



史卫民 何岚 著

知青备忘录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史卫民 何岚 著

知青备忘录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史卫民，何
岚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

ISBN 7-5004-1856-6

I. 知… I. ①史…②何… II. ①知识青年工作-史料-中
国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平事迹-中国 IV. D43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22960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75 插页：2

字数：387千字 印数：1—10000册

定价：19.60元

过去的，未必没有永恒；存在的，未必永远留世。回忆，可能留下点点余晖，但黑土地上的热血、青春，将是超世纪的话题。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

作为支边生活的亲历者，作为苦乐衰荣的过来人，云南的生活成为他们永恒的话题。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

我不希望历史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重演，却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了解我们的历史。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

宣讲过去，旨在使人们对今天的生活充满热爱，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

前 言

在1966-1976年的“十年动乱”中，曾掀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403万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告别父母家人，离开城市，前往“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1048万插队或回乡知识青年被安置在农村社、队里，126万知识青年被安排在新组成的青年集体场队中，另有229万知识青年，被国营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所接纳。

生产建设兵团，很快成为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在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

生产建设兵团有大批安置知识青年所需要的最完备的组织系统。除了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组建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广州、兰州、安徽、江苏、福建、浙江、山东、湖北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建（生产）师，分别由各大军区或省军区直接领导，基本取代了原来由农垦部领导的国营农牧场系统。生产建设兵团自成体系，既有严密的军事化编制，又是农、工、商企业的集合体，财源充足，机械化程度高，不仅能够解决成批知识青年的食宿问题，还具有大规模组织青年投入生产拓荒、发展经济的雄厚实力。

生产建设兵团有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所需要的坚强领导力量。解放军各大军区、省军区抽调了上万名现役干部进入各生产建设兵团，担当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并留用了数万名地方干

部配合工作，在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方面的领导力量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

生产建设兵团的任务是相当明确的，既要推动边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组织大农业生产起表率作用，又要承担教育知识青年的职责，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还要担负保卫祖国边疆的重任，充当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

这是在特殊环境下组织得最好的一场大胆试验，是把发展农垦事业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大规模尝试，它的成功无疑将会影响未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流向。国家为这个试验付出了近 80 亿元的代价。但是结果如何呢？

这场试验归根结底是失败了，并且败得很惨。到 1976 年，所有的生产建设兵团和生产师全部被撤消，全面恢复过去的国营农场建置，原因很简单：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不是发展大型国营农业企业的合适模式，也不可能超量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试验是不可能成功的。

失败的教训足以警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历史需要合理的解释，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生产建设兵团，症结一定会通过知识青年问题反映出来，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从知识青年的角度来陈述近十年的生产建设兵团史，应该可以得到人们的理解。

对生产建设兵团的描述首先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随即出现在新修的各种地方志和有关军、农垦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专著中。文学作品中既有片断的回忆，短篇、中篇甚至长篇小说，也有气势宏大的纪实文学；但是，文学终究不能替代历史，我们同样需要一部真正的历史！这里献给读者的，就是在各种有关著作基础上经过认真加工的、力求全面叙述十年动乱期间生产建设兵团兴亡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命运的一部信史。随着各种著述的增多，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资料能够补充到这本书中来，我们也真

诚地希望能有史料更确切、内容更丰富的生产建设兵团史问世。

本书分为16章，不但从各个层面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历程，还收录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既具有可读性，也具有保存价值。

我们由衷地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资料室、中国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为本书搜集资料提供的大量帮助，感谢刘小萌、定宜庄、许敏、黄正建、杨玉文、刘连恕、穆凤兰、申丽铭、杨兰平、李大友、诸平等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对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同志表示感谢。

作 者

1994年10月13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时代的产物	(1)
一	“全国山河一片红”与“知识青年再教育”.....	(1)
二	屯垦戍边，寓兵于农.....	(6)
三	十二个兵团，三个生产师.....	(10)
四	兵团组织模式.....	(22)
第二章	兵团知识青年	(28)
一	“解放军序列”中的知识青年.....	(28)
二	“绿色的召唤”.....	(33)
三	安置费——400元.....	(50)
四	“要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	(53)
第三章	工作队、生产队、战斗队	(58)
一	建设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	(58)
二	不搞经济核算不行.....	(62)
三	难推行的“评工记分”.....	(68)
四	兵团管理体制.....	(78)
第四章	向大地要粮	(81)
一	开垦荒地与治沙造田.....	(81)
二	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	(86)
三	小镰刀大战机械化.....	(91)
四	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过“黄河”.....	(103)

第五章	“争气胶”与多种经营 ·····	(118)
一	打破植胶禁区·····	(118)
二	高产数字后面的隐忧·····	(124)
三	水田中的苦难历程·····	(130)
四	茶棉生产与多种经营·····	(134)
五	草原上的牧羊人·····	(138)
第六章	亦农亦工 ·····	(142)
一	铺开工业摊子·····	(142)
二	废除“管、卡、压”之后·····	(148)
三	农业亏损工业补·····	(156)
第七章	准备打仗 ·····	(160)
一	“时刻立足于打”·····	(160)
二	“身穿绿军装，一人一杆枪”·····	(164)
三	“紧急集合”·····	(167)
四	珍宝岛——十万火急·····	(173)
第八章	路线是个纲 ·····	(178)
一	“天天读”雷打不动·····	(178)
二	“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	(185)
三	争“四好”，创“五好”·····	(188)
四	“支部建在连上”·····	(195)
五	共青团——做好党的助手·····	(199)
六	入党与提干·····	(204)
第九章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	(220)
一	“大批判”开路·····	(220)
二	“一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	(225)
三	形形色色的政治案件·····	(232)
四	“林彪事件”的影响·····	(237)
五	勇敢的“上书人”·····	(240)

六	“王亚卓事件”	(242)
第十章	扭曲的生活	(246)
一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246)
二	“兵团绿”	(248)
三	“蓝天作帐地作床”	(253)
四	关于“吃”的故事	(259)
五	萌动的青春	(269)
六	苦恋	(274)
七	病伤的困扰	(279)
第十一章	文化贫乏综合症	(284)
一	兵团报纸	(284)
二	“样板戏”与看电影	(291)
三	歌喉引来的麻烦	(296)
四	偷读“禁书”与“地下文学”创作	(301)
五	侃大山、起外号、打扑克	(305)
六	学文化	(310)
第十二章	全国知青会议	(312)
一	水火无情	(312)
二	李庆霖告“御状”	(320)
三	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	(323)
四	“成绩讲够，问题摆透”	(331)
五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36)
第十三章	敢问路在何方	(340)
一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两招一征”	(340)
二	征兵工作面面观	(343)
三	“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350)
四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	(355)
五	地震大逃亡	(360)

六	“兵团战士苦菜花”	(365)
第十四章	走出误区	(374)
一	改变体制势在必行	(374)
二	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全部被划掉	(378)
三	“来时雄赳赳，走时灰溜溜”	(384)
四	位卑未敢忘忧国	(387)
第十五章	知青大返城	(392)
一	高等学府的召唤	(392)
二	北京、天津敞开了大门	(397)
三	上书、卧轨、大请愿	(407)
第十六章	青春祭	(424)
一	百感交集离别情	(424)
二	心中的碑	(426)
三	“知青文学”与“兵团文学”	(431)
四	你我风雨同行	(442)
附录一	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	(449)
附录二	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建制表	(462)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462)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468)
3.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472)
4.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	(474)
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475)
6.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	(477)
主要参考书目	(484)

第一章 时代的产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狂澜骤起——生产建设兵团出现在全国 18 个省、自治区——现役军人构成主要领导力量——复员转业军人、原国营农场职工、知识青年，统一编入新的体制

一 “全国山河一片红”与 “知识青年再教育”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这是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最后成立的两个革命委员会。从 1966 年夏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完成了重大的使命。9 月 7 日，在北京举行了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也就是说，大规模的红卫兵和群众造反、夺权乃至“打派仗”运动至此宣告结束，以后的运动需要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生产和生活等也要逐步走向正轨。

但是，整个社会没有就此安定下来，成堆的问题急待解决，其中就有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因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滞留在城市的数百万中学毕业生，如何安置？

众所周知，40年代末和5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高涨，给中国社会带来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按照1964年的人口统计数字，从1947—1959年共出生219848894人，占当时全国人口694581759人的31.65%。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2亿多人正处于接受中学和小学教育的年龄段；而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这代人将走入社会，找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位置。

根据教育部对招生人数的统计，1966年全国在校的中学生人数为：初中在校学生共计849.9万人，其中城市学生335.2万人，县镇学生215.2万人，农村学生299.5万人。高中在校学生共计133.1万人，其中城市学生为56.8万人，县镇学生64.8万人，农村学生11.5万人。

骤然兴起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近千万中学生的学业。他们被作为革命的动力之一过早地引入社会，成为风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基础力量。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革命之时，显然忽视了中学毕业生的出路问题。从1966—1968年，全国本应有983万初、高中生分批毕业，但受到运动的干扰，1966、1967两年，只有54.8万高中生毕业（应毕业97.2万人），348.4万初中生毕业（应毕业550.1万人）。同时，上千万小学生已经升入中学（1966年，升入初中的有272.7万人；1967年，升入初中的为198.3万人；1968年，升入初中的高达648.5万人），致使1968年的在校中学生人数达到了1392万人，并有79.4万高中毕业生和519万初中毕业生需要安置；1969年，又有1023万人要升入初中，并有399.4万名初、高中生面临毕业分配；此后数年内，同样每年都要有上千万人升入中学。

决策者既要面对在学校待分配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学毕业生，

又要应付滚滚而来的数以千万计新升入中学的学生，一点也不能拖延了。在当时的形势下，显然不可能把大批初中毕业生送入高中继续学习，因为高中的容量有限，在文革以前最正常的情况下，每年高中的招生人数一般是40余万人，最高也不过60余万人，何况受“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学的教学秩序已彻底被打乱，高中毕业生也同样面临出路问题。由于经济受到破坏，城镇就业机会锐减，更为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增加了困难。如果考虑去掉农村和县镇的中学生（绝大多数回乡务农），城市几百万中学生必须尽快安排去处，否则大批游荡的学生将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无论是新成立的各地区革命委员会，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都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毛泽东早就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化大革命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为解决城市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把滞留在城市的知识青年成批转移到农村去，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既减轻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压力和负担，也等于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假如他们还能给国家创造一些财富，那就更理想了。这样的安置方法，对近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个体来说，可能是不近情理的，但对国家来讲，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总理在9月7日北京市革命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其中已经谈到了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也就是说，中央已经基本确定了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政策，需要的只是具体落实和进行动员了。实际上，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都已开过专门会议，研究迎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问题。

动员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插队落户，需要给他们注入

新的革命热情，画出一幅美好的前景。在“个人迷信”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只有毛泽东的话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尤其是要发动一场涉及全国城乡的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人们无限崇拜的毛主席发出号令是最合情理的。这个时刻很快就来到了。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说法：

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工宣队、军宣队继续对学校、科研机构进行管理、改造的同时，贫下中农亦进军上层建筑领域，对学校进行管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与动员，也颇为热烈起来。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辽宁省新金县革命委员会的文章，更鲜明地提出了“下乡知识青年必须由贫下中农给以再教育”的说法。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的如下讲话：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泽东的这一“最新指示”，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2月23日，《人民日报》以《亿万军民热烈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为题，做了如下报道：“……游行队

伍、宣传队伍、报喜队伍川流不息。许多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连夜召开会议，认真学习，热烈讨论，并立即制定落实措施。不少地方的革委会当晚发出通知，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争做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有些地区召开了几万到十几万人的动员大会，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新高潮……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天津、武汉、济南等城市今天又有一批知识青年兴高采烈地奔赴农村安家落户。各城市还有更多的大、中学毕业生即将奔赴农村。许多学校里贴满了学生要求到农村去的大字报、决心书。北京有的学生豪迈地表示：‘手捧红书离北京，立志扎根工农中，广阔天地炼红心，忠心绣出宇宙红！’……各地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表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教育知识青年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教导，最热烈地欢迎广大知识青年和城乡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从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劳动上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尽快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同我们一起把农村这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其他各大报纸也纷纷报道人们积极响应号召、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烈场景。各城市的红卫兵组织和中学革委会等，也迅速发出了“动员令”。

实际上，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已有近2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后仅半年，又有1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69—1973年，预计要有8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按照1975年1月18日新华社的正式报道，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已达1200万人。此后几年又有近500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总人数接近了1700万的水平。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运动，显然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

是另一种革命的尝试。知识青年到基层去进行锻炼，与劳动人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缩小产生“修正主义”的种种社会差别，符合毛泽东对革命接班人的一贯要求；知识青年大批离开城市，大大减轻新生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压力，使得学校的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的秩序尽快恢复，又会成为稳定全国形势的有利因素。但是，设计一场革命是一回事，具体安排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是另一回事。几百万知青在短短几年内从城镇涌向农村和边疆地区，无疑会给当地带来很大的压力，并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能否借助解放军的力量，“消化”一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减轻其他方面的压力？中央想到了军队，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二 屯垦戍边，寓兵于农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农垦、军垦系统，由农垦部（设于1956年6月）管理。1965年，农、军垦系统包括2062个农场，146个工厂，28个建筑企业，26个运输企业，48个商业企业，拥有职工共260余万人，隶于本系统的人口达660余万人。军垦农场、企业多由解放军生产部队或复员、转业官兵开辟，后来又吸收了大量“支边”（支援边疆建设）的内地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农垦农场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复员、转业或残废军人建立的农场，组织形式采取地方编制（下辖分场、生产队）；二是知识青年垦荒队和“支边”青年开辟的农场；三是国家建立的“劳改”农场，安排犯人劳动和刑满释放人员就业。此外，还有不少农民和“盲流”（流动人口）被吸收进了农垦系统。

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师被用于农业生产，建立了一批农场，分布在甘肃、宁夏、山东、江苏和新疆等地。我们可以把此当作建国后大规模军垦的开始。

1954年，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提出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批准。当年12月5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下辖8个农业师，43个农牧业团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发展军垦提供了完整的组织形式。根据周恩来、陈毅的指示，生产建设兵团应该做到：

（一）政治工作方面，强调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认真改造知青，把农场变为学校。

（二）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要贯彻多种经营方针，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工业产品质量，农场建设不要城市化。

（三）武装工作是兵团的重要工作之一，劳武结合是个最好形式。

（四）民族团结一定要搞好。

（五）接收复员军人、支边青年，是兵团的一项政治任务。

（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

周恩来还特别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词，归纳了上述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1963—1965年，新疆兵团的形式被推广，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甘肃、青海、宁夏和陕西农业建设师，由新疆兵团抽调干部帮助组建新师。由于当时新疆兵团已有十个农业师的建制，新编农建师被续称为十一、十二、十三和十四师。在西藏自治区则组建了扎木农建师，由西藏军区生产部管辖。

1966年2月，中央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组建华北农垦兵团，内蒙古军区筹建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3月，沈阳军区在

黑河和合江地区建立了两个农建师。在边疆地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农垦事业，已成为军队的一个重要任务。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农垦部机关不久即因参加“革命”而停止工作，农、农垦系统亦因不停地“造反”、“夺权”和“打派仗”而陷入混乱局面。处境最恶劣的是那些新建立起来的农建师。1965年参加宁夏农建十三师的北京知识青年，借“批判”旧北京市委的名义，声称他们受了骗，在他们笔下，十三师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去的只是在荒凉的沙滩上挂着“农垦”名义的地方农场，几年前曾是惨害浙江支宁青年的“人间地狱”，一些国民党匪兵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的“首长”。我们没有学习条件，很少报纸，没有证件，只有一张赖以活命的餐证。我们还受着私设“劳改场”的威胁。我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却要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十天一休息，没有任何福利待遇，看病要跑几十里沙滩，如遇急病，一命呜呼！*

青海农建十二师的知识青年也因为生活待遇问题引出种种矛盾，青海省军管会特别于1967年4月14日向国务院请求处理办法，国务院7月11日复电：“关于农建十二师青年的待遇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继续实行供给制不变，待中央定出新的分配制度以后，再按新制度执行。”

不少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其他地区农建师的知识青年，

* 引自宁夏农建十三师一团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队、毛泽东思想红旗兵第一支队：《强烈控诉旧北京市委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滔天罪行》，《农垦战士》1967年1月18日（油印传单），编入《红卫兵资料》第4卷，第755—756页。

乘“大串连”或“造反”的机会，返回家庭所在城市，有的人甚至在各游荡。国务院不断发出通知，敦促他们回到边疆去，并对回程的路费等作出了安排。

从1967年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生产，支援农业生产和军事管制、军事训练），为恢复农垦事业提供了契机。大力发展军垦，甚至由军队取代地方直接管理垦场，在规划者眼里，至少可以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地方的党政机关多被“夺权”，只有军队还保持着原有的组织系统。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各地农场的秩序和生产，并组建新的农场，必须摆脱文革“造反”、“夺权”和“派性”的干扰，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借助军队的力量。在“有令即行，有禁则止”原则指导下的军队管理体制，能够解决当时地方党、政机关（包括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旧垦荒人员归队、征调和补充新垦荒人员（尤其是补充现役和复员、转业军人）、调配生产物资，等等。各垦场内部的矛盾，亦可由军队按其常规方法较快解决。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战争空气日益浓厚，战备工作加紧进行。在这种形势下，军队着手大量接收、改造边疆农场，尤其是劳改农场，更新人员，充实力量，实行军事编组，能够使军、农垦队伍成为一个庞大的“准军事力量”。这样，从形式上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并没有大幅度增加（到1974年底，解放军正规部队总数额为610万。而据1972年9月的统计，全军总人数为600万，其中51%是作战部队，计306万人），但可以增加一个人数与正规部队差不多、并且直隶于军队管辖之下的“后备力量”。一旦战争爆发，这支力量既可以补充正规部队，亦可能直接参战。

文化大革命对生产的破坏，有目共睹。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秩

序，尤其是重建对农垦系统的管理，增加粮、油产量，已是国家当务之急的目标。国家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在军队的干预甚至直接指挥下，尽快扭转被动的生产局面。

借助军队力量，利用原有农、军垦农场的条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还可以解决一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问题，减轻各大、中城市的压力。

尽管原有的和正在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尽快发挥兵团大量吸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效用，因文化大革命而受阻的组建新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还是重新启动并迅速铺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边设计，边施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各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大多是这样的产物。

三 十二个兵团，三个生产师

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是在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下进行的，部分省级军区协助组建工作。卷入这一工作的有北京、沈阳、新疆、兰州、南京、广州、福州、武汉、济南、昆明、广西、西藏等军区。

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发表前后，组建新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组建新的生产建设兵团，大致采取以下步骤：

（一）军区领导人和地方党、政领导人会商建立兵团的计划，了解当地农牧场的情况，并派出人员对拟建新场的地方进行考察，随后军、地领导机关共同拟定组建兵团的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建立新兵团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如无异议，即发出通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出），批准建立兵团，并对所建兵团的隶属关系、发展规模等作出具体规定。

任命兵团的负责人。

(二) 军区和地方领导人接到中央批示后,着手进行新兵团的组建工作。军区方面抽调所属部队现役干部短期训练,说明建立兵团的意义,介绍所在地区情况,并搭成兵团各级领导机构架子,任命各级干部。对准备参加兵团的士兵进行教育,办理复员手续。地方方面,通知指定农场冻结人事关系(人员不准调入调出),清点资产,准备兵团接管。

(四) 兵团分期分批接管指定农、牧场,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原农、牧场领导机构撤消,大多数地方干部留在兵团,少数在地方重新安排工作。一般农场职工符合兵团人员条件者加入兵团,劳改就业人员择优留用(所谓“优”者,指家庭出身好,判刑时间短,刑满释放后劳动表现较好等),在押服刑犯人一律由地方公安部门负责转往他处。

(五) 派出部分干部前往各大城市招收知识青年。招收工作由兵团和所在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共同负责,成立专门机构,对申请参加兵团的知识青年进行审查审核。招收知青的数额,由地方和兵团共同商定。

(六) 知识青年陆续到达团场、连队,建立基层组织,明确管理体制。

(七) 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兵团成立。

按照这样的模式,从1968年开始,到1970年10月止,全国新组建了11个兵团,加上原有的新疆兵团,共计12个兵团和3个独立师,拥有干部、战士242万人,连同家属共有485万人,拥有耕地近4000万亩,成为当时兴办国营农场的主要形式。

各兵团的组建情况如下: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12月5日,基本保持军队

的组织形式。兵团下辖 8 个农业师、1 个建筑工程师和 1 个运输处，总人口 17.5 万人，职工为 10.5 万人。新疆兵团由国务院农垦部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双重领导，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农垦组织。

50 年代后期及 60 年代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量接收支边青年，吸收自动来疆人员和安置职工家属、子女，并接收了部分来自甘肃等地的移民与劳改犯人，人口迅速增加。到 1961 年底，兵团职工总数达 50.3 万人，总人口为 86.6 万人。

1969 年 8 月 23 日，农垦部军代表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改变农垦部直属垦区和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报告》，请求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生产建设计划、物资供应等由农垦部下放，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军区负责，建制仍在新疆军区之下，得到了批准。新疆兵团的组织系统因此稍有调整，并调入了一批现役干部，司令部仍设在乌鲁木齐市。至 1971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建有 10 个农建师，149 个农牧业团（详见本书附录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建制表”）和 181 个独立的工矿企业单位，总人口达 200 万人，职工近 90 万人，其中农牧业职工近 65 万人。职工队伍的大体构成是：原进疆部队的干部、战士近 1.5 万人，起义人员 3 万余人，复员转业军人 7.8 万多人，支边人员 26 万人，自动流入人员 22 万人，职工家属、亲属就业的 15.5 万人，新接收的知识青年约 7 万人，刑满就业人员 8 万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生产建设兵团，但早已自成体系，与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本书不拟过多叙述该兵团的情况。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在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地区）、松嫩平原（大、小兴安岭以南）和牡丹江平原（从完达山到

兴凯湖)，有纵横千里的大片荒原。人们把这片气候寒冷、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大荒原统称为“北大荒”。建国之后，北大荒成为农垦开发的重要地区之一，荣军农场（安置残废军人和部分转业军人）、解放团农场（安置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友谊农场（由苏联援建）等先后建立。1955年，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开始在北大荒建立军垦农场；1958年，7万多名复员、转业军人进入北大荒，大规模开辟军垦农场，设立了牡丹江农垦局（即铁道兵农垦局）和合江农垦局。1962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东北农垦总局的决定》，牡丹江与合江农垦局合为东北农垦总局（局设佳木斯）。总局为农垦部的直属局，同时受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黑龙江省委的领导。1963年1月1日，东北农垦总局正式成立，下设虎林、密山、萝北3个分局，1964年增设饶河分局。总局下属共有36个农场。

196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东北局，原则同意在黑龙江省仿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做法，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谭震林副总理召集会议，专门讨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问题。3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筹建。沈阳军区所属部队10769名干部、战士转业到黑龙江省，分别前往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水产局所属的29个边境农、牧、渔场，编组成农建一师（黑河）和农建二师（合江），共辖9个团、24个营和94个生产连队。1967年7月4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委托黑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和黑河军分区领导农建一师。

1968年2月24日至3月3日，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会议，并于3月9日向中央呈报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筹建情况的报告》。筹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拟编5个师，辖58个团，76个营，1293个连，共有职工24.5万人，耕地1239万亩。兵团机关驻佳木斯市，受沈阳军区领导，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代管。组建工

作拟在年底以前全部完成。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同意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军区的报告，决定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建制划归沈阳军区，由沈阳军区委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领导。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及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仍列入国家计划。

5月30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连以上干部代表大会，宣布兵团正式成立。兵团共接收国营农、牧、渔场93个，合编成5个师，辖58个团，76个营，1300个连队，共有职工25.5万人。黑河地区的20个农场，编为第一师，下设7个团，职工2.2万人；合江地区松花江以北的11个农场，编为第二师，下设10个团，职工4.7万人；合江地区松花江以南、完达山以北的17个农场，编为第三师，下设15个团，职工9.5万人；牡丹江地区的14个农场编为第四师，下设12个团，职工4.2万人；嫩江地区的22个农场，编为第五师，下设12个团，职工3.9万人；兵团司令部还直辖3个独立团和3个独立营。8月15日，生产建设兵团及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公章开始使用。1969年，又在三江平原东北部的抚远荒原新建了6个团，并将原属第三师的4个团划出，合编为第六师。按照1970年底的统计，黑龙江兵团兵团职工和战士总计57万人，配备解放军现役干部2978人，非现役干部31414人，连同职工家属在内，总人数达118万人。当时的建制为6个师，69个团及相当于团的单位12个（详见本书附录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团以上单位建制表”），142个营及相当于营的单位174个，2387个连队和相当于连的单位298个。1972年，黑龙江兵团总人口达125万人，职工60万人。

3.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内蒙古自治区，曾是中国的“大后方”，不但在这里建有大量的“保密工厂”，亦有不少的垦殖场（包括劳改农、牧场）。至文化大革命前，内蒙古已建立了79个农、牧场。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大后方变成了“反修”前线，战备工作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内蒙古军区当时虽然是全国的大军区之一，但是直辖军队较少，已经不适合现代化战争的需要。为加强战备和边疆建设的需要，1966年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由内蒙古军区负责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区副司令员刘华香负责筹建工作，组成领导小组，兵团司令部设在巴盟的包尔套勒盖，并在此后征集了部分人员和建设了一些基本设施。

由北京军区在1966年年初开始组建的华北农垦兵团，司令部设在山西省大同市花园屯，接收了雁北地区的山阴、阳高、天镇、朔县等农场、马场，先后设置了12个团。1967年7月，经过整编后保留了6个农业团和3个工业团，总人数为13200人。1968年10月，华北农垦兵团将位于天津塘沽地区的第十一团移交给了天津市。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华北农垦兵团都没有达到原来的设计目标。1967年5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军区降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领导。1968年9月20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建立自治区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学校总校及第一、二、三、四、五分校。毛泽东思想大学学校准备安置下放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着手进行接收国营农、牧场的工作。但不久北京军区即设计出了将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与北京军区华北农垦兵团合并，建立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方案。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了兵团筹建小组。

196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

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分校及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华北农垦兵团大部一同并入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各级领导班子，率领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郭勒盟等地接管国营农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规划为6个师的建制，每个师辖10个团，每个团辖10个连队。

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司令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当年，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接收北京、天津、上海、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万余人，全兵团在职人员达7万余人。1970年，又组建了2个师，15个团。按照原来的规划，一、二、三师设在内蒙古西部的巴彦淖尔盟、伊克昭盟境内，四、五、六师设在内蒙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境内；由于锡林郭勒盟草原地区不适于发展农业和超量发展畜牧业，内蒙古兵团不得不将四师从锡林郭勒盟迁到了巴彦淖尔盟，使“东三师、西三师”的格局变成了“东二师、西四师”的态势。1971年，内蒙古兵团已有41个团（包括2个工业团和4个相当于团级的工矿企业，详见本书附录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团以上单位建制表”），职工为10.1万人，其中有知识青年7.55万人，复员转业军人和留场职工2.57万人，现役军人近6千人，另有家属3.8万人，共计14.5万人。1972年，内蒙古兵团总人口为17万人，职工（包括知识青年）13万人。至1975年，内蒙古兵团下设农牧业团35个，厂矿企业单位34个，在职人员11万余人。

4.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当年2月25日至3月2日，在兰州召开了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

立大会，兵团下辖6个师，57个团场。8月，兵团司令部由兰州迁到甘肃省武威黄羊镇。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唯一的跨省兵团，原农建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师和林建二师，均划归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建制之下，各师由所在省（自治区）革委会、省军区和兰州兵团双重领导。

在甘肃省的河西地区发展军垦事业的动议于1958年正式提出，并成立了甘肃省军垦筹备委员会，将1个师1万余人调入了垦区。原来设想建立河西生产建设兵团，或是建制划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下，并专设新疆兵团河西管理处。1963年10月30日，农垦部批准在甘肃河西地区建立农业建设第十一师，直属甘肃省委和农垦部双重领导。十一师师机关设在酒泉，先后接收了河西地区的24个国营农、牧场。1964年和1965年，十一师为下辖单位确定番号，包括工程团、一团（黄花农场、花海农场）、二团（蘑菇滩农场）、三团（边湾农场）、四团（老寺庙农场）、五团（黄羊河农场）、六团（小宛农场）、七团（西湖农场）、九团（生地湾农场）、十团（四坝农场）、第一牧场（鱼儿红牧场）、第二牧场（宝瓶河牧场）等单位。1966年，十一师又接收了河东地区的14个国营农牧场，编为十一团和十二团。

1969年11月1日，兰州兵团决定将十一师改编为两个师。农建第一师师部设在玉门镇官庄，下辖酒泉地区的7个农业团、1个工程团和1个牧场，职工2.8万人，总人口4.1万人。农建第二师师部设在河西堡，下辖张掖、武威、天水地区的5个农业团和1个牧场，职工1.6万人，总人口2.7万人。1970年初，兰州兵团又调整了一、二师下属各团的番号（详见本书附录五“兰州生产建设兵团一、二、四师团以上单位建制表”）。

青海省军垦筹建处成立于1965年3月。1966年5月，筹建处由西宁迁到格尔木，在原格尔木劳改农场基础上组建了青海省农

建十二师，下辖3个农业团和1个工程团。1970年12月，农建十二师改为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四师，仍下辖4个团。

1952年2月，西北军区将属下的独立一师改编为农建第一师，在宁夏贺兰山区开辟农场。1959年和1960年，浙江省6000名知青参加了农垦行列。1965年，4800多名北京知青和2000名天津、杭州知青也参加进来，于是中央即有了组建宁夏十三师的动议。当年5月1日，宁夏自治区党委批准建立农建师。1966年1月，宁夏农建十三师正式成立，隶属宁夏军区。1970年初，农建十三师改称为农建五师，划归兰州生产建设兵团管辖。农五师下辖平吉堡、黄羊滩、南梁、前进、暖泉5个团场和银川糖厂、大武口建材厂、银川灰砂砖厂等5个企事业单位。

1965年组建的陕西农建十四师，1970年改为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六师，仍驻陕西境内。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林业部所属单位抽调部分人员分布在黄河中游人烟稀少地区，并安置一些下乡城镇知识青年，专门从事水土保持工作，治理水土流失。1965年8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建立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设兵团，陕西、甘肃、宁夏分别建立水土保持建设师。甘肃水土保持建设师1965年10月在平凉筹建，1966年3月改名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第二师，当年师部由平凉迁往西峰镇。1969年，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撤消，林二师划归甘肃省军区代管。1971年7月，林二师纳入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定名为林建师，下辖4个团，1个直属农场，全师职工6741人，总人口11672人。

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云南是国家重点开发的垦区之一。1955年，由4000余名复员转业官兵开辟了9个军垦农场，于1957年划归省农垦局统一领导。1960年，云南省的国营农场达90个，职工总数为7.8万人，

总人口 14 万人。1963 年，全省农垦农场撤并缩减为 40 个，职工减到 6 万人。

1969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0 年 3 月 1 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建制归昆明军区，行使军级权限，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军区领导。生产建设兵团在原农垦分局、总场、农场、生产队的基础上，组建成 4 个师，23 个团，116 个营，1038 个连队，4 个直属企事业单位（详见本书附录六“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建制表”）。1969 年 10 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建立的 5 个水利工程团，划归云南兵团领导。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思茅，一师所属团场集中在西双版纳州内，二师各团场分布在临沧地区内，三师大部分团场设在德宏州内，少数团场设在保山地区，四师的团场分布在红河等地区。到 1972 年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干部、战士、职工共计 18.7 万余人，总人口达 29.6 万人（包括原农场 9 万余人）。

6.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

广东也是国家重点开发的垦区，军垦亦开始较早，主要经营橡胶树种植业。1951 年 11 月，在广州成立了华南垦植总局。1952 年 3 月，由 2 万多名解放军官兵组成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一师开发海南岛，二师开发雷州半岛。1960 年后，又有大批复员、转业军人进入海南岛。至 1966 年，海南岛已有橡胶农场 90 多个。

1968 年 8 月 15 日，广州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筹建领导小组。1969 年 3 月 19 日，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成立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1969 年 4 月 1 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归广州军区建制领导，接受当地革命委员会领导和监督。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总部设在海南岛海口市，接管了原海南、湛江的国营农场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兵团按部队编制，下辖10个师，148个团（橡胶团131个，茶叶团3个，剑麻团2个，油棕团2个，谷物团8个，水果团2个，详见本书附录七“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团以上单位建制表”），3个独立营。1971年，全兵团拥有职工43万人，其中橡胶工人29万人，总人口达92万人。

7.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大革命前，安徽省建有22个国营农场，职工5万余名，耕地63.3万亩。1966—1969年，农场生产滑坡，亏损上升。1966年粮豆总产量1.59亿斤，工农业总产值4802万元，亏损583万元。1969年，粮豆总产量9022万斤，总产值为3712万斤，亏损高达2531万元。

1969年9月17日，建立安徽生产建设兵团，隶于南京军区之下。兵团接管了31个省属国营农场、茶场、林场和省公、检、法系统所属的11个农场单位。兵团下编4个师，43个团，兵团司令部设在合肥市。

8. 江苏、福建、浙江、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9月，设立江苏生产建设兵团，隶于南京军区之下，兵团司令部设在盐城，下辖4个师，40个团。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接收知识青年5万人，主要来自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常州、徐州、海州、上海等地。当年，还设立了福建生产建设兵团，隶于福州军区之下。1970年5月7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隶于南京军区之下，下设3个师，15个团，辖6万余人。同年10月18日，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设3个师，20个团，由济南军区领导。1971年，武汉军区组建了湖北生产建设兵团。

除了成建制的生产建设兵团之外，还有独立农建师的建制。1965年在西藏波密镇设立的扎木农建师，下辖察隅、米林等农垦团；196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遣3000多人进藏，建立了易贡农垦团，西藏军区生产部还专门设立了工程团。1968—1970年，工程团调入四川，易贡农垦团的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员撤回新疆，补充了近2000名知识青年。1970年底，西藏军区生产部改名为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师，实行地方、军队双重领导，下设江孜、山南、八一、澎波、林周、雪巴、米林、易贡、察隅9个团场。1969年，江西在垦植场的基础上组建了江西农业建设师，下辖8个团，由江西军区领导。1970年，在广西亦组建了直属于军区的生产师。

1970年，全国规模的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基本完成，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建师，分布在18个省和自治区。

表1-1 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建制表

兵团名称	所属军区	辖师	辖团场数	成立时间	撤消时间
新疆	新疆	10	149	1954	1975
黑龙江	沈阳	6	88	1968	1976
内蒙古	北京	6	45	1969	1975
兰州	兰州	6	57	1969	1973
江苏	南京	4	40	1969	1975
安徽	南京	4	43	1969	1975
浙江	南京	3	15	1970	1975
广州	广州	10	166	1969	1974
福建	福州		28	1969	1974
云南	昆明	4	32	1970	1974
山东	济南	3	20	1970	1975
湖北	武汉			1971	1972
西藏生产师	西藏		9	1970	1979
广西生产师	广西		12	1970	1974
江西农建师	江西		8	1969	1975

四 兵团组织模式

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系统，基本采用军队编制，但多少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在人员构成方面则具有不同于正规军队的特殊性。

1. 兵团、师两级领导机构

各生产建设兵团多将司令部设在所在省会、自治区首府或垦区的中心城镇。司令部的驻地，或是接收原农垦局机关的办公楼和宿舍，再加以维修、扩建，或是接收在文化大革命中撤消的学校，将教室和学生宿舍改成办公等用房。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部，就设在佳木斯市内原东北农垦总局大院内，黑龙江兵团撤消后，这里又成了农垦总局的所在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呼和浩特市原内蒙古自治区党校院内，党校的办公楼、礼堂、教室、宿舍等都被兵团征用，兵团还在附近盖了一些宿舍；内蒙古兵团撤消后，内蒙古自治区党校恢复，内蒙古农管局只接收了党校院外兵团盖的房子。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思茅原0284部队营房内。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总部设在武威黄羊镇原甘肃省畜牧兽医学校内。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合肥市内的原合肥工学院内，大多数教室被改成了宿舍和办公室；几年后，兵团撤消与合肥工学院恢复同步进行，教室等又恢复了旧日的面貌。

司令部的领导干部包括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等，通称为“兵团首长”。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生产建设兵团要在党委领导下，建立精干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领导机关。兵团主要领导干部可由黑龙江省军区负责人兼任”。后来设立的生产建设兵团，也采用了同样的领导体制。兵团

机关一般设立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令部设参谋长、副参谋长；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后勤部设部长、副部长。部下辖各处，设处长、副处长，并根据需要设置若干参谋、干事。为突出兵团的生产特性，有的兵团后来把后勤部改成了生产建设部或专设生产部。

兵团机关大多有一个直属警卫通讯营或警卫通讯连，负责兵团机关的保卫工作，或者由兵团直属团的武装连专门负责司令部机关的保卫工作。

兵团下辖各农建师的师部，大多设在垦区市镇内。师长、师政委、副师长、师副政委、师参谋长等，通称为“师首长”。各师亦设司、政、后三部，各部下设处或科。师部大多设一个武装排（或称警卫排）负责保卫工作，并建立一所医院。

兵团、师两级机构中的司、政、后机关，职能相同，下设处、科的设置也大体相同，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设置是兵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司令部下辖作训处、军务处、生产处、基建处、管理处及直属警卫排。政治部下辖组织处、干部处、秘书处、保卫处、宣传处。后勤部下辖卫生处、机运处、财务处、军械处、供销处。1974年，兵团后勤部改为生产建设部，下设计划处、农牧处、工业处、劳资处、基建处、供销处、财务处、机运处等机构。又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师机关1970年5月的建制是：司令部，下设作训科、侦察科、炮兵科、通讯科、军务科、计划建设科、生产科、管理科，直属单位有水泥厂、研究所、干训队、卫生队、警通连、气象站、副业连、商店、招待所。政治部，下设秘书科、组织科、干部科、宣传科、保卫科、直工科，直属单位有印刷厂、看守所、电影站、托儿所、学校。后勤部，下设政治处、战勤科、物资科、商业科、供应科、卫生科、装备科、营房科，直属单位有工业一连、工业二连、供应站等。

2. 团场和连队

兵团的团场，设立团部或场（营）部，自成体系。下面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建制：

团首长：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

司令部设参谋长，下设生产、军务、管理、计划、作训、通讯 6 个股。

政治处设主任，下设干部、宣传、保卫、组织、文教 5 个股。

后勤处设处长，下设供应、装备、物资、营房、商业 5 个股。

黑龙江兵团的其他团场机关，设置大体与此一致，只是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增减股的建制而已。其他兵团也采用大致相同的机构设置，但有的团场专设生产处，如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下属各团，都设有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生产处。

团（场）部一般设有下列直属单位：

卫生队 负责全团场的医疗保健工作。卫生队中既有军医，也有来自地方的医生，护士和卫生员则大多由经过短期培训的知识青年担任。团卫生队的条件比较简陋，只能医治常见病和动小手术，遇到危难病人，必须送往兵团、师医院或地方大医院治疗。

军人服务社 俗称“小卖部”，卖食品、烟酒和日用品等。

运输队 或称汽车队，为团机关运送物资、传递公文和接送团首长，有的团设机运连，掌管全团机动车辆和农业机械；机械化较高的团场，甚至有机运营的建制。

兽医站 农、牧业团大多设站，并有专职兽医。

电话班、电工班 负责全团通讯、用电等业务。

草料场和仓库等。

在团级建制之下，多数兵团把营作为常规建制，一个营相当于过去的一个农场或分场。有的兵团则不把营作为常规建制（如内蒙古兵团），但保留一些特殊的营级建制，如建立直属的基建营、直属工厂等。工业团的大厂（两个连队以上），也建立营级的厂部，营设营长（或厂长、矿长）、教导员及其副职。营级单位无参谋、干事等职，下设科或室分管业务，如生产科、政工科、技术科、办公室等。

连队是兵团最基层的组织，全国兵团系统建有 1 万多个连队。连队下设排、班，组织机构如下：

连部	连长、副连长
	指导员、副指导员
	军医——卫生员
	司务长——上士——炊事班
	文书、通讯员、保管（统计）员
排	排长、副排长
班	班长、副班长 战士

3. 人员构成

绝大多数新建的生产建设兵团，是由现役军人、地方干部、复员转业军人、原农场职工、知识青年等几部分人组成。

现役军人干部是兵团的主要领导阶层，其中级别最低者也为副连级。大多数现役军人在调到兵团时，作为一种鼓励，职务提升了一级。各兵团所属军区不同，现役干部配置的比例不等。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配置的现役干部较多，常年保持在 5500 至 6000 名左右，不但团以上领导都是现役干部，参谋、干事以上的职务，也大多由现役军人担任；甚至在每一个连队里都至少保留两名现役军人，担任连长和指导员的职务；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

的比例是1：17。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现役干部任职的比例也比较高，先后调入云南兵团的现役干部2700名，兵团机关现役干部占80%以上，师团机关现役军人占50%至70%，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35。在广州兵团任职的现役干部有2900人，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42。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配置的现役军人较少，现役军人和知识青年的比例是1：100；从兵团、师到各团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团以上机关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除极个别外，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基层则大量任用非现役干部；仍以二师十三团为例，全团干部中只有现役军人20多名，都在团、处、股任正职领导，连队中没有现役军人。江苏兵团营级以上的干部为现役军人。

地方干部大多是原地方农场的管理干部，有少数人是在兵团建立以后，为支援兵团建设或者下放劳动从地方单位调入兵团的。地方干部的政治地位一般低于现役军人，虽参与领导，但始终处于“协助”地位。

复员、转业军人在部队时很多人是班、排长，大多数人是党员。复员、转业到兵团后，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俗称“老兵”。他们的原籍多数在农村，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愿意到兵团来。他们到兵团后不久，纷纷把家属从农村接出来，在兵团做临时工。后来兵团为这些家属解决了“农转非”（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问题，甚至有些家属解决了就业问题，也成为兵团的正式职工。

原农场职工的构成最为复杂，主要是当地的农工、牧工，还包括少数的“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对后一种人，知识青年在背后称之为“二劳改”、“老改”，他们的政治地位最低。

知识青年主要是上山下乡的城镇中学毕业生，也有少数农村青年，通过各种关系而加入其列。知识青年被习称为“兵团战士”。兵团战士是兵团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也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

各生产建设兵团在统计报表时，将干部、职工、战士均列在“在职人员”项下，同时要列出家属的人数。干部、职工的配偶、小孩甚至父母，只要是住在兵团管辖的区域内，都算在兵团系统的人口数额之内，所以各生产建设兵团都背着一个人口包袱，因为兵团的非在职人员，同样吃的是国家商品粮。

多数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除外）初建时，连队的干部都是由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或地方干部担任。但很快各兵团均选拔了一批知识青年担任基层干部，在一、两年内，不仅班、排长基本由知青包揽，连队的副职（副连长、副指导员）也大多由知青担任，甚至出现了“知青连长”、“知青指导员”。更有少数表现出色的知识青年，被提拔为营级干部，甚至团级干部。兵团后期，知青干部越来越多，大多数兵团的连队里已经没有现役军人，只有少数兵团还坚持在连队里至少留一名现役军人担任正职干部的做法（如内蒙古兵团）。

各兵团师、团场数量不等，人数差别很大，甚至不成比例。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人数最多的二师，下属人员近4万人；人数最少的四师，下属人员只有9000余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七团（弥勒东风农场），在编人员为4651人（1974年），其中知识青年1200余人，复员转业军人200余人；而人数较多的二师七团（勐定农场），仅成都知识青年就有5000余人；人数最多的一师六团（勐腊农场），甚至下辖23个营，在勐润曼巴山脚的六团十九营，辖12个连队。连队的人数，差别也很大，人少的连队只有几十人，多的则有数百人，甚至一千余人。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构成，在管理干部中有现役与非现役的区别，普通人员又有兵团战士、兵团职工、兵团家属的区分，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物质待遇，面临的将是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二章 兵团知识青年

涌入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达百万之众——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此之大——安置费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视知识青年工作

一 “解放军序列”中的知识青年

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既然是大批量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重要措施，那么各兵团招收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很快大范围铺开。

各兵团招收知识青年的工作，大体上按照国家的计划安排进行的，并得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的大力协助。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8月9日上报的《关于1966、1967年中学毕业生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全市1966年和1967年中学毕业生共有24万人，已经安排了7.5万人，其中1967年前往东北、内蒙古、云南插场插队的4000人，支援三线建设6000人，1968年组织去黑龙江兵团1.5万人，中央在京单位和地方企业招收1.5万人，参军1万人，回乡知识青年2.5万人；还有16.5万人等待安排，大多数毕业生计划安排到农村插队或生产建设兵团。

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城市知识青年的工作大致采取以下步骤：

（一）组织落实。兵团招兵人员与各动员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等机构商讨招收知识青年方案，确定征招人数，指定招兵学校。

（二）动员。由兵团招兵人员和各学校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军宣队等共同组织宣传活动，召开动员大会或誓师大会，鼓励初、高中毕业生写决心书等，广泛宣传前往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伟大意义，并讲明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条件。

（三）报名。各校毕业生以班或年级为单位，填写毕业分配自愿表，并展开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名活动。有两个以上兵团招兵的学校，允许毕业生选择去向。

（四）体检。安排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进行体检。各兵团一般规定参加兵团的知识青年需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身体条件不适合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或有严重慢性病、传染病者不予录取。

（五）政审。对报名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进行政治审查。政治审查的标准一般为“本人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下列情况的毕业生兵团不予接收：（1）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2）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子女；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3）本人道德品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

（六）录取。宣布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毕业生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告知启程时间，发给乘车证和购物证等。

（七）准备物品。被录取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人纷纷购买生活必需品，并把箱子等大件行李按时送到指定地点一同发运。

（八）启程。安排车、船等将录取者陆续送往生产建设兵团，

届时在学校或车站等地举行大规模欢送活动。

基本遵循同样的模式，各兵团先后展开了招收城镇知识青年的工作。

黑龙江兵团 1968 年成立后，立即着手安排接收城市知识青年的工作，当年接收北京知青 1.5 万人，上海、天津知青各 1 万人，本省知青 1 万余人，并准备在 1969 年接收 20 万名知识青年。1969 年，黑龙江省实际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知识青年 21.2 万人，其中 17.6 万人被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兵团系统外的国营农场。至 1970 年底，黑龙江兵团共接收知识青年 35 万人，其中北京知青 9 万余人，天津知青 4 万余人，上海知青 10 余万人，浙江知青近 4 万人，其他都是来自黑龙江省内各大、中城市的知青。截止 1975 年底，黑龙江兵团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 39 万余人。

内蒙古兵团 1969 年接收了来自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保定、上海和浙江等地知识青年 50843 人，1970 年接收知识青年 26580 人，1971 年接收知识青年 20886 人，三年共计接收知识青年 98999 人，其中北京知青 26642 人，上海知青 5575 人，天津知青 14871 人，浙江知青 9127 人，来自河北省保定、唐山、张家口等城市的知青 6659 人，来自山东省济南、青岛市的知青 5600 人，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集宁市的知青 19273 人，来自内蒙古各盟的城镇知识青年及零星加入的知青 11252 人。此后内蒙古兵团不再大规模招收知识青年，1972 年接收的 1154 名知青，都是零星招人的。截止 1975 年 3 月，内蒙古兵团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 10 万余人。

首批前往云南垦区的北京知识青年 55 人，于 1968 年 2 月 8 日出发，2 月 21 日到达云南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后来成立云南兵团，这批知青大多转入兵团。1970 年 6 月底前，云南兵团接收了北京知青 8330 人，上海知青 27236 人，云南知青 9073 人，四川知青 39 人。1971 年，云南兵团接收四川知青 4 万余人。根据

1973年10月的知识青年情况统计，在册知识青年95128人，其中北京知青5035人，上海知青35052人，四川知青（主要是成都、重庆两市）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截止1974年8月，云南兵团共安置下乡知识青年10万余人。

广东垦区1968年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46071人，1969年广州兵团成立，垦区原来安置的知青均转入兵团，当年又接收知青29452人。1970年，接收知青27187人；1971年，接收知青9416人；1972年，接收知青1833人（包括广州市461名违法青年）。至1973年底，广州兵团共安置知识青年11万余人，主要来自广州市和海口、湛江市及广东其他市县。

甘肃农建十一师1964、1965两年接收了来自天津、西安、兰州、张掖、武威和山东淄博的知识青年1.4万人；1966—1969年接收天津、兰州和山东知识青年1.4万人。兰州兵团成立后，农一师和农二师先后接收知识青年5300人，其中兰州知青2860人。

新疆兵团从1961—1966年接收上海、北京、天津、武汉4市和浙江、江苏2省知识青年12.7万人，其中上海知青为9.7万人。1967—1975年，新疆兵团接收城镇知识青年10万余人。江苏、湖北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各接收知识青年5万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知识青年3万人，江西生产师和江西省属国营垦殖场共接收知识青年3万人，其他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接收的知识青年都在2万人以下。

生产建设兵团的各团场，无论是原来的国营农牧场，还是新开辟的农场，都为超量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做了准备。自然条件和未来前景，制约着各兵团团场吸收知识青年的数量。新疆兵团和广州兵团原有职工基数大，又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不能过多安排知识青年。以广州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安置知识青年多的团场可达二三千人，如海南岛琼山县的一师三团（红明农场），1969—1970年接收了广州、汕头、海口、湛江、江门、潮州等地

知识青年 2435 人；一般的团场安置知识青年一千人左右，如海南岛屯昌县的六师四团（中坤农场），1968—1971 年接收北京、广州、汕头、海口知识青年 1160 人；六师九团（中建农场）同期接收广州、上海、汕头、湛江、海口知识青年和其他社会青年 1514 人；有的团场则只能安置几百名甚至几十名知识青年，如六师二团（晨星农场）只接收了广东知识青年 346 人。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新建点多，又有适合发展的空间，一般的团场都能接收四五千名知识青年。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黎明农场），人数远少于一师六团，尚能在 1969 年 8 月至 1971 年 7 月间先后接收了 8 批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城市的知识青年 4420 名。

吸收城镇知识青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已经成为与农村插队和返乡务农并重的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主要方式。1973 年 7 月至 8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计划 1973—1980 年动员 1300 万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即明确指出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四种形式：1. 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户；2. 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3. 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4. 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1968—1971 年，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的知识青年比例逐年增加。1972 年以后，各兵团人口趋于饱和，安置知识青年的能力大大下降（参见表 2-1）。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批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很快改变了原国营农场系统人员构成的比例关系。据总参谋部 1972 年的统计，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共有职工 292 万人，其中知识青年近 110 万人，约占 38%。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最多的黑龙江、广州、内蒙古、云

表 2 1 1967—1976 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年 份	人 数	插 队	百分比	集体场队	百分比	兵团农场	百分比
1967—1968	199.68	165.96	83.11			33.72	16.89
1969	267.38	220.44	82.44			46.94	17.56
1970	106.40	74.99	70.48			31.41	29.52
1971	74.83	50.21	67.10			24.62	32.90
1972	67.39	50.26	74.58			17.13	25.42
1973	89.61	80.64	89.99			8.97	10.01
1974	172.48	119.19	69.10	34.63	20.08	18.66	10.82
1975	236.86	163.45	69.01	49.68	20.97	23.73	10.02
1976	188.03	122.86	65.34	41.51	22.08	23.66	12.58
合 计	1402.66	1048.00	74.72	125.82	8.97	228.84	16.31

南 4 个兵团，由于历史的原因，知青所占比例有所不同。比例最高的是内蒙古兵团，由于留用的原农场职工不多，新调入的复员转业军人也只有 1 万余人，在职人员中知识青年占了 77%。黑龙江兵团虽然原有 25 万人的职工队伍，但几年中超量安置知识青年，使知青在在职人员中的比例达到了 65% 的水平。云南兵团知识青年与原农场职工等各占 50%。广州兵团接收的国营农场职工队伍庞大，新加入的知识青年，只占在职人员的 25%。

知识青年，无疑已成为军垦系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绿色的召唤”

我们应该追踪一下各地知识青年踏入生产建设兵团大门的历程。

从 1968 年开始，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助力，与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步，报纸上开始载文公开宣传生产建设兵团的活动，以

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如1968年9月6日的《人民日报》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光辉照耀下，石河子地区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在革命大批判的推动下，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形势大好”，介绍了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工二师、“八一”毛纺厂等单位的情况。按报道所说，当年上半年，石河子地区的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农业也战胜灾情，许多单位的小麦获得了大面积丰收。1969年4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又出现了这样的大标题：《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垦战士》，描述了老红军、老八路、复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以及维吾尔族牧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劳动的场景。

在城市长大的中学毕业生，绝大多数人对生产建设兵团和军垦农场的印象主要来自文革前的电影、话剧和小说，如《老兵新传》、《军垦战歌》、《军队的女儿》、《年轻一代》、《边疆晓歌》，等等。对青年人来说，解放军是楷模，凡与军队沾边的都有一层美丽的光环，于是生产建设兵团就有了不同于农村的特殊魅力。

对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去兵团似乎比到农村插队更有吸引力，因为生活待遇有保证，组织系统有人管；更重要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大多数年轻人对紧张严肃的军事生活抱有幻想。知识青年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兵团好像也更放心一些。在这样的形势下，兵团在城市招收知识青年的工作并不难做，再加上一些“拔高”的宣传和“现身说法”的教育，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各生产建设兵团在大、中城市大量征招知识青年时，成千上万的中学毕业生对此赋予了空前的热情。

下面是生产建设兵团“征兵”片断的部分回忆和当时的几封书信，从中我们既可看到兵团接收知识青年的模式，也能揭示出青年人前往兵团时的不同心态。

1968、1969年，北京、天津、上海……至黑龙江、内蒙古——

火车站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

站台上扯着一幅巨大的横幅标语，上面的金字异常醒目：“热烈欢送应届毕业生奔赴北大荒！”毕业生？鬼才知道我们算什么毕业生！数学只学了正负数运算，几何只学了对顶角，英语只会“四个伟大”，理、化、史、地没沾边。语文倒学了些文章，从复课闹革命到分配的一年多时间里，“老五篇”和三十七首诗词背得滚瓜烂熟。

扩音器里响着激昂的口号：“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心里说，这口号应把“工”字删去。从60年代初期开始，每年都有不少知识青年走这条路，到我们这届几乎是连锅端了。没有高中，没有招二，没有征兵，只有“与农相结合”这一条路。尽管如此，我们都是自愿的，有的甚至是死磨硬泡争取来的。上兵团总比插队强啊。

……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开动了。此刻，人们忘记了光荣的使命，忘记了是去完成一项伟大的创举，再也顾不得什么政治影响，埋在心底的惜别之情喷发而出。顿时，车上车下一片呜咽……人非草木，组织来送行的人们也被此情感染，锣鼓声、口号声悄然消失。那写着“热烈欢送”的横幅标语和无数面彩旗，与这颇有些凄惨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叶世洪

（1968年7月13日）火车10点38分开出北京站。为了反帝反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报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戍边。

当教师的爸爸想不通，他主张我留在北京等待机会考大学。全家人都笑他迂腐。可不是吗？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

种想法。两年前，男四中、女一中的倡议，促使政府取消了修正主义的高考制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了两年，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今后，全国都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旧的大学还会有吗？即使有，也绝不会有考试了。

摆在面前的路只有一条：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团张润和

车还没开，母亲就靠着站台的石柱子哭了，可我没有哭，还冲着她乐呢！我从小就想当记者，满世界跑，对北大荒又早有所闻，这次是自愿报名的，怎么会悲伤呢？至于别的知青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1968年7月16日那天我是兴奋的。好像小时候去春游一样，又像是中学时的短期下乡劳动，我以为过不了多久，这一车人又会被拉回来，可谁知从那天起，在北大荒一干就是11年。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杨南莺

一个初中学生，当时谁能摆脱得了天真、幼稚、浪漫的色彩？大伙儿把心中的北大荒描绘成了翠绿的原野，乡间的小路，一派田园风光，一切一切都是那么多姿，那么情趣盎然。

1968年10月，我们一路风尘来到了北大荒，迎接我们的是寒风，是飞雪，先一步的梦幻早已飘逝。我们茫然了，女同学躲在宿舍里哭了起来。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团王宴青

我珍藏着一张乘车证。一页淡蓝色的小纸，虽然纸已开始褪色，但那上面红色的铅字却还分外醒目：

(一)来车站上车的知识青年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二)听从指挥，有秩序地凭乘车证上下车厢，开车前10分钟上车完毕。

(三)开车前5分钟，不准站在车厢门口，不得再与家长握手。要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

(四)每证只限1人，不得转借他人。

每当看到这页小纸，它都会在我的眼前催幻出20年前的情景。

1969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股大潮。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走，还另有别的选择吗？更何况到农村去的大势谁又能逆转呢？

站台上到处是人群、红旗、语录，送行的人们与离去的人们都在依依惜别。在列车与人群之间有一条由军人拦成的警卫线，使送行的人不能靠近车厢。母亲和大哥及患病的姐姐，我们站在一起，大哥总想找出一些愉快的话题来缓和我们大家的心情。这里的母女都在低声地饮泣，站台上充满既热烈又悲凉的气氛。这种奇怪气氛的揉合，在当时那个年代却是怪而不怪的事情。

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就在这一瞬，除了那疯狂的铃声外，一切都没有了声息。突然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和人们的哭喊声合在一起，汇成了一股说不出滋味的、动人心魄的交响曲，列车徐徐开动了。我贴在车窗上看到母亲在大哥、姐姐的搀扶下，向渐渐远去的列车挥动着双手。远了，渐渐地远了，列车把我们载向了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七团娄健

不少人是被下乡的大潮卷进来的，我可是自己跳进去的，我才上初一，14岁。这个年龄，怕在兵团知青中是最小的年龄了。妈妈不同意我下乡，“革命就缺你一个人吗？”她这么对我讲。妈妈呀妈妈，你怎么在这样的大事上总是搞不清楚，老师也是迂腐，还劝我多学点知识，我告诉她，北大荒就是知识的海洋，凭我去遨游吧，够我一辈子学不完的学问。老师被我问得没词了，妈妈更说服不了我，离京那天，她没看我一眼，也没说一句话，但我真像只小鹰，要自己去狂风暴雨中练翅了。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七团高新宇

在边陲的小站下了车，心里酸酸的，想哭。我与周围的大部分人不同，在屯垦戍边的口号里，我心里时时刻刻不无一股酸楚的下放改造的感受。父母都是“走资派”的重压，令我无法喘息。我困惑，我伤心，我要逃避那残酷的现实。我苦苦央求兵团在京“招兵”的领导，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总算注销了户口。

心里期幻着北大荒，一厢情愿地把她和“桃花源”联系起来，只盼着给我这惊惧不安的心灵一片安定的绿洲。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潘慧娟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小就在营房院里长大。除了蓝色的天空，在我的眼前浮动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绿的汽车、绿的大炮和穿着绿色军装的人们……，在我懂事起，就默默地立下了誓言，长大了一定要当兵！

上初一的那一年，内蒙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我的很要好的同学及他们的家也一起随父赴疆，这一下子牵动了我的心。

当时我真着了魔，妈妈不答应我，小犟脾气上来了，连睡觉都不回家，说别的根本听不进去。

远方的父亲来了信：“就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吧”，就这一句话，妈妈怎么也“拴”不住我了，铁了心一定去当“兵”。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周伟

那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风吹遍了整个中华大地，我的家乡黄浦江边也卷起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浪潮。一天，在我家附近，出现了几名来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兵军人，通过他们的宣传，我这个刚过15岁的男孩子，开始对窗外的大世界充满了幻想，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美景展现在我的眼前。

热血沸腾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激情在我心中奔腾不羁。父母嫌我年龄太小，不忍我离家远去。父亲哀声叹气、苦苦挽留；母亲终日不语，不停地流泪。我已无暇顾及这些，当时对我最有诱惑力的只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豪言壮语。我不顾父亲的悲叹、母亲的眼泪，整日冲他们喊着“拿户口来！我要报名。”

就这样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报了名。

兵团可不是农村，出于战备需要，兵团战士作为解放军的后备力量，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去的地方。对于应征“入伍”的知青还需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呢！那时，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足75市斤，身高才1.49米，为这不争气的身体我不安极了，生怕领兵的同志不收我。体检之前，我在一双大鞋里垫上了厚厚一层棉花，勉强使自己身高达到了1.50米的基本要求。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八团孙永明

1969年4月，我怀着一腔热血，从包头积极报名，参加了这年年初刚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我刚满19岁，属68届高中毕业生。

……从学校走上社会，从城市下到农村，从中学生成为兵团战士，对一个青年人来说，的确是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刘建禄

1969年4月24日，我和我的许多同学，胸前佩带着上山下乡光荣的大红花，在许多热情欢送人群的簇拥下，由天津登上一列开往内蒙古的专车，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火车穿过长城，离开河北、山西，在内蒙古西北大地奔驰。第二天傍晚，来到了乌拉特前旗车站，我们陆续下车，分别编队，我被分配到二师十三团二连。胡连长走到我们面前，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带领我们分乘几辆卡车，连夜行进。汽车沿着崎岖不平的沙路缓慢行进，耳边冷风嗖嗖，我们互相拥挤，由于寒冷、饥饿，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有汽车的马达不时地发出轰鸣。26日凌晨，我们到达了连队所在地——刘贵。

刘贵的早晨寒气袭人，远处四周一片沙漠。一大早，李指导员就等候在连部门前迎接我们。他命令通讯员、文书给我们打饭、打水。一会儿功夫，饭拿回来了，辣咸菜条、玉米面饼子。锅炉房送来了热水，我们每人倒了杯开水，刚一入口，几乎不约而同地吐了出来，啊！苦涩的水。泪水伴着苦水难咽啊，许多人哭了，而且放声大哭。我把牙咬得很紧，独自一个人跑到百米以外的沙漠空地，仰天长叹。眼望着远处刚刚升起的红日，思绪万千。啊！兵团，我将在这里工作、生活、战斗。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团陈继宗

1969年5月我来到黄河边上的三师二十三团八连。屯垦戍边、扎根边疆，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是我们的理想。当时我们住在马棚，吃的是糜子米和咸菜，但是每天生活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中，沉浸在连长为我们描绘的营房建设蓝图的遐想中。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三团张玉敏

火车站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随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家长亲属的哭声，列车一声长鸣，缓缓地开动了。刚满19岁的我，便梦一般地离开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过上没有军籍的军人生活。我们这一批知青被分配到了二师十二团一连，在内蒙乌拉特前旗下火车，又坐了3个多小时的卡车，我们被送到了当年关劳改犯的日址——沙头一连……

乌拉特前旗沙头一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蛤蟆叫，蚊子咬，下雨走不了”的大荒滩。人烟稀少，枯木和面积白花花的盐碱地到处可见，一片凄凉。走出十几里地，可以看到一些破烂不堪的土坯房，这样的环境，许多知青都抱头痛哭。而我却没掉泪，心想，到了兵团就是种大地吃苦来了，哭也没用，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就只好面对现实，从思想上要做好吃苦的准备。我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能就是如此吧。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团王芳

爸爸妈妈：

一声长长鸣响的汽笛，带走了你们的独生女儿；一列隆隆行进的火车，开始了女儿人生的征途。

妈妈，您不该伤心，不该落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时代的潮流；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号

召。好儿女志在四方，何况女儿都19岁了，初中毕业也整三年了，总不能无所事事，成年累月地在城里混吧？妈妈一天到晚念叨着“女儿大了，该找婆家了”，真的是太早也太急了一些呀。女儿曾经做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梦，但梦毕竟是梦，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脚踏实地地去走。虽然按政策我可以留城待业，但女儿要到广阔的天地里闯一闯，炼一炼。您应该为女儿的抉择高兴、骄傲才是。

……这里真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且一个连队三百来号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充满了蓬蓬勃勃的朝气，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王海燕

××、××同学：

我们已经到了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今年1月24日毛主席亲自批准成立的，毛主席的指示是：屯垦戍边。她的成立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到兵团来，准备吃苦，准备打仗，因为兵团是个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集团，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还是工作队。现在兵团的师、团级机构都正在筹建中，我们首批报到的也算是创业人吧。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赵援朝

1969年，苏州至苏北农场——

1969年初，省里下达了苏州市68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方案：主要送往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我当时是苏州市高级中学（仅有高中部）68届毕业生。当方案公布后，主持我校工作的工宣队负责人（原东关丝织厂

工人)多次开会介绍情况: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由南京军区直接领导,师、团、营三级都配备解放军相当一级干部。全兵团分4个师,分布在自新海连到南通的海岸线上,因此每个兵团战士肩负的是屯垦戍边的重要任务。不过目前兵团还在组建中,暂时的体制还是国营农场性质的。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每个团都配有若干台“康拜因”,耕地、收割等全是机械化。农场主要种植棉花、小麦、果树和少量的水稻。我们学校的学生将分配到黄海农场的新荡分场。苏州市的上两届毕业生全都安排在苏南插队,在人口密集的江南农村,他们的下去,无疑是与农民抢饭吃,因此不受欢迎。他们一二个人分在一个生产队,干的是种双季稻的繁重水田活,因而孤寂、劳累。与他们比较,我们将去的地方,有军人领导管理,吃食堂,过集体生活,每月发若干津贴,生活有保障,劳动强度也不十分高。因此,大多数人是感兴趣的。

在上山下乡大潮中,屯垦戍边、保卫海疆的使命更容易使人激奋,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无需做更多的思想工作,就报名、写决心书了。我也不例外,很快和几个同学集体写了“时刻听从党召唤,坚决到兵团闹革命”的决心书,贴在学校最醒目的黑板报前。以后就是誓师大会、欢送大会,当然最重要和实在的是打点行李。

1969年3月28日,是我们启程的日子。大行李在几天前就已经装船了。早晨8点多,我们就穿着军跑鞋、挎着小挎包在码头上等候了。但更多的是来送行的家长和亲朋好友。我父母亲没有来送我,对他们这代人来说,往往把工作看得比这类“私事”更重要,另外很可能是不愿意经历离别的伤悲。我的大妹妹已于3月15日去了云台农场(后来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因此来送我的代表便是10岁刚出头、尚不谙世事的小妹妹和自告奋勇前来的堂兄。堂兄当时是西北

电讯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有过远离家长艰苦生活的体验。他一直劝我留在苏南插队，可我没有听他的。

9点不到，轮船鸣响了汽笛，催我们赶快上船。码头上躁动起来，有母女抱头痛哭的，有父子挥泪道别的，更有那千般叮嘱，万般劝慰。船开动的那一刻，哭声、喊声汇成了一片，响彻天空。我没有哭，可能是因为没有人引发我的这种感情。我站在船头，望着木呆呆的小妹和远去的苏州城。堂兄却骑着自行车，追着轮船在河岸上飞驰，每到一座小桥，他都冲上桥顶向我挥帽。送了一程又一程，也不知过了多少顶桥，直到车再也无法骑了，他才挥手别去。此时，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鼻子有些酸了。

因为有三天三夜的航程，所以男女同学分乘两条船。船开动后不久，护送的工宣队师傅向我们宣布了航行规则，同学们的情绪也慢慢恢复了平静。三月阳春，河岸上麦苗儿青青，油菜花泛黄，和风丽日，好一派江南风光。开饭时，送上来的白花花的米饭和香喷喷的叉烧肉，同学们都高兴起来。一路行一路嚼着带足了零食，一路观赏外景一路聊着玩着，不时唱起“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船行到宽阔的河面，我颇有那种“海阔天空任鸟飞”的感觉……

最后一天晨曦刚拉开时，大伙儿都早已从梦中苏醒，因为今天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其实昨晚已经进入我们分场所在的响水县地界了，窗外再也不是融融的春光，而是春寒料峭；两岸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稀稀拉拉的盐蒿子在瑟瑟的北风中摇曳。赶早的农民骑着自行车，拉着大篓子在堤岸上飞跑。一些妇女用竹耙子刮着地上的枯草。他们都穿得很破烂，尤其是妇女们，令人奇怪的是她们大多穿着大花裤子。我们知道，这决不是时髦，而是愚昧和落后。再看看他们焦黄的头发，更说明这里土地的贫瘠。同学中不知谁带头抽泣

起来，然后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去的地方是苏北最贫穷的地方；有的说，这里的老农都是从劳改农场调来的，野蛮得很，打骂起知青来，如对待劳改犯一样；还有人说，这里生产队的头头，多半要强奸妇女。天哪，还有这种事，我不禁毛骨悚然。哭声比先前又响了一倍。又有人说，农场根本就没有解放军领导，这是上面骗我们的……真的，连穿上军装，当个兵团战士的梦也破灭了。这时，身为女一排排长的我也失望、焦躁起来。我们找来了工宣队，要求解释这一切，那老一套的话语已经不能使我们信服了。

在一片呜呜的哭声中，轮船到达了陈家港。男同学很有秩序地下了船，可我们就是死不肯上岸。工宣队师傅一遍遍地劝说都无济于事。无可奈何之中，他们找来了在码头上等着接我们的场部军管队领导。那位军人说，农场由解放军接管，将来要组建兵团，由解放军领导是毫无疑问的，目前兵团、各师，甚至有的团都已安排了解放军干部；你们不久就是光荣的兵团战士了，现在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快下船。他这么一讲，不少同学就打算上岸了。我当时尽管还是满腹惆怅，但又感到人既然已到了这里，总不能老赖在这条船上。工宣队要我起带头作用，我扶着哭得最凶的同学上了岸，随即登上了新荡分场来接我们的拖拉机。

在拖拉机突突的开动声中，我们踏上了崎岖、颠簸的兵团之路。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八团许敏

1971年，成都、重庆……至云南——

“慢，慢一点同学们！”兵团参谋长神采奕奕，他胳膊一挥，压住了满场动荡。“大家不是爱读小说么，我带来一部小

说送给同学们。时间有的是嘛，读了小说再报名、再写血书也不迟！啊，我只提醒一句、一句话——这部小说里描写的故事不是天方夜谭，也不在天涯海角，正好在我们三师十五团！正好在同学们报名要去的那个潞江坝！”

掌声、惊叹声、欢呼声、锣鼓声四起。

——红绸系着十几部同名的小说。

十几部小说顷刻间被争抢一空。

有人把书拆散了。有人把拆散了的书页传单一样没头没尾地发给大家。会场上下，校园里外，一时间全是借小说、读小说、议论小说的中学生。

大家一边读小说一边议论：“喂，听说了没有？参谋长身边没穿军装的那黑瘦个儿，原先是垦荒队长哩！”“小说主人公就是他！”“我们去的什么地方叫什么？”“喏，书上写了，叫孔雀坝。”“孔雀坝！啊，太美了，太浪漫了！我看准会有孔雀！”“啊唷唷，那地方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有人读着书中一大段风光描写，“原来菠萝有刺，原来菠萝像红苕长在土里并不是结在树枝上！”

小说还描写两个垦荒队员悄悄赶早工，男的醒不来，临睡前在胳膊上系条绳子，从旧碉楼上扔下去，到时候一个女队员在楼下拽醒他。“呀，你看，他们的生活多有意义！”

“不，不好！”一个女生慌忙丢了书惊叫起来，“呀，那里有瘴气、瘴气！吓死我了！”正好，书上写着过去的名谚：“没到孔雀坝，先把老婆嫁。”

大家把没头没脑的书页合在一起，牢牢记住了一个抒情的名字：《边疆晓歌》。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五团金平

1971年3月22日，是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我被批

准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了！像真的参军一样，我们是通过目测、体检、政审才被录取的。

一切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3月11日，宣布我们初中毕业（我刚上了两年）。12日全校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13日报名，写决心书。15日应招，21日招收工作结束。23日上火车。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八团曾智成

少年时代，理想显得那么崇高。读小说《军队的女儿》，我被书中热气腾腾的军营生活深深吸引了。在革命熔炉里战天斗地，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能像书中的主人公刘海英那样当一名兵团战士。

1971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蓉征招农垦战士。不满17岁的我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不顾家里反对，不听朋友劝说，好说歹说“开后门”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支边队伍，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团周瑞蓉

同样的景象也发生在广州、杭州、武汉、南京等城市。首批前往海南岛的广州知识青年，是1968年11月从太古码头启程的，他们在海口市受到了兵团首长的欢迎，随后即奔赴各农场，开始了新的生活。

来自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带来了不同的“乡音”，甚至从穿着上都带着本城市的特征。如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不同颜色的服装可以看出知识青年来自何方：“上海知青的棉装是斜纹布的，更接近‘国防绿’；天津知青的棉装是土黄色的，还不及北京的；本地人不管是年纪老少，几乎是一身黑”。正如二十九团知青黄效东所说：

当年，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气质汇到了一起，都是十几二十来岁，没有矫揉造作，把敞开的胸怀投进了荒野，那全部身心，让人一览无余。初时相见，只从衣着上便能判断“南北”。北京的蓝制服，宽衣肥裤，少不了几分不屑一顾的神气；上海的瘦腿裤，衣服上扎眼的花补丁，显得精明、勤快；天津人立领上衣，总有一股不服气的劲儿，还素有“精不精一身青”之说；哈尔滨的一式吊腿裤，窄衣袖，镶铜扣。只是一到冬天，“南北”之分就不再那么明显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一切都溶进了北大荒的大烟泡。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知青金平的回忆更有代表性：

那时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万知识青年来自四面八方。每天清晨，旭日喷薄、层林尽染的时候，置身于如此磅礴的队伍，你会情不自禁唱起那首“五湖四海”的语录歌。北京知青秉性开朗，豪爽旷达，一开口那字正腔圆、一如收音机里播音员的普通话，就把他们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四川知青个头不大，却聪敏机智、热情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干得最多。他们还能在瓜菜裹腹的黄昏，将林林总总的四川名小吃，一串串填入《知青之歌》的曲调，唱出一派巴蜀自豪。惟有上海知青韬略在手、城府于胸，不知是从小感染了大都市的雍容作派，还是自幼受中西文化的交融熏陶，即使自己有什么值得骄傲与矜持之处，也都笼罩了智慧的光芒，既不轻举妄动，也不毕露锋芒。譬如，他们轻慢别人只需叽哩咕噜讲一通上海话，就非常巧妙地用一道天然屏障把上海人圈在了里边，叫外人水泼不进；又或许，他

们穿上了艰苦朴素的补丁衣裤，但那洗得发白褪色的织物，竟然是当地人那时想也不敢想的涤纶卡叽、的确凉；再不然，他们下田下地衣袖裤腿挽得高高，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细心瞅瞅你会发现，他们穿着上海刚刚研制生产的农田鞋、水田袜，泥土不会灌进鞋里，蚂蟥也叮不破皮肉，任随三伏的日头炙烤，涂了防晒霜的额头也绝不露出草帽的帽檐……

被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知识青年，主要是1966—1971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初中生的比例远高于高中生。这些后来的兵团战士，大多数是1948—1955年之间出生的。

参加生产建设兵团，既有向往军垦生活的一面，也有其他情况存在。有少数人是因为父母正在“挨整”，无法顾及他们的安排，只好先到兵团“栖身”，一旦有机会则马上脱离兵团。这样的人大多是干部子女，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关系，赴兵团时就幻想较少，头脑里几乎没有“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想法。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选择了去兵团的道路，无论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每月32元工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每月28元工资，还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供给制……对他们都很有吸引力。有的城市没有去兵团的指标，一些中学毕业生因向往兵团生活，干脆自行跑到兵团所在地，坚决要求加入兵团，一部分人得到批准。当然，这只是些特例，不久各兵团都作出了不许擅自接收计划外人员的规定。有人费了很大的劲，要求参加兵团，甚至已经在兵团所在地落脚，但终于没有如愿。有一位北京知青，本已在黑龙江农场，黑龙江兵团成立后农场改为兵团，但他却因父亲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而被逐出北大荒，改在山西农村插队。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是我不爱北大荒”。

不管是出于光荣感、使命感，还是出于无可奈何，或者认为兵团生活有人管，吃饭有食堂等等，到兵团去的知识青年当时都

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所有制”的问题。兵团是国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兵团战士是享受全民所有制的职工，拿等级工资。插队则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一样，是集体所有制，干活拿工分。国家给插队知青一笔安家费，头一年供应商品粮，以后就和“老农民”一模一样了。后来人们填表、评级时才发现，去兵团算工龄，插队不算工龄（这种政策后来得到了纠正，插队时间也被计入工龄），这才知道二者的根本区别。

三 安置费——400元

为保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特别拨出一大笔费用作为知识青年的“安置费”，并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1970年8月20日，财政部发出了《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做了如下规定：

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在使用安置费时，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教导，力争做到少花钱、多安置、安置好。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包括部分建设资金）；非劳动力，按成户插队、插场的补助标准执行。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不包括社来社去的毕业生），每人补助 50 元。

按照计划，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 20 元、40 元。

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 30 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

在上述标准以内，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根据安置地区的不同条件，具体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使用。安置费由县社掌握，根据安置进度分期下拨到队，不准挪作它用……

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享受的是国营农场的待遇，每个人的安置费平均 400 元。从 1966—1976 年，国家拨付给农垦系统的知识青年安置费共计 11 亿元，绝大部分由生产建设兵团支配使用。由于所处地区不同以及工资制与供给制的差异，各兵团确定的知识青年安置费标准不完全一样。以服装费为例，虽然大多数兵团都发放“军装”（黄布衣服），有的兵团将其列入知识青年安置费内，对知青们来说，棉衣裤乃至棉大衣等，就算是“白得”了，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如此。但实行工资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前发了一身“兵团战士服”——黄棉衣棉裤，当时并没有宣布要本人付钱。两年之后，根据到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自理冬装费的规定，每身衣服折人民币 37 元，由兵团收回这笔钱。当时的兵团战士对此反映极端强烈：

转眼到了 1971 年夏季……兵团下发的一个文件，差点儿引起动乱。

文件大意为：知青下乡时发的棉装是兵团出的钱，衣服不是白给的，现在到归还的日期了，每身 37 元……

大伙儿一听，那个气啊，会上就有人骂起来。会后，大家聚到一块儿，有连讽带刺的，有气得把棉衣扯了的，还有人把它泼上汽油到外面示威性地烧了的，有的班排长到连部去评理：

“过了快两年了，怎么想起这事来的？当时也没说扣啊。”

“当时不发这身衣服我们还不来呢。”

“就这身衣服值 37 元吗？我卖给你，10 元就行……”

大伙儿七嘴八舌，气不打一处来，连长、指导员说不出所以然，他们只知道，一月扣不清分两月扣，扣清为止，反正必须扣；战士吵归吵，闹过这阵子就好了……

有的人有骨气，不是 37 吗？借钱，一月扣清，幸好没发帽子，不然还不知要扣多少呢？！

由于知识青年“安置费”掌握在各级领导手中，为了防止将安置费挪作它用，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特别于 1970 年 6 月 23 日发出《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集中，安置经费数量较大，除了用于建造房屋等基本建设外，其他花销也多用这笔经费支付，所以挪用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的现象比较严重。给知识青年建的住房，条件一般较差，好房子多由各级领导占用。虽然每年都要检查知识青年安置经费的使用情况，但大多是流于形式。1973 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后发布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8 月 4 日），特别指明：“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也必须认真解决青年的住房问题。所需经费，应当用国家过去拨付的安置费解决。挪用了的，要追回。”知识青年的安置费标准，更有了明确的规定：“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每人补助 400 元”，具体使用参照非兵团知识青年的分配标准（新规定的知识青年安置费标准，全国平均每人将近 500 元）。

同年11月9日，财政部发出《关于清理城镇人口下乡经费的通知》，亦对生产建设兵团有效，通知要求对1968—1972年的城镇人口下乡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11月24日，财政部又颁发了《关于加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的暂行办法》，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是国家为了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专项补助费”，重申了以下规定：（一）专款专用，讲究实效。（二）建立和健全预、决算制度。（三）依靠群众，民主理财。（四）加强财产管理。（五）各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应定期研究下乡经费的管理使用情况。

各生产建设兵团大都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又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清理，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则上报中央请示处理意见。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财贸办公室曾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城镇单位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安置费问题请示财政部，财政部于1974年8月29日复函：“经与国务院知青办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城镇单位的初高中毕业生，凡由兵团自行安排在军垦农场的，其所需建房费，由兵团自己解决（1973年以前的不再补发）。今后凡经你区统一组织兵团驻城镇单位初高中毕业生下乡的，其下乡经费按中央规定补助标准拨给。”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安置费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团、师部超标建房、家属占用知青用房的现象相当普遍。

四 “要加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

1969年1月28日，国务院转发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对上山下乡工作的组织落实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并强调“各级革命委员会和

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着重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各区县革命委员会，要加强对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组织专门的班子和办事机构负责这项工作。”

196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和工作要点做了原则性说明。文章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措施，是关系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大革命。”文章要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彻底与“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等剥削阶级观念决裂，通过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的长期锻炼，从根本上改变“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打掉身上的骄气、娇气和阔气，主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文章强调要重视知青工作，希望每一个有知识青年安家落户的社队，对知识青年都要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对于表现好的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对待他们。对于下乡的男、女知识青年，都要提倡晚婚，热情帮助他们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文章还特别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把这项工作放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加强领导。要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坚持不懈地抓好知识青年安家落户工作，总结经验，抓好典型，及时地发现问题，妥善地解决问题，克服一般化的领导作风。”

各省、自治区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发的文件，大致重复的是同样的内容。

当年，大批知识青年从城镇前往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并且很快暴露出安置不当、生活困难、组织混乱等问题，甚至发生了迫害知识青年的事件。197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转发了同年4月1日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并指出：“报告中提出的当前几个政策问题，是很重要的，请你们认真研究执行。希望你们在最近期间检查一下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总结经验，并向中央写一报告。”报告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组织与领导。报告中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必须十分重视知识青年的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来。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认真抓好典型，总结和推广经验。面上的工作，一年要抓几次，定期派人下去，进行检查。……既要把下乡知识青年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是三大革命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二）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政治要求。报告中认为：“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最根本的是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要向解放军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向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学习。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要经常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用会，不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定期召开下乡知识青年或者有下乡知识青年参加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社员代表会议。表扬先进，树立标兵。各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都应当吸收他们参加。报刊、广播要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要有计划地定期印发学习材料，并能使他们及时看到党的报纸。”

(三) 认真总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在边疆地区试办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这种农场，要配备坚强的领导班子。要在思想上革命化，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工农化。”

(四) 各地组织间的配合。“安置地区和动员城市，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努力，做好工作。”

(五) 安排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与劳动。

(六) 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坏现象做斗争。“各地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阶级敌人，必须依照《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坚决给予打击。凡是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干部利用职权，为非做歹的，要撤职查办；包庇怂恿违法犯罪分子的，要给予严格的纪律处分，有的地方对这类案件处理得很不严肃，很不及时，对这股歪风邪气打击不利，必须认真检查，坚决纠正。”

(七) 严禁挪用、克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经费。

(八) 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注意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无产阶级政策。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都应当欢迎他们去，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歧视他们。”

1970年7月9日，《人民日报》特别发表了《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的社论，对上述意见进行了公开的宣传，并特别强调：

毛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凡是有知识青年落户的社队、农场、生产部队，都应注意调动下乡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教育中积极使用，在使用中坚持教育，让这支生力军在彻底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要支持他们向旧

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斗争的革命精神。对他们要合理安排劳动，注意劳动安全。劳动分配要贯彻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关心、爱护青年，大力提倡晚婚。要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正确对待“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老师，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上到下，似乎颇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政策的制定也与运动的节奏合拍，但实际效果怎样呢？从生产建设兵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形态中，我们不仅能够透过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到各种政策的运行情况，也能为解释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社会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提供一些重要的例证。

第三章 工作队、生产队、战斗队

生产建设兵团的特殊性质——普遍的经济亏损带来了实行评工记分的动议——兵团职工、战士不愿意和农民划等号

一 建设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

1968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在上报中央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中，对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和任务作了这样的说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它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它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边防部队和边境广大革命群众，共同建设强大的政治边防，确保祖国反帝、反修前哨的安全。……同时，进一步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农业，为农村人民公社树立榜样。”这些任务，被概括成四句话：屯垦戍边，反帝反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以后陆续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大多以先建的生产建设兵团为参照系，确定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组织体系，并根据各自的特点规定了任务的范围。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

藏农建师的师以上干部 170 人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兵团会议，又在以下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一）各兵团的形势很好，一个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到会同志列举大量事例，狠批了“亏损有理”、“浪费难免”的谬论，一致认为，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的方针，生产才能发展，兵团才能越办越好。

（二）继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走政治建军的道路。广大干部和战士，要结合三大革命运动，认真学习“老五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增强思想革命化，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和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加强连队建设。当前，要着重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教育：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进行“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的教育，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进行组建兵团重要意义的教育，牢固地树立热爱兵团，扎根边疆的思想。把兵团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三）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认真搞好斗、批、改”。

（四）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认真抓好现役部队、值班部队和民兵的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军事训练，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思想，严防敌人突然袭击。

（五）努力发展生产，力争粮、棉上《纲要》。要坚决贯

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四五”期间，要力争粮、棉实现和超过《纲要》。广州、云南兵团要大力发展橡胶，力争早日结束橡胶进口。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增加稳产高产农田。有计划地扩大耕地面积，同时注意保持水土和保护草原。要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要努力办好现有工矿企业。发展工业以“五小”为主，以为农业服务为主，同时注意平战结合。要发动群众，制定“四五”规划。“制定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懒汉、懦夫的世界观，树雄心，立壮志，同时，“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

（六）一定要学大寨，一定要学好。

（七）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和任务。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战时一面作战，一面坚持生产。建立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寓兵于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是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贯彻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毛主席人民战争、人民军队思想的又一光辉体现。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开发边疆，保卫边防，为国家提供粮食和工业原料的艰巨光荣的任务；是生产建设的一支突击队，是巩固国防的一支重要力量。任何对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轻视和歧视这个工作，都是完全错误的。

（八）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关系。各生产建设兵团，属大军区建制。不论是大军区直接领导，或者是大军区委托省军区领导，都必须服从所在省区党的一元化领导。兵团党的建

设、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工作、行政管理、军事训练、指挥调动和战备、装备等，由军区管；生产、基建、财务和物资等，由省区革委会管；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由兵团统一编制，纳入所在省区的计划和规划。

兵团使用土地、水源、草场、山林、矿藏等，应当在省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

（九）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实行精兵简政。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反对讲排场、摆阔气、搞楼堂馆所等资产阶级作风。提倡精打细算，实行经济核算，少花钱，多办事。必须减少非生产人员，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有些兵团的非生产人员高达20%，而一些先进单位的经验证明，把非生产人员压缩到10%以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切亏损单位，应力争在一两年、两三年内转亏为盈（战备费用和按照规定由国家开支的其他费用，可另立帐目）。

兵团其他企业事业单位，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一业为主，兼营农业、副业或其他生产。兵团各级机关干部，要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有劳动能力的家属，要按照人民公社的办法，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

兵团原有“场社挂钩”的公社和生产队，一定要帮助他们自立更生学大寨。基本核算单位不要改变。

（十）加强军政、军民和兵团内部的革命团结。兵团干部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团结的模范。要发扬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尊重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团结各族人民，保护人民利益，加强同贫下中农的联系，巩固工农联盟。要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要关心广大战士的生活。同志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发生问题多做自我批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席卷全国 18 个省区的“兵团模式”，就这样形成了。组建这么多的生产建设兵团，是希望通过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组织形式，达到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目的。兵团在把大型国营农业企业直接与国防需要相结合的同时，又在所属范围内将本来由地方政府主管的文教、政法、金融、商业、外贸、税收等部门完全收归兵团统一管理，使兵团成为党、政、军大权合一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一个大而全、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半军事化组织。但是在这种模式下运转的管理机制，实际上始终处于摸索状态之中，并总是摇摆于军队与地方体制之间。

二 不搞经济核算不行

生产建设兵团的财政管理体制，由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国营农牧场财政管理规定，基本废除了旧有的规章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一种混乱的机制之中，生产无计划、管理无制度、劳动无要求、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的现象相当普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大多抱着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财务工作险上加险的态度，不愿过问财政问题；原来国营农牧场的财会人员、统计人员大多被下放，新的财会、统计人员普遍缺乏专业知识，经济核算和必要的统一报表一度被取消，理由是“三年不算帐，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由此产生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非生产人员的编制迅速扩大，行政管理费大大增加。（二）计划和财务管理大大削弱，“四超”（超建、超购、超支、超编）现象严重。（三）经济核算观念淡薄，浪费巨大，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四）基本统计不全不实，成为经济管理的严重障碍。

类似问题早已存在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中。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多年采取“以收抵支，自筹包干”的办法，不能全部纳入国家预算管理。1963年3月，财政部、农垦部派专人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解财务情况，准备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务收支尽快全面纳入国家计划。他们发现了兵团挪用流动资金、拖欠职工工资等现象。1963年8月，财政部、农垦部发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通知，对整顿兵团财政体制提出了要求。从1969年开始，大规模增建生产建设兵团，国家财政为此大量拨款；到1975年止，共拨付以生产建设兵团为主的农垦支出83.76亿元，其中增拨流动资金11.42亿元，弥补亏损39.07亿元，基本建设拨款33.21亿元。在财政管理方面，为尽快建立可行的机制，几年中做了以下工作：

(1) 疏通财务管理渠道，确定财政管理关系

兵团接管的农牧场及垦区的财政事务，原来均归农垦部管理。1969年6月，农垦部原东北农垦总局的财务、物资供应计划等全部划归黑龙江兵团管理。兵团的生产建设和物资供应计划，都纳入黑龙江省的财政计划之内。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突出省或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1970年1月，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垦区的财务收支，下放给所在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军区领导。从当年3月到1974年9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实行三渠道财务管理，由中央拨基建投资，省军区拨国防军费，省财政拨流动资金。1970年5月，规定新疆兵团的生产建设计划、物资供应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军区负责。此后，其他兵团的财务收支也陆续下放。“垦区下放后，人员调配、物资供应、计划、财务、劳动工资的管理，从1970年起分别列入所在省（区）计划。”

(2) 宏观控制财政亏损

农垦企业的大量亏损是从1967年以后出现的，我们不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因素，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组建和不善于经

营管理，也是亏损的重要原因。1970年，兵团企业亏损4.09亿元。为了促进生产建设兵团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扭亏为盈，在当年召开的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兵团的生产建设问题。会议确定一切亏损单位应力争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扭亏为盈。1972年，财政部派人对新疆、黑龙江、内蒙古三大生产建设兵团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指出了在资源利用、政策落实、发展农业、经济核算、资金渠道等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列举了几个需要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的实际问题：

(1) 兵团都有不少的社会性政策性支出

1971年新疆兵团为5805万元，黑龙江兵团为1842万元，内蒙兵团为×万元。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负担重了，不应由企业负担；一种认为负担虽重，主要是挖掘生产潜力，增加收入是可以负担的。

(2) 行政事业费

1971年新疆兵团支出2200万元，国家拨款包括劳改企业支出补助共计512万元；黑龙江兵团由国家拨款943万元；内蒙兵团由国家拨款270万元。

(3) 税收抵兵团支出

1971年新疆兵团交税金7100万元；黑龙江兵团税金1243万元，作为收入抵支出，新疆兵团也希望这样办。

1972年10月，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在北京召开包括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的加强经济核算、扭亏为盈会议，并专门召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的代表座谈，指出生产建设兵团的突出问题是产量低、成本高、亏损严重。国务院负责同志毫不客气地说：“我劝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志们，要按经济核算制度搞，你们是企业，是搞生产的嘛。”会议提出要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

经济核算，建立和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对亏损企业实行计划补贴、逐级负责、限期扭亏。对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的具体要求是：“要认真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广开增产节约门路；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核算，以连队或生产队为基层核算单位；精兵简政，压缩非生产性人员和非生产开支；社会性和战备支出不计入企业盈亏范围。”但是，情况并未好转，亏损越来越严重，1973年全国兵团的亏损额11.10亿元，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00斤左右，甚至有些兵团粮食不能自给。1973年3月3日，农林部、财政部联合发出的《关于改变生产建设兵团师以上行政事业费的管理问题的通知》，也是一种补救亏损的措施，通知宣布：“为了便于生产建设兵团加强经济核算，合理计算盈亏，经研究，生产建设兵团师以上的行政事业费，包括行政管理机构经费、医疗机构和学校经费补贴、勘测设计、科学研究、兽医院（站）、气象台（站）、监所及看管部队经费，改由国家定额补助，不计入兵团盈亏范围之内。”

（3）建立财会制度和财务审核制度

1965年12月24日，财政部、农业部下发《国营农场简易会计制度（草案）》，从1966年1月起开始试行，但因文化大革命的骤起，未能贯彻执行，使得各兵团组建后，财务管理实际上无章可依。1972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对77个基层核算单位进行财务检查时发现，有29个单位不记帐，许多单位帐目混乱，数字不清，手续不健全，用白条顶现金现象严重。类似情况在其他兵团也比比皆是。“为了加强国营农牧企业（包括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农牧企业）的财务管理，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制，促进企业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资金积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财政部、农林部直到1973年9月5日才

颁发了《国营农牧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有：

(1) 以路线为纲，加强财务管理。“农牧企业的核算体制，应同管理体制相适应。要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以连、队为基层核算单位。要做到出勤有考核，用工有记载，消耗有定额，收支有手续。要把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结合起来。”

(2) 加强财务计划管理。“农牧企业必须在制定生产、销售、劳动工资、物资供应、产品成本、基本建设等计划的同时，编制生产财务计划。”“凡属有盈利的企业，要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充分挖掘潜力，不断提高盈利水平。凡属暂时发生亏损的企业，要认真分析亏损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扭亏为盈。”“农牧企业基本建设财务计划的编制，要先核实资金来源，量入为出。要在保证国家指定建设项目的前提下，本着先农牧业、后工副业，先充实配套、后扩大提高，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农牧企业的基本建设计划，要按照规定的程序，纳入各级的统一计划之内，并应按照有关的规定，切实加强管理。流动资金的定额，应本着节约资金、加速资金周转的原则，按照生产正常周转的最低需要予以核定。”

(3) 固定资产管理。“农牧企业生产和非生产用的机械、设备、工具、房屋、建筑物等，单项价值在500（或200）元以上，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一般应划为固定资产。凡属固定资产的支出，不得列入企业的生产成本。”“农牧企业对固定资产的维修、使用、保管，必须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度。要定期清查盘点，防止损坏丢失。”

(4) 流动资金管理。“维持企业生产正常周转最低需要的

定额流动资金，由财政拨款；季节性、临时性的需要，由银行贷款”。“要建立和健全物资的采购、验收、领发、保管、使用和销售等责任制度，做到物资采购有计划，储备、消耗有定额，进出有手续，保管有专责”。“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严禁挪作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和福利等开支”。“农牧企业要严格执行现金管理制度，切实加强现金管理，严禁挪用公款。”

(5) 专用基金管理。“农牧企业的基金，包括更新改造基金、劳保福利基金和其他专用基金。更新改造基金，应当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老旧机型的更换，设备的技术改造，技术组织措施……劳保福利基金，按二资总额10%提取，只能用于职工劳动保险、职工医疗、生活困难补助、集体福利设施等方面的开支。其他专用基金，是指上级和有关部门拨给的专项资金，如城市人口下乡经费、科研费、华侨事业费等，应按指定用途，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6) 成本管理。“农牧企业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的教导，逐步建立和健全成本核算制。要正确、及时、全面地核算成本。要加强定额管理，健全原始记录，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划清产品成本和非产品成本的界限。农牧企业必须改善劳动组织，压缩非生产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原材料消耗定额，严格控制间接费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农、林、牧、渔、工副业的成本，要分别核算，并结合本单位的生产任务，核算几种主要产品的成本。”

(7) 盈亏计算。“农牧企业要全面计算盈亏，既要计算经营盈亏（农业税列作经营性支出），又要计算上交的利润或应弥补的数额。经营盈亏扣除或加上社会性支出，即为应上交的利润数或应弥补的数额。农牧企业计算盈亏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农牧企业的营业外支出，包括农

闲建设支出，防汛抢险支出，处理积压物资损失，呆帐损失，非常损失等。社会性支出，包括中小学经费补贴、安置老残干部工资、专职政法人员经费。社会性支出可以另立帐目，单独考核，不计入盈亏范围之内，相应减少上交利润或增加应弥补数额。各项社会性支出，应标明细表（包括机构、人员、开支定额、支出金额等），随生产财务收支计划或财务决算，报送有关部门。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备支出，由兵团商请军区解决。属于应由国防费开支的，按军事系统上报审批。”

（8）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民主理财。“农牧企业党委，要加强对财务工作的领导，把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定期加以讨论。党委要有一名主要负责同志抓财务工作。农牧企业要本着精简原则，健全财务机构，充实财会人员。财会人员缺乏的，要抓紧进行培训。财会人员应力求稳定，不要轻易调动。”

这个规定从1974年1月1日起试行。各兵团在此之前已经有过财会人员的培训和经验交流等。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各兵团先后制定了《企业财务管理办法》、《财务经费管理办法及经费开支标准规定》和《连队经济核算办法》等章程。但是，由于专业人员缺乏，管理水平低下，财政管理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

三 难推行的“评工记分”

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来源不同，工资水平和生活待遇也不一样。现役军人享受正规部队中军官的同等待遇，地方干部按国家干部待遇规定领取工资，职工（包括原农场工人、知识青年和复员、转业军人）则因地而异，分别实行工资制、供给制甚至工分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建时实行供给制，1956年以后改行计时等级工资制。1971年农林部、国家计委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工人的分配制度进行调查，分析了固定工资制和评分记工制并存的现状与原因。固定工资制是新疆兵团的主要分配模式，在工资支付形式上分为计时等级和死级活评两种，最低级别的工人月工资为28.5元；全兵团职工包括生活补贴在内的月平均工资是45元（农牧职工40元，工业职工50元），一级和低于一级工资的职工有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2%，所以流传着“干不干，二十八块半”的说法。并入兵团的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社员，仍旧实行评工记分制。鉴于职工工资水平过低，调查组提出了调整工资的方案：1957年底以前的三级工，1960年底以前的二级工，1966年底以前的一级工，工资均上调一级，平均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这项建议得到了中央主管部门的批准。

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大多实行等级工资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了国营农牧场后，即否定了原来实行的以“包（单产、总产、上交、利润）、定（上地、劳力、机械装备、成本）、奖（超产奖励）”为主要内容的分配制度和在部分农场实行的评工记分与加奖励的“两结合”工资制度，规定参加兵团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工资，一律定为农工一级标准，月薪日计，劳保福利等各项待遇与原场职工相同。农工一级的工资是每月32元，被人们戏称为“每月三百二十大毛”。这个规定执行不久，就被攻击为“多出工多给钱，少出工少给钱，硬往青年脑子里灌输一个‘钱’字，实质上是修正主义那一套”。1968年12月，兵团又做出了“保留月薪，取消日计”的决定。但是，有的老职工在农场已工作了几十年，月工资还是26元或28.5元，而知青一到兵团就拿32元的月薪，自然引起他们的不满。兵团曾设想提高老职工的工资水平，或者降低知识青年的工资待遇，使之更加接近和平衡，但考虑涉及范围太广，影响太大，所以一直没有动作。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因地区差别，农工一级的工资每月 28 元。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橡胶工人 29 万人，实行不同的工资制，1966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大部分以日工资制方式支付；1968 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则实行月工资制。工资级别海南岛地区一级 26 元，二级 29 元，三级 32 元……九级 70.4 元；湛江地区一级 24 元，二级 26.5 元，三级 29 元……九级 63.8 元。新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第一年每月发生活费，海南岛地区 22 元，湛江地区 20 元，一年后定级，一般为一级，少数表现好的定二级。复员军人工作满半年后定级，一般定二级，军龄加工龄满 8 年的定为三级。此外，广州兵团 6 个谷物团的 3.3 万人，是从人民公社并进来的，仍然实行评工记分制。针对橡胶工人工资水平过低的现象，1971 年，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及广州兵团建议取消现有的一、二级工资，并入三级（每月 32 元），将每月 32 元定为一级工的工资额，然后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低工资的规定进行升级。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兵团战士实行供给制。兵团组建时，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指示“兵团接收的城市知识青年实行三年供给制，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改为工资制”，并确定供给标准“略低于解放军陆军战士现行的供给标准”。全兵团平均每人每月供给标准 29 元，加医药卫生、福利、烤火费等，共 33 元，具体数字如下：

（一）基本生活部分：

粮食：农牧工人每人每月 45 斤。

伙食费：东部地区每人月平均 17 元 6 角；西部地区每人月平均 14 元 9 角。全兵团每人月平均 16 元 3 角。

过节费：新年、春节、八一、国庆 4 个节日，每人 1 斤猪肉，全年每人平均 3 元 2 角至 3 元 5 角。

伙食补助费：包括住医院伙食补助等，每人每月 5 角，由

师、团掌握使用。

津贴费：第一、二、三年，每人每月分别发给5、6、7元。
女青年每月发卫生费7角5分。

(二) 被装部分：

以三年计算，东部地区每人每年平均84元，布71尺，棉花3斤2两；西部地区每人每年平均68元，布76尺，棉花4斤5两。

(三) 其他部分：

公费医疗：每人月平均1元5角。

福利费：包括困难补助、洗澡、理发、抚恤、丧葬等，每人月平均1元。

取暖费：由集体掌握使用。东部地区一年7个月烤火期，每人月平均2元；西部地区一年6个月烤火期，每人每月1元7角6分。

除实行供给制的知识青年外，复员战士和其他职工实行等级工资制，共25700人，占兵团职工总数的25.4%。

各兵团存在的不同分配制度，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职工、战士工资水平偏低，很快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围绕国营农场现行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曾展开过争论，焦点是到底实行等级工资制还是全部改行评工记分制。农林部和国家计委1971年的调查指出：

大多数干部和一部分职工从他们多年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在农牧场实行固定工资弊多利少，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不利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能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利于克服“铁饭碗”、依赖国家的思想，限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说：“大锅饭”不能再吃了，“糊涂日

子”不能再过了，不能再吃社会主义了。改变分配制度是基本方向，要求彻底改革，越快越好！少数干部和相当一部分职工认为还是固定工资好，不要改变。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1966年实行过的定额记分问题多，工资总额卡死，互相争工分影响团结，只图数量，不顾质量，老工人收入没有保证，这种评工记分还不如固定工资。另一部分人（包括少数干部）则认为，兵团是解放军，是全民所有制，搞评工记分是倒退。国营农场工人就是要拿固定工资，不拿工资还算什么工人？！评工分干脆回家去评。有的甚至说：评工记分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突出政治，是工分挂帅，是用头脑中的“私”字促进生产，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等等。也有的说，评工记分影响职工队伍的巩固，不利于备战。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认为在实行供给制之后，应该向等级工资制过渡，不宜改为评工记分制，在农林部、财政部和国家计委同年的调查中，反映出了这种看法：

供给制受到青年和家长的普遍欢迎。青年实行供给制，有利于培养集体主义思想和“三八”作风，有利于安排他们的生活，使他们集中精力学习和劳动锻炼。“青年高兴，家长放心”。因此，一部分年龄小的青年要求供给制年限长一点；也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或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青年，则要求改为工资制。看来，实行三年左右的供给制是适宜的。

兵团各级领导同志的意见，三年供给制后改为等级工资制。兵团地处反修前线，战备任务较重，目前又处在开发建设阶段，生产水平很低。1970年播种87万亩，总产5500万斤，平均每亩只有78斤，亏损3000万元。在目前情况下实行评工记分分配制度，不能维持青年和职工的一般生活，不

利于对他们的稳定，甚至可能发生向城市到流的现象。

在研究评工记分问题时还提出：

（一）是分配制度的改变，还是所有制的改变？

（二）国家对兵团的基本建设如何投资，盈余如何上交，流动资金如何核定？

（三）是否要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允许战士、职工种自留地和搞家庭副业？

统一实行等级工资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则存在另一种问题：“上工到不到，照样三百二十毛”的“铁饭碗”思想，造成了普遍性的出勤率降低；1971年，又实行了“月薪日计”方法，但很快出现了出勤不出力的现象，因为“干多干少没人算，一天一块两毛半”，在出勤率普遍增加的情况下，工作效率和质量并未相应提高，工资总额则明显增加。

在对辽宁省盘锦垦区农场的评工记分做法、内蒙古兵团的供给制及广州兵团的工资制等进行调查之后，农林部、财政部的意见是这样的：

农业工人的工资制度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反复调查研究，经过试点，总结经验，积极而慎重地进行改革。就上述三种类型的调查材料，我们初步研究认为，各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不同，经营对象不同，因此，工资形式和分配制度也不宜“一刀切”。盘锦地区的农场由于狠抓政治建场，生产基础较好，多数职工又是从社、队转进来的，实行大寨式的评工记分方法，弯子转得不大，改革后效果很好，是可行的。类似盘锦地区的团、场也可以参照他们的经验，改革等级工资制度，实行评工记分办法。广州、云南、广西等以经营橡胶、剑麻、油棕和其他

多年生经济作物的团、场，职工工资制度，仍以实行等级工资制度较为适宜，这比其他分配形式矛盾要少些。至于现行工资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逐步地加以解决。但要注意农工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当地人民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水平保持大体接近。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等新建单位，现在生产条件很差，生产水平很低，城市下乡青年又占大多数，实行评工记分办法，事实上是困难的，目前可以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但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搞评工记分的试点，以便取得经验。

1971年2月18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国营农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工人的工资问题提出了如下看法：全国农业工人实行工分制这个问题很复杂，想把农业工人的工资改过来，转为记工分；先搞试点，看看是否能够改过来。农林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为此制定了改革方案：以连队为核算单位，定生产任务，定上交利润指标，完成生产任务和上交利润指标后，纯收益部分除按工分分配给职工外，适当提取一部分上交团场和连队留用；由于自然条件很差或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收益和收益很少甚至完不成任务时，按照原来的工资水平，由团场给予适当补助。这个方案是依据以下七条原则制定的：（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利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二）全面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三）把国家利益与职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四）适应边疆生产部队的特点，有利于战备；（五）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有利于改善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发展；（六）充分挖掘劳动潜力，有利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七）统筹兼顾，合理照顾，有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1971年开始，江苏、黑龙江、新疆、安徽等生产建设兵团

先后进行了由工资制改行工分制的试点，主要采用的是“按纯收益分等积累、评工记分”方式。江苏兵团有411个连队试行了工分制；黑龙江兵团先在1个营和1个连试点，并很快推广到62个团的10万人改行工分制；新疆兵团只在6个团内进行了改革试点。1973年5月，农林部召开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座谈会，虽然大谈工分制的好处，但还是提出了慎重行事的建议，希望继续扩大试点，总结经验，而不要在全国范围内马上进行大规模的国营农牧场工资制度改变。

在进行改变分配制度试验的同时，为解决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职工工资偏低的问题，国家计委、农林部于1971年9月26日发出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调整工资问题的通知》，作出了如下规定：

（一）实行工资制的职工，按照1971年《国务院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的规定，在不提高工资标准、不取消下延工资等级的原则下，适当调整一部分职工的工资。

实行下延工资等级的工人，凡是1961-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不论是执行下延的哪一级，都应在本人现行工资等级的基础上调高一级。

对于1957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1960年底以前参加工作执行下延工资等级的人员，其中抓革命、促生产表现突出好的少数人，经过群众充分讨论同意，并经领导批准，可以在本人现行工资等级的基础上调高两级。

职工工种变动的，这次调整工资时，不改变工种工资标准，仍在现行工资等级的基础上调整。

（二）实行工分制的农业工人，按纯收益提取分配基金评

工记分的，不调整工资。控制工资总额评工记分的，当前的收入水平适当、又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提高工人收入的也不调整工资；由于没有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劳动力自然增长相应地增加工资总额，当前工人的实际收入显著偏低的，可以适当增加工资总额，提高工分分值。增加的幅度，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这些单位的生产水平和工人的收入水平从严掌握。

（三）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实行工资制的长期临时工，这次调整工资时，暂不改为固定工。但是对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且常年顶班劳动、与同期参加工作的固定工人的工资相比偏低的，可以在本人现有工资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工资，但每月不得超过5元。

1971年11月30日，国务院在《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中对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工人的工资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从1971年起招收的人员，或者实行工分制，或者按当地生活水平实行供给制，并发给一定的零用钱……1970年底以前原有人员的生活待遇，各地情况不同，有的实行工分制，有的实行供给制，有的实行工资制，现行工资如何改革，这次是否调整工资和如何调整，由各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提出办法，报国务院审批。”

各生产建设兵团一方面制定了调整低工资的方案，一方面继续进行改行工分制的试点。1973年，各兵团和国营农场大多将低于农工一级的工资额取消，并为工作多年的老农工增加了工资。由于牵动面较大，财政部特于1974年1月3日发出通知，对补发工资中的财政问题做了具体说明。

这次工资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各兵团接收的原国营农牧场职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资待遇不变，所以没有起到划一分配制度和统一工资标准的作用，只是使一些人的生活困难暂时得到

缓解。由于改行工分制的职工大多被摒除在调整工资系列之外，加上提高工资的额度较小，在分配制度方面依然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1974年初，黑龙江兵团正式公布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牧连队实行工分制试行办法》，将分等积累的基础指标定在每个劳动力全年净收入384元（一级工年固定工资水平）上，超过者按分等提取积累办法计算；如遇灾年完不成计划指标，由国家补到384元。当年，黑龙江兵团还提出了全面推行工分制的设想。1975年，改行工分制的做法被斥为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不得不对个人分配、工分差距等方面补充了各种限制，并明显地影响了人们改变分配制度的决心，很多农场又恢复了月工资制，兵团战士依然是每月32元的工资收入。

由于上级机关不同意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将兵团战士的供给制过渡为等级工资制，兵团本身又不愿意改行工分制，所以采用了变通的办法，延长供给制年限，并将服装费折成现金额，与伙食费等一起直接发到战士手中，第四年每个月津贴费8元，共发给战士29.5元；第五年每月津贴费9元……直到兵团解体后才获准将原兵团战士的供给制改为等级工资制，大多数人按规定套为农工二级，月工资37元。

在分配制度方面的政策摇摆，为解决兵团人员生活待遇问题增加了难度。等级工资制虽然工资额偏低，但毕竟有定级、考核、升级的一系列规定，并有国营企业职工待遇的保证，所以无论是原来的国营农牧场职工，还是后来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大都愿意享受工资制待遇。改行工分制，全民所有制的兵团人和集体所有制的老农民彻底划了等号，就是每月多拿几块，心里也不痛快，所以普遍受到抵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工矿企业职工，工资标准、劳保待遇同地方同行企业职工一样，大致实行相同的“定级”、“考级”制度。实

施供给制的内蒙古兵团，厂矿兵团战士的津贴费等与农牧场兵团战士相同，但享受国家规定的工人劳保待遇，每月可领取一定数额的“劳保费”（工种不同数量不等，一般在10元以下），上夜班者则有固定的“夜餐费”。

在边境地区的团场，还发放边疆补助费。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每月给边境团场的兵团战士、职工发放边疆补助费9元。新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月工资和边疆补助费加在一起有41元，基本与北京的二级工人工资持平，足可以自豪一下。但是七八年下来，还是这点钱，又有了颇多的怨气。

“提干”的职工和知识青年（副连级以上），工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按照干部工资标准，正连级干部享受最低级别的24级工资待遇，每月41.5元（六类地区）。被提升为正连级干部的知识青年，当然可以按常规拿干部工资；但是副连级干部不能拿24级工资，于是又设计出了所谓的“25级”的工资标准，每月36元（六类地区）。知青提干，副连级是第一个台阶，多数人享受过这种工资待遇。当职工普遍定级、调级之后，25级干部的工资已低于一般职工，对不能升入24级的干部，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采取了“以工代干”的方法，即拿的是职工工资（一般为二级工工资），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这种做法，在兵团后期特别盛行。

四 兵团管理体制

在所属军区和所在省、自治区革委会双重领导下，各生产建设兵团对下属师、团等单位实行垂直领导，师、团分别接受专区（州、盟）和县（旗）革委会有关政治思想、方针政策、防火救灾、文教卫生、商业等方面的监督，对敌斗争则接受边防部队和当地驻军的统一指挥。

兵团的基层管理由连队实施。当时兵团的两大任务战备和生

产，都要落实到连队。此外，各种政治运动、政治学习、思想教育、落实政策，以及推荐上大学、职工评级、调整工资等，无不以连队为基本单位进行。

由于每个连队都设有党支部，为体现党的领导，几乎连队所有事务的决定，都要经过党支部的讨论。凡重大决定，如突击生产、军事训练等，既要有连队领导向班、排长安排布置，又要召开全连大会进行“动员”，然后具体实施。只有在干部带队离开连队时，才有权临机处置，单独做出决定。当时人们习惯把连指导员称为连队的“一把手”。指导员外出，连队中发生事情，还专门派人去征求处理意见的例子，并不罕见。而连长和指导员之间矛盾重重，也是极普遍的现象。

上级指示的传达和落实，大致采取以下方式：

（一）电话会议。这是一种较便捷的指挥方式。一旦有任务需要布置，上级机关先用电话通知下级机关开会的时间，届时有关领导在电话上聆听首长指示，并可适当提出问题。在交通不便、没有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电话会议的形式可以保证各种指示迅速地从兵团司令部一直下达到团场乃至连队。

（二）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和工作会议。中央指示的落实和重大事情的决策，都要召开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议（吸收非党委委员的有关领导参加），有时则召开专门的工作会议。会议做出决定后，再层层往下传达。

（三）领导视察和现场指挥。团以上的各级领导，定期或不定期到基层“视察工作”，并随机发出指示。“视察”一般事先通知，基层干部要预先做好准备。在生产大会战（春耕、秋收、兴修水利）时，上级领导（最多的是团领导）往往亲临现场指挥，建立临时指挥部。

（四）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为了解上级指示的执行情况、掌握生产进度、生产成本及了解产品质量，各级领导机关不时派出

参谋、干事到基层连队去搜集资料，有时则组成调查组或检查组，下到各团场或连队去“摸情况”，然后写成汇报材料，层层上报。

(五)“蹲点”。为了帮助“后进”单位，或者为了树立“先进典型”，上级领导有时住在连队或团场，具体组织工作和解决问题，人们习惯称之为“蹲点”。

(六)“大会战”。军队干部习惯于用打仗的方式指挥生产，所以动辄组织“大会战”。所谓会战，就是抛开其他事情，集中人力、物力，突击完成某项工作，如麦收、挖渠等。会战规模有大有小，小到连队的百十人，大到团、师的“协同作战”，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参加。这样的会战往往由于规模宏大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实际效果并不一定很好。

在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指挥机制中，“长官意志”、“粗暴管理”、“盲目服从”和“追求形式”是最严重的问题。

按照军队的作风，上级领导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一切指示，不管这些指示是否切合实际和可行。尤其是在连队里，现役军人具有绝对的权威。由此造成的管理生硬，甚至粗暴、残忍地对待知识青年，在各兵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生产和打仗毕竟不同，在管理生产时仍然是军队的一套，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人们常说的“瞎指挥”，导致混乱的生产。兵团虽制定了各种生产计划和规定各种指标，但长官意志大大高于生产实际，“抗上”的人，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会受到打击。从“大跃进”以来形成的“浮夸风”和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形式，使得多数领导满足于遵从上级意图、组织轰轰烈烈的活动，并不重视实际效果。在这样的机制下，巨大的浪费和效率低下，乃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章 向大地要粮

出大力，流大汗，活着干，死了算——平均亩产量不到 200 斤——惊人的巨额亏损——1 斤粮食成本 66 元

一 开垦荒地 & 治沙造田

生产劳动，是每个上山下乡城镇知识青年都经历过的锻炼，而且绝大部分知青参加的是农业生产，不过是时间有长有短而已。与插队和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不同的是，加入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投入的是由国家财力、物力直接支撑的以开垦荒地、增加播种面积为主的“大农业”生产，耕作方式明显区别于农村社、队的在已有耕地面积上的精耕细作。

文革期间，全国农垦系统共开垦荒地 1967 万亩，新增耕地 1354 万亩。地处北疆的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生产建设兵团，以农业为主，在开荒造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奋战在沙漠里的团场，用三年的时间在沙漠中开垦荒地 16 万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新建的六师，建师时只有 98 万亩耕地，大部分连队建在草甸子的沼泽地上。到 1975 年，经过垦荒，已有 342 万亩土地。

开荒是极艰苦的劳动，给兵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黑龙江兵团知青张宗培写道：“在北大荒开垦荒地，七十五马力‘东方红’拉三片犁铧，油门轰到底，几乎还跑不起来。抡锄头刨，谈何容易。厚厚的草皮，千百年来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草根，一锄头下去，掀不起来，拉扯不动。只有先用斧子砍出几公分见方的一圈沟，用二卡子刀起一点，再用斧子横着将草砍断，随拽随砍。起出来的草皮子，薄的五寸，厚的一尺，含土量很少。再向下挖一层，连同弄碎的草皮子，才好下种。”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团场有良好的开荒工具。黑龙江兵团六十四团，号召知青“一人一把镐，一镐三亩田，二亩种小麦，一亩种大田”，而每人的一把镐，是知青们捐钱买的。

如果说北大荒的荒地不好开垦的话，在内蒙古的大沙漠里造田同样不是易事。开垦者不但要搬走沙丘，还要改造土壤。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所在地是原来的太阳庙林场，地处内蒙古乌兰布和大沙漠北端，南边是连绵不断的沙丘，北边是盐碱斑斑的西大滩，面积数万亩。改造大沙漠，开发西大滩成为四团的主要生产建设任务。兵团战士们用柳筐担，用脸盆端，搬走了一座座沙丘，造田 25000 亩，试种水稻成功，培育成功第一代棉花，在寸草不长的盐碱地上，种出了玉米。一师所属的其他团场，也在乌兰布和大沙漠周围，同样肩负着治沙造田的任务。在当时为“治沙壮举”所写的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豪言壮语：

定教沙漠变良田，
荒原盛开大寨花。
塞外恶浪练红心，
钢筋铁骨治宏图。

（《人民日报》1971 年
1 月 4 日《沙漠新歌》）

蓝天作帐地作床，
黄沙拌饭可口香。
狂风为我送歌声，
千里戈壁好战场。

（《人民日报》1971 年
2 月 3 日《战斗在黄河湾》）

地处库布其沙漠北部边缘巴拉亥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同样在治沙造田上颇有建树，知青闵长琦写下了一段回忆：

1969年，一支军垦健儿，履冰踏雪开进茫茫戈壁……面对几千个封冻如铁的沙包，一些当地人说：“在这样的沙包地里还能打粮食？除非去北大荒取土。”而我们的战士却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渗透着烈士的鲜血，为了解放这块土地而壮烈牺牲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它穷而放弃它。今天，我们没有半点理由不把它建设好。沙丘虽多，搬一点就会少一点，我们军垦战士，一定要征服沙漠，开出万顷良田。”一份份决心书、请战书向雪片一样送到连部。于是他们以蓝天作帐地作床，开始了移沙造田的战斗。

沙包冻得坚硬，一镐下去，手震得生疼，才显出一个白点。许多战士的手磨起了血泡，震开了虎口，挥肿了胳膊，但谁也不甘示弱，个个汗流浹背，在呼啸的寒风中，只穿一件单衣还热气腾腾……大家脸冻肿了，手冻裂了，右肩压肿了就用左肩挑，每人的双肩都压出了血印，可没人放下担子歇歇脚。有位女战士一天压断了三根扁担。那个时节，狂风一起，天昏地暗，人都站不稳，不少人适应不了变幻无常的气候，口干唇焦，鼻流血，脸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就这样在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赶在春播前开出了一片土地。

春回大地，战士们见到自己开垦的土地上长出幼苗，别提多高兴了。可苗出土不久，碰上一场雨，牛皮碱一起来，几乎把苗全都盖住了。指战员们没有被吓倒，白天，天不亮就下地，中午在地头吃过午饭就顶着烈日接着干，晚上，踏着月色归。硬是用锹铲，用脸盆端，柳筐抬，把几百亩碱地剥了一层皮，枯黄的苗又变得绿油油了……

秋天，终于收获了几十万斤粮食和蔬菜。驻地附近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听说兵团把沙丘改造成良田，还收获了粮、菜，非要她的小孙女领她亲眼看看不可。来到八连，她捧起一把金灿灿的玉米，热泪盈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麦盖提垦区，地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1966年开始，有上万名来自上海、浙江、江苏的知识青年和原来兵团的老战士一起治沙造田，开发土地面积从原来的3万亩发展到13万亩，粮食产量从300多万斤上升到1300万斤，牲畜从1万多头增加到3万多头，并且有85%的耕地实现了机械化作业。*

扩大耕地面积后，改造土壤，增加地力，更是提高粮食产量必不可缺的环节，各兵团都在冬季大力开展积肥活动。这种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轰轰烈烈的“运动”色彩：

田野里光秃秃的，缺肥料的土皮表面浮盖着一层微白的碱晶。远处，战士们迎着风拉着小排子车向地里运送炕土、沙子和一些劣质的粪肥。团里的拖拉机也回来了，车斗里装着从连队里装的炕土，在公路上狂奔着。车后扬起一条长龙似的上下翻滚着的尘土。拉排子车的战士们个个脸上布满了灰尘，他们戴着棉帽子，有人还把帽“耳朵”翻上去，几趟下来浑身冒着热气，脸上流下几条汗水冲成的“小沟”。

几天前，在全连誓师大会上，一条醒目的横幅大标语令人记忆犹新：大干一冬天，定让粮食翻一番！会场庄严，气氛激昂，连同年轻的兵团战士们炽热的血液混同在一起，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大家心里都像是将要喷发的火山。连长安排文书提前给团里打了电话，务必晚上要给我们三连送电。那

* 见《人民日报》8月27日文《浩瀚沙海变绿洲》。

天，会场里比往常多装了几只灯泡。战士们按班、排位置整齐地就坐。连长白候伟作风俭朴；待人热情，一向深受战士们尊敬。他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400多人，近7000亩地，担子不轻啊！粮食要丰收，不是口号，而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兵团战士，就是要长这志气！大家要干起来，使出浑身力气干起来！”一阵掌声之后，各班开始纷纷上台表决心，送挑战书。男排战士血气方刚，互不示弱，女排姑娘芳心锦绣，不减春色。

没有肥料，我们除了掏厕所，就是拾粪。没有工具拾粪，只有用脸盆了。记得当时有人诙谐地说：“在这地方，咱们的脸盆使用率就是高，又洗脸，又洗脚，又拾粪，又舀水，下雨还能把水接。”我们硬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肥送到远离连队几十里的地里，用背包带拉耒把种子播进地里……

各兵团都涌现出了一批垦荒和积肥先进单位。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四团一连积肥班是一个女生班，成立于1971年5月。为了多积肥，积好肥，女战士们经常赶车到离驻地十几里的海渤湾市去，走大街，穿小巷，发掘肥源。找厕所，掏大粪，除了脏、臭外，还不时招来讥笑，她们都满不在乎。1972年，连队下达的积肥指标是300万斤，积肥班完成了400多万斤，平均每人每天积肥2000多斤。当年，积肥班荣立集体三等功。1975年1月，积肥班被授予兵团先进单位称号。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耕地。根据1972年的统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面积已达3033万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开荒400万亩，耕地面积达1700万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年开荒100万亩，拥有耕地面积增为153万亩。

二 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

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热烈气氛下，各生产建设兵团无不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农田水利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挖渠、打井。每年冬天各兵团都要抓住农闲时机，组织大规模的水利会战。当时不但把农田水利工程视为建设边疆和农业学大寨的重要措施，还把它作为考验和锻炼知识青年的重要手段。无怪一位内蒙古兵团的知青后来这样说：“如果有人问我，兵团时期什么活最苦、最累？我会毫不思索地回答：挖大渠。挖大渠是后大套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每年必搞……说到我们兵团战士挖大渠，那就更多了一层‘建设边疆打先锋，一颗红心献农村’的政治色彩。”

大规模的水利会战，热闹非凡，如1969年冬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组织的甘南县查哈阳水利工程大会战，历时两个月，调动了数团兵力，轰轰烈烈，遗憾的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当人们以为水会在干渠中奔流，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的时候，传来的消息却是：兵团总部在选择地理位置上出了问题，由于地势偏高，连一滴水也没有蓄进，用冻土垒成的水渠在春天全部翻了浆，成了一堆堆烂泥，兵团战士的血汗白流了。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引黄（河）排灌水利工程大会战，是全巴盟军民的统一行动，1975年11月开始，历时三个多月。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属下的团场，大多已经移交给地方管理，但参加会战的知识青年仍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投入了挖渠工程，为了省时间，早晨到工地，中午饭送到渠上吃，晚上仍不收工，没有照明设备，战士们就找来破棉花、烂手套，浸上柴油点起火把，挑灯夜战。工地是沸腾的，白天红旗招展，夜晚一片火海，18磅的大锤使劲抡，上百斤的冻土块，肩背人抬，推起小车一溜小跑……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一旦收工，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步履蹒

跚，回到驻地倒头就睡。一位当年参加会战的女排长累得实在受不了，曾产生过这样一个念头，当她挑着箩筐十分吃力地爬上用冻土块堆起的渠背上时，真想从后面摔下去弄成个轻伤，只要不伤着骨头就行，这样就可以休息两天，哪怕一天呢，好好睡个觉。在工地上，不但有摔伤的、累垮的、昏倒的，甚至还有献出生命的……

在每年的水利会战中，人身伤亡事故时有发生。仅在记录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往事的《北大荒风云录》一书中，就有近10篇文章谈到了会战中发生的事故。

少数团场和连队，坚持多年一贯制的水利建设，注重实效，收效较好。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二十九团，在10年内对460块条田有计划地改造，共挖大、小渠道1000余条，总长1082公里，使全团12万亩耕地中有5万多亩成为稳产高产田。1970年10月至11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组织6个团的1.3万人展开江川抽水灌区总干渠、干渠土方工程大会战，完成土方185万立方米，使江川抽水灌区成为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二连，1970年底在牧羊海边建点，当时只有1000多亩耕地，有灌无排，严重碱化。二连指战员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本连驻地周围方圆30多里的范围内，开挖渠道54条，总长100多公里，并且移沙造田，使耕地面积达到了5000多亩。1972年4月，兰州兵团一师从各团抽调1470人，组织了修建安西总干渠的大会战，1973年底完工，建成48公里水泥预制块衬砌渠道和30公里防洪工程，可灌溉安西与西湖地区的80余万亩土地。但是确实有不少水利工程因为规划失误，实际上根本不能使用，少数工程后来虽然发挥了效用，可比起投入的人力、物力来，实在是得不偿失。甚至有的兵团领导突然心血来潮，在农忙时也要抽人去搞水利会战，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一团就曾赶上过一回：

正要麦收，团里忽然组织起水利大会战，机车抽去不说，还搭上了一百几十个劳力。水利会战年年搞，可到底利在了哪呢？谁也说不清楚；再说往年都是冬天搞水利，这大夏天的怎么修起水利了呢？

秉性耿直的连长反对团里的这种做法，不识时务地在大会上强调眼下麦收要紧，招致了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说他在搞本位主义，说他目光短浅，没有革命的紧迫感。我想象得出团首长们侃侃而谈的那种活龙活现的样子。“修水利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这话，每年都讲，可年年都在冬天才“最重要”，怎么今年提前到了夏天就“最重要”了呢？

由于水利工程耽误了麦收的时间，本来丰收在望的麦子，在一场大雨后全泡在水中，损失已无法挽回。

为了表现在“农业学大寨”方面取得的成绩，在水利工程中还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乱报土方数额时有发生，这也是水利工程经济效益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何兴民描述的黑龙江兵团一师的水利工程，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实例：

三天前兵团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我们一师孙政委介绍学大寨经验时，兵团首长插话问一师水利土方数字，孙政委说有几千方，不想兵团首长火了，把孙政委轰下了台。后来听到其它师都是几万方、几十万方时，孙政委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天早晨，（四团）二十九连的两台红旗100马力和一台斯大林80大型推土机用钢丝绳连在一起，拽着一个大开沟犁待命。

对这种无规则拉沟我有点发怵，逼上梁山，就只好拉吧。

我对司机说走直线拉沟，可没走多远，后车便响起停车的信号。

“下来！下来！”师长走过来挥着手。“这车你是怎么领的？你去后面那辆。”说着他上了第一台。

推土机顺着山根不停地前进，大开沟犁翻出的深沟像一条黑龙弯弯曲曲地爬在原野上。我蓦地醒悟了，这哪是农田建设，分明是向大地要土方。

……吃午饭时，师长坐着吉普来了，他端起水杯让我喝，我谢绝了，无名的烦恼缠着我。

“你不要生我的气，”师长坐在我身边。“我也是没有办法”他的语调带着一种忧虑。

“可这样不是太盲目了吗？”我说。他没说什么，坐在那里望着远山。他的心里或许也是矛盾的。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农业学大寨吗？……那一次水利会战给团、师都增了光，添了彩，进度每天都有惊人的突破。除了在大田里拉了几条沟外，在田间道和公路两侧都开了沟。

无疑，那土方数日日暴涨。

盲目照搬大寨经验，把抓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到吓人的高度，不讲科学、不计投入、不管效果，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但在各兵团普遍存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的作者杨遇春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基本建设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许多农场不从实际出发，盲目修水库，搞灌溉工程，建设‘旱涝保收田’，搞整平耙碎，建设‘海绵田’。据兵团1972年统计，从1969—1972年，全兵团共完成农田基本建设工程5800多万土石方，平均每年完成的工程量比1968年增加了3.3倍，建成灌溉面积100多万亩，排涝面积367万亩，水土保持面积76万亩。实际上，上述数字，颇有不实之处，加上许多

工程缺乏科学的勘测设计，质量不高，有的工程远未配套，重建轻管，年久失修，万亩以上灌区 39 处，排涝区 144 处，多数无专管人员，泵站渠道破坏严重，工程受益面积逐年减少。”

水利工程年年建，年年修，大坝仍然免不了决口。水火无情，一旦大坝决口，宛如一场真正的战斗。1969 年 5 月，内蒙古巴盟乌拉特前旗“二黄河”决口，十几个村庄被淹，驻在附近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迅速派人赶去堵决口，当时参加堵口的一名兵团战士描绘了这样的场景：

我站在车上往堤上望去，只见大坝上有一个大口子，河水卷着泥沙像一头巨大的猛兽张牙舞爪地翻滚着冲出来，向那广袤的田野，向一个个村庄扑去。口子越冲越大了，前方传来消息又有两个村子进水了。情况十分紧急。

“快！一排、二排运土，党员干部围堵。”连长急促地命令着。

我随着人群向草袋堆跑去，刚一打开草袋，就有五六把铁铣向袋内装土，眨眼之间就满满的了。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在战场上非生即死的拼搏感，促使着我一下子背起这一百六七十斤重的草袋子向堤边跑去。几名排长站在决口的一边，把一个个装满土的草袋顺着堤边放入水中，眨眼草袋就被凶猛的河水吞没了。连长高举着马灯亲自指挥着这场战斗。我背着草袋拼命地在大堤上来回奔跑着。听说又有几个连也赶到了。远远望去，堤坝上形成了两条长龙，一条黄色的长龙向着堤口冲去，另一条却向着这边游来，两条长龙几乎汇合成一圈。北疆的夜晚，寒气袭人，然而汗水连外衣也湿透了，我整个成了一个泥人。背上的草袋越来越沉，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地抬不起来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咬紧牙关，吃力地移动双腿，一步步地向堤上爬去。这不仅是人与大自然的

较量，更是一个青年人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情的体现，对自己意志的考验。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随着草袋的抛入，决口一点一点地合拢着。可是堤内的水面也随着决口的缩小在渐渐升高，河水咆哮得更凶猛了，像一只不屈服的野兽，挣扎着向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扑来，这个小口子随时都会被重新撕开，大堤上再次出现了险情。

黑暗中，不知是谁大声喊道：“党员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绝不能让大堤再次冲开！”喊声刚落，一个黑影跳下水中，紧跟着又有几人也一齐跃下。我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推动，抱起一个草袋也纵身跳下。一时间，两米宽的口子中已立起一道人墙。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时间，口号声，语录声，夹杂着河水怒吼声，汇合成了一曲震撼天地的交响乐。

上百个草袋一齐向水中人们的身后抛去。草袋越堆越高，终于露出了水面，洪水驯服地顺着河道向下游流去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车站保住了。沸腾的大堤上，人们欢呼着，拥抱着，兴奋使人们忘记了一切。

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人们贡献着血汗、青春，乃至生命。轰轰烈烈，真真实实！由于当时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形式主义、不讲科学的乱指挥，在人们的“付出”中，有一部分是完完全全的无效劳动。也许这是一个时代前进所不可避免的吧。

三 小镰刀大战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是早就提出来的发展目标。1970年12月，中共中

央同意的《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又特别指出：“第四个五年计划，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50%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60%左右。”生产建设兵团是国家支持的农垦事业，优先发展机械化，无论在农机配套供应还是在农机资金投入上都享有特殊地位，但是在农机的使用和维修、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农业团场的机械化程度，各兵团不同。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每个团场大多有几十辆机动车辆（包括货运卡车、拖拉机、推土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吉普车、救护车等）。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时拥有汽车716辆，拖拉机756混合台，每标准台平均负担耕地760亩。相比之下，云南、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机械化水平较低，1970年云南兵团组建时，94个橡胶农场仅有各种型号汽车120辆，其中还有一部分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使用，造成生产资料运不进去、产品运不出来的矛盾。当年国家不得不特别批给云南、广州生产建设兵团50辆汽车，应付紧急需要。

具备机械化耕作的兵团，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尤其是大片农田的收割，动辄是大规模的“机械会战”，场面确实壮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八团的知青王杰廉记录了一次机械大会战的场面：

团营首长决定，根据掌握的天气预报，抓住麦收中后期的几个晴天，集中一批收获机械抢收小麦。

成败在此一举。是夜，连长召集会议作出具体安排，“作战”地块如何分配，送水送饭怎样保证，饭菜花样该咋调理，通讯联络由谁负责……给我的任务是：收集会战情况，写好宣传报道。幸亏我多了个心眼，事先借了一辆自行车，要不，这大面积作战靠两条腿跑得过来吗？！

凌晨3点刚过，只见南边公路上车灯忽闪忽闪连成一片，灯光中夹杂着车轮扬起的尘烟，女副连长小张扯着大嗓门叫道：“来啦！来啦！”说话间，车队已拐弯浩浩荡荡开进通往连部的道路。

一个个庞然大物威风凛凛，纵贯大道。自动康拜因、牵引收割机、载重汽车和小型运输车，加起来足有七八十辆，往北，望不到头；往南，找不到尾。车队在这儿短暂停留后，便轰鸣着驶向各自的作业地号。

东方刚开始由红转白，“战舰”已经在千顷麦浪里驰骋……

平生哪见过这种壮观场面：眼前一片金光闪烁，那在麦浪中“鏖战”的收割机群，逐波剪浪，吞金吐银，在它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整整齐齐的麦茬，远远望去，就像铺在大地上的一层绒毯。地头公路边，“大解放”敞着宽阔的胸怀，接下了—斗斗金粒似的小麦，然后—溜烟奔向晒场……

晌午时分，我在地头碰到一个康拜因手，他和我是同一车来的知青。我想同他好好聊聊，可他却顾不上同我唠几句，只是大口大口吞咽着饭菜，后来干脆把剩下的一点菜夹在馒头中边走边吃。我冲他喊：“这么火烧火燎地干啥？”他只回了我一句：“那边人歇车不停，我们正同他们鏖着干呢！”他跳上机车，随着排气管里冒出一缕黑烟，康拜因又轰鸣着驶进麦海。

大面积耕地、播种，当然更离不开机械，为了抢时间，有时甚至昼夜不停地驱机运转，那滋味可不好受。黑龙江兵团四十五团的女知青王祖俭有这样一段回忆：

寒风带着细碎的雨珠，疯狂地扑面而来。裸露的皮肉像

被千万把锋利的刀一遍一遍地割。冷、痛，直到麻木，没了知觉。

站在播种机上，到处都是冷冰冰被漆过的绿色角铁，足令人望而打颤。前面的“东方红”不知疲倦地滚动，发动机吼叫着，粗大的链轨嘎嘎地磨着牙。那单调的奏鸣引来播种机不停的震颤。麦粒也在抖，不停地顺着一根根管子流向土地，它们还要经受无数的考验，才能生养出更多更多的后代。

黑色的土地伸向天际，空旷的田野上，能看到星星点点的拖拉机和拉着的播种机；低垂的天幕下，倒也浑然是一幅画卷，只是色调太冷。才十六岁的我，站在播种机上瑟瑟发抖，浑身上下都已湿透。不时麻木地向播种箱里添着麦种。整整一天了，中午那几个冷包子早已消化没了，我忍着，咬紧了牙。

老远见连长来了，我像看到了希望。他看到我们这副可怜相，多少也得发点慈悲吧！再者天也就黑下来了。我们可怜巴巴地望着连长，我只觉得喉头一阵阵发堵，低着头，忍着要涌出的泪，也不敢说话，我知道一张嘴就要哭。

“天还早，把这片地播完再收工，先吃饭。”这竟是我们盼到的希望。可此刻，我却没有了眼泪。同行的姐妹谁也不再说话。我们把一袋袋麦种拖上了播种机，车发出了沉闷混浊的鸣叫，拖着播种机，载着几颗被冷死的心冲进了黑暗。

风更急，雨更大，天更冷了，黑暗笼罩了一切。只有两支光柱伸向前方。我想起了温暖的家，想起妈妈。在寒冷与孤独中，满肚子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混着冷冰冰的雨水往下淌。

机械毕竟不是万能的，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限制，有时机械的作用非但发挥不出来，甚至造成副作用。黑龙江兵团为使机车

在雨季能够继续作业，采用了给机车穿“木靴”的方法，但是却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雨一下就是10天，颗粒状的黑壤土本就细如粉面，加上连队的麦地地势低洼，地里水分早已饱和，透过密密的麦秆儿，能看见一层薄薄的雨水。一脚下去，泥水能没及小腿，别说开机械下地收割，人行走都很困难。

我看见连长在指挥着拖拉机试着下地，老远听着机车哼哼地鸣叫，看着链轨搅起的泥浆，倒是像和泥。

没两天，团里又传下话来，要连里派人去兄弟连队取经。派去的人带来了新招，给拖拉机链轨上绑上木头防陷，然后用数台机车合力牵引一台康拜因。

那场面着实难见，数台“东方红”一字摆开，红旗一挥，轰鸣声震耳欲聋。

“铁甲车”滚滚前压，掀起的泥浆，打成团地下落。还真行，机车滚过，出现了一片整齐的麦茬。可一回头，我看见连长在那急得冒汗……

转年春播时，我们看到更可怕的事实。昔日黄色的土地怎么变成了黄白颜色，如同一张营养不良的面皮，痛苦地皱在一起；又像一片片烂癣，在本来丰满的肌肤上留下一块块腐烂流着泥水的皮肉。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们才清楚，这里本是一片丘陵带，黑壤土只有一尺来深，“先进超人”的机器穿“木鞋”收割法，把没有肥力的黄白土壤翻了出来。

与机械打交道，难免发生意外事故，这些事故，一部分是技术操作问题，另一部分是过度疲劳后的松懈所造成。虽然防止机

械事故的教育年年有，但仍然不可能杜绝事故的发生。

在“革命加拼命”、“大干快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气氛下，兵团农业技工人员、机车驾驶员及农机操作手的培训时间极短，造成了普遍的农机知识不足和机械保养不良的现象；野蛮驾驶和违章操作，更加速了机械的损坏。机械完好率过低已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机械的大量损坏、报废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兵团的机械化水平。有的团场，后来不得不返回到完全畜耕手割的状况。财政部1972年的调查表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机车作业无规章制度，机车的完好状态比过去差，时间利用率低，机车事故多。以十八团为例，1971年机车完好率只有70%，出勤率65%，时间利用率60%，每项都比过去降低20%，并且发生了机车事故55起。同年，黑龙江兵团十团因机车事故死6人、伤14人。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样存在。

另外，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公然贬低农业机械作用的情况，片面地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认为越苦越累，越能体现出人的革命性。杨遇春不客气地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轻视农业机械作用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范围内，将“人的因素第一”强调到排斥一切的程度，因此，生产建设兵团一成立，就主张“不能靠拖拉机、康拜因，最根本、最重要的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开发北大荒，建设北大荒”。

1971年，兵团曾对三师二十九团做了一个调查，报告例举这个团的六连“地少人多，平均每人负担耕地20亩，但他们为了‘学大寨’，硬是用机械在耕地上纵横划印，然后用大量人工去刨垅，抓把粪，点播玉米”。兵团批转了这个报告，把它作为学大寨的好典型加以宣扬。

由于不断贬低机械化的作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常被搁置

起来。在这一段时间，许多农场、生产队，除了机耕面积以外，从作物的播种、管理到收获的许多生产环节，机械化程度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连队改装的玉米点播机，不准使用，强令工人点播；大田作物的田间管理，年年搞“大兵团作战”，机关锁门，工厂停工，都去支援铲地，并且实行“两头（早、晚）看不见，地里三顿饭”；一到秋收，不仅玉米的收获需要动员包括小学生在内的人力去掰棒子，就连多年来一直是机械收获的大豆，也强调人工收割。当时的《兵团战士报》还刊出了宣传“小镰刀打败机械化”的文章。三师二十九团强调一律用人工收割大豆之后，从割倒、放小铺、集大铺到脱谷，作业程序多，综合每亩损失达30多斤……

对先进生产工具的轻视，导致对掌握这种生产工具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技能的鄙视和漠不关心，许多机务技术人员和工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先进工人不少被撤换……又慑于“技术第一”、“白专道路”的帽子压人，放弃了技术培训，劳动力的质量显著降低，机械作业质量不好，机车技术责任事故大幅度增加。据二师十六团统计，在1971年的前11个月中，全团发生机车事故51起，多是技术事故，占机车总数的34%。其中，联合收割机引擎掉下摔坏、断曲轴、烧瓦等重大事故之多，为建场24年所仅有。十团当年机车事故就死亡6人，伤14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新工人不懂操作规程造成的。1971年新建的十七团，由于用“不突出政治”的帽子吓人，老同志不敢教技术，新同志不敢学技术，技术事故不断发生，全团有18台中型拖拉机元宝梁破裂，2台拖拉机水箱冻坏，3台小型拖拉机捣了缸。

总之，兵团的初期，人为地制造人与工具的对立，把充分发挥机械作用批判为“机械挂帅”，把丢开先进工具去拼体力赞扬为“人的因素第一”，“革命化打败机械化”，严重阻碍

了农垦经济的发展。

各生产建设兵团大多有自己的拖拉机修配厂或农机修配厂，团场则设有修理站。黑龙江、内蒙古兵团的下属单位基本可以做到拖拉机大修不出团场。有的团场除农机维修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的机运连，就颇有建树：

我团机运连是在原林场机耕队的基础上组建的，除十几台拖拉机、几间空车库、部分农机具之外，修理工具只有一台手摇钻和一把榔头……当时提倡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机运连敲敲打打地开始了修理业务。

按照全军技术革新交流会的精神，我和大家一起组织攻关，开展技术革新和修旧利废的工作。青年们发挥了聪明才智，技术干部悉心教授，一项项新技术运用起来了，一个个新产品开发出来了，一台台新设备试制成功了。如我们试制出氩弧焊机用以焊接铝材和不锈钢板（清华大学在第二年才试制出第一台氩弧焊机）；用环氧树脂粘接法修补汽车、拖拉机发动机缸体；用镶齿法修复拖拉机边减齿轮；还把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自己制造出多用综合电器、玻璃钢氧气瓶、电动抽油泵、拖拉机湿式空气滤清器、发动机小吊车、龙门吊车和电动制砖机等。所有这些技术、工艺、设备在70年代初的北疆沙漠被推广、应用，无一不凝结着我们这一代开拓者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对当时的机运创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四团的机运工作曾先后受到师、兵团、自治区各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使一师四团机动连在北疆颇有点小名气。

当然，也有不成功的革新，1972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七团某连在指导员的带领下改造联合收割机，就是一个假、大、空的例证：

1972年4月20日。连里又开会了，无非还是研究改装5151号联合收割机的事，5151号车确实有些旧了。

“这回我们几个人要把它改造成国际水平的收割机，你们想想，把横向滚桶改为顺向，不就可以成为世界水平了吗？”指导员不断强调改造它的意义，真让人心里有些激动。

1972年6月24日。今天干了一整天的活，晚上加班干到9点多，整个改造过程是边设计边施工，干脆说，是老车师傅想到哪，就干到哪。我真佩服老车师傅好想象力，只不过把滚桶向前移动1米，转一个90°，把钉尺改成纹杆就可以了。看来，外国先进水平也不过如此。听有人说外国农业使用全电子技术无人操作，八成全是吹牛。不过活全靠我们几个人手工干出来，却是挺累人的，干一天活累得腰酸腿疼，手上碰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为了让河对面的苏联人看看，我们也有国际水平的收割机，累死也值得！

1972年7月25日。5151车的改造工程终于完成了……晚上开全连大会。指导员郑重地向全连一百多号人宣布：“我们中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收割机，终于试制成功了！目前在我国只有两台，一台在广交会展览，一台就在我们连队的停车场，今年麦收就要大显威力了！”接下来又是一气什么防修反修，不依靠旧学校培养的臭知识分子之类的话。

1972年8月2日。星星还在东方天上列着队向前走时，我们就到了车上，由301号机手把5151号收割机拉到地头。今天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人常说，天时地利人和，今天占全了：大晴天，天时；地号经过反复挑选，又平又直，地

利：谁都想干好，人和。

8点半，露水下去了，正式开割。但实际并不顺利，不是这坏就是那坏，总出毛病，急得老车师傅满头大汗，把我们几个也累得够呛。整整一天，光修车了，根本没干什么活。

1972年8月25日。我们这台国际水平的收割机还不如改造以前，那时每年还出不少活呢。那些农工也真坏，还编了什么顺口溜：“5151，割麦不如镰刀，5151，脱粒不如棍敲。”可有什么办法呢？

1972年12月20日。这台破车能参加全师召开的农机改造先进代表会，真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望着从全师十来个团拉来的各式各样改装机具，能让这台破车摆在其中，我心中很不是滋味。经过麦收、秋收两场考试，证明我们的改装不成功，可还要拉来，还要说它如何如何好。瞧，指导员正在向别人讲改造如何如何成功呢！改造车的事，他一点活也没沾，他有什么经验，无非大讲怎么革命化呗。

1974年12月15日。5151号车正式宣布报废了。

大田的田间管理，培育优良品种和推广先进种植技术，确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一连是兵团早就树起来的典型单位。该连党支部经常在《兵团战友》报介绍经验。在连长闻泽华的带领下，该连每年冬季的平地保墒工作都抓得很紧，上地的耙、平、压，都在4遍以上。该连还有一位66岁的“老愚公”王有余，每天顶着星星积肥，一个多月就积肥20000斤。一连有64名职工，连队党支部很注意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关心他们的生活。在经营管理方面，一连不仅试行了劳动奖励制度，还制定了连队经营管理的规章制度5章30条，并实行了劳力、土地、产量、工具四固定的生产制度等。内蒙古兵团二师的直属种子站，开辟了600亩种子田，为全师10个

农业团提供良种。在北方尤其是沙漠地区种稻子的试验，也是从育种开始的。但是培育出来的稻种没有能够大面积种植，参加过试验的兵团战士后来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一是黄河水下来有一定的时间，不能满足稻田经常用水的需要；二是排水问题没解决前，种水稻会造成土地盐碱化；三是从建设规划讲，这里需要大面积营造防护林，防风固沙，防止沙漠东移。以后几年的建设中，植树造林成了沙漠地区的主要任务。

大豆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产品之一，受到特别的关注。五十四团曾试种大豆优良品种取得成功：

这一年为创大豆高产，我们连科学种田、合理密植，试种了“三苗眼”大豆。

“三苗眼”，就是在一条田垅上种三行，为此还特别自行设计改装了“三苗眼”播种器。

不久豆苗初露尖尖角，接着几场春雨过后，豆苗气儿吹似地窜了出来，田间一片新绿。

“三苗眼”密植在兄弟连队已经试验成功，我们说是“试种”，一播就是3450亩。大豆长势喜人，可也急坏了连长。以往铲地的长把大板锄用不上了，不然就会草苗一块儿被刨下来。可时间不等人，雨水不仅滋润了苗也滋润了草，草苗并行生长，这可怎么办？

连长不愧是个好庄稼把式，他想出了改便小把锄铲地的办法。他的招一出，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招儿绝了，活儿，更够受的了。

“三苗眼”密植，看来非小把锄不行。尽管都清楚干起来是股什么滋味儿，但没人反对。接下来便进行全连动员，从大道理世界革命到农业学大寨数了一个遍。同时尽快安排赶做小锄300把。

300号人终于进入了位置。

这是铲头遍地，老百姓都说：“头遍如绣花”，意思是要细，像绣花那么细，一遍细，第二遍、第三遍就好办多了。可在一望无际的农田里“绣花”，谈何容易！

铲地开始，我就发现速度慢了，而且更累，但没有一个人说什么，都闷头儿干。不久，发现大家都只铲垅间的草，垅上苗该间的间。按以往的情况是没有间苗这道工序的，因为是“三苗眼”，密植还要合理，所以提出了间苗的要求。俗话说：“豆打旁枝麦打齐”，这都是下乡后新长的学问。

连队开动员大会时，讲到了间苗问题，但大家仍有疑虑，况且间苗就更影响速度。田间休息时，我向大家重又解释了一遍，说明这是合理密植科学创高产的重要一环。学大寨，争取上《纲要》，就得舍得下功夫，既然已豁出来用小把锄“绣”，难道就不能再把苗间匀点吗？

知青是可爱的人。道理说过，他们都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去做了。他们有的蹲着，有的跪着，有的大弯着腰，在田垅间“飞针走线”。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们300人在有限的的时间里是不可能铲尽这3400多亩大豆地的。团里派来了几卡车人支援，经过半个来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头遍“绣”。

收获时节，“三苗眼”大豆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团的上海女知青陆红珠，为了提高大豆的产量和质量，曾进行了“花生与大豆的缘远杂交”试验，虽然精神可嘉，但是终于未能成功。而同样是上海知青的梅民权，比陆红珠幸运得多。他从1970年8月开始在完达山北麓试种适于温湿气候的银耳（白木耳），并得到了上海农科院的帮助，终于在

1972年试验成功。*

但是，就总体而言，各生产建设兵团对农业科学研究的重视不够，甚至因为“突出政治”而破坏了科研的发展。仍以黑龙江兵团为例，不仅撤消了原来为垦区培养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农垦大学和王岗、赵光、宝泉岭三所农业中等技术学校，还撤消了原东北农垦总局农科所，农科所的科研人员80%下放到基层劳动，留下来的十余名科研人员先在试验队劳动，后来被派到一些农场去“开展群众性的科研工作”，导致许多科研项目中断，不少已经可以推广的良种失去了应用的机会，在十余年后才得以大面积普及。1973年，黑龙江兵团建立团、营、连三级种子繁育体系后，引进、推广、应用良种不当，出现了品种多、乱、杂的现象，小麦品种107个，大豆、玉米品种70多个，无法单收、单晒，给生产带来困难，加之有的品种未经试验立即投入生产，品种搭配不合理，造成了减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学院和塔里木农垦大学于1969年4、5月相继撤消，兵团设计院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组织也先后被撤消，科技干部不能发挥作用。按照新疆兵团1972年的统计，全兵团只有农业科技人员6992人，其中1766人被迫改行，1046人下放劳动，由自治区肯定并推广的“好条田、好林带、好渠道、好道路、好居民点”的经验被当做修正主义的产物遭到批判，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四 千方百计上《纲要》， 拼死拼活过“黄河”

耕耘是为了收获，无论是兵团战士还是干部、职工，在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之后，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好收成。收割、脱粒、入

* 见《人民日报》1972年12月20日文《“银花”开在北大荒》。

库，是每年都要有的最后冲刺，大面积播种的作物，不用机械而用人工收割时的滋味，普遍地留在了北方兵团人的记忆里：

小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7月中旬的河套平原，雨季尚未来临，天空骄阳似火，地里的麦子已是一片青、一片黄，麦浪滚滚，到了开镰收割的季节。

开镰的前一天，三连的500余名兵团战士整齐地列队在连部的大院里，由连长、指导员作战前动员：“是英雄，是好汉，割麦场上比比看！”凌晨4点钟，嘹亮的军号声就把人催了起来，以排为单位整队奔入麦田。每3人划作一组，其中手快的一人打头阵，割4垅，捎带打腰子，中间一人纯割5垅，后面一人割3垅，连捆带拣麦穗。这时，天刚麻麻亮，镰刀一伸进麦垅，讨厌的蚊子就一窝蜂似地涌了出来，趴在人的脸上、脖子里，死死叮住不放，人们根本无暇去顾及它。麦田的地头长有3里地，到中午只要割到地头，每人即平均1亩地，可称得上是棒小伙子。上午10点钟以后，是人们最难熬的时刻，太阳烤得人直冒油，口干舌燥，腰已连续弯了几小时，此时更加疼痛难忍。我割几把就得站起来直直腰，不怕慢，就怕站，一会儿我便落在后边了。女青年似乎忍耐性较好，差不多冲在前边的都是女性了。常言道，女人怕坐月子，男人怕割麦子。这话大概有点道理。只听见，女四排的王燕儿带头喊起：“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随之，口号声此起彼伏，再加上镰刀的割麦声，人们的呼味喘气声，宛如一曲美妙的交响乐章。我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抖擞，憋足了劲，一会儿又冲到了前边。

午饭后，大家累得倒头便睡。即使是这样，每班都有人牺牲午休，偷偷替战友们磨快了镰刀。那是真正自觉自愿地学雷锋，做好事，甘做无名英雄。

假若天公不作美，在麦收季节来个阴雨连绵，快要到手的好收成即成泡影。虽然兵团机械化程度较高，但依然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局面。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机械的作用反而发挥不出来，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拼命的干劲，用人力夺粮，收回多少算多少。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碰上了这样的厄运：

谁也挡不住老天爷变脸。1971年麦收时节，三江平原连续几天暴雨，接着又是细雨绵绵，没完没了。

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机械割麦是没指望了，即便是人工下地也实在够呛。

水，总算是缓缓地退了下去。泥泞不堪的麦田里，泥水没膝，人进去难以自拔。小麦出现了大面积倒伏，这一切都加重了麦收的困难。

团党委在召开的连干部会上，要求全团干部战士克服困难，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向大自然开战，全力以赴，龙口夺粮。

这是一片4000亩的麦田，麦田低洼处，水还没有退尽。每天清晨5点，来自各个连队的知青就已在地上集结完毕，彼此之间的对抗赛是无言的，这是知青的特点。

雨靴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灌篓儿，人几乎是泡在水里的。每人18根垅，大弯着腰，左手搅过一把湿漉漉的麦子，右手挥镰齐根儿顺手往斜下里带，说不清是一股子什么劲儿，两把三把就是一捆。这是巧劲，但架不住一天几千几万次的重复。天还是阴沉沉的，可我们却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甚至不愿意直一直酸疼得几乎折了的腰，谁多直起一次，就要被少直一次的人甩下几米。实在难熬，就反手将镰刀把横在腰间硌几下。

难为的是那些女知青，她们像小伙子一样地干。来了例假，却没有一刻不是泡在水里的。

……每天持续在泥里和水里滚、爬。站着割不动了，就跪在水里割，用膝头向前蹭，遍身泥浆，几乎是在拼命。六师师长、全国战斗英雄王少柏看到了这样的劳动场面，他哭了，他说：“这样的战士，是全兵团的骄傲。”

就这样，我们连创造了人均日割2.7亩小麦的最高记录，并始终保持人均日割2.5亩的记录。

为了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经常性的动员会、表决心、展开革命竞赛等当然在所不免，领导们甚至还要抓住中间休息的机会开“地头会”，像这样的一次“地头会”，颇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

“嘟！嘟！”传来了吃午饭的哨声。全连战士接班、排围坐在一起吃午饭。饭后，指导员召开“地头会”，由蹲点的团政治处主任讲话。他领着大家先学毛主席的指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是怕苦，二不怕死’。”“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然后主任对大家说：“同志们冒雨、冒着蚊虫的叮咬割麦子，辛苦啦！这次麦收战役是对每个兵团战士的考验，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用小镰刀战胜拖拉机。我们要坚持天天读，天天批，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他又谈到苏修入侵我国领土，挑起边界争端，兵团战士要准备打仗，随时准备反击侵略者云云。

开完地头会，大家就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毋庸置疑，在各生产建设兵团中都有一些获得过大丰收的团场、连队，并且获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按照当时的标准，能

够达到自给的单位就可以受到表扬。首先应该做到的是粮、油、菜、肉“四自给”，然后争取粮、油、菜、肉、工资“五自给”。在当时的报纸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北大荒垦区，过去粮食平均亩产量在 200 斤上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管后，提出了垦区粮食亩产上《纲要》的口号（平均亩产达到 400 斤以上），并且要争取“跨黄河”（平均亩产 500 斤）、“过长江”（平均亩产 800 斤）。有人说道：“北大荒人少地多，向来都是广种薄收，要上《纲要》，神仙也办不到。”但是兵团人不相信。有一个连队提出了“每个战士、职工，平均每年生产 1 万斤粮食”的目标，并要在短期内实现亩产上《纲要》。在连长王池的带领下，全连积极开展了开荒、积肥和造良田的活动，在 1970 年就实现了亩产上《纲要》。1971 年，黑龙江兵团一个团场的 20 万亩大豆获得丰收，其中有 5 个连队的 18800 亩小麦亩产上了《纲要》。1972 年，黑龙江兵团六团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较好收成，全团 149653 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 250 斤，有的高产连队，小麦平均亩产在 400 斤以上。*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某部，1971 年粮食总产量 1500 万斤，1972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2663 万斤，有 72% 的农业连队实现了“四自给”，并出现了 5 个年产百万斤粮食的连队。

西藏生产建设师下属的澎波农场，有职工、干部 6300 余人，开垦耕地 10 万多亩，从 1969—1975 年六年中，生产粮食 10742 万斤，上交国家商品粮 5100 万斤，上交国家利润 439 万元。西藏生产建设师全师的情况也比较好。1972 年，该师垦区受到了干旱、冰雹、病虫害等自然灾害袭击，仍然战胜困难，夺得了粮食总产量等于 1971 年的好收成，上交国家商品粮 1000 万斤，盈利 100 多万元。

* 见《人民日报》1972 年 3 月 10 日文《“北大荒”换新貌》。

报刊上宣传的“典型”事例不能反映客观事实，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总体而言，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效益较低，很多连队甚至团场是欠收单位和经济亏损单位。在多年后人们较切实际的回忆和评判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记录。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一年的生产记录是：“1970年，六十四团十七连播小麦8亩，绝产。”另外一个连队，则由于收获时受到水利工程的干扰，耽误了季节，结果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倒欠国家300元人民币。1972年，六十一团在麦收季节遇上阴雨天气，小麦大幅度减产，单产只有50公斤；大豆单产32公斤。1973年，又遇春涝，麦播推迟，造成大面积绝产，单产仅22.5公斤。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四连，在盐碱滩和沙漠上开出300亩水稻田，提出了争取吃饭自给自足的口号，但是秋后的收获只是半麻袋稻谷。同团二连种麦子，情况也不妙，“由于没有讲科学种田，没有管理经验，在贫脊的坡地上种地，自然是得不偿失。秋天拔那些稀稀拉拉、高不过膝的麦子时，也不知收没收回种子来”。五师四十三团四连，在草原上开荒种地，几千亩水草肥美的牧场变成了黑黝黝的农田，但是收获时每亩只收回30多斤小麦，连种子都不够。

大量农业团场的歉收和绝收，造成了整个生产建设兵团系统农业生产的快速滑坡，国家统计的年产量数字清楚地反映了这个问题：

1969、1970两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垦种上地近4000万亩，拥有拖拉机15000台；其中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年生产粮食9700万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粮食总产量达15.6亿斤，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1971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粮豆总产量共计50亿斤，平均亩产量194斤；新疆兵团粮食总产量15亿斤，单产246斤，上交粮

食近2亿斤。黑龙江兵团粮食总产量26.9亿斤，单产180斤，上交粮食10亿多斤。内蒙古兵团粮食总产量8172万斤，1969—1971年，三年平均粮食单产80斤，吃掉国家供应粮2亿多斤，超过了三年的粮食总产量。

1972年，全国兵团粮豆总产量46亿斤，平均亩产量175斤。

1973年，全国兵团粮豆总产量41亿斤，平均亩产量167斤。

单一兵团的生产情况更能说明问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与1966年相比，职工增加了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52万亩，粮食总产量减少19.5万吨，下降30%；棉花总产量减少0.98万吨，下降39%；油料总产量减少到5000万吨，下降34.3%。1966年兵团上交商品粮27.5万吨，1974年吃国家返销粮1.7万吨。

兰州兵团一师1970—1974年开荒4万亩，边开边弃，择好地而种，耕地由1970年的23.89万亩减为1974年的20.46万亩，播种面积由19.18万亩减为18.18万亩，粮食产量由1970年的793万公斤增长为1974年的1095.8万公斤，增长38%。二师改造老农田9.7万亩，开荒配套10.38万亩，1974年耕地面积达到27.6万亩，比1970年增长8万亩。1974年产粮1199万公斤，较1970年增长12.1%。一、二师的前身农建十一师，原来是一个缺粮单位，每年由新疆兵团支援粮食400万公斤。改建兰州兵团前，新疆兵团支援粮食的任务中断，所缺粮食由甘肃省解决，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1970年，一、二师共缺粮399万公斤。1973年，一师缺粮413万公斤，二师缺粮34万公斤。1974年，一师缺粮425万公斤，二师粮食基本自给。在青海的兰州兵团四师，农业生产情况同样很不理想。1970年，四师播种面积为8.11万亩，产粮441.38万公斤，平均亩产58.2公斤；油料作物产量为1.27万公斤，平均亩产2.5公斤。1974年，播种面积降为6.31万亩，产粮244.15万公斤，平均亩产43.5公斤；油料作物产量为2.14万公

斤，平均亩产5公斤。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情况参见表4—1和表4—2。

表4—1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基本情况统计表（1968—1973）

项 目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职工总数（万人）	39.1	53.7	58.1	60.7	59.5	59
国家投资（万元）	6357	10467	13167	12667	14137	19023
工资总额（万元）	16851	23791	25507	26192	27039	26979
耕地面积（万亩）	1385	1465	1630	1749	1861	1867
播种面积（万亩）	1230	1276	1358	1490	1573	1459
平均亩产（斤）	217	158	198	180.8	154.1	128.6
粮豆总产（亿斤）	26.68	20.13	26.88	26.93	24.24	18.77
上交粮豆（亿斤）	15.52	10.25	12.99	10.49	8.46	4.73
农用拖拉机（台）	5876	5911	7285	8268	8361	8746
工农业总产值（万元）	47210	45612	61198	61099	63747	60619
农业产值（万元）	53544	31850	42051	41887	40679	34762
工业产值（万元）	13666	14762	19147	19212	23068	25857
经营盈亏（万元）	+1347	-13478	1542	-8311	-10674	-19750

由于人力投入过多和机械花费、农药施用等花销过大，兵团所生产粮食的成本高得惊人，平均一斤小麦合几元钱的事并不是非常罕见。例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1970年播种3.8万亩，粮食总产量为210万斤，平均亩产只有67斤，每个职工平均生产粮食466斤，创造产值174元；二师十八团十连，1971年水稻每亩成本284元，收入50元，每亩亏230多元；一师四团十连，平均每亩只打4两粮，每斤粮食成本66元；而当时北京市商品粮的售价，1斤白面是0.185元，1斤好大米为0.197元。

表 4-2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基本情况统计表 (1969—1974)

项 目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人 数 (万人)	7.66	9.36	10.6	12.8	13.9	14.1
国家投资 (万元)	7152	3720	8441	6449	6250	3701
工资总额 (万元)	1621	2593	3406	3526	3676	3762
耕地面积 (万亩)	59.66	102.3	151.7	174.4	155.4	148.7
播种面积 (万亩)	56.37	78.16	131.9	134.4	125.1	107
平均亩产 (斤)	80.5	78	62	35	58	44.15
粮豆总产 (万斤)	3963	5263	8195	4740	7322	4091
牲畜存栏 (万头)	43.61			63.09	68.56	70.02
甜菜产量 (万斤)				735	1655	663
工农业总产值 (万元)	1538	3599	6302	10879	12091	9373
农牧业产值 (万元)		2607	3787	3646	3814	2940
工业等产值 (万元)		992	2515	7233	8277	6433
经营盈亏 (万元)	-1994	-3047	-2935	-3238	3209	-4682

不计成本的生产，产出越多，亏损越大。各兵团绝大多数的农业团场都亏损，并形成了全国所有兵团的巨额亏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1968—1973年，基本建设投资8.1亿元，拖拉机增加了55%，耕地面积扩大31.5%，但粮豆总产量减少35%，平均亩产量降低41%，上交国家商品粮减少72.5%，6年累计亏损8.22亿元，平均每年亏损3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1953—1966年，14年盈利10.54亿元，1967—1976年，共亏损12.93亿元。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1971年，国家拨基本建设投资2.33亿元，弥补亏损0.786亿元。无怪有人说：“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兰州兵团一、二师，1970—1974年共计亏损7244.62万元；四师1974年比1966

年亏损增长 59%，1970 - 1974 年亏损总额超过了 3000 万元。

生产建设兵团的严重亏损和粮食产量的持续下降，不但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困难，还影响了全国粮食购销计划，理所当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1973 年 9 月 26 日，黑龙江省粮食局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的报告，列举了兵团组建以来历年的粮豆生产和交售情况，并指出 1973 年兵团粮豆产量和交售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自然灾害很大，春涝严重，部分播种面积违误农时，播种质量不好，造成严重减产；第二是生产指挥不力，小麦播期已过，本应改种大豆、玉米，但仍按计划到了 5 月中旬继续播种小麦 450 万亩，致使大豆的播种期也普遍拖后，其中有一半左右播在极限期的‘芒种’以后，而又不是早熟品种；第三，是机械不配套，维修跟不上，维修用钢材每亩仅有 0.2 至 0.3 斤（1968 年为 1 斤），致使机械技术状态不好，许多连队没有钉尺耙，田间管理跟不上，草荒严重，化肥减少，平均每亩仅 5.6 公斤，而 1968 年平均每亩为 17 公斤。”

全国粮食会议 10 月 4 日印发了这份报告，同时分送给总理和国务院各业务组。10 月 6 日，李先念副总理在报告上作了如下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呢？我想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是不会甘心长此下去的。……材料所写的几个原因，可能有些道理，但不是主要的道理，问题在于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们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希望农林部和黑龙江省委抓一抓这个兵团的工作……从方针、政策上总结经验，错了就转过来，这样，就可以鼓舞士气，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国家多贡献力量。”此后，李先念又在全国粮食会议上指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拖拉机最多，他不是年年增产，而是年年下降，我看他七减八减，闹出吃别人的粮食，他就舒服了。”

歉收的农场，当然要努力改变局面，领导们一再发出号召：“不当伸手派，不吃亏心粮”（兵团由国家供给商品粮，可谓旱涝保收），“力争打好翻身仗”等等。当然，不亏损的团场有理由出来介绍自己的事迹和经验。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团党委就曾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叙述他们如何一方面抓好生产，一方面搞好多种经营，在1972年使得42万亩小麦的产量增长了一成，向国家上交商品粮4200万斤；该团从1970—1972年，每年上交的利润达200多万元。西藏生产建设师1970年亏损1179.6万元，1971年转亏为盈，盈利1.1万元，实现粮食自给，并向国家交售商品粮452万公斤。从1971—1978年，西藏生产建设师一直是盈利单位。但是这样的师、团场毕竟是少数。很多亏损的连队乃至团场，直到兵团撤消时还未能扭转局面。

从1973年开始，各生产建设兵团逐步由大军区划归省、自治区领导，并增加了新的投资。如黑龙江兵团交给黑龙江省委领导后，1973—1975年，黑龙江垦区得到基本建设投资6亿元，农用拖拉机增加了2500台，联合收割机增加了近2000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亏损19750万元，国家拨补7000万元，其余部分由兵团自行挖潜解决。农林部、财政部在复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函中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近年来粮豆总产量逐年下降，亏损越来越多，今年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是很可喜的进步，希望……尽快做到转亏为盈，为国家多做贡献。”1974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粮豆总产量达到31.5亿斤，上交国家14.7亿斤，但亏损的帽子还是没有摘掉。

生产建设兵团以农业生产为主，又搞不好农业，原因何在？除了当时已经引起人们重视的管理体制问题外（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十四章专门讨论），还有生产经营中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业

生产的评说来解释这些问题。该书作者认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仅在农田基本建设上盲目照搬大寨经验造成了不良后果，在选择作物栽培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由于强调“千方百计‘上纲要’，拼死拼活‘过黄河’”，许多农场原封不动地照搬省内学大寨的典型涝州公社的生产措施。例如，玉米的种植，在垦区，因为早熟、高产品种没有解决，加上各个生产环节的机械化程度都很低，被认为是“难种、难管、难收、难吃”、经济价值又低的作物，只是它有时可能获得比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便强调扩大玉米种植面积。1971年全兵团玉米种植面积由60年代末期6%左右扩大到了12.9%，个别农场竟达30%，由于以上原因，基层干部和工人不愿种，1972、1973年降低到7%，可是，又被批判为“以钱为纲”。对玉米的种植，兵团大力推广大寨和涝州“一垅双株，人工抓把粪，横穿带玉米，高粱拐子苗”，以及“三带一复”（大豆带玉米、土豆带玉米、瓜类带玉米，小麦地复种糜子或豌豆），搞“土豆夹着玉米过长江”等等。这些在大寨、涝州以及其他地区，都可能是成功经验，但是，在黑龙江垦区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显然很难适应，这些措施的强制推行，使20多年实践逐渐形成的、比较适应机械化生产的生产秩序和制度，因之而废弃，不少方面又恢复到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生产措施，事实上造成了生产力的倒退。

贬低农业机械的作用和忽视农业科学技术的现象，有目共睹；生产上的“瞎指挥”更是司空见惯：

1970年7月，兵团四师四十三团曾下了一道麦收“命

令”，要各营、连在麦收中“突出一个早字”，在8月1日前麦收全面报捷。于是，大部分连队的小麦在黄熟中期、初期，个别连队甚至在小麦腊熟期就开始收割，严重伤镰。全团7.7万亩小麦，每亩少收30至40斤，全团减收达300万斤，增加了全团的亏损。这种违背生产规律，脱离实际“一刀切”的瞎指挥的事例，在兵团的前期是极其普遍的。

由于兵团的生活方式要求军事化，生产和生活秩序也强调高度统一。但是，兵团的多数主管干部，又缺乏指挥机械化农业大生产的经验，加上对“旧农场”、“旧干部”、“旧知识分子”的歧视，不愿意、也不可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只靠自己的主观意志和小农经济、小生产的传统观念来认识机械化农业大生产。因此，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生产和工作搞上去，使经济有所发展，却常常事与愿违：有的同志到田间检查工作，看见机务工人正在进行双班保养，就批评是“磨洋工”，“好好的机车，大好的天气，为啥不抓紧干活”；有的领导听说那枝高叶茂的玉米要作青贮，认为违背了“以粮为纲”，立即决定，必须等玉米成熟收了粮食再割倒喂牲口，而且指令今后不再允许有青贮的种植面积。每年农业生产的春耕、播种、夏锄、麦收、秋收等生产阶段，兵团（或是师、团）总要发布“命令”，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一刀切”的要求，如统一的“开始投入战斗”、“战役报捷”时间，统一的作业程序和步骤，等等。

当然，对上述指挥生产的方式，兵团不少同志（包括多数现役干部）是看到了它的严重危害的。有的提过中肯意见，有的在行动上有所抵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它的危害，而且促使它得到过一定程度的纠正。比如，兵团政治部1971年在对二师进行了广泛调查以后，给兵团党委写过一个报告，提出：“有少数现役干部以掌权者、改造者、领导者自居……把

个人意见当作党的指示和命令下达。在生产指挥上，不走群众路线，不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不懂装懂，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瞎指挥，给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有的团要求所有连队在9月19日把苞米全部割倒，结果因为没有成熟，减产20%；有的团今年麦收要求各连队同一天开始收割，结果有的小麦正灌浆也被割倒了。”这种比较清醒的认识，直率而中肯的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兵团一经发现，在许多方面也做了一些必要的纠正。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到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形势下，这样的生产指挥和经营方式，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它对生产发展的消极作用，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延续。

此外，过量接收城市知识青年和大量安排原国营农牧场职工子弟就业，使得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力增加的幅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发展的速度，不仅工资总额比生产总值增加的速度快得多，还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急剧下降，降低了劳动力的质量，增加了劳动管理的困难，加剧了职工生活的困难。领工资的人越来越多，干活的人越来越少，已是生产建设兵团普遍存在的现象。

盲目的开荒和毁林造田，不但没有增加粮食产量，还大大破坏了生态环境，不得不在兵团体制改变后由地方政府组织力量进行挽救。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牧区草原上大规模开荒，引起大范围的草场退化，70年代后期，自治区党委为保证畜牧业的发展，不得不大念“草木经”，还农田为草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石河子垦区，原来是享名全国的优秀垦区，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受到严重破坏，18万亩林带有4万亩被砍伐，也不得不在1977年后重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规划。

近百万知青加入大农业的劳动洪流，抛洒血汗，虔诚地“劳其筋骨，伤其肌肤”，再加上国家的巨额投资，换来的不仅是高价

粮食和一顶顶难堪的“亏损”帽子，还为后来留下了骂名。近十年来出版的书中，凡是提到生产建设兵团，总是列在“文化大革命对农垦事业的破坏”一类标题之下。老资格农垦战士刘培植的说法，代表了人们的普遍看法：“以 80 亿元的代价换来的生产建设兵团经营成果，实在是中国经济上的一大灾难。”

第五章 “争气胶”与多种经营

子子孙孙种下去，什么样的树种不活——连根掘去的山林永难复出——陷在水田中拔不出脚——大草原上潇洒走一回

一 打破植胶禁区

为了促进橡胶生产的发展，改变国家长期依赖橡胶进口的局面，中央领导同志对在文化大革命前军、农垦农场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生产建设兵团寄予了厚望。农垦部军代表在1969年8月23日的《关于改变农垦部直属垦区和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报告》中特别指出：“广东的海南、湛江两个橡胶垦区，遵照中央关于成立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办理。广东的汕头垦区有宜林地35万亩，农场范围内有45000亩，现在仅开发了16000亩，建议划归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促进该地区的开发。”1970年1月4日发出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下放农垦部直属的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垦区的通知》，更明确宣布：“橡胶，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力发展橡胶生产，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当年3月12日，农垦部军代表邀请广州、云南兵团和广西生

产师的同志座谈移交工作方面的问题，建议从1970—1972年采取过渡办法解决物资问题。1970年5月19日，国家计委、物资部军管会、财政部军管会和农垦部军代表发出了《关于橡胶垦区下放后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对橡胶垦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收入指标、物资分配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兵团是二等兵的说法是错误的，能搞橡胶是我们的光荣！”云南、广州、福建等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很快统一了思想，组织力量，向荒山野岭进军，为扩大橡胶栽种面积而拚搏，于是一幅幅艰苦卓绝的场景深深地刻入垦荒史中，也成为知青史中令人难忘的一页。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邓贤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当时橡胶垦区开发的艰难境况：

国际上权威的植胶理论认为：橡胶树只能在赤道两侧南北纬 20° 以内生长，超越 20° 就是植胶禁区。

我国是温带国家，北纬 20° 以内地区只有一个小小的海南岛。按照上述理论，我国岂不是只能沦为贫胶国，而种不出橡胶，就只好依赖进口，依赖进口就等于眼睁睁让帝修反卡我们的脖子。由于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和诸如“国际经济大循环”之类的说法，因此打破国际反动势力经济封锁，种出“争气胶”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20万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身上。

1970年，兵团党委制定了一个突破“三禁区”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即突破最远（北纬 25° 线），最高（海拔1500米），最冷（年平均气温摄氏 15° 以下）的世界禁区。该计划产生的依据不是实践经验，不是经过严格取证的科学数据和理论，而是来自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的主观意志和一厢情愿的勇气决心。“人定胜天”的口号就相当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政策的主题。

于是就有成千上万的兵团战士信心百倍地投入这场改天

换地气壮山河的橡胶大会战。

第三师十五团分布在北纬 25° 以北的高黎贡雪峰脚下，属沟谷型亚热带温湿气候，当地人从未有过种植橡胶的历史。但是该团广大干部职工和知识青年决心在这里进行打破禁区的伟大尝试。他们挥汗开荒，砍伐森林，修筑大片台地，精心培育胶苗……短短几年后，终年积雪不化的高黎贡大山下奇迹般地出现了排列整齐迎风摇曳的橡胶林带。我们用铁的事实，不，用战无不胜的思想和劳动的双手打破了“北纬 20° 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世界神话。

第三师十团驻地分散在横断山脉西麓，海拔1800公尺以上，一年内有50天霜冻期，年平均气温摄氏 10° 左右。该团官兵和知识青年不信迷信，齐心协力，寻找种植橡胶的种种途径和办法……何况种不种橡胶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问题，生产问题，而是路线问题，立场、观点和态度问题。

天大的困难难不倒用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的兵团战士。1971年，第一批橡胶苗在暖棚里培育成功，出苗率达20%；次年改进方法，出苗率增至25%。两年后上山定植，成活率为10%。有10%就有20%、30%直至100%，因此这个胜利大大鼓舞了该团官兵……

到70年代中期，有关部门宣布：在我国云南省沿北纬 21° 至 25° ，东经 97° 至 106° 的广大地区已经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橡胶基地，我国不久将会实现橡胶自给自足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1974年和1975年，云南大部地区连续遭受特大寒潮袭击，连北回归线以南思茅、西双版纳等地亦不能幸免。寒潮与霜冻直接打击了蓬勃发展的橡胶事业，致使大批胶苗枯萎，成片胶树死亡……

跌倒爬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擦干眼泪，但是并

没有总结教训。他们一次又一次宣誓，凭着“人定胜天”的精神信念，死了种，种了死，再种，再死。子子孙孙种下去，有什么样的树种不活呢？

1974年“寒害”确实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失，云南全省开割橡胶林受害率达70.7%，幼林达79.5%，苗圃受害率达77.9%，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损失幼林橡胶18万亩。在云南黎明农场（一师五团）的“大事记”中，有如下记载：“1974年1月初，由于西伯利亚冷平气流南下，越过哀牢山脉，使本地区气温急剧下降，勐遮最低气温达 -5.8°C ，勐满植胶区达 -2.2°C ，打洛植胶区达 -0.1°C 。3日后，勐遮坝区的甘蔗全部冻死，亚热带果树——香蕉、芭蕉、木瓜等干枯叶落；勐满、打洛地区的阴坡胶林毁于一旦。勐遮区乌龟山北麓1959年定植的2亩胶林无一幸存。6日清晨，糖厂饮水井旁洗菜锅中冰层厚达12厘米。这次寒害给五团当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00万余元。”

不怕困难，战胜困难，橡胶垦区不断扩大。盲目扩大橡胶垦区与毁坏原始林带同步，人们只是在多年后才有了负罪感，而当时则是用了百倍的干劲、千倍的疯狂向森林宣战的：

大锯、推土机、十字斧和长柄砍刀，所有砍伐森林的钢铁都疲劳了，都卷了刃。突击队员们四仰八叉横躺在草草掘出的环山胶林带上，只剩下心跳和呼吸。

整整一个旱季，他们弱小的躯体竟然魔幻似地摧毁了一座热带雨林，扒光了高黎贡山的这个山头。他们用唾沫湿润着自己的咽喉，心中掠过旱季风一样燥热的自豪，前人从未干过的事情你们干了……

指导员的誓师动员不过那么几句，你能一句不差地背下来：这儿越过了北纬 $23^{\circ}27'$ ，海拔越过了1200米——是帝国

主义预言家的“植胶禁区”。禁区，禁区就意味着我们要用大米小麦去换洋人的橡胶做胶鞋、造轮船……是的，恰恰是这几句誓言火一样烧红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心。

疲劳的大锯、推土机又轰鸣了。卷了刃的刀斧重又挥动。在那个火红火红的旱季，你们奋不顾身，一心想在高黎贡山雪线下拼命去实现你们的誓言！

后人或许难以置信，誓言和战歌有时真的如狂飙漫卷，无畏无敌。

一环环植胶带把山岭割成了螺壳。

一孔孔植胶穴把山岭戳成了蜂巢。

成千上万的橡胶苗被你们从几十里外的苗圃背着、驮着，栽到了坑里，偏偏没有了水！

垦荒的模式与其他兵团一样，都是没完没了的大会战，云南兵团知青陈翔军写道：“我所在的分场座落在勐定坝最南端的山脚下，背后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7个连队顺着山脚一字形排开，都是清一色的新建连队。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山野林，既要‘治坡’又要‘治窝’，劳动异常艰苦。白天上山垦荒，晚上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疲力尽，全身像散了架一样，再加上手上的血泡，脚上的脓疮，就更够呛了。那时好像不讲什么劳逸结合，也不考虑刚从大城市里来的小青年们能否吃得消。各种‘大战’、‘会战’、‘攻坚战’、‘突击战’，一个接一个。一年到头，几乎天天大战，月月大战。什么‘大战一星期’啦，‘奋战二十天’啦，‘决战四十天’啦，大战红五月、红七月、红八月、红十月啦，名目多得很，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莫说年方二八、细皮嫩肉、体力单薄的知青们喊天，就是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干惯了农活的老职工也招架不住。”知青杨泽也有同感：“为了种出国家视若血液的橡胶，我们成天10多小时

地在山上伐林烧荒，开带挖穴，从瘦弱的身体中，摄取出超人的体力，超人的毅力，来适应每年从大战‘红五月’开始，至‘七一’、‘八一’、‘十一’的献礼，直到过一个‘革命化’的元旦和春节的大会战。哪个不累得疲惫不堪，哪个不满面倦容？”按当时报道的说法，云南兵团的知识青年，刚到兵团时平均每人每天只能挖1个橡胶窝，还不一定合格；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每人每天能挖10个合格的橡胶窝。

海南岛、雷州半岛的地理环境适合橡胶树生长，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经营的是更重要的橡胶生产基地，官兵们同样摆开了向大自然要胶的战场，并提出了“一年超过十七年”（生产建设兵团1年产胶超过原农垦农场17年总产量）的响亮口号。1969年8月29日，广州兵团制订了《1970—1974年橡胶生产发展规划》，要求在5年内新植橡胶树525万亩，其中海南岛450万亩，湛江地区75万亩。到1974年末种植面积达到750万亩，海南岛600万亩，湛江150万亩。后来修订为1975年种植面积达到750万亩，干胶总产达到15—16万吨。广东省对亦对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橡胶生产给予了积极的支持。1970年3月22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同意海南区将1500万亩土地（包括原国营农场的930万亩土地）划给兵团，以满足兵团植胶的需要，并要求妥善解决种植橡胶和一般植树造林争地的矛盾，没有造林的林地需向种植橡胶让路。

广州兵团的橡胶会战从1969年开始全面铺开。当年橡胶树定植面积为17.49万亩，种植橡胶树478.89万株。1970年定植面积为151.83万亩，种植橡胶树3006.35万株。1969年秋季，广州、汕头等地的知识青年和一批老农垦工人一同开赴海南岛小熟岭，开垦荒地，修梯田，建水库，使1000多亩荒山变成了环山梯田，并从山下挑来了几万株树苗，在水库中放养了几万尾鱼。这不过是当时报纸上报道的一个小小事例，同样的劳动场景，在广州兵

团随处可见。需要说明的是，橡胶是多年生植物，生产周期长，产值高。从开荒定植到开始割胶以前的六七年内需要大量投资，开割后亦要有科学的管理。海南岛的橡胶开割时间一年内长达10至11个月，湛江地区则为8个月左右，加上停割期间的管理，一年四季基本上没有农闲时间。在开割季节里，橡胶工人每天从早二三点直到中午11时左右割胶、收胶，下午进行管理，一天劳动的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睡眠时间少，体质消耗大，在职工和知识青年中已造成了普遍性的职业病。

轰轰烈烈的开荒植胶大会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忧虑。1970年10月21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出席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代表时，特别询问了广州兵团的生产情况，并且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担心的问题：“去年、今年怎么一下子种那么多橡胶？地选得恰当不恰当？”“你们估计成活率有多大？”“能不能同时种防护林？”叶剑英元帅则于1975年1月15日特别来到广州兵团二师八团视察，观看了割胶表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回报呢？

二 高产数字后面的隐忧

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干快上似乎给橡胶生产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1969年，广州兵团生产橡胶3100多吨，比1968年增长45%，盈利275万元。1970年，植胶120万亩，相当于过去17年植胶面积的50%，年有橡胶面积375万亩，年产干胶4.3万吨，盈利1.4亿元。1972年2月29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样的消息：1971年广东、海南岛等地乳胶产量比1970年增产7.2%，剑麻等超额9.6%完成国家任务。当年广州兵团橡胶面积达到382万亩，占全国橡胶面积的70%，产干胶4.64万吨，占全国干胶总产量的89%，平均单株产量为1.93公斤。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70 年橡胶定植面积 3.54 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 46.06 万亩，年产干胶 1943 吨；1971 年橡胶定植面积 11.67 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 56.28 万亩，年产干胶 3603 吨；1972 年橡胶定植面积 6.33 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 60.01 万亩，年产干胶 5444 吨；1973 年橡胶定植面积 8.73 万亩，年末实有橡胶种植面积 56.44 万亩，年产干胶 6616 吨。

但是在高产数字的后面隐藏着严重的问题。根据农林部 1971 年冬季和 1972 年春季的调查，在广州兵团的橡胶生产中有以下三大问题：

（一）种植任务高指标

原广东橡胶垦区曾有过两次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发展的教训。1951—1968 年累计植胶 420 万亩，只保存了 217 万亩，损失很大。

这几年又重犯了这个错误。1969 年以来，3 年开荒种植橡胶 180 万亩，相当于广东垦区过去 18 年橡胶保存面积的 83%。

由于开荒种植任务高指标，劳力、机械、肥料、苗木等都跟不上，3 年累计报废近 50 万亩，占种植面积的 28%。其余 130 万亩，保苗率一般只有 40% 左右，折实有面积约 50 万亩。一年的种植任务，补植三四年才能完成，搞了大量的无效劳动。

投入林管的劳力很少，有些胶林荒芜，增粗慢，开割率低，产量低。去年开割 2600 万株，只占 1965 年以前种植的 5200 万株的 50%。

防护林的营造也很少。1968 年前累计造林 154 万亩，每年平均造林 9 万亩。这 3 年虽然计划造林 40 万亩，实际只完成 12.4 万亩。对原有的防护林管理差，砍伐多，有的甚至毁

林种胶，这是近几年风害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发展橡胶威胁很大。

（二）割胶生产瞎指挥

制定干胶生产计划不从实际出发，指标偏高，有些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对过去建立的一些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置之不顾，不是在加强林管、防病养树上下功夫，而是片面强调一个“割”字。有的把两天割一刀的制度改为天天割，甚至一天割两三刀，冒雨割，低温割，等等。过去规定胶树围粗50厘米左右开割，现在有些40厘米左右，甚至30多厘米就开割了。

广大战士和基层干部对这种做法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进去，甚至说什么“农垦那一套是防御性的，我们现在要搞进攻性的”，“管是手段，割是目的”，强调要这样“挖潜力，做贡献”，等等。1970年吃了大亏，1971年仍然没有纠正。

用这种“杀鸡取蛋”的办法，不仅影响了当年生产，而且将影响到今后若干年的发展。去年，全兵团因病害、死皮、风断已停割的胶树达576万株，占开割树的22%，有的团严重溃疡树占到百分之三四十。正常耗皮每月平均1.8至2厘米，现在高达3厘米，甚至四五厘米以上。平均干胶含量则从30%左右降到27%以下。溃疡树要两三年到五六年才能恢复，如处理不及时，将会虫蛀、腐烂，一旦台风袭来，势必大面积断倒。

（三）经营管理不善

有些干部不能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一度不敢抓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按计划，管理没有制度，所以非生产用工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增高，产量下降。非生产用工一般占百分之三四十，出勤

率约百分之七八十。去年每吨干胶成本比1970年提高14%。有些用货单位反映，干胶质量不符合标准，要求退货。

针对以上问题，广州兵团党委修订了1972年生产计划和1975年发展规划。1972年，原计划开荒植胶40万亩，调整为10万亩；原计划产干胶5.5万吨，调整为4.1万吨。到1975年，原计划植胶面积达到750万亩，调整为400万亩；原计划产干胶16万吨，调整为5万吨。

1973年8月28日至9月14日，在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召开了全国橡胶生产座谈会。会议认为，橡胶生产中的问题比较严重，有些问题重复发生，教训深刻，主要是保存率低、开割率低、单产低、病残树增多。截至1972年，全国累计植胶765万亩，报废298万亩，保存率仅达61%。1972年，兵团、农场开割树3210万株，只占1965年前保存株数的50%，平均单株干胶年产量仅1.49公斤，病残橡胶树约占开割树的30%。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在橡胶的开荒、种植和割胶生产上，搞了一些高指标、瞎指挥所造成的。另外，物资供应不足也影响了橡胶生产的发展。例如，广州兵团每年需化肥21万吨，但只能供应1/3左右。会议计划广州兵团的植胶面积从现有的368万亩扩大到500万亩；云南兵团从60万亩扩大到130—140万亩；广西生产师从27万亩扩大到33万亩；福建兵团从4.8万亩扩大到25万亩。结合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经验，在会上提出了四条挖潜增产的措施：

(一) 坚持不懈地搞好胶园基本建设，加强抚育管理，这是橡胶树连生、高产、稳产的基础。针对我国橡胶树一般都种在丘陵山区、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特点，特别要搞好梯田建设。广州兵团三师三团，近几年坚持大搞胶园基本建设，有些连队已开始用石头垒梯田，全团平均单株干胶产量3年中

增长 80%，去年达到 2.34 公斤……

(二)把开割树的当前生产与长远生产统一起来，实行管、养、割相结合。即搞好开割树的抚育管理，注意防病养树，合理安排割胶刀次，提高割胶技术，坚持科学割胶。大力加强胶工的技术培训，建立健全割胶检查、辅导、岗位责任、胶工考核和植物保护等各项制度。广州兵团三师四团七连，全面贯彻管、养、割的各项措施，采取看树、看天、看物候的科学割胶法，低产品种获得了较高产量，近 3 年平均单株产干胶都在 3 公斤以上。

(三)加速实现橡胶生产的机械化，尽快改变目前基本上还是手工作业的状况。……对橡胶生产所需的特殊机械，要专题研究，组织试点。广州兵团七师四团，近两年由于党委重视橡胶生产机械化的工作，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创、改、仿制了 17 种林管机具，基本实现了挖穴，株行间除草、灭荒，牛栏起肥、运肥，株间开沟、施肥、压青，植保等作业的机械化、半机械化，去年平均 12 万个工日，相当于 428 人二年的工作量。

(四)大力加强橡胶生产的科学研究。当前，橡胶生产的科学研究，应以提高现有胶树的生产水平，选育抗灾性强、速生、高产、稳产的优良品种，改革制胶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为主要内容，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橡胶生产的落后局面。

就在全中国橡胶生产座谈会结束的当天（1973 年 9 月 14 日），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袭击了海南岛橡胶生产基地。台风从琼海县和万宁县之间的沿海登陆，中心风力达到 12 级以上，风速每秒钟 70 米，持续 5 小时之久。广州兵团驻海南岛的 7 个师 54 个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二、六师有 18 个团受灾严重。全兵团死

亡128人，受伤829人，橡胶损失740万株，倒塌房屋137万平方米。

全国橡胶生产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表明依靠军队组织形式发展橡胶生产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中央很快就做出了取消广州、云南兵团的决定。

广州兵团从1969—1974年，开荒种植橡胶树219万亩，补换植胶150万亩，仅存113万亩，保存率为30.6%。1974年，橡胶种植面积达到364.43万亩，共8390.22万株，开割面积为150.72万亩，干胶总产为4.07万吨。

云南兵团共开荒定植橡胶25万亩，产干胶17700吨，生产粮食2.62亿斤。1970年全兵团亏损581万元，1971年亏损912万元，1972年亏损543万元，1973年盈利190万元，1974年亏损1607万元，共计亏损3453万元。

和北方各兵团相同，辛勤的劳动同样没有留下佳话。《当代中国的广东》这样写道：“兵团的成立对稳定当时农垦的混乱局势、保证橡胶生产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的领导与管理体制不适应于农垦企业的实际，以致造成很大损失。”《当代中国的云南》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给予了以下评价：“政治冲击一切，指示命令代替规章制度，生产违反自然规律，不问经济效果，加上接收安置知识青年过多过猛，与生产需要不相适应，机构庞大，层次过多，生产建设秩序混乱。原植胶林失管，新植胶林质量差，死枯严重，割胶不讲技术，大量伤树死皮，形成投入多、效益少、亏损大的被动局面。”

多年之后，站在胶树已经荡然无存的荒山面前，当年的垦荒者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当年的战歌，当年的誓词，当年惊天动地的豪迈，全都冷寂下来，冷寂在这一片衰败的林地。寒害和干旱留给这里

一片萧瑟的空寂。一种种植的橡胶树没能长大，连根据去的山林也永难复出，溪流曾经滴过的石湾早被风吹日晒，连一点点发白的水印也没了，除了你们，谁还知道这儿曾跳跃过淙淙的溪水呢……

这里高海拔，高纬度，不该种……胶。森林毁了，会干旱，会受冻……现在我们才懂了。

三 水田中的苦难历程

南方各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对水田劳动同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的女知青尹俊屏，对“蚂蟥田”和“深水田”记忆犹新：

初到云南，分在三师十团三营一个最大的水稻连队，当年便经历了从播种到收割的劳动全过程。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心惊肉跳，浑身起鸡皮疙瘩的一件事，就是女知青过蚂蟥关。

记得第一次下水田，栽秧栽得正起劲，突然感到小腿上痒酥酥的，紧接着又像是被马蜂螫了一口，痛得钻心。连忙抬起腿来看，原来是条黑糊糊、软绵绵，足有拇指粗细的“水虫”紧紧地缠在腿上，另一头像个吸盘，深深地扎进肉里，扯又扯不脱，甩也甩不掉。再抬头一看，水面上还游动着好几条这种可怕的水虫。我吓得惊叫一声，赶紧跳上田坎，大声呼救。这时，附近田里的几个女同学也像是同时被马蜂螫了似的，一个个在田坎上又蹦又跳，哭爹喊娘，惊恐万状。一个好心的老工人一面叫我们不要慌，一面帮我们从腿上捉掉水虫。这时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水蚂蟥”，专吸人畜身上的血……那一年，我的双脚被蚂蟥咬了数不清的血窟窿。因

为蚂蟥对血腥味特别敏感，专咬带血的伤口，一咬进去就扯不脱，使劲扯又钻心地痛，再说只顾逮蚂蟥又要影响栽秧速度，反正腿也痛得快麻木了，干脆不去管它，等它把血吸够了自己就掉下去了。就这样，一年到头我这两腿伤痕累累，伤口从来没有好利索过。后来遇上伤口交叉感染，两条腿肿得又红又亮，根本无法穿鞋，晚上痛得睡不着觉。

除此之外，最令人不堪忍受的还有一关，那就是“栽深水田”。

我们连队有两千多亩水田，除了那种土质松软的蚂蟥田，还有一种望不到底的深水田。这种田不仅水深齐腰，而且土质特别硬，甚至有些瓦块碎石，手脚常常被戳得鲜血淋漓。

每逢农忙季节，我们都是正经八百地“披星戴月”，天不见亮就下田，天不黑尽不收工。清晨，田水冰冷刺骨，冻得浑身直打颤；中午，烈日当空，浑身又被汗水湿透。一连十四五个小时，几乎整个下半身都一直浸泡在污浊的浑水里，那种苦不堪言的滋味可想而知。加上秧又特别难栽，好不容易将秧苗插下去了，可不一会儿又浮上来了，这样反复几次，弄得你毛焦火辣，不少女同学是边栽边哭边骂脏话。我在知青中个子最矮小，栽这种田就更艰难。常常是弯下腰去手够不着泥，手挨着泥又湿了衣服和头发，甚至嘴里还要呛水。加上几个手指被戳得稀烂，十指连心，我不知悄悄哭过多少回。尽管如此，可为了“鼓舞士气”，我不但要强言欢笑充硬汉，就连例假期间也要带头去栽深水田。日久天长，妇科病根便从此落下……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男知青凌宪，则始终忘不了雨季中抢收水稻的大会战：

有一年，南定河边一个连队的稻田被水淹没。一连十多天，雨不停，水亦不退，眼看成熟的稻谷将毁于水。营部组织大会战，最远的连队从几十里外赶赴河滩地。老营长身背他那铁锈斑驳的驳壳枪，威风凛凛，亲临督阵。尽管这驳壳枪同抢收水稻风马牛不相及，但确也给大会战平添了几分战斗气氛。会战持续了六七天，人们克服着极度的疲劳，泡在水里，几乎是一把一把地将水稻捞起来送上拖拉机。我左手的小拇指也险险乎在这次大会战中报了“阵亡”。

离开南疆好些年了，雨季不再来，而那略带苦涩的回忆却时时叩响我的心扉……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还有过围海造天的壮举。参加海南岛三江围海造田工程的知识青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壮志凌云战三江，
沧海桑田人正道，
万难锤炼壮士胆，
首战必胜凯歌还。

茫茫大海英雄汉，
冉冉征云战旗飘，
不得一番寒彻骨，
岂有神州处处新。

艰苦卓绝的劳动同样没有给人们带来满意的收获，只是解决了部分口粮问题。云南兵团一师五团的生产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70年2月25日黎明农场正式改建为兵团一师五团，1974年9月16日一师五团改名为国营西双版纳黎明农场，1970—1973年

的生产数字如表 5—1。

表 5—1

作物种类	面积与产量	1970 年	1971 年	1972 年	1973 年	1974 年
水 稻	面积 (亩)	24475	21201	21879	21320	
	总产 (万斤)	762.38	636.88	699.57	728.74	
	单产 (斤)	311	300	319	341	
黄 豆	面积 (亩)	1977	2098	1690	1690	
	总产 (万斤)	9.2	6.48	9.03	6.29	
	单产 (斤)	45	30	43	37	
油料作物	面积 (亩)	4019	3099	4947	4070	
	总产 (万斤)	33.53	20.37	17.06	16.42	
	单产 (斤)	83	65	34	40	
甘 蔗	面积 (亩)	4794	7746	8379	9209	
	总产 (万斤)	1517	2273.3	2273.2	3942.2	
	单产 (斤)	3164	2934	2713	4280	
玉 米	面积 (亩)	8438	7324	6880	7161	
	总产 (万斤)	149.86	122.07	153.13	143.58	
	单产 (斤)	177	166	222	200	
茶 叶	面积 (亩)	59	79	320	694	
	总产 (担)	47.2	63.2	116	146.5	
橡 胶	面积 (亩)	354	1946	3924	4741	
	干胶 (吨)	1.68	24.77	89.68	137.88	
盈亏状况 (万元)		-99.86	-132.6	-136.77	-72.14	-282.38

以橡胶生产为主的广州、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粮食不能自给，成为较严重的问题。如广州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粮食总产为1.2亿斤，由广东省供给兵团大米2.44亿斤，实际粮食自给只能达到25%；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粮食自给36%；广西生产师只能粮食自给20%。这些兵团不得不认定“我们种胶，国家给粮，合

情合理”，但这种观点却受到国家的批评，指示他们要正确处理胶、粮关系，从各方面大力挖掘潜力，逐步提高粮食的自给水平。

四 茶棉生产与多种经营

安徽、浙江、江苏等生产建设兵团，除了生产粮食外，还担负着生产茶叶、棉花等经济作物的任务。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以生产茶叶为主，在皖南茶区新增茶园1万亩，使茶叶年总产量翻了近两番。兵团下属的淮南、大圩圩、皖河等农场，曾连年获得粮食大面积的较高单产。但是该兵团的财政情况同样不理想，从1970—1975年，连续6年亏损，年均亏损1891.1万元。

浙江生产建设兵团，设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全兵团有6万人，只有13万亩耕地，加之机构建置过多，头重脚轻，生产情况不好。1969年浙江兵团农业亏损178万元，1971年农业亏损达到1300万元。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情况也不算好。1972年全兵团有410个连队试行了工分制，生产颇有起色，是组建兵团以来生产形势最好的一年，粮食总产量比1971年增长25%，棉花总产量增长30%，亏损减少1000万元，盈利的连队由1971年的25个增到139个。以二十五团为例，全团有18个农业连队，耕地21380亩，人口8170余人，其中知识青年2550人，劳动力5660个。1972年全团粮食总产量比1971年增长26.9%，单产920斤，比1971年的790斤增长15.7%；棉花总产量增长53.1%，单产100斤，比1971年的39斤增长了61%。全团节约生产费11.6万元，水稻的成本由1971年的每斤0.16元下降为0.10元，棉花的成本由每斤1.46元下降到0.62元。1971年全团亏损76万元，1972年亏损13万元。江苏兵团十八团亦在1972年节约生产费16万元，粮食生

产成本降低 22.3%，棉花生产成本降低 29.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产量也有大幅度增长。尤其是玛纳斯河垦区各团场，1972 年增种棉花 1.5 万亩，棉花种植面积达到 45 万亩。各团场普遍采用了宽窄垅播种法，合理密植，每亩由过去的六千株增加到一万株左右。当年，棉花获得丰收，平均每亩收皮棉 80 多斤，超过《纲要》规定的指标。

云南兵团的茶叶生产也有所发展。1969 年时，全系统有茶树 1900 亩，产毛茶 200 担，单产 30 斤左右；到 1977 年，则有茶树 14089 亩，产茶 2398 担，单产达 73.6 斤，其中大部分茶树是兵团时期栽种的。

剑麻是广州兵团重点栽培的经济作物，在雷州半岛栽培剑麻的知识青年，曾写下这样的诗篇：“蓝天下这肥美的土地，是我们年轻的双手开拓；沃上上这青翠的剑麻，是我们青春的汗水浇灌。只要瞥一眼这壮阔的麻园，半岛风云便在胸中激荡。啊！垦荒者的生活，不平凡的年代，青春的历史上留下多少豪迈的记载。”胡椒、可可、咖啡等，是广州兵团的特产，尤其是二师八团的胡椒园、咖啡园和可可园，因管理得当，被兵团树为标兵，曾多次引来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参观访问。1971 年 12 月，广州兵团还制定了发展南药生产基地的规划，确定利用荒山野岭和零星土地，结合生产造林和住区绿化，大量种植槟榔、儿茶、白木香、砂仁、益智等药材。

除茶、棉等经济作物之外，瓜果的生产也颇为各生产建设兵团所重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葡萄、哈密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甜瓜等，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八师七团，位于雷州半岛红湖畔，原来是红湖农场，以生产甜橙为主。该团在 1971 年扭亏为盈，生产甜橙 200 多万斤，比 1970 年增产一倍；干胶产量也增加了 31%，被农林部农垦调查组视为“抓了路线扭亏为盈”的典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团场

种植花生，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二师八团三营一连的王仕陆，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是整整 2000 斤花生，营里借给我们连做种籽的，连队在全团最边远的河谷里，生活最苦，一入雨季经常断粮，甚至每月一两菜籽油的定量也无法保证。这下好了，最保守的估计，收获也在万斤左右。想想能不令人激动？

剥花生是义务劳动，全连没半句怨言，三天后交回花生米。

文书宣读了回收统计结果：

总计发放花生种 1200 斤，应回收花生米 780 斤，实收 540 斤。

稍静，两位排长提一麻袋走来，置于桌上。

这是“突击搜查”的成果。花生米 57 斤，分别从 30 余处搜出。事后得知，分别出自衣袋、被窝、竹筒、木箱、鸡窝、梁上、床下、水缸底、灶灰中……事涉全连人数三分之一。

会后分班围坐，分发剩下的 800 斤花生。集中管理，相互监督，在连干部的轮番训话声中，剥至深夜。

有了前车之鉴，下种时花生米用“六六六”拌合均匀，才分发各班……接连几天，有人呕吐、肚痛、腹泻，是偷吃的花生种没漂洗干净。

到底是神奇的土地，花生成熟了。不过，正式收获前，地里已频频有人光顾……适逢连长回家探亲去了，独立支撑的指导员，几乎带着哭音恳求大家收获的时候不要再吃。全连都被感动了，答应不吃。

但，只是不忍当着他的面吃。背转身，不吃的有病。

三天收获三天雨，花生粘着抖不掉的黑土……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都像发了狠心。刨着拔着坐着站着蹲着走着，无嘴不动。人人嘴上一圈泥，浓淡不一，抹了又涂。吃得兴起，有人在雨中朗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等最高指示，更有人即兴发挥，说“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吃花生吗？”……

花生入库，他（指导员）独自去了营部。回来时脸色比打摆子还难看……

连长回来后第三天，便亲自押解牛车上路了，满载2000斤种籽的收获——890斤花生，沉重地驶进1973年的土黄雨……

1972年3月24日，农林部、商业部、轻工部联合召开了有黑龙江、新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的甜菜生产座谈会，建议在这三个兵团内建立甜菜生产基地。三个生产建设兵团闻风而动，立刻布置部分连队抢种甜菜，并要求拿出好地来发展甜菜生产。内蒙古兵团二十一团四连的一位知青副连长，不同意拿好地种甜菜，受到了其他人的批评，最终还是把肥沃的土地拿出来种上了甜菜；二十二团五连试种甜菜两年，收效甚微，但传达会议精神之后，二十二团党委决定五连当年种植甜菜540亩。这540亩甜菜1972年获得丰收，总产量达100多万斤，二团五连当年种植的50亩甜菜，也获得了总产10余万斤的好收成。但是就总的生产情况而言并不理想。原计划兵团1972年全年甜菜产量达到5400万斤，实际只收获了735万斤，减少收入将近140万元。

甜菜生产规律尚在摸索之中，种植面积已经迅速扩大。1973年，内蒙古兵团二十二团五连种植甜菜扩大到1500亩。1972年，十五团种植甜菜700亩，1973年全团10个农业连齐上阵，播种甜菜5000多亩。另有一批连队从1973年开始奉命试种甜菜。按计划1973年甜菜产量为3425万斤，实际收获515万斤，只完成了计划的15%。1974年，计划甜菜产量为4170万斤，实际收获662

万斤，只完成计划的 6.3%。

黑龙江兵团从 1974 年开始，每年种植 15 万亩至 17 万亩甜菜，由于基本上是人工刨埯种植，田间管理粗放，平均亩产只有 300—350 公斤。

大面积种植甜菜，为制糖工业提供原料保证，减轻甘蔗产区的压力，是国家的宏观规划。在具体操作时，应该因地制宜，不能盲目定出产量指标，片面追求扩大耕种面积。生产建设兵团在尚没有甜菜种植经验的情况下，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拿出大量好地种植甜菜，势必造成甜菜不能丰收、粮食不能自给的现象；而如此的按长官意志办事、瞎指挥的行为，又为扭亏为盈增加了阻力。

五 草原上的牧羊人

内蒙古、新疆、黑龙江的大草原和大片山林，是发展牧业和林业的好地方。北方地区的几个生产建设兵团，都设置了专门的牧业或林业团场。这些团场，一般都是多种经营并重，亦农亦牧、亦农亦林或农林牧副并举。

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可以使人领略到大草原的种种风情，既有豪迈、潇洒的一面，也有艰苦、单调的另一面。放牧、接羔、保畜、打草、打井、培育优良种畜……牧业生产同样给兵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牧业团场，集中在锡林郭勒盟地区，知识青年们对牧业生活有这样的回忆：

牧羊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锡盟气候春秋季节不明显，每年 5 月还在下雪，到 9 月又下雪了。趁着 6、7、8 三个月暖和，我们就上山打草，为羊群准备过冬的饲料。草原生活是那样的单调乏味，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日复一日地用

打草机割草——先用铁叉堆成小堆，再用牛拉木拖子堆成大堆，最后把草堆成高高的草垛。

……我们的饭食天天是奶制品、羊肉和杂粮——莜麦、高粱、玉米等，由于不习惯，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饭到嘴边，又难以下咽。

我们女生班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打井。沿着划好的圆圈，我们开始挖土，一天，两天，手上挤出了血泡，胳膊酸了，肿了，我们咬着牙坚持着。井越挖越深，井上搭起了支架，在井下挖泥掏沙的，水一身泥一脸；在井上拉绳吊筐的，被毒毒的太阳烤着。那时，我们以为打好一口井，就是为埋葬帝修反、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做一份贡献，谁也不肯落后。当砌好最后一块石头，打出第一桶清水时，已用了一个月时间……

乌拉盖的冬天，常常刮起白毛风，雪花飞舞旋转着在旷野上扫来荡去，使天地间充满白色的雾。一次，在这白毛风中放羊，连人带马滑倒在一片冰面上，我被甩离马鞍，躺倒在雪地上，久久爬不起来，但手里还紧紧地抓着马缰绳；一个寒冷的冬夜，为了找回走失的十几头牛，我怀着找到牛的决心和怕迷路把自己交待给死神的恐惧，单骑夜闯雪原，当坐骑识途而终于返回牧业点时，两颊已经冻白了。记得，春天的白毛风还是那样凛冽，它无情地把天地搅成一团，怕新羔冻坏，有时我们彻夜守在羊栏边，自己快被塑成雪人了……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二团女知青马杰，对“牧马人”的生活也是念念不忘：

牧马原本没有女性，开始的几个女知青是当炊事员被要去的。可草原骏马着实让我入了迷，几经申请，终于有机会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放牧并不仅仅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炎炎夏日，我跟着马群，不知被晒掉多少层皮。赶上狂风暴雨，惊马狂奔，我要纵上马背让坐骑昂首奋蹄，迎着风雨风驰电掣般地追拦惊马……

严冬时节，因为冷，有时我要像马一样地狂奔，要不骑在马上更冷。碰上风雪交加，三四个小时后我就下不了马，人和鞍子冻在了一起。脸上、手上、脚上冻出层层水泡，旧的未愈，新的又来，我的两个脚趾盖就是被生生冻掉的。

……牧马生活，像“野人”的生活。冬天，屋里没火，一盆水不等洗完脸就结了冰碴子；睡觉冻得实在受不了，我们就捡两块砖头在老乡家灶火里烧烧，拿回来放在被窝里。草原冬天又长又难熬，每天早起，头发和被头上都是一层白霜。

艰苦的条件给牧马人留下了病，关节炎、风湿、胃病……

草原气候多变，最可怕的是冬季的“白毛风”，草原上的兵团人，都有与白毛风打交道的经历，甚至曾在大风中与狼对峙、保护畜群，并受到严重的冻伤。冬去春来，干燥的草原容易失火，几乎每年牧业团场都要遇到草原火情。开始青年人没有经验，只是凭着勇敢、拼命精神去救火。1971年4月15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七团三连两位女知青柏永华、单美英在一场草原大火中为保护牧场和林场而献身，成为全兵团学习的榜样。1972年5月5日，在另一场草原大火中，死难知青达69人，我们在后面将详细介绍这次大火的情况。

牧业和林业在兵团体制下有所发展。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各牧业团先后开发缺水草场31万亩，大小牲畜从431600头

(只)发展到 1087900 头(只)。1969—1974 年,内蒙古兵团生产肉类 1440 万斤,上缴羊毛 746 万斤,捕鱼年产量均在 160 万斤以上。

但是,牧业团场的农业开发效果极差,盲目在草原垦荒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不但农业没有发展起来,还造成了大范围的草场破坏,加速了草原的沙化,使牧业生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改之后,自治区党委大念“草木经”,在草原地区还农为牧,兵团当年在牧区开发的农田,大多数又变回为草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第六章 亦农亦工

轰轰烈烈的工业交通大会战——塌方、哑炮、毒气、有害射线——兵团阀门厂生产“喷壶”——工业利润填补农牧业亏损

一 铺开工业摊子

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大前提下，各生产建设兵团兴建和接收了一批工矿企业。兵团工业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农机厂、修配厂、农药厂、化肥厂等；另有一些是进行农、副产品的加工，主要有奶粉厂、食品厂、糖厂；还有一些是为了解决兵团物资供应问题而兴建的工厂，如水泥厂、服装厂、煤矿等，只有少量的工厂是利用兵团出产的原料生产纸张、地毯等产品，或者完全利用地方的原料进行生产加工。

各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后，大多将原属于农垦系统的工厂，主要是农机、修理、农药及食品加工等厂接收到自己手中，并重新配备人力，组织生产。一些原来安置劳改就业人员的所谓“新生”厂，也被兵团接管。按照各兵团的发展规划，还新建了一批工矿企业。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6月，将原驻巴彦淖尔盟乌拉

特前旗乌拉特农场的二师十三团改建为工业团，大部分人员调到包头市，先后接收了包头新生阀门厂、新生砂石厂及包头拖拉机修配厂等，又陆续建起了无线电元件厂、无线电整机厂、造纸厂、浆粕厂（位于乌拉特前旗）、铁球厂、油脂厂、地毯厂。各师除了建有直属被服厂外，还因地制宜建设了一批工厂，如一师的糖厂、水泵厂，三师的地毯厂，四师的碱矿、玻璃厂，五师煤矿、水泥厂，六师煤矿、发电厂，等等。

1969年，直属于内蒙古兵团司令部的“五·七”化学纤维纺织厂的基建准备工作大规模铺开。这项工程于4月11日经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会议批准，并于4月18日被国家定为全国基建排号151号。9月底，前期辅助土建工程开工。1970年1月1日，纺织车间主体厂房破土动工；8月1日，企业正式投产。此外，在乌拉特前旗二师师部所在地乌拉山，还兴建了直属于兵团管理的180电厂和化肥厂。截至1971年5月，内蒙古兵团已有团级工矿单位6个，职工5600人，已投产的工厂17个。1975年撤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时，兵团下属工矿企业34个，职工人数达16350人。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窑、小农机“五小企业”遍地开花，至1970年底，兵团已拥有水泥、采煤、机修、造纸、玻璃、酿酒、制糖、奶粉、肉联、皮革、麻袋、砖瓦、木材、制药等中小厂矿780多个。1969年，兵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兴建计划年产6万吨合成铵的浩梁河化肥厂。1970年5月，兵团党委决定兴建跃进山钢铁厂，先建高炉。三师组织了3200人参加大会战，用四个月零五天建成了一座55立方米的炼铁炉，当年生产生铁1800吨。1971年1月10日，兵团征得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同意，在油田范围内的林源地区建设一座年处理原油40万吨的炼油厂，不久即由国务院燃化部批准，并很快展开大会战。1973年10月1日，兵团石油化工厂进油开车成功，正式

投产，该厂附属的毛纺厂也同时投入生产。从1969—1973年，先后建成日处理甜菜500吨的双山、宝泉岭、赵光等糖厂。此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先后兴建了大型水泥厂、尼龙厂等工厂。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在临沧附近建立了师部化工厂，专事铀矿生产；一、三、四师分别兴建了制药、胶鞋、化肥等工厂。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每年投入基本建设资金500万元，除了用于修建水利工程和购置农业机械外，还特别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工矿企业，如华阳河榨油厂、宣郎广精制茶厂、十字铺茶机厂、淮南乳品厂、建新水泥厂、场山葡萄酒厂、建新农机修造厂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原有工矿企业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一批工厂。原来兵团有工业建设一、二、三师的建制，1969—1972年，工一、二、三师相继撤消，所属各团和厂矿企业划归各农建师。为了修建南疆铁路，1974年4月15日，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铁路工程纵队，下辖5个支队。同年9月，铁路工程纵队改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疆铁路工程指挥部，简称兵团铁指，各支队改为团的建制，一、五、六团驻石河子，二、四团驻乌鲁木齐，三团驻库尔勒，七团驻奎屯。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下辖16个工厂，接收的工厂有海口、湛江等地的7个机械厂、1个橡胶制品厂和1个糖厂，新建的工厂有2个机械厂、3个水泥厂、1个造纸厂和1所印刷厂。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除充实原有的拖拉机修配厂、糖厂、水泥厂外，新建了年产6000吨的磷肥厂，并使设计能力为年产针剂6000万支、片剂5亿片的祁连山制药厂正式投产。

兵团战士们以同样的热情投入了兵团工业建设的浪潮之中。他们不但在基建施工中出大力、流大汗，还很快学会了生产的基本技能，制造出了大量的产品。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工厂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是兵团工业大会战的一个缩影。

直属于内蒙古兵团司令部的化学纤维纺织厂，被规划为兵团

最大的工业工程项目，兵团特别成立了由兵团副参谋长孟庆祥为组长的建厂筹备领导小组。1969年5-7月，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建部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联合召开会议，决定由全区52家企业分别承担化纤设备的加工任务，内蒙古轻工设计院负责厂房设计，华北建筑一公司承建工程。施工设计组选定在呼和浩特市西郊孔家营大队的菜地建化纤车间，在呼和浩特市南郊的内蒙古农业学校建纺织车间。纺织工业部特别为化纤厂调拨了全套60年代末最新的纺织设备。从8月底开始，826台纺织专用设备、716台配套电机、492万件纺织专用器材陆续进厂。9月底，前期辅助土建工程开工。为加强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生产建设部和兵团首长组成了施工现场指挥部，兵团副司令员杨世明担任总指挥。1970年1月1日，一支由19个单位参加、近2000人的队伍开进施工现场，一场基建大会战开始了：

整个施工现场上，红旗招展，战歌嘹亮，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送着连、排、班之间的挑战书、应战书和决心书，播送着在施工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充分显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

工地上搭起了简易工棚，作为现场指挥部兼广播室和卫生室。施工指挥人员实行现场办公，后勤人员服务到工地。少将副司令员、老红军杨世明已是银发斑斑，坚持亲临现场指挥施工。他经常为战士们唱起当年的红军小调，鼓舞士气。

浇铸厂房支撑柱基础要求一次成功。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战士们一天工作长达十四五个小时。一次因停电造成混凝土搅拌机停转，在此节骨眼上，排长一声令下，十几个战士跳入灰浆池中进行搅拌。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在这里重现！运料工地上，稍有不稳，就会车翻人倒，独轮车一字排开，一部分女兵穿插其间，格外引人注目。她们越平地，过跳板，健

步如飞。兵团战士们用行动证实着“是英雄，是好汉，施工场上比比看”的誓言。

化纤厂的技术培训工作同步进行。1969年6月，第一批兵团战士被送往石家庄、大同、上海等地进行技术培训。其中378名学员在石家庄国棉三厂、四厂学习纺织挡车技术；大同市煤机厂培训了59名学员，学习司炉、电工、车、钳、焊等工种，这两批学员占投产后所需熟练工人的40%以上，在后来的生产中他们大多成为技术骨干。

1970年5月，化纤厂生产线安装、调试工作全面展开，绝大多数工作由兵团战士承担。经过空车运转、单机负荷试车、分段试产、连续试产，1970年6月11日，纺织车间第一道工序清花机组开始投料试生产，试车一次成功。化纤厂正式投产后，内蒙古兵团实现了被装自给，也填补了内蒙古地区化学纤维纺织品的空白。

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三团新建的造纸厂，同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建设工程：

工地上施工速度由于兵团战士的加入进展很快。事实证明，他们的作用谁也不能低估，尤其在浇铸造纸厂关键的大烟筒会战中，我们更加看到了兵团战士的可爱。40多米高的烟筒整体，要求全部用水泥沙浆浇灌，中间不能停，要一气呵成。工地上出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白天黑夜连轴转，大家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其中有4名女兵团战士最为突出，从搅拌机到烟筒处有几十米远，她们推着一辆沉重的水泥车，多拉快跑，一气就推了几个小时，个个汗流浹背。北京女知青苏大文，年仅17岁，患有关节炎病，硬是驾着车把，口中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一直坚持到下班。当休息下来时，两条腿都抬不起来。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呀！他们当时想的是什么？这里没有金钱的诱惑，也没有物质刺激。他们每个月才有5元零花钱，根本谈不上什么奖金。她们换来的仅仅是几句表扬就心满意足了……

在现役军人、兵团战士和地方施工队伍的共同努力下，一座新型的造纸厂提前一年竣工了。

化纤厂建成投产后，180电厂和化肥厂成为内蒙古兵团重点保证的工程项目，由于土建工程量巨大，几年中会战不断。参加电厂建设的一位兵团战士的回忆是这样的：

1971年4月，一师的农业团抽出人来组成了一个施工连，参加发电厂建设。那是个英雄主义年代，青春热血，澎湃涌动，人们争当英雄情绪之切，竟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几乎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主厂房地基要挖十几米深，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表现英雄气概的良机。……等到最后连土台阶都要挖去，从最底层直接扔土的时候，就更显英雄本色，没几下真功夫绝拿不下这个活。我们那时一锹两锹地铆劲，结果练出了左右开弓抡锹的本领。

最痛快的是浇灌混凝土。我们推着装满灰浆的引车，一路迅跑，从不见谁走着推车。跑动接力才叫漂亮：一个人推着车跑到接力点，单手扶把，接力者也先单手接车，两人并肩跑上几步，一个再侧身闪开。干得兴起时，推车者双手同时撒把，接车人迅速补位，车不摆，灰不撒。路过的姑娘看得目瞪口呆，小伙子更觉帅气十足……

1973年，电厂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兵团战友报》记者造访了工地，并写出了《乌拉山下战旗红——180电厂工地巡礼》的长篇报道，几千人的劳动场面跃然纸上：一班日产网络160块的记录，提前20天筑成冷却水塔，土法上马吊装36吨重的煤斗……处处显示出的都是大会战的魔力。

二 废除“管、卡、压”之后

被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工厂，一般在人员短期技术培训之后就很快投入生产，同时安排扩大营房、翻修或新建车间、增加设备等工作，大多采取了一边生产、一边基建的方式。

与组织农业生产一样，生产建设兵团的各级领导需要一个熟悉工业生产的過程。工业生产，要有严密的生产计划，需要不断核实生产进度、成本指标，经常性地检修设备和对工人进行技术培训，严格检验产品质量……一句话，组织工业生产，必须有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合格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兵团接厂和建厂，正值批判“管、卡、压”的时候，各种所谓旧的规章制度都被抛到了一边，几乎是无章可循，只能各自制定一些可行的规定。被兵团接管和派到兵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多半是“再教育”的对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没有一定规章制度和严重缺乏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状况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业，带有明显的非“正规”生产特征。强调快上马、快投产，追求高利润、高指标，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指挥工业生产，是各兵团普遍存在的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劳动强度过大，生产工具简陋，安全保障性差，各类生产事故层出不穷，是兵团工业生产面临的普遍问题。在“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喊得极响的年代里，片面强调人的因素，忽视生产环境和安全措施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工人们不能

对恶劣的生产条件提出异议，否则就是怕苦、怕死。工矿企业的领导，也大多满足于建起厂房，开工生产，造出产品。大多数工厂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不注意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只是空谈安全生产，无法避免工伤事故的发生。曾在黑龙江兵团从事工业生产的刘新威写道：

十八团造纸厂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可事故也层出不穷：暖气片爆炸、蒸球喷浆、锅炉干锅、炉排烧塌、臭电石罐上天、大管钳掉入漂浆池……成了家常便饭。我们提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怕死。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还怕什么？！一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怎能不热血沸腾，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碰上事故发生，心里也害怕也紧张。

……切草间门洞大开，早就有窗无玻璃。几个女知青已慌成一团，跺脚直哭。切草机马达隆隆闷叫，通向二楼蒸球间的传送带，像一条打断了脊骨的蟒蛇，浑身颤抖，却纹丝不动……一个女生用手指着大叫，却听不清说什么，顺着方向望去，啊！输送带前端铁架子上跪着个人，身体随着输送带的抖动而微微蠕动，一条胳膊连肩带背卷入输送带轴里，头和身子被卡在三角铁框架上，大号的螺钉已嵌进头颅、肉体……为了排除切草机的故障，他按老法子，用手去抠缠绕在传动轴上的麦秸，一下被“咬”住，手、胳膊卷了进去，人卡在铁架上……由于螺钉卡碎了颅骨，胸部严重损伤，一个16岁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

发生这样的生产事故，一方面是由于机械安全设施不齐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兵团战士上生产经验少，安全教育不到位。由于操作机械不善引起的伤人毁机事故，几乎在兵团各厂都发生过。而

塌方及爆炸事故等，又常常威胁着兵团的煤矿、铁矿和采石厂。

由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三团接收的采石厂，原来是劳改厂，兵团战士到达前不久，在押犯人刚刚转走，昔日的监房大多变成了兵团战士的住房，在采石兵的笔下，我们看到的生产场面几乎全无安全保障：

兵团采石厂，原名是新生砂石厂。1969年迫于战备的形势，劳改犯迁到了内地。我们来到采石厂时，电网、碉堡和劳改犯未及带走的衣、裤、鞋、袜等生活用品举目可见。改造劳改犯的地方变成了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场所。

在采石厂，你至少要过三关。一是胆量关，二是力气关，三是皮肉关。所谓胆量关，是指要能攀绝壁、打炮眼、排险石，要能接雷管、装炸药、排哑炮。所谓力气关，是能抡起20来磅的大锤把大石破小，要能把几十斤或上百斤的石头装上矿车。所谓皮肉关，一是受得住烈日的曝晒，寒风的劲吹，二是要经得住受伤流血，大锤一落，石花四溅，打在身上就是一块青。所开的石头棱角如刀，稍不留心就被划破……我爱人是推矿车的，在采石厂的几年中，10个指甲被挤掉过9个，左手食指还被截掉了一节。

无需专业训练，用不着现场观摩。觉悟、胆量、力气兼备，就是一名优质采石兵……

5天完成4000方碎石的壮举，至今历历在目……战前动员，誓师大会，施展了神奇的魔力，使得山场沸腾起来。红旗开路，战士冲锋。60斤重的风钻扛到150米高的作业面上，人悬在半空中，钻头刺入石中，开动起来震得人浑身发麻，此时采石兵的意志可要胜过磐石。18磅的铁锤对准石头抡起砸

下，千百次、上万次，抡起最大的信念，砸下全部的力量。粉碎机加足马力狂吼着，咧开那贪婪的大嘴吞嚼着无数的石块。机房里粉尘飞扬，迷眼呛人，猪鼻子似的胶制防尘口罩扣在脸上几乎令人窒息，可粉尘还是钻了进去，一天下来，睫毛头发，浑身上下无一不着色，活活白毛女下山了……

红旗下的鼓动呐喊，石头上的滴滴汗水。棉衣皮帽甩到一边，粗糙的把柄磨得光亮，手上打起了血泡，血泡又被磨破，汗水渗进皮肉入骨地钻心疼痛，汗水、血水、泪水、苦水，搅拌在一起，抛在了那片山石上。真的，那时我们年轻，我们火热，我们赤诚，我们几乎豁出去，也全凭豁出去，5天拿下了4000方。

累已经是苦不堪言了，更可怕的是那时时冒出的险情。渴望上学求知的采石人称这里为“采石大学玩命系”。

就是在这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采石厂，因工伤死亡的兵团战士就有三人：一人在雨后带着风钻登山作业，被落石击中头部坠崖身亡；另一人在修理破碎机时，不慎卷进机器而死；第三人在撬石时被落石埋入石堆，造成骨盆骨折和内脏大出血，诱发败血症死亡。同一个团的造纸厂，劳动条件同样很差：

造纸行业虽然是轻工业，但劳动并不轻，尤其对这些刚刚走出学校大门，身体发育还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来说，就显得极不容易。最前边的生产工序是备料，在当初，许多设备和操作工序还不够完善，备料时大家把70多斤重的苇草捆放在肩上，一捆捆从几十米外扛到车间，20多人一天需扛近千捆，肩膀磨破了，他们咬着牙，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有的病了还坚持不下火线……

在浆洗工段，每天操作工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终日和水

打交道，浆洗时的沫子流得遍地都是，有半腿高，使人无法下脚，但大家知道，再大的困难也要想法克服，她们不停地用水冲洗沫子，衣服上、腿上经常被溅得水淋淋的。时间一长，有的患了关节痛，许多人到了夏天还穿着绒裤上班，但她们仍然坚持着干……在纸浆漂白过程中使用的原料是漂白粉、氯气，毒性很大，干活时戴上防毒面具也经常被熏得头昏脑胀……

更有甚者，在超剂量的核辐射下开采矿石，严重摧残了生产人员的身体，但当时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多年后才看到不容争辩的恶果。曾在云南兵团铀矿工作过的兵团战士写下了这样的回忆：

半年后我调到了师部化工厂。初建时化工厂有两百余名职工，是分别从二师七、八、九3个团和独立一、二、三、四营抽调来的。上海、成都、昆明的知青有144人，成都知青约占一半。尽管当时对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后果已有耳闻，但这里毕竟距临沧专区所在地近，交通较为方便，星期天进城看场电影，吃顿豆浆油条改善改善伙食，与二师许多连队相比，已经是不错的了，所以大家也就不去细细考虑X射线会危害我们年轻的生命，吸吮我们血管中奔流的热血了。知青中有的暗自庆幸自己丢掉锄头而进了“工厂”，更多的则为自己能加入发展祖国原子事业的行列而感到光荣和自豪。我呢，觉得这儿距成都又近了300多公里，似乎与爸爸妈妈的心也更贴近了，因此很满意。

根据各国从事放射性工作的有关防护规定，凡直接从事放射性工种的有关人员必须享有特殊的劳动保护措施，尽量减轻射线对人体的危害。但二师化工厂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仅能保证井下采矿工和车间生产人员每月半斤茶叶（据说多喝茶水能排泄体内的有害物）、一袋奶粉、一斤白糖和十几元营养补助。虽然这已算得上全兵团最特殊的待遇，可却不能抵挡射线对我们的无形摧残……井下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知青们每天在潮湿的掌子面上支架钻炮眼，排除哑炮有危险，总是抢着上，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几次坑道发生冒顶，没有一个人只顾自己逃命而抛下患难之中的战友。

1984年3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朋友告诉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小穆死了，得的是肺癌……

小穆的妹妹告诉我，医院把姐姐当作一个典型病例来分析。因为医生认为小穆作为年轻女性，无抽烟史和其他病史，身体又好，似乎不可能得这种病。但当医生了解到她曾在云南临沧地区当过8年知青时，也就找到了答案。原来临沧是铀矿开采区，那时采取的又是原始的裸露性开采，因此成了有害射线污染区，后来也就成了癌症高发区。我听了后心情有些沉重，那个地区曾经生活、劳动过成百上千个知青，小穆是第一个受害者，以后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各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的工矿企业，只有少数采用了当时国内先进的生产技术，引入了部分先进设备；多数则或是土法上马，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使用极简陋的设备、极简单的工具甚至手工操作，进行工业生产；或是拆旧利废，用早该淘汰的机床设备进行生产。这样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生产率低下。

工人的素质同样是严重问题。兵团企业的主要劳动力是来自各城市的知识青年，他们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没有经过正规工厂的学徒训练，在“大干快上”精神驱使下，一般只经过短

期技术培训后就上岗顶班生产，并且很少再有机会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在技术要求不高的生产部门，问题似乎并不突出；而在需要较高技术的部门，因操作失误和技术不熟练造成了大量的废品和机械事故，使得工人技术低下的问题暴露无遗。

本来已经是落后的技术和设备，以一批技术还远未达到要求的人为主力来进行生产，其结果自然是大量地产出次品或者废品。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阀门厂为例，各种型号阀门的零部件，无论是铸造还是金加工，大都达不到图纸设计要求；而装配工人只是把这些不合格的零件凑在一起而已。成品阀门的过水检验，很快形同虚设，因为认真检验很难找出几个不漏水的阀门，况且用来检验阀门的机器本身亦未达到应有的设备标准。在生产突击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指标，经常是只要装配工将阀门组装出来，在检验车间过一下水（把水压调低），表示检验过了即可；甚至时有连水都不过的现象发生。阀门的外形，更是一塌糊涂。按照国家的要求，低压阀门的手柄要涂成红色，其他部分涂成黑色，加工过的“法兰面”要涂清漆。按照正规的做法，需把阀门吊起来，用喷枪喷漆，保证着漆均匀；后因喷漆设备经常损坏，加之气味太大，对兵团战士身体不利，全部改为刷漆；先是用小刷子慢慢刷，尚可保证黑红分明；不久又嫌速度太慢，改用棉纱做成的大刷子涂抹，或者干脆用铁桶盛满漆，把阀门一个个扔进去，再捞出来，美其名曰“蘸漆”，刷清漆的工序，自然是早已免掉。结果，该红的地方不红，该黑的地方不黑。在成品库里，看见的是一堆堆紫黑相间的“喷壶”。按规定应对阀门进行的包装，如小阀门装箱、阀门手柄缠绕草绳等，也统统免去。这个厂生产的阀门，后来干脆连生产厂家的名字也不出现，实际上是自知产品不合格，省得用户找麻烦。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每年下达生产任务，产品出厂交货，就算完成了任务。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哪一套管道系统不用成百上千个阀门，就算是我们生产的阀门漏

水，谁能查得出来？”国家倒也不含糊，全国阀门行业质量大检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阀门厂的产品坐了倒数第二把交椅，任务指标锐减，领导着实焦急了几天，但毕竟阀门还是供不应求，不久又找到了订户，于是一切如故。

产品质量差是兵团工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连生产者自己都往往不愿意使用本厂制造的产品。当然，有的企业的产品还是受人欢迎的，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化纤厂生产的纺织品，就曾得到当地群众的青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北大荒”牌白酒，很受人们欢迎。在全国市场商品匮乏的情况下，有限的工业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以兵团工厂的产品，虽然质量不太好，还是能够继续出产。

兵团的领导干部把“大会战”的模式搬进了工业生产，各工厂制定的生产计划往往是粗线条的，并且夹杂了很多主观意志。下达的生产任务，一般只明确产出数额，没有严格的成本指标和技术指数。尤其是在突击出产品的时候，强调全厂大协作，打破工种界限，集中全厂或几个车间的所有人员干最后几道工序，一窝蜂似地连轴大干，其效果可想而知。

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势必造成生产随意性强、组织管理差、生产责任不分明等问题。机床设备缺乏必要的保养、维修；多数生产者看不懂图纸、不照图纸生产甚至无图纸生产；脏、乱、差的生产环境，如此等等，举不胜举。

兵团各工厂虽然都设有生产、技术、检验、统计、劳资、供销等科室，配备了必要的人员，但在企业管理意识淡漠的风气之下，各部门的工作经常与生产脱节，基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以生产统计为例，各车间、班组上报的人员出勤率和生产数额，往往在厂部汇总后即继续上报，很少有人来进行核查。工具领发和生产材料的消耗，在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和领发制度的状况下，甚至都不包括在车间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之内，完全由领导或班组长

说了算，由此造成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的大量非正常消耗。生产材料和生活用材料不分，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在不少工厂，车间里有什么，职工家里就有什么；尤其是工业用煤和焦炭等，在冬季更是大批运回宿舍派了用场；甚至有人认为，缺什么都可以到车间去拿，或者开动设备制造出来，这就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谓“干私活”的现象屡禁不绝。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一些工厂虽然每年都能完成生产任务，但长期戴着亏损企业的帽子，就是因为管理混乱和生产资料大量浪费而不能扭转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之后，一些兵团工矿企业领导认识到了建立合理规章制度和进行科学管理、组织文明生产的重要性，并着手确定干部、职工的岗位责任制，加强工人的技术培训，建立健全经济核算制度，对生产的各个流程强化技术把关，实施严格的产品检验制度，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改变非正规生产的习气，使工厂真正迈进国家正规企业的行列。

三 农业亏损工业补

各生产建设兵团兴办的工矿企业，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吸收了一部分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整个农垦系统当时劳动力过多所造成的矛盾。如黑龙江兵团，平均每年工业职工人数增加3万多人；内蒙古兵团则有1/6的人从事工业生产，使得农牧业团场的人口压力有所减轻。

各生产建设兵团工矿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地比农牧业单位好。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8—1975年的年工业产值从13666万元增至38100万元，7年内工业产值累计12亿元，工业利润接近2亿元。1968年工业产值占兵团生产总值的29%；在农业生产降到最低点的1973年，工业产值达到25856.9万元，占总

产值的40%以上；1975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37.8%。黑龙江兵团连年亏损，如果没有工矿企业的产值顶掉一部分亏损数额，亏损更为巨大。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同样靠工矿企业的产值弥补了部分农业生产的亏损。1970—1973年，内蒙古兵团农牧业亏损13914万元，而工业盈利1288万元。像兵团化纤厂这样的骨干企业，建厂6年，年年完成国家计划，实现工业总产值5220万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润，确实不愧为兵团的宠儿。

工业生产还解决了生产建设兵团物资供应方面的部分问题。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原煤12万吨，仅能满足兵团生活需要的20%；1970年之后，陆续兴建了60余座小煤矿，年产量增到34万吨，1975年则达到了60余万吨的水平；仅四师就新建了11座煤矿，1975年原煤产量为253772吨，比1968年增长2.7倍。煤矿建设的发展，大大缓和了北大荒垦区燃料短缺的矛盾。为解决三师跃进山钢铁厂用焦炭问题，1971年5月动工兴建的四十四团（八五·一〇农场）焦化厂，1972年11月8日试车投产，当年生产焦炭2388吨，不久即形成了年产1万吨焦炭的能力。四师完达山食品厂从1968年开始研制大颗粒速溶奶粉，1974年试制成功，1975年8月在全国乳品协会上介绍了压力喷雾速溶奶粉操作规程，被轻工业部作为新工艺向全国推广。

交通、电讯建设也迅速发展。除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专门组织力量进行了南疆铁路大会战外，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六师参加了抚远福利屯至前进农场铁路的施工工程。各兵团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公路、高压输电线路等。黑龙江生产兵团在8年内共修建改造了2100公里砂石公路，建成了100多座永久性桥梁和几千座永久性涵洞；从富锦二龙山到抚远的二抚公路，全长235公里，由二师、三师、四师分段承包，1969年5月动工，11月竣工，是黑龙江兵团修建的最重要的公路之一。黑龙江兵团四

师还先后修建通信线路 539 杆公里，高压线路 894 公里，并投资 500 多万元建成了密山虎林电联网工程。为解决玉门镇地区照明、动力、排灌等问题，兰州兵团一师从 1971 年 8 月至 1974 年底完成了“三五”线路架设任务，架设线路 250 多公里。

投资工业见效快，导致了重工轻农的现象。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生产建设兵团，大量投资于工业，挤掉了农业的部分投资。黑龙江兵团从 1968—1975 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 13.9 亿元，其中农业投资 4.15 亿元（不包括农田基本建设），只占基建总投资的 29.8%；工业投资 4 亿元以上（不包括交通、电力），几乎和农业投资相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年来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用于农业方面的基本建设支出，由 1969 年占基建总支出的 48.7%，下降到 1971 年的 41%。内蒙古兵团感到搞农业很费劲，认为农业“低产有理”、“亏损难免”，转而从工业方面使劲，基建投资多用于工厂建设方面。由于各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农垦系统，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大前提下，这种重工轻农的倾向自然引来非议，并且不断有人出来“纠偏”。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 1972 年就不得不承认：“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客观地看问题，与其在自然环境不适应发展大农业的地区花费大量投资和投入过多人力去进行徒劳无功的农业生产，不如挪动部分投资和人力发展工业。

各兵团都有一些急于求成、仓促上马的工业项目，由于对资源、能源、供销等考察不细，后来成为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的跃进山钢铁厂，1971 年投产之后，由于采矿跟不上，不得不从海南岛、朝鲜购进矿石，每吨生铁的生产成本在 500 元左右，比国拨生铁的价格高出一倍；1975 年，每吨生铁成本下降到 414.6 元，仍比国拨价高出 65%。黑龙江兵团化肥厂（浩良河化肥厂）1974 年 9 月 29 日生产出第一批“北大荒”牌尿素，但由于设备不过关，1975—1978 年累计投资 1.2 亿元，累

计亏损 2850 万元。1975 年初，王震副总理指示黑龙江兵团组织黄金生产，兵团立即在一师一团、二师十五团、二师独立一团、三师三十二团建立了四个采金点，当年采金 16.5 两；由于缺乏地质资料和采金经验，经营亏损，后来除了三十二团采金点坚持生产外，其余都停产下马。但是就总体来说，兵团工业的成效比农业成效大得多，不少工矿，如内蒙古兵团的化纤厂、发电厂、化肥厂等，后来都成为当地的骨干企业，在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改变之后依然能够发挥作用。

第七章 准备打仗

用战备的观点审视一切——北疆有个“和尚团”——
夜半号声催——珍宝岛前线的兵团担架营

——“时刻立足于打”

1965年，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升级”，扩大了战争规模，引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在积极备战的思想指导下，国防建设被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当年9月国家计委重新拟定、经中共中央同意的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就是一个以备战为中心的计划。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在一系列大规模的示威、声讨、抗议活动后，战备工作更加紧进行，并把迎击苏联的“突然袭击”作为重要工作来抓。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要求。

1969年8月28日，由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下发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委会，向各族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传达。

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中有一条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全世界人民团

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1970年1月31日，在毛泽东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又明确提出“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3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这就是著名的“五·二〇”声明。此外，毛泽东还有“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一系列指示。

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战备工作全面铺开。经济建设方面，突出战略后方建设投入，强调各地区建立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强调要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在抓紧“两个拳头”（农业和国防）的思想指导下，会议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划分为西南、西北、中原、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山东、闽赣、新疆10个协作区，要求各自建立独自作战的工业体系，做到自己武装自己。1970年给内地的基本建设投资为197.98亿元，其中三线建设投资为163.13亿元，同时还增加了对山西、陕西、豫西、鄂西、湘西、川西、黔西等“七西”地区的农业生产投资。为充实三线建设，边疆地区的工厂，尤其是军工厂，大量内迁；各地区企业的管理权亦大批下放。为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从1971年起，财政部又增加了对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宁夏、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山东、河南等14个省、市、自治区和四川、云南、贵州大三线地区的农业资金。军事方面，除了加强军队建设外，还加强了对民兵以及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和军事训练，并且大量修建国防公路和国防工程，甚至

在每个大城市都建造了用于防御原子战争的“人防工程”。政治方面，则强调加强战备教育，开展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清除阶级异己分子的活动。

在战备形势如此严峻的局面下先后组建起来的各生产建设兵团，尤其是设在边疆地区的兵团，大多数团场分布在边境线附近，构成了一道绵长的屏障。在东北的边境线上，黑龙江兵团的四师（牡丹江地区）、六师（抚远地区）、二师（合江地区）、一师（黑河地区）、五师（嫩江地区）由东向西排列。内蒙古的边境地带，有内蒙古兵团的六师、五师分驻在锡林郭勒盟内，二师、三师、一师在巴彦淖尔盟一线排开。新疆的边境线上，依次排列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六师（昌吉地区）、十师（阿勒泰地区）、九师（塔城地区）、五师（博尔塔拉地区）、四师（伊犁地区）、一师（阿克苏地区）、三师（喀什地区）。西藏南部边境线内，分布着西藏生产师的江孜、山南、米林、察隅等团场。云南边境，从西向东，排列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二师（德宏地区）、三师（临沧地区）、一师（西双版纳地区）、四师（红河地区）。海岸线也不容忽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上，分布着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10个师；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各师，沿着海岸线由南向北布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边防军人的身后，有一个由生产建设兵团组成的防卫圈，这个防卫圈由数百万人组成。

既然被摆在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各生产建设兵团自然特别重视战备教育和战备工作。

所谓战备教育，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不断进行形势教育和传达“敌情通报”。“敌情通报”的内容多是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亡我之心不死，不断挑起事端等等，要人们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1969年下半年和1970年，各兵团的战备教育都抓得很紧。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为例，1969年9月5日至12日全团停产进行战备教育。该团八连被确定为武装

连队。10月1日早上，在团部召开紧急会议，并于当晚向全团战士传达了会议精神：（一）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二）一定要注意防空袭、防毒、防空降、防原子。（三）为防备敌人的突然空袭，各连要迅速挖好防空洞；八连必须把枪迅速发下去。此外，还传达了一些“可靠消息”：敌（指苏蒙军队）在内蒙古边境城市二连浩特空投特务21名，被抓获18名，另3名不知去向；敌8架飞机侵入内蒙古，飞到了离十二团不远的白云鄂博……各连很快在驻地周围挖好了防空壕，并在住房内挖了地道，不断进行防空、防原子的演习等。

1969年10月19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同时传达了当天早上5时18分以林彪名义发出的命令，以下是当时的日记摘抄：

（一）苏、美军队近几天有异常现象，希各部队加强战备，做好战斗准备。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决定今日到京，事实多次证明，边谈判边施加压力是有可能的。19、20日要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要将坦克、大炮迅速隐蔽，尤其是三北军区。

（三）人员减少流动，领导对外出人员要心中有数。

（四）各部队要有坚强领导进入战斗指挥所。各首长各就各位。

（五）增加首长值班。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命令是“迅速传达下去，快执行”。各团又有一些补充的具体措施，如规定各种警报讯号等。

10月安全地过去了，仗没有打起来，但战备教育并未因此而放松，尤其是形势教育课经常上，内容无非是现在苏联在我国边境部署了70多个师，100多万人，配备了3千架飞机、2万辆坦

克，时刻可能对我们发动突然袭击；后来又有了新说法：苏军部署在我国边境的兵力已达200万人，飞机2万架（包括海、空军作战飞机9000架），导弹基地30多个，导弹1000多发；此外，还有蒙古军队30万人作为帮凶。

1970年1月1日，内蒙古兵团司令部又发出了紧急通报，内容如下：（一）苏联方面，谈判代表团未按规定日期返回。（二）苏方给我国一个照会，内容不知。（三）苏联军队于12月31日向我国边境全线推进。各师、团又加了一些指示，层层下传。如二师的指示是：“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人员不许外流。”十三团的指示是：“各连不许外出，值班分队应提高警惕。各连做好物质上的准备，要做好防空准备工作。”

通报不时下发，形势教育常搞，但又不能完全停下生产来进行全方位的备战，所以一旦生产任务紧迫，战备还是要让位于生产。农闲或是生产淡季，则成为抓战备教育的大好时间，由此造成了兵团生活的紧张节奏。不断重复这样的战备教育，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给人们以使命感，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增加热情。但时间长了，备而不战，自然会松懈，战备教育不久就只是流于形式了。

其他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备教育情况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大体一样，尤其是黑龙江、新疆、兰州等生产建设兵团，面对北方的强敌，同样不断把苏军的动向通报给各级指战员，进行准备打仗的教育和安排。

二 “身穿绿军装，一人一杆枪”

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并且基本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来的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容易改编成正规部队，但毕竟没有跨出这一步，还只是作为后备军事力量存在。在既要加强战备，又要

组织生产的指导原则下，兵团的武装力量始终被限制在较低的水平上。当然，各兵团的地理位置不同，武装力量的编组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地处“反修”前线，军事化程度较高。兵团征集了北京、天津、哈尔滨等11个城市数千名男知识青年，编组了类似现役部队的“兵团值班步兵团”：

二六六团——兵团值班步兵团，筹建于1970年初，参加这个团的条件，是“根正苗红”符合参军要求的男性青年，这就为怀着“戍边”渴望，却又与现实矛盾的男知青们提供了机遇。“身着绿军装，每人一杆枪，佩戴帽徽和领章”的招兵动员，对于血气方刚又带着那个时代余热的年青人，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吸引力。“兵士们”半个月左右就在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集结完毕。于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知识青年，又在兵团的特殊任务中开始了特殊的战斗生涯。

集训用了两个月，之后兵分两路，大部分到山上修筑战备工事，同时选一个连队到桦川县境内的一片荒原上建基地……

随后3年间，这片荒原平地立起了一排排红砖瓦房，附近其他团队的营房也拔地而起，并建起了有办公楼、俱乐部和商店等设施的团部。开垦了全部荒地，修起了公路。

可最使我们遗憾的是，招兵的允诺没有兑现。除“每人一杆枪”外，“佩戴帽徽和领章”始终没有音信，而“身着绿军装”只能算实现了一半——不过是发下来黄色仿造军装。

随着岁月流逝，到了1975年，这支部队的“先天不足”愈加暴露。“知青政策”这个严肃的课题，以“个人生活问题”的形式诙谐地表现出来。“战士”年龄一天天大起来，“和尚团”处在如何解决生活问题的困境，“部队”士气大受

影响，这年的麦收已失去了往年的火热劲儿……一个肩负特殊使命的工作组出发了，他们是到十八团专招未婚、并且没有男朋友的女青年。180名符合条件的女青年被批准加入二十六团。

这批女青年的到来，是二十六团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它主要担负的打仗任务已不复存在了。

黑龙江兵团的其他团场，大多建有专门的武装营或连队。“珍宝岛”事件之后，黑龙江省已经处于“最前线”，接近中苏边境的兵团各团，在武器装备、人员配置等方面都颇下功夫。如四师从成立之日起便着手组建值班分队，至1969年9月已建成武装值班营9个，武装值班连队33个，共计武装人员5464人，连排干部是非现役的，营职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五师建立了炮连、喷火连、防化连、侦察连、工兵营、高炮营和两个步兵团（五十四团、五十五团）、一个炮兵团（五十六团）。位于萝北县境内的二师十四团的男子炮连，1个排3门炮，配有炮弹。“分到炮排的战士则必须思想进步、身体健康，更少不了根红苗红、出身纯正。”不久又建立了女子机枪班，全班9个人，3个人一挺机枪。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兵团的武装连队里也储备了不少反坦克手雷和四〇火箭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多数团场离边境较远，直接担任战勤任务不多，武器装备基本按照当地民兵的水平配置，并在各团设置了武装连队。各武装连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一般只配有机枪、冲锋枪、步枪及手榴弹等。兵团配置的武器，大多是北京部队替换下来的旧武器，甚至还有早该淘汰的苏式冲锋枪和“7.62”步骑枪等。

1962年，新疆塔城、伊犁地区发生大规模边民外逃事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很快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武装巡逻值班

部队和承担“三代”任务（代耕种、代管理、代放牧），并特别由财政部拨付了武装经费500万元。此后，新疆兵团一直保持着一定水平的武装力量。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同样设置了武装连和警通连，武装连按三三制编制，每个排配备1挺机枪、12支冲锋枪、21支步枪；警通连配备机枪3挺，冲锋枪111支。到1971年底，组建了值班分队40个连，武装连13个。1972年底，全兵团共有武装人员7694人，配备步枪7715支，冲锋枪4999支，轻机枪351挺，各类手枪128支。内地生产建设兵团也有武装连队的建制，但武装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数量都明显少于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

三 “紧急集合”

军事训练是战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包括出操、队列练习、射击投弹、防空演习及“战地拉练”、“紧急集合”等内容。

各地的兵团大都建立了出早操制度。每天起床号后，除1名值日生外，所有人都要列队出操。出操内容包括跑步、队列练习，有时亦有枪械训练，早操时间一般为半小时。兵团年轻人多，劳动强度大，又经常加班搞“会战”，睡眠不足是普遍问题，所以早上起来出操，尤其是冬季，实在是令人痛苦的事。连队为了抓好出操，不时进行评比，强调出勤率的高低表现出战备工作和组织纪律的好坏。

射击和投弹训练，武装连、排多一些，一般连队较少。如云南兵团1970年规定值班分队的军训时间应占全年时间的10%，一般连队的兵团战士军训时间为5%。武装连队要掌握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杀敌本领，还要进行“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伞兵）、“三防”（防化学、防细菌、防原子）和近战、夜战训练。实弹训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女青年投弹，更易发生事故，

需要严密地组织。所以尽管各团场为战备准备了不少弹药，但实用的机会并不多，即使是实弹训练，每人亦不过射击几发子弹，投一二颗手榴弹而已。这一点训练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平时最多进行的是空枪瞄准练习、投掷教练弹、拆装枪支和擦枪等活动，至今许多人还记得一句口令：“突刺，刺！”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笔下的军训情况，颇有代表性：

早晨，起床号一响，全体武装战士就起来出操。夜间的紧急集合、急行军成了家常便饭。子弹袋、机关枪、手榴弹、背包，干粮袋七缠八绕盘了一身，跑不了几步就喘不上气来。还要练刺杀，满山滚，叫利用地形地物。演习着传口令、防空、攻占山头等等。大田里掰玉米，要想着青纱帐里的游击战；下工回连，路上要练一手遭敌军空袭救护伤员的本领。排长不断地出花样：“敌机来了，卧倒！”“×××受伤，××救护！”跟真的似的。大路上爬，叫匍匐前进，一前进就是几百米，而后就是弯腰跑，因为敌情不退。从地里背老玉米，那叫负重行军，本就累得每天爬不起来，可还一个劲儿地加码。当时的口号是响当当的：胸怀大目标，迎接大风暴，经受大考验，做出大贡献。

最能使兵团战士感受到“战争”气氛的，莫过于“紧急集合”了。所谓“紧急集合”，大多在夜间进行，号声一响，所有人打好背包，带上枪支弹药、水壶、干粮，列队集合。为了带有“真实”色彩，连干部常常宣布战争已经开始，连队立即参战，并马上带队离开营房，开往荒山野外，绕一大圈后又返回营房，声明不过是一次演习。刚去兵团的人不习惯这种经常出现的神秘行动，往往洋相百出，穿反了裤子、穿错了鞋、走不多远背包就散了的事情比比皆是。时至今日，提起兵团军事化的生活，许多当

年的兵团战士首先想到的就是紧急集合：

1969年春天，珍宝岛打响，中蒙边境也紧张起来。我们虽属“序列”，但军事训练丝毫不亚于正规部队。连队生活也比以前更紧张了。每天半夜三更睡得正香，一阵紧急集合的号声就会响彻夜空。前方发现敌情，跑步前进！于是，踉踉跄跄的队伍就在荒山野地里跑上一通。尤其是1970年冬天，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三次，真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但是，我们的功夫也没白下，那年冬天，师团首长对我们连进行了一次偷袭检查，结果，从号声响起到全连报数完毕，共3分27秒。师团首长除了检查背包、枪支、弹药、干粮带等着装外，还重点检查了袜子是否穿反了，鞋带是否系好。还有炊事班，锅碗瓢盆是否齐全牢靠。师长满意地说：“这个速度怕是正规部队也赶不上啊！”那一年，我们连被评为师战备值班的模范。但我们不少同志对军号声也产生了恐惧感，他们常常失眠或突然惊醒。繁重的劳动，紧张的生活以及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使他们的身心受到损害。对那时的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至今我也很难作出评价。从当时的边界形势看，应该说是必要的，但就我们的年龄体力而言，确实难以承受。

后来紧急集合搞得实在是太多了（1969和1970年，几天就要搞一次，北方的兵团大多如此），人们不再相信“战争”已经爆发，于是疲疲沓沓，有的人干脆赖在炕上不起来。组织者往往来点真的，黑龙江兵团三十二团就有过这么一次紧急集合：

轰的一声巨响，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发生了什么事？十几个脑袋同时从南北两排大通铺抬起。

“兵团战士们请注意：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对我国发动

了战争，牡丹江遭到了轰炸，飞机正往哈尔滨方向飞行。各排宿舍、各家各户马上熄灭灯火，棉袄一律白里向外，迅速到连部门口集合。”连队的喇叭里响起了紧急命令。

“啊！打仗了！”顿时，宿舍里一片骚乱，有的低声抽泣，有的翻箱倒柜，有的撕着家信，有的把新衣服一件件往身上套。“哈尔滨咋整呀？”哈尔滨青年比起我们北京、上海青年更显得慌乱。而此时的我却并没有感到恐惧。好奇与紧张促使着我迅速穿好衣服跑出集合。

来到连部门前，大部分人已经到了，连长在集合队伍。尽管来自最上峰的一号战备命令已传达，动员会已开过，备战的观念也已形成，但当时兵团按所处地理位置分一、二、三线，我们团为三线，所以还没有练过兵。现在突然听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把战火烧到哈尔滨，大家不免有临战之感。天天喊屯垦戍边，今天果然要拿起枪保卫边疆了。

队伍集合完毕，指导员带我们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又慷慨激昂地作了口号式的战前动员，然后按班排顺序排好队，穿过连队后面的麦场，向山里进军了。

.....

行军的速度减慢了，队伍开始躁动，噼噼啪啪的说话声骤然而起，原来，我们又回到了连队。等到队伍完全站好，只听指导员说：“同志们，今晚的演习到此结束。明天晚上以班为单位讨论。解散。”唉，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演习。

事后才知道，那一声巨响，用的是我们平时开山打石头的炸药。

有的时候，“紧急集合”是为了抓“空投特务”或者潜逃的敌特分子，当然大多数还是特别设计的演习或者捕风捉影的盲动，只

有少数是真有情况，抓到个把“潜逃分子”。在备战最紧张的时间里，有的团场还在夜里组织武装人员突然搜查所谓“有问题”的住房，以求找出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的“罪证”，但大多是徒劳。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对解放军作战部队发出指示：“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一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并且指出：“野营拉练是一种好方法”，“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全国各军区的野战部队，很快部署了大规模的冬季野营拉练。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担负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在不影响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也可适当组织野营拉练”。各生产建设兵团都组织部分部队进行了野营拉练。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1—3月先后有4个师机关、14个团机关和192个连队，共计42065人参加了拉练，拉练时间3—10天不等，行程少则50公里，多则450公里。黑龙江兵团四师从每团调集一个值班连，加上师直机关共计1893人，于1971年2月2日至3月5日进行拉练训练，从密山到海林县柴河镇，行程1500余里；各团也相继组织了中、小型拉练。

这次拉练强调实战标准，要求部队做到“会行军，会做饭，会休息，会放哨”，达到“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和练战术、技术”的效果。参加拉练的兵团战士，都是迈出校门不久的知识青年，缺乏野营生活知识和长途行军锻炼，在气候寒冷、风沙大、冰雪盖地的情况下负重行军，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年参加拉练的内蒙古兵团三十一团女战士陶知敏回忆道：“1971年冬的一次拉练使我终生难忘。那时，部队正提倡千里野营。这日我们要负重日行80里。连指导员王培田带着我们急行军，他人步走，我们就要小跑。体力实在不支了，我壮着胆子恳求指导员慢些走，可他理也不理，我顿时傻了眼，他平时对战士们的和和气气到哪里去了，此时怎么这么冷酷无情？我还真从心里恨起了他。后来我才明白，指导员是为了培养我们平时能吃苦，战时能打仗的作风和

坚韧不拔的精神。队伍终于按规定时间到达了目的地。战士们们的脚上都磨起了殷红的大血泡，累得几乎跌下了。”

有的师、团为了从难、从严训练部队，专门选择了最恶劣的气候和最难走的路线。如内蒙古兵团三师组织的第一批野营拉练连队，时间安排在最严寒的“三九”天，行军路线是通往“游击根据地”的一条崎岖狭长的大冲沟和一条翻山越岭的人行小路。在沟深路滑、大雪纷飞的情况下，不少兵团战士带病行军。二师十四团在行军中逐步加快速度和加大行程，把行军时速由8里提高到了15里，日行程从65里提高到95里，每人负重30至45斤，许多战士脚上打满了血泡。有的师、团还把拉练和生产结合起来，如四师组织的拉练，除了120里的综合行军外，每天背碱往返70里，既劳动，又拉练，一举两得，只是苦了参加拉练的兵团战士们。虽然在拉练中喊出了一系列的革命口号，如“为了保卫毛主席，战备野营练红心；为了埋葬帝、修、反，骨碎筋断永向前；为了解放全人类，苦练一双铁脚板”；“一路风雪一路歌，嘹亮歌声震山河。兵团战士骨头硬，苦练硬功保边防”；“兵团战士意志坚，三九寒天只等闲；为了埋葬帝、修、反，甘洒热血永向前”，等等，但因身体不支而掉队的大有人在。

除了军事训练外，各兵团还修建了大量的战备工事。不仅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兵团的边防团连普遍挖地道、交通壕、防空洞，建立攻、防、打、藏相结合的“战斗村”，南方的云南等兵团也纷纷修筑防空洞、战壕等战备工事，形成一派紧张的战斗气氛。由于机械搬用人民战争理论，也闹出过不少笑话。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遵照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大力推广地道战的经验，在各连驻地大挖地道，各宿舍之间全部连通，并且一直通到山里，还不断进行钻地道演习。结果敌人军队没有来，山里成千上万只老鼠却被引来了。一时老鼠成灾，平均每人有一个排的老鼠兵力。为消灭鼠患，又不得不把地道口填

死。挖地道不仅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而且还造成多起工伤事故。有的生产建设兵团还组织试制各种武器，黑龙江兵团四师专设了军工厂生产枪支。试验自制武器，有时引来悲剧。1969年8月9日，黑龙江兵团二师十二团参谋股副股长贾宝廷即在试验本团制造的手榴弹时被炸身亡。

1971年9月中旬，多数北疆兵团的团场接到命令，停产集结待命，准备打仗，并且在驻地周围修筑工事。人们对此举倒并不紧张，觉得又是一次大演习。这次是真的了，因为“副统帅”林彪跑了，全国都进入战备状态，正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一团陈新所描述的那样：“‘9·13’事件后，整个兵团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们连也不例外。每天除了生产，还要进行军事训练，挖防空洞。晚上睡得好好的，不定什么时候，连长‘嘟嘟’一吹哨子，就得爬起来演习紧急集合。那时，我们都把兵团发的棉被事先打好背包，放在床下，一听哨响，穿上衣服，提上背包就跑出去。”

1969—1971年，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分严重，战备过于紧张，不仅影响了各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搞得人心惶惶，还耗费了巨大的资金。如黑龙江兵团四师1969年战备值勤费支出232.8万元，1970年支出226.7万元，都比1968年增加了十几倍。

四 珍宝岛——十万火急

在全国十几个兵团里，真正参加过实战，并常与苏联边防军打交道的，大约只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少数团场。

在珍宝岛的冲突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组织了担架队参战，北京知青黄海回忆了当年的经历：

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这时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是第二个年头，所在的团靠近珍宝岛。消息传来，知青们纷纷要求参战。日紧一日的前线战事，使我们人人都感到热血沸腾。3月8日，上级命令我们迅速组建担架营，赴前线参战。命令传来，只两个小时，就有5000多人报名参战，决心书、保证书纷纷扬扬，不少人还写了血书。城市知青更是激动万分，都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没有老婆孩子，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不让我们上前线谁上?!”

反复挑选之后，一个由下乡知青为主体的450人的担架营组织了起来，第二天便开赴前线。临行，各连队都召开了欢送会，女知青为我们戴上了大红花，没能被选上的男知青纷纷为我们举杯敬酒，充满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气氛。

到了前线，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站岗放哨、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先在原地待命，但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进行训练……我们在前线讨论过“副统帅”的“指示”，“要抓战备促革命，促生产，促进各项工作”，为承担如此重任而激动不已。我和大家一样，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留下了遗言——“一旦光荣牺牲，把自己下个月的全部工资32元（因为本月工资已全部吃光），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

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3月15日清晨，苏联边防部队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再次向珍宝岛发动进攻。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赶到前沿阵地待发。我们趴在乌苏里江边的灌木丛中，几十米外的珍宝岛上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机枪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飞过，打碎的树枝一个劲儿地飞落。炮弹不住地在四周爆炸，震耳欲聋，泥土、血块四溅。这种场面在电影里见多了，可身临其境，我还是第一次。心里紧张

得不得了，不停地默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

这时，传来了送炮弹上岛的命令。我们一跃而起，扛着三十几斤重的炮弹，冲向珍宝岛。飞来的炮弹呼啸着的声音尖厉刺耳，震人心魄。起初听到这鬼样的叫声，我们都卧倒隐蔽，前进速度受到影响。一会儿，我们遇到了撤下来的伤员，从他们嘴里知道，阵地上的炮弹已经不多了。我说不清胸中涌动出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听到炮弹呼啸的声音，也顾不上卧倒隐蔽。同伴们一个跟一个都这样地向前冲。

越过乌苏里江江岔后，炮火更加猛烈。巨大的气浪、飞溅的土块不断冲击过来，密集的机枪子弹呼呼地从身旁飞过。冰面坎坷，肩上的炮弹也越来越沉，可是没有一个人后退，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扔下炮弹。我当时什么也顾不上想，豪言壮语也全忘得精光，只是咬着牙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把炮弹送进炮兵阵地。接着就是把伤员和烈士遗体安全地撤下。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担架营涌现出不少动人的事迹。北京知青杨一平双脚严重冻伤，但他把棉衣脱给了伤员，自己冒着严寒硬是在雪地里趴了几个小时。北京知青朱波在指挥员不到位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担起了指挥任务。北京知青陈放等人在运送伤员途中遭敌人袭击，他们跪在了担架旁，用自己的身体筑起了一道血肉之墙，这个伤员就是后来的战斗英雄冷鹏飞。更有不少知青血染了疆场。

在前线，我专门以《红心谱成忠字曲，赤胆写就反修篇》为题写了一篇战地通讯，“……为了祖国山河永远红，为了乌苏里江两岸同样红，就是死在反修前线，我也心甘情愿！”尽管这里含有时代的印记，但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心里话。

其他靠近中苏边境的团场，只是执行站岗放哨、巡逻、修战备公路、架电话线等任务，有幸目睹“老毛子”的兵团战士，毕竟不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知青叶英，有幸赶上过一回：

坐在值班室里，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江面上，波光簇簇，许多人在游泳。

绥滨县的北口子就像是人工堆砌的，从日伪时候这儿就有边防警备队。组建兵团武装分队以后，一伙毛头小子便拿起枪，和边防站真兵组成联防，一起值勤。

……忽然，我发现江面上有4个黑点，依稀像是军用舰。我拿起望远镜：怪了，前面一条船挂的是红旗，后面的三条船挂着绿旗，这三条分明是苏联军用舰。什么年头，难道双方还会混合编队不成？继而我恍然大悟，昨天排长带人巡逻时发现一只无人的苏方小船漂流至我方，回来后他向团部以及边防站报告，回答说已与苏方交涉。想必今天是来领船的。

我冲向岸边，向在江里嘻笑打闹的人们喊道：“快上来，老毛子来了！”

当最后一位浪里好手湿淋淋地上岸时，4条船只已经开始靠岸……跟在我方代表身后上岸的两个人，一个是矮而粗壮的少校，一个是膀大腰圆的中尉。那少校笑眯眯地和大伙儿打招呼，逐个递烟……

寒暄之后，我方人员递过一张表格，那少校在上面写着什么。周围湿淋淋的人们围过来，从他的背后窥视，这可有点不雅。也难怪，尽管一江之隔，也难得一见这些“高鼻梁”。

……交接完毕，那少校笑着与我方代表握手话别。然后过来，把手伸向我们，这可讨了个没趣。

在场的人，除了我方那位代表，都是一脸的“正色”，并

且都极力表现出“愤慨”。那原因凡是过来人都明白。少校一声苦笑，冲大家摆摆手，上舰而去。

舰至江心，即将加速的时候，那少校突然摘下军帽，拿在手里，向我们连连挥动。我方代表冲着我们用近乎哀求的口气道：“我说，你们就招招手吧，太失礼了。”

此言一出，几十只手一下子举了起来，就像是在表决什么并一致通过了一般，大伙连连摆手。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内蒙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责成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全面军管。这也是当时加强战备的一项措施。作为解放军序列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派出部分人员参加了军管活动，兵团党委为此特别发出了《关于坚决执行北京军区前线指挥部给兵团军管任务的决定》。1970年，兵团参加军管的干部、战士经过集训后陆续进驻地方单位，在各级军管会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1971年下半年，兵团军管人员先后撤回原师、团，不再介入地方的活动。

兰州兵团曾承担一项特殊的任务：武装管押犯人。1970—1972年，根据兰州军区的指示，兰州兵团从一、二师抽调了7个武装连编成二师独立营，分驻井儿川、旱平川、红会煤矿等地，负责管理和押送犯人。

1972—1975年，紧张的形势渐趋缓和，再加上知识青年人心思走、生产连年亏损等原因，兵团的军事训练和战备教育走向低潮，基本陷于停顿的状态。

第八章 路线是个纲

政治口号满天飞——“四好”、“五好”压倒一切——
“典型”材料如何出笼——难以下咽的“忆苦饭”——
“家庭出身”的忧惧

一 “天天读”雷打不动

生产建设兵团既是具有战备性质的生产组织，又是“具有特殊使命”的政治组织。这个特殊使命，就是“培养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自不同省份、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生活阅历的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以及原来农场的干部、职工，被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聚集在一起。在一切突出政治的年代里，生产、备战以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凸显“政治挂帅”，强调“政治建军”，各生产建设兵团首先用标语牌和毛主席语录牌把驻地打扮起来，并不失时机地发明了一系列政治口号，借此烘托出热烈的政治气氛。适合青年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往往被总结成套语，在各单位推广使用。例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十八连，用“五个经常化”育人建军，即阶级教育经常化，路线教育经常化，大批

判经常化，抓活思想经常化，办学习班经常化。三师二十团十六连，对新入伍的知识青年采用的是“五大教育”，即“老三篇”教育，阶级教育，路线教育，战备教育，传统教育。此外，还有“四带头”（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头斗私批修，带头搞好团结，带头搞好三大实践）等说法。被批判的东西，也编成套语，如“黑四帅”（利润、奖金、业务、技术挂帅），“三到头”（级别、职务、年龄到头）；“两变”（人变修、国变色），“两亡”（亡党、亡国），“一复辟”（复辟资本主义），等等。其他兵团也有类似的三、四、五套语。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当时首要的政治任务，而“天天读”一度被认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将其安排在正常的作息时间表内，“雷打不动”。云南兵团成立伊始，即号召全体干部战士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规定每天早上上班时先学习一小时毛主席著作或语录再进行工作，每周用半天的工作时间系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每个班一至二周开一次“讲用会”，每个连队一个月开一次“讲用会”；营和团半年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兵团一年举行一次“学代会”。后来为了照顾生产，“天天读”大多改在下午收工后进行。不管一天下来多么劳累，都必须参加学习，否则会被视为不突出政治。“天天读”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外，更多的是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缺点，“斗私批修”，“抓活思想”，等等。除此之外，为了展示“三忠于”、“四无限”，还把当时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也安排在了兵团的正常活动之中。一位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写道：

兵团成立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也就是人们的思想最赤化、最统一、最狂热的时期。每天早操之后，便是

“天天读”的一小时，早、中、晚饭前按常规背诵毛主席语录、唱语录歌及样板戏。要赶上毛主席最新指示或政治运动，则要加班加点了，人人要谈心得体会，个个要记笔记。最苦的要数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战士了，真是逼得眼泪汪汪。“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也真奇怪，一年半载之后，许多小家伙发言，还头头是道呢！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1968年7月北京知识青年到来后，每人发给一枚毛主席像章，一本毛主席语录，一块语录牌，一副挂在脖子上的毛主席木刻像和一个“忠”字牌，称之为“五带”，宣布以后要随身佩带。吃饭前当然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但不久就越背越短。有一次一个连队吃包子，只背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多思’”，就一哄而上，这可能是最短的语录了。此外，集合整队，向右转时要高喊“打倒刘少奇”，向左转则高喊“拥护毛主席”。有个胖大嫂无意喊颠倒了，成为公开高呼反动口号，被定成反革命。

为能经常性地表彰先进，批评帮助后进者，兵团初期把“班务会”也列入了正常作息时间之内，每天各班都要开一次会，由班长总结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讨论存在的问题。开会的时间一般为半小时。班、排和连队还定期举行“讲评会”，总结学习情况，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经常性的开会，很快演变为流水帐，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完全流于形式，所以大多数单位不久即把这种会议与“天天读”合在了一起。

“天天读”主要是自我提高，要起到教育别人的效果，就得采用“讲用会”的形式，也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向其他人宣讲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和工作经验、英雄事迹。小到班、排、连队，大到团场、师直至兵团，经常举办这样的“讲用会”，以起到树立典型、传经送宝、鼓舞士气的作用。有的时候，兵团还集中一批积极分子，到各师、团去巡回“讲

用”。而这些积极分子，又大多是参加过各级“积代会”（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1970年1月，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届“积代会”上有25位典型代表发言，会后这些代表前往各师、团作报告，其中既有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也有知识青年，所讲的内容各有侧重：如三师二十一团参谋长讲“继续革命”问题，六师五十三团五连王副连长说的是“艰苦奋斗，屯垦戍边”的事迹，三师二十三团三连的一名复员转业军人介绍自己如何“养猪场上练红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一师三团六连一位知识青年陈说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只争朝夕练红心，争分夺秒干革命。”有的兵团还用一些因救火等致残的知识青年集体讲用，向听众展示他们的伤脸、残肢，黑龙江兵团十九团就曾举办过这样的讲用会，让一批扑灭山火的上海知识青年讲用，并伴以音乐和演出，起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典型事迹经过整理后，发表在兵团办的报纸或当地报刊上，有时甚至登载在《人民日报》上，继续起教育作用。就这样，我们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兵团的对优秀人物的报导：

西藏农建师……程振英是文化大革命中军垦系统的早期知青典型人物。1965年成立的西藏扎木农建师，是由当地翻身农民、复员转业军人、支边干部和支边青年组成的生产建设部队，1965—1966年，来自北京、河南、山东的近2000名知识青年加入了农建师。程振英是1966年11月从河南参加西藏农建师的高中毕业生。她所到的农场是一个新建场，海拔4000多米，风沙大，气候差，条件比较艰苦，她不怕艰苦，虚心拜工农兵为师，不但过了生活关，还掌握了播种、收割、施肥、灌溉等技术，并学会了赶马车、抡大锤，被人们称为“铁姑娘”。196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前进……记在西藏高原立足生根的女知识青年程振英》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1972年5月10日，《光明日报》以《在喜马拉雅山下生根开花……记战斗在西藏高原

上的女知青吴毓萍》为题，报道了西藏农建师另一位河南女知青的事迹。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70年8月30日，云南兵团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26号文件认真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指示》，表扬了知青中的典型先进人物李镇江、王洪扣等人。当年12月，云南兵团组成197人的代表队参加云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李镇江、罗桂友、邓竹青等知青代表出席了大会。李镇江是1968年2月首批到云南农场的55名北京知青中的一员，因表现突出，很快入了党，并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女知青罗桂友是16团的割胶能手，发明了不伤树、产量高的短弧皮新刀法，经农垦部鉴定后向全省推广。女知青邓竹青是二团四营二连指导员，被授予云南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被选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1973年3月17日《人民日报》以《他在自觉接受再教育——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部二连指导员、北京下乡知识青年李镇江》为题，对李镇江的事迹做了报道。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12月，广州兵团召开第一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表彰先进集体24个、积极分子30名。1971年1月，广州兵团召开第二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4900人，会上表彰了19个先进集体和16名先进个人，林国惠是受到表扬的知青典型代表之一。1968年12月下乡的女知青林国惠，因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广州兵团某团的团党委委员，1972年12月20日的《人民日报》以《志在边疆干革命》为题发表了她的工作和学习照片。

我们不否认这些典型材料大多是有事实依据的，但在说空话、假话盛行的年代里，人为的“拔高”在所不免。曾整理过典型材料的黑龙江兵团六团的北京知青石肖岩对此有很深的体会：

连里头头找我去，说是给司务长整理材料。

啥材料？团里要开“积代会”，司务长要讲用，讲用就要有材料，这还用细问？头头们态度可严肃：“司务长的材料能不能整好，是关系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我们连能不能体现的大问题，也是对你的锻炼和考验。”好家伙，听这口气，我紧张了好一阵。

初时我写了好几稿。怎么写？管家、理财、算帐，一个司务长，倒腾来倒腾去还不就是这个样？可连里头头看了不同意：司务长被描成了啥模样，一笔流水帐。

真让我扫兴，怎么办？想来想去，我翻出了连部柜底的一摞摞旧报纸——找词儿；又跑到营部借来几本军区积代会的典型材料——照葫芦画瓢。我寻思着，那些典型讲用，说他们都靠了“精神原子弹”，司务长看来也得这么写。他理财有方，是想起了“勤俭建国”、“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他想方设法改炉灶，是“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放光芒；他身患肺气肿，还领着炊事班下河套砍条子，那是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你想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司务长一定是这样。

连头那儿总算通过了，可向司务长念叨时，他细听着不言声，末了儿，只说了一句话：“没想那么多，写上合适吗？”

没想到，团里管宣传的头儿们也不满意，“司务长是积代会的典型，不能就事论事，要在路线觉悟上找‘境界’。”

境界？让我好一阵琢磨。司务长是个老实人，成天一身黑棉衣，整个“老屯”的打扮，高高的颧骨，托了个“酒瓶底”，手指捏起个钢崩，得放到“瓶底儿”细瞧，不然分不出个一分、二分。司务长不仅老实，还是个地道的红管家，我们去的那年，他已有10年的“长龄”，处理了不少难事苦事，可一个错没出。选他当积代会代表，那是没得说；可要说

“境界”，我怎么也想不出来。

……在胖干事的屋子里，他拿起稿子看了看，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直楞楞地盯着墙，他真入神了。不大功夫，他缕了一遍，小标题也跟着标出来了：第一，越是艰险越向前，把好社会主义经济关；第二，路线是非分得清，当好社会主义经济管家人；第三，毛主席指示我紧跟，打好农业翻身仗。

“怎么样？”胖干事眯着眼瞅瞅我，两眼里透光，没待我回答，他一巴掌又拍在桌面上，“大标题也有了，就叫——在经济战线上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好关，管好家，打好仗。”

绝，真绝了！我打心眼里佩服胖干事，我真没想到，费了个把礼拜整理的材料，让他三下五除二，一笔点“睛”，把“境界”给找出来了。

先进人物本身并不轻松，他们往往背着很沉重的包袱。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王晓梅写道：

刚到兵团不久，我就名不副实地当上了所谓知青“标兵”。很多人都奇怪过，因为我和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干活尽管卖力，不偷懒，也不比别人多做好多，可是连队、营、团领导却特别注意我的表现，不到一年却几次三番派干事来写材料，挖掘“先进”事迹，在兵团向四川慰问团汇报的材料上，在家乡的《四川日报》上，都出现了我的名字。开始我也不太明白，后来才知道这全是那封信的后果。学校动员时，为说服从湾丘“五·七”干校赶回成都的母亲同意我到兵团，因不敢正视她的泪眼，我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使学校不再考虑我们家庭的具体困难和家长的请求，批准我为兵团战士。后来，这封信又被当作具有说服力的动员材料登载到成都市革委会的《情况简报》上，广为散发。于是我这个

本来默默无闻的女学生自然变成了成都方面和兵团各级重视的对象，成为革命事业需要培养和扶植的“先进典型”。

……保持先进很不容易，时时处处都得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经常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当时特别害怕犯错误，个人当不当标兵事小，可千万不能给党的脸上抹黑，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

兵团后期，人们普遍对这种说教形式不再感兴趣。有些在台上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人，“开后门”上大学或回城。走的人再也听不到“讲用归讲用，回城是回城”的讥讽，留在兵团的人则只能空叹“扎根边疆的都走了，剩下的就是咱这些不扎根的啦”。

二 “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

对于新到兵团的知识青年，“忆苦思甜”是必不可少的一课。所谓“忆苦思甜”，就是邀请苦大仇深的老贫下中农、老工人、老干部给知识青年作报告，讲述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当主人的经历。在忆苦报告之后，按惯例要吃“忆苦饭”。1971年1月26—27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的忆苦活动就是这样开展的：遵照毛主席“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全团从机关到连队，在春节期间，先后用半天时间召开“忆苦会”，吃了“忆苦饭”。各单位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老工人带头引苦，大家共唱忆苦歌曲《不忘阶级苦》。在这次忆苦活动中，全团有57人分别在忆苦会上回忆了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史。参加这次活动的干部、战士、家属有一万余人。

各地的忆苦饭不同，大多数是用野菜、饲料拌上粗粮做成窝

头或糊糊。忆苦饭自然是越难吃越好，每个人都必须吃，因为这是阶级感情问题。黑龙江兵团三十三团知青杜鸿林和云南兵团九团知青杜新春的回忆，使我们看到了吃“忆苦饭”时的插曲：

“天上布满星，月芽亮晶晶……”又来了，对此谁都太熟悉了。在平缓而不悲切的歌声中，有人抬来了几桶忆苦饭，用豆饼和糠麸子包的团子。众人蜂拥而上，会汤大乱。以能吃且吃得多、吃得快为荣，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革命的坚定性。试想如果好吃，何需忆苦呢？可我当时却认为表现的时机已到，抓起来大吃大嚼，不想实在难咽，不得不去找水喝。

在隔壁厨房，不期发现了“新大陆”。一位刚才还有超人之举的上海姑娘正悄悄往泔水缸里扔糠团子，且将嘴里的也吐了出来。回来再看众人，均纷纷起来喝水，水是喝了，可泔水缸也满了……

在离晒坝不远的伙食团旁边，平时用来煮猪草的那口大锅，正在熬着知青们会后就餐的忆苦饭……

忆苦大会结束已近傍晚，各班知青在领导的督促下，各自拿着印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搪瓷盅，挨个去领忆苦饭。连队领导庄重严肃，毫不吝惜地大瓢大瓢地往知青盅里盛，边盛边说：“多吃点，明天干活才有劲”，“忠不忠，见行动……”。唯恐知青们将忆苦饭倒掉，特别规定不准离开会场，互相监督，就地消化。

端着满满一盅黑乎乎、粘稠稠的忆苦饭，腾起的热气令人作呕，扒一口在嘴里，只觉满嘴泥沙乱钻，苦涩、腥臭，分不清是草、是糠、是泥、是沙……屏息囫圇吞下，用知青们的话说：“连死都不怕，还怕吃忆苦饭吗！”一口、两口，干

脆不嚼，顺喉而进。突然，一位女知青惊吓地叫了起来：“妈呀！忆苦饭里咋个有肉？这是啥子？”胆大的知青凑近亮光一看，原来她咬了一口又夹出来的是一条尚未煮烂的四脚蛇，吓得她将手里的碗筷一齐扔在地上，边嚎边呕地朝宿舍跑去。四脚蛇的出现令在场知青翻肠倒胃，未吃完的再也不敢吃了，吃下去的太多又就地吐了出来。有的在一旁一个劲地干呕，老是呕不出来，又是捅喉管，又是抓舌根，一副悲凄的可怜相……明月东升，会场一片狼藉，连队领导满脸怒气……

事后，发现四脚蛇的这位女知青，尽管身体有病，还是被作为考验对象抽调到最苦最累的第一线，将功补过去了。

有的连队，为了体现“思甜”，在完成忆苦饭定额后，再发给人们甜饼、馒头等，形式多样，不一而足。

既然“忆苦思甜”是为了提高知识青年的阶级觉悟，听别人讲不如自己教育自己效果好，于是又有了知青忆苦的发明，由青年人讲述自己的家史。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家庭的知青不难倒出些苦水来，但却难为了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无苦可忆，只能听别人教育自己，还要“斗私批修”，和家庭划清界线，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常搞忆苦教育，实际效果只会是越来越差。黑龙江兵团十四团的北京知青董兰娣后来写道：“从‘天上布满星……诉苦把冤伸’那人人会唱的忆苦歌，到不断的忆苦思甜大会、小会，惯于以情感人的诉苦故事，渐渐麻痹了人们的神经。它已不再是焕发人们热情的动力，尽管它一直是再教育我们的主课。这里，教育者已很难以此自豪，受教育者也并不是永远幼稚可笑。当我们在农村生活了十个年头重返故土时，唯一的收获是：多思多想，再也不迷信了。”

三 争“四好”，创“五好”

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1961年的规定，部队四好连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评比“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曾被视为建军育人的重要措施，自然要被移植到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教育体制中来。由于生产建设兵团与正规部队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原有的标准，所以先后制定了具有“兵团特色”的“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评比条例。例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二、六师分别制定了“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比条件。兵团政治部对3个师的规定加以总合，形成了一个供全兵团参照执行的评比标准：

四好连队条件：

（一）政治思想好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领导全体干部、战士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牢固树立继续革命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斗私批修”，彻底改造世界观。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思想明确，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把连队真正培养成为“三忠于”的战斗集体。

（二）三八作风好

对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做到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坚决贯彻

执行。不断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强调加强革命团结，搞好上下、内外关系。

（三）生产建设好

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提高革命警惕性，用毛泽东思想练好兵。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艰苦奋斗，自立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革命、生产建设、战斗等各项任务。

（四）生活管理好

认真贯彻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带好兵，增强政治责任心，预防各种事故发生。关心群众生活，发扬“三大民主”，厉行节约，不断改善物质、文化生活，保证人员身体健康。

五好战士条件：

（一）政治思想好

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牢固树立继续革命思想。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于“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二）三八作风好

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做到雷厉风行，坚决照办。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革命团结。

（三）完成任务好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坚决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

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的革命精神，加强团结，搞好协作，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英雄气概，多快好省地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提高革命警惕，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四）生产技术好

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认真钻研技术，掌握生产劳动客观规律。敢想、敢干、敢于发明创造，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提高技术、生产水平。

（五）锻炼身体好

……积极锻炼身体，讲究卫生，在“三大革命”中充分发挥作用。

按照这样的标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1970年评出了四好连队、单位98个，知识青年被评为五好战士的有33500多名，占知青总数的44.4%。同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评出了四好连队247个，五好战士37317人，有424人次出席了云南省和军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创造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一时间成为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很多连队开展了“四好月”检查制度，即每月集中一两天，进行月检查，找出差距，以利进步。至于评比五好战士，一些连队为了表扬先进，甚至每周评一次“周五好战士”，以此类推，还有“月五好战士”、“季五好战士”等等。当然，正式算数的是年终评比出的五好战士，不仅全连表彰、发喜报，还要记入档案。

在开展创四好运动中，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有所创新，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结出了“三个深扎”的做法：一是深扎思想第一的观点，二是深扎一分为二的观点，三是在作风上深扎实践第一的观点。1970年，黑龙江兵团在上半年初评中被评为四好连队

的单位占14.5%，评为五好战士的占28.8%，评为五好职工的占10.7%，评为五好家属的占8.8%。

在创四好运动中，各生产建设兵团都组织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这也是从部队学来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形式。一般是一个党员或团员与一名群众结合成“一对”，经常谈话、交心，先进者帮助后进者解决思想问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的李喜武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运动中，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李喜武是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一中68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以下乡知识青年的身分进了临河农场。兵团建立后，农场变成了三师二十一团，李喜武转成了兵团战士。

李喜武生性老实，寡言少语，但干起活来像拼命一样。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并很快被发展成为共青团员。

“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兴起，打乱了李喜武的生活。领导给他安排了一位女性做“一帮一”的对象。她是来自包头的知识青年，名字叫王丽。

“她是我们男知青中背后打分较高的女孩子之一，”李喜武承认，“当时在男知青中虽然心里愿意和女知青接近，但表面上对女知青是不屑一顾的，男女之间的接触常会被当作睡觉前男知青们海吹的笑料。”

李喜武一开始只是应付“官差”，“我们的交往仅限于规定一帮一每周必须谈一次话的最低限度，谈话的内容也仅仅是：我在诚心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她也是向组织表示进步。都是官腔”。

1969年底，王丽的情绪突然大大低落，经常发呆，干活心不在焉。身兼党小组长的张班长，勒令李喜武在一周内摸清王丽的思想。李喜武不敢怠慢，得罪了班长入党就没门了。他约王丽谈话，结果使他大吃一惊。

同连队的郑排长，是一个复员转业老兵，自称28岁，但是在

知识青年眼中，38岁也打不住。漂亮的王丽，吸引了郑排长，他搬出大耳朵副连长做说客，向王丽发起了进攻。17岁的小王丽，顿时没了主意，只能悄悄落泪。

李喜武义愤填膺了，“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傻大黑粗的半大老头子，好像中国没男人了！”他和王丽订了个君子协定，绝不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并采取拖的办法，既不说同意，也不断然拒绝，耗着郑排长，这样谁也不得罪。

连队领导之间的矛盾，使问题更复杂化了。大耳朵副连长告发连长有作风问题，团部派来的工作组，反而把副连长关了起来，罪名是见同志犯了错误还落井下石，搞宗派主义。与副连长关系密切的郑排长，也加入了反省的行列。

工作组的大皮鞋干事，很快抓住了郑排长和大耳朵副连长破坏兵团规定的把柄：居然敢与兵团战士谈恋爱。为了获取罪证，需要王丽向组织“交心”，这个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李喜武的头上。

李喜武把王丽约到车间谈话。为了使王丽渡过这一关，他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郑排长硬缠着王丽固然不好，但也决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他们小声地商量着对策。

突然，车间门开了，大皮鞋干事拿着一支明晃晃的手电走了进来，径直对王丽说：“刚才你说的事我都听见了，希望你能如实向党组织反映。”

“小李，你可以走了。”他接着说道。

天哪，他居然在门外偷听！声音小了，听不清了，就闯进来了。

李喜武离开时看了王丽一眼，只见她脸色灰白，嘴角在抽动。

“那个目光，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李喜武后来回忆道，“是绝望，还是一种受欺骗的怨恨？显然两种都有。可以想象她一定是认为我和大皮鞋干事搞好的圈套，诱她讲出这些事情。我当时想解释一下，而大皮鞋在场我又无法说清。但我知道，我和王丽

的交往到此结束了。”

如此的交心、谈心，造成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帮助”气氛，实际作用不大，所以开展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人们对“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逐渐淡漠，这种活动形式后来终于被抛到了一边。

在一切突出政治的大环境下，兵团的“四好”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政治思想好”被放在了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但是，就像哲学家们在永无休止地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命题一样，在“四好”、“五好”运动中，“一好与三好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谓“一好与三好”的关系，也就是当时全国都在讨论的“红与专”的关系。当时通行的说法是：政治思想好不能代替其他“三好”，但政治思想好必须统帅其他“三好”。这样一句简单的、绕口令式的原则，解释起来实在困难，往往产生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如有人会说，政治思想好，其他“三好”也一定好，否则，其他“三好”不好，怎么能有政治思想好呢？还有人说，“三好”好了，不等于政治思想好；“三好”不好，也有可能政治思想好。

当时一些兵团领导对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提出了异议。如云南兵团副司令员江洪洲曾向云南军区党委写信反映兵团部分单位每周出工5天，每天劳动5小时，第一线劳力占50%。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兼云南兵团司令员）在1970年12月的会议上针对这种“三个五”的现象指出：“第一线劳动力至少要有60%，兵团主要任务是生产，首先是生产队，其次才是战斗队、工作队。要把非生产性人员压缩到最小。天天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指干部）也可以根据情况，雨天集中学，晴天农忙要搞生产。如果稻子烂在田里而不去收，还在按部就班学，这不是突出政治，这恰恰是不突出政治，这是教条主义。我看了江洪洲同志的信，有一个感觉，我们军队干部也好，地方干部也好，有些同志不敢讲生

产任务，一讲就好像是不突出政治了。我看有这种看法的人，恰恰是不突出政治。总理讲了，兵团什么时候扭转了亏损什么时候再开会。”如此明快的说法，虽然一时不能扭转普遍流行的做法，至少表现了领导层对空洞的政治说教和形式主义的政治教育的不满。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军队建设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四好”运动宣告终结。

由于毛泽东曾说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于是各种名目的学习班立刻风靡全国，军队和事事向军队看齐的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经常举办不同类型的学习班。兵团的学习班，一种是为交流经验而设，大凡生产管理、战备教育、知青工作、政治思想及宣传报导工作等，都可举办学习班，集中一批有关人员进行学习和互相交流经验；另一种为解决问题而设，从个人的工作不安心、生活作风不好、偷窃打架、有不满言论，到群体的思想教育、落后单位的改变、亏损企业的扭亏为盈，因人因事，皆可以办班，所以这种学习班或大或小，大到几十人、上百人，小到专为一个人办班。对后一种学习班，当然人们都是不愿意参加的。有的领导就抓住了这种心理，动不动以“办班”来吓唬不听话的下级。

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教育模式，基本照搬当时正规部队“左”的一套做法，正如后来有人评价黑龙江兵团四师的“政治建军”时所指出的那样：

“旧农场”的一套被砸烂了，“新兵团”建立了“新秩序”。1969年3月10日四师第一次党委会便讨论了四师建设的方向问题，认为必须“摆正帅位，举旗抓纲”……于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天天读雷打不动，学习班频频举办，讲用会层层召开，学习毛泽东思想被绝对化、庸俗化、简单化、

形式化了，强调“对号入座”、“改观换魂”……尤其到四好总评时，从干部到群众，人人都要进行“路线爬坡”，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很多干部职工对这一套空头政治的做法有意见，在大忙季节天天读雷打不动，看到生产受影响心痛，提出究竟兵团的任务是什么的问题，以致在师党委会上不得不进行政治和生产、三好和一好的关系的专题讨论。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是讨论不清楚的。在“突出政治”、大批“唯生产力论”的高压下，使很多干部产生了“抓政治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经济险上加险”的思想，不敢放手抓生产。许多老黄牛式的实干家，被指责为“只顾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

四 “支部建在连上”

加强党的领导，做好青年工作，是各生产建设兵团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并突出体现了党团组织的作用。

各兵团组建之后，党团组织很快建立起来。按照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指示，兵团每个连队都建有党支部，连指导员是当然的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一般由5—7人组成，除书记外，还有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青年委员等。党支部成员由连队干部担任，后来也吸收一二名知识青年参加。一般情况下，连队副指导员出任党支部的青年委员，并兼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之下设若干党小组，每个党小组设一名党小组长。

党支部之上，营级机构设党总支，由营教导员任党总支书记，团场以上设党委，政委任党委书记。

连队党支部是党的最基层组织，任务最为繁重。本着“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连队里的一切工作，大到生产、战备，小到评先进、给处分，都要由党支部讨论决定。

由连队全体党员参加的党员大会，按照《党章》的规定是基层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但实际上只是在党员发展时需要经过全体党员讨论和表决，其他事务均由支委会讨论决定后，在全连党员大会上宣布并动员党员起积极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活动，以学习为主。尤其是中共中央、军区及兵团下发的各种文件，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精神，一般先在党内传达和组织学习，然后再传达给全连群众。

作为共产党员，除了能够“先听到中央的声音”外，还要处处以身作则，不但要做青年的模范带头人，还要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在这样的标准衡量下，党支部往往要求党员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每年都进行优秀党员的评比和表彰活动，同时还有支部和党员的总结等活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有一批模范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用他们的行动给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受到兵团战士的赞扬和尊敬。多年之后，我们从兵团人的回忆中还可看到这样的事迹：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三团后勤处副处长池忠义，1969年参加兵团，任四连连长。在营建和生产中，他不但干在前，还能时时关心战士们的疾苦。在一次野营拉练后，他不但给战士们烧洗脚水，还用自己家里的红糖和生姜熬好糖姜水，一碗碗端给战士们喝。任后勤处副处长之后，池忠义负责全团的粮油工作，按说多吃点油、面是经常事，但他从不这样做。同志们知道他有胃病，家属也身体不好，曾给他送去两袋好白面和10斤油，硬是被他退了回来。全团拉煤时，一个司机想用麻袋给他家装点煤，被他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且指出：“我们当领导的应首先考虑群众，不能以权谋私，要近水楼台不得月！”

内蒙古兵团四师三十四团政委尚增和，调来兵团时已50多岁，患有严重的气管炎，身上还带着伤疤。在修建大型黄河扬水站工程中，他带着药坚持工作，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内蒙古兵团一师三团五连连长朱海清，爱兵心切，在全连断粮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与团领导争吵，终于求来了救命粮，但不久即被调走。在当时社会上浮夸成风、只报喜不报忧的形势下，朱连长这种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抗上”的胆量，给兵团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八团某连连长李怀远，在战场上多次荣立战功，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为了将一名患伤寒病的女知青连夜送到团部卫生队去，他冒着风雪独自赶车送病人，不幸马惊车翻，女知青获救，他却献出了生命。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正是因为有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才使共产党员的称号更加高尚、纯洁。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的行为确实令人不齿，官僚主义、独断专行、贪污纳贿、欺男霸女，是他们的通病，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为了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各兵团都曾有过“开门整党”的活动，所谓“开门”，就是欢迎党外群众给党员及党支部、上级党组织提意见，这是响应毛泽东的关于整建党的指示的重要措施。1969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一年，是多数兵团的组建时期，很多连队的党支部刚刚成立，党员和群

众刚认识不久，马上进行“整党”显然不适宜。各兵团采取了灵活的做法，把“开门整党”的时间往后拖了一段时间，放在年底或1970年年初进行，有的兵团到1971年才完成整建党工作。如广州兵团在1969年和1971年分两次进行整党建党，1969年整顿党支部4400个，1971年整顿党支部2773个，新建党支部530个。经过整顿，吸收新党员9500名，劝退和开除出党的有46人。

“评议党员”和给支部提意见，多由党支部组织进行，少数情况下由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主持进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支部书记照例要作最后的总结报告，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等等。在兵团的特定环境内，真正能够虚心接受群众批评的党员和干部并不多见，多见的倒是对提意见人的打击报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穿小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团的“开门整党”，可以说是当时整党工作的缩影。1970年1月底开始的“开门整党”，进行了20多天，学习文件、思想整顿等用了两个星期，真正给党支部提意见仅仅安排了两个半天。某连指导员在整党动员大会上代表党支部表示热烈欢迎全连广大群众给支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不要有顾虑，保证绝不打击报复。指导员欢迎同志们首先向他开炮，并声称如果有打击报复行为，请向上级党委揭发检举。连队的知识青年认真地给指导员和党支部提了一些意见：如连队向上级报喜不报忧，虚报成绩；指导员工作作风简单粗暴，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一个人说了算，不尊敬少数民族，爱占小便宜等；本连的党员从他们来兵团后的表现看，没有几个符合毛主席提出的五项党员标准的，军医对病人不能一视同仁，复员转业的“老兵”称王称霸……有几位知青觉得给党支部提意见的时间太少，没有尽情发表意见，于是又专门写了一封意见信。面对来自群众的批评，指导员坐不住了，他与一些老兵策划后，很快指使党员骨干分头活动，搜集一切对连领导不满的言论。最后指导员的整党总结，使全连知青大吃一惊：我连整党中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主

义，写意见信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按照连里规定的组织系统提意见，而是打破班排界限，私自结合写小字报，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参加写信的知青都被点了名，一位女生排长、团里有名的积极分子当时就被免职。连队的黑板报上还出现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的口号，知识青年敢怒而不敢言，一切又恢复到了整党前的老样子。

支部和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当时颇受重视，报刊上常有介绍基层党组织抓好一班人建设的典型报导。实际上，生产建设兵团人员复杂，不但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有矛盾，军队干部之间也时有磨擦发生，连长和指导员互不相让的情况，在各基层连队普遍存在。

五 共青团——做好党的助手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学校的共青团组织纷纷瘫痪，红卫兵组织一度取代了共青团的地位。各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后，把建立共青团组织和开展共青团活动作为青年政治工作的首要步骤。在学校已经加入共青团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生，并且出身比较好。他们不仅很快成为班、排骨干，并作为党组织倚重的力量，在建立和扩大团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兵团每个连队都建有团支部，团支部书记一般由党员担任，由党支部指定人选，其他成员由团员选举产生。除支部书记外，团支部还设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文体委员等。支部下面设团小组，一般是每个班成立一个团小组，选举一名团小组长。团支部之上，亦设团总支、团委。

团支部作为党支部的“左膀右臂”，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如组织团员学习，做团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出墙报，开展文体活动等等。兵团初建时期，政治因素第一，生产和战备无不打上政治

的烙印，团组织要做好党的助手，自然是坚决、迅速地贯彻执行党支部的各项重大决定，所以很少有自己的独立安排；即便安排少量活动，也都是非政治性的赛球、拔河等体育活动。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叫“活泼不够，严肃有余”。几年之后，年轻人逐渐成熟，团支部的组织活动亦慢慢向多样化发展，除了仍按党支部的要求安排政治学习和进行一般性的生产动员外，加进了科学知识、业务知识学习的内容，有的地方甚至由知识青年自己办起了夜校；恋爱、婚姻等问题，也成了团组织可以涉足的领域；适应青年的文体活动，更是大力开展起来。兵团后期的连队生活，在政治控制渐趋淡漠后还有一些生气，主要就是由团支部组织的一些活动维系着。

发展团员，当然是团支部最重要的任务了。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初中毕业生，团员比例很低，所以对每个团支部来说，组织发展的任务都是很繁重的。新团员的发展，一般先由团小组提名，支委会讨论后，交支部的全体团员大会表决通过，报上级团组织批准。

入团也要讲究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早期发展团员标准较高，尤其注重家庭出身，有些人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始终不能加入团组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共青团干部，对一个总不能入团的青年十分同情：

无休止的批判会、学习会、讨论会，献出我们旺盛的政治热情和聪明才智；“学大寨，赶大寨”、“扎根边疆，铁心务农”，全然不顾客观实际效果；“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穿着打扮讲究了，甚至会遭到批判。如果说这是一种盲目和幼稚，那么，当一个要求上进的青年，因背上出身不好的包袱，始终不能被吸收入团，那就不止是啼笑皆非的事了。

小唐就是其中的一例。至今，我忘不了她那期待而不解的目光。

她是68届高中生，重点中学出来的，写得一手好文章，连里哪次大批判都离不了她。人又积极肯干，按说入团应该不成问题，可她的家庭成分是“资产”，因此几次讨论她的入团申请都搁浅了。人们对她没什么可挑剔的，只是一次次要“考验考验”。

这一考验就是几年，转眼她将满25岁。记不得又经过了几个“回合”，舆论终于趋于一致。团支部委托我，找小唐谈话，谈她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的认识。

争取了若干年，终于得到了谈话机会，小唐动了感情，望着年长我几岁的她在我面前流泪，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种渴望被接纳，又无法摆脱政治动因所左右的复杂心情，我想我能够理解……

看来一切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不料小唐的25周岁生日到了，指导员打电话向团里请示，组织股答复说“可以报上来”。于是工作抓紧：填表，审批，“关”、“坎”一一通过。可谁知材料上报不久被退了回来。组织股长还大为光火：“乱弹琴！超龄了还报什么报？！”一切不容辩驳！一切不可挽回……

我总觉得是件憾事，对小唐来说，更是一生的憾事！

兵团后期，发展团员的标准越来越松，凡适龄青年，只要表现说得过去，大多数都被发展成为共青团员。但每个连队都会有几个知青，因为家庭出身或其他原因，如谈恋爱、打架、外出超假、逃跑回家等，给干部、群众留下了“坏印象”，虽然后来努力不懈，但依然长年被关在团组织的大门之外，被视为“后进青年”。为使他们能够加入共青团，一方面要鼓励他们不要泄气，继续努力；另一方面要做团员的思想工作，逐步改变以往的偏见。不

少所谓“落后青年”，后来都在兵团加入了共青团。内蒙古兵团三十五团分管青年工作的政治处组织干事保存了1975年8月团代会上的一份发言稿，是一位兵团战士关于“我是怎样由一个后进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的”的自述：

1971年5月，正当我要走上邪路，被坏人拉下水的时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兵的解放军同志来到我们这里。说实话，我那时报名参加兵团，也是出于和家里赌气来的。对怎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从没想过。所以，一来兵团看到这荒无人烟的碱滩和席棚，就后悔，想起家来了……

我特别反感的是，白天干一天活，晚上还要学习、点名，早上还要出操。这哪有在家时，下班看电影、压马路耍得痛快呀！越想越觉得在这里呆着没意思。于是，我和几个青年商量往家跑。第一次是个晚上，因为路不熟，又刮大风，我们转了向；第二次没走多远，就被班长发现，把我们叫回来。我还是不死心，顶多是回来作个检查呗！第三次，我们终于跑回了家。回到连队以后，领导和同志们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我严重警告的处分。当时，我很不服气，满不在乎，一直发展到结伙打架，我又受到行政记过处分。从此，我也就在全团出了名。我真感到抬不起头来，心想，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正当我感到走头无路的时候，领导和同志们都来热情帮助我，看不出一点瞧不起我的样子。指导员杨青山同志多次找我谈心，同志们也鼓励我好好干……

思想改造不是一劳永逸的。一个后进青年要赶上先进行列，也要经过很多曲折斗争。后来，我得了肺结核住了医院……当时团里刮起了无政府主义的歪风，私自回家的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有的同志给我吹点冷风，我的思想也动摇

了。反正在连队也不能劳动，干脆回家算了。因此，未经领导批准，又回家住了两个多月。

从家回来以后，我的情绪很低沉。一些说我过去是“假积极”等风言风语的话，也传到我的耳朵里。就连过去曾帮助过我的同志，有的也泄了气，说我是“出了窑的砖，定了形了”，再变过来也不容易。我自己也感到失去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这时，指导员又找到了我，问我的身体怎么样？思想上有什么想法？并肯定了我过去的成绩，诚恳地批评了我私自回家的错误，耐心地帮助我分析重犯老毛病的原因。

经过团组织较长时间的考验，我于今年4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和幸福。我由一个后进青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这完全是领导和同志们耐心帮助的结果。

在知识青年如此集中的地方，加入共青团已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政治要求，甚至被视为在兵团工作好坏的基本标尺，所以当有的战士离开兵团时，尽管以前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加入共青团，临行前团组织大多要将其发展为团员，说穿了，就是送上一顶共青团员的帽子。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的一位知识青年感慨地说：“我所在的连队是个有六七十年历史的老屯子，在北大荒，够得上用“悠久”二字形容了。知青在那里，绝对是二等公民，接受再教育嘛。别说连头儿，就是排头儿，正职多半也是贫下中农老职工，支委里的知青纯粹是“结合”进去的。再说我本人当时连党的边也没有摸着，就连团票还是困退返城的调令下来后追发的。”

到离开兵团时，毕竟还是有些知识青年戴着“白丁”的帽子。他们往往带着沉痛的心情离去。有一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女知青说了这样一句话：“凭着我在兵团下了这么多年，最后连个团都入不了，这就是兵团给我的一切！”

团组织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把优秀的共青团员推荐给党组织。在评选优秀团员的基础上，向党支部推荐党员发展对象的做法，曾一度在建设兵团的不少团场、连队盛行，但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党支部往往有自己的看法，被推荐上来的人未必是理想的发展对象；同时，这种做法还容易造成团员之间的矛盾，在“积极争取上进”的浓厚氛围中，评不上先进还会有人玩命，更别说推荐党员发展对象时落选了，意想不到的事例时有发生。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入党呢？

六 入党与提干

党支部除主持日常工作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发展新党员。发展党员，必须在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营级建置由党总支批准，无营级建制，则由团党委批准）。

兵团组建时，现役军人绝大多数是党员，复员转业军人中大部分人也是党员，所以各兵团均把发展知识青年入党作为组织发展工作的重点。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中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年4月14日），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党员的标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 （一）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 （二）为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 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 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1973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的要求只加了“批判修正主义”，其他的与“九大”时所做的规定完全一样。

虽然在各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发展”中都要学习新党章的这些规定，但在实际发展工作中，最先被吸收入党的知识青年往往具备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好、干部或者积极分子等条件。

文革初期盛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虽然遭到了否定，但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出身”始终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首要标准。发展党员时，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的知青往往被优先考虑；知识分子、职员出身的人一般不在党员发展的范围之内。最复杂的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有些人的父母在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他们就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对所有出身不好的人的一种较为婉转的称呼）；可是一些人的父母后来又被“解放”了，于是他们又随之升为“红五类”，而另有一些人的父母，最初是“革命干部”，后来随着文革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他们被定为“5·16分子”或“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这些人的子女就被打入另册。所以对于“革下”出身的知识青年的入党问题，许多人抱着“等”的态度，等到有了定论再考虑。至于出身不好（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的人，除极个别者，付出几倍于他人的努力，被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

典型吸收入党外，其他人几乎毫无入党的希望。对于“出身”的定义，各地亦不太相同，有些地方要查“三代”、“四代”，以“祖父”、“曾祖父”的成分定出身，可怜许多人连祖父母的面都没有见过，就受其牵连而低人一等。黑龙江兵团四十二团知青周禹鹏，有过这样一段痛苦的经历：

“吐故纳新”开始了，我所在的连队派驻了工作组，一方面“吐故”，清除所谓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分子，一方面在群众中，特别是对贫下中农“纳新”，推荐新人入党。

我是机务排的学员，就当时的条件，机务排属“要害”部门。排里的老职工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知青中挑选进机务排的，也都是工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唯我例外，因为我父母是教师，母亲还是民主党派人士。我行前，他们都尚未列入“牛鬼蛇神”之列，承蒙连首长掌握政策，我也居然进入这样一个“要害部门”。

一连几天几夜，全排人员在工作组指导下，认真推荐人选。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和哈马烟的浓烟迷雾中，被提名者红光满面好不春风得意；未被提名者有的愤懑不平，有的倒也不在乎。更有自知不合格者，则早已躲在暗角中倚在热乎乎的炕上闭目养神。

提着提着，不知是谁提出了我，理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独养儿子，家庭条件很优越，居然积极报名到边疆，能吃苦，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可以推荐入党。

几条理由一说，倒也通过了，一时我心里热乎乎的，说实在的真可谓诚惶诚恐，感谢党的政策，感谢贫下中农的信任。但是，几天后，在正式宣布的“纳新”对象中没有我，只

有两位老职工。我的心很平静，因为我得到提名就是“殊荣”了，没有批准说明我条件不够，继续老老实实做人，认真真接受“再教育”是了。

春节到了，时尚贫下中农邀请知识青年先吃“忆苦饭”再吃“幸福饭”。我也受连长、一位刚“纳新”的共产党员之邀，先在他家的炕头上吃了几个糠团子，就接着对杯喝酒，畅谈“革命带来的幸福”。也许是酒喝多了，连长竟忘了党的纪律，带着神秘的脸色问我：“你知道这次纳新为何没你？”我诚恳地说：“那是我条件不够，还要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更加神秘地凑近我的脸，喷着酒味说：“不，不是这么回事，是你的出身问题。”

出身？“我出身职员啊？”“不，不对，你不是出身职员，你出身富农，你隐瞒了家庭出身，对党不老实，所以没有被批准。”

我仿佛掉进了无底的黑洞，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再也看不到前途，我哭倒在炕上，哭肿了双眼。

第二天一早，我勉强睁着红肿的双眼，在雪野中奔跑了15里路，赶到邮电所，拍了一份电报到家，内容是：“速告家中情况和我的家庭出身。”

若干月后，父亲的回信来了。他告诉我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已被清进“牛棚”里，失去自由了。他还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家小镇布店的职员，在父亲10岁时病故了。是我的曾祖（他倒是一个富农）抚养大了父亲。他要我相信他的一生是清白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去怪我从未见过面的曾祖、祖父吗？谁能想到这里的出身要“查四代”呢？！

各连队人员的家庭出身，一般由连队干部掌握，虽然不予公

开，但大多数人是彼此清楚的。个别地方甚至有公布全体人员家庭出身的做法，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四团的一个连队，就在一次全连大会上由连长一一公布了本连知识青年的出身，一位女知青对此发出了“重负难挨”的叹息：

会场静得出奇，那“成分高”的知青心里都在打鼓。连长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清查阶级队伍？知青里也能挖出个漏网地主吗？“工人”、“贫农”瞪着不解的眼睛，“富农”、“地主”垂着头，就差寻地缝钻进去了。还在痴痴发呆的我，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王桂萍，资本家。”

天哪，为什么今天要坐在第一排，前面连长的目光如剑，背后人们的眼神像刀。我脸上发烫，头上滚下汗珠，全身燥热，眼睛盯着地上，不敢再抬起头来。在那一刻，我反复地背着“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语录。想哭又不能哭，想跑出去又不敢动。连长又说了些什么，再也听不到了。

我可是主动报名到黑龙江的啊，那时67届毕业生还没开始分配，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再者我怎么成了资本家的子女呢？分辩是没用的，就从那天晚上起，我真的就像是变成了“资本家”，身份一变，也就自然比常人短了半截。到武装排扛枪是没门了，甚至离开连队外出去劳动，连队也总要选“历史清白”的知青。开始我还不知趣地找连长、指导员争取，表示自己的决心，后来就干脆一切事儿都回避，躲得远远的。同来的知青私下里跟我谈，为我抱不平，可谁又能从根上解决问题呢？

我真的变了。变得孤僻、冷漠、倔强。从早到晚一个人闷头劳动，晚上早早就睡，见人不打招呼不说话，有时一连多少天也说不上几句话，乃至感到舌头也转动迟缓了……

“要想入党，先当干部”，是当时各兵团的普遍现象。由于各兵团很快选择了一批知青当班、排长，团干部又是一色的知青，他们在生产上和各项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自然成为党员发展的主要对象。任用干部，家庭出身也是主要的尺度，其次才是个人的能力。

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工作积极肯干，吃苦耐劳，和群众关系好，积极靠近党组织（经常找党员谈心，写思想汇报等），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个人表现好”。实际上，还应该加上一条——和领导关系好。在一个讲究“绝对服从”的准军事组织里，不听领导的话，甚至与领导“对着干”的知识青年，是很难入党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女知青宫异娟对自己的入党经历有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毕业生分配政审表》一行铅字映入我的眼帘。往下看，“学生姓名：宫异娟……”是我的政审材料！这怎么能给本人看呢？我疑惑地望着指导员。“是组织上让你看的，看完咱们有事要谈。”不祥之感袭上我的心头。

“学生家庭出身：革命军人。父亲本人成份：漏划资本家……”我的心跳明显加快了。在那占了近半张纸的“历史问题及现实表现”栏中写着：“本人成份为漏划资本家，却长期隐瞒，伪造历史为工程师。海外关系复杂，当过日本特务，参加革命后一贯表现不好，平时所交往的人没有好人……”

我的头“嗡”地胀大了，手也因痛苦和气愤而微微颤抖。指导员看出我情绪上的变化，他似乎很得意，继续慢慢地在小屋里踱着轻松的步子，一字一顿地说：“现在你总该明白，上个月支部大会能讨论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尽了多大的努力呀，我以为你会领我的情，听我的话……”

一个急转身，他直视着我，目光更加冷峻：“可我想错了，你跟我离心离德，和我对着干！”

不错，我确实在和他对着干。

我当过连部文书，如今又是女排排长，工作关系平时出入连部较多，加上我总有“习惯动作”，往往不喊报告推门便入。就在这间小屋里，我曾多次冷不丁撞见指导员调戏女战士。……良心告诉我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保护无辜的姐妹，于是我向团党委告了他一状。如今，这“反作用力”，在我入党的问题上爆发了。

指导员踱到我身旁，脸上出现了笑容，口气也缓和了许多：“我知道，你入党的要求是很迫切的，各方面的表现嘛也很突出。可你想想，就凭这张政审表，报上去团里哪会批准呢？我很愿意帮助你。只要你写封信，说你前些天告我的那些话都是道听途说，我就把你这份政审材料从档案里撤出来，亲自去团里为你办理审批手续，让你顺利入党。否则嘛恐怕你……”

记不得我是怎样离开那间小屋的……难道我真的屈服吗？我能为保住自己入党去说昧心话，置姐妹们的命运于不顾吗？良知对我说这绝不可能，也绝不应该。那样做即使我入了党，心中也会留下终生抹不掉的耻辱！可是不屈服后果会是怎样呢？那份深深嵌入我心里的政审表告诉我，自己恐怕这辈子与入党无缘了……我哭着，想着；想着，哭着。还好，泪水没有白流，我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不向邪恶屈服的道路。我知道，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的路。

四个月后，连长很遗憾地通知我，由于找不到我的档案材料，手续不全，团党委没有批准我入党……又过了几个月，连长找我谈话，才使我明白了其间发生的一切。

原来，指导员见我不接受他的交换条件，便把我的档案

从连部柜子里取出，藏进他个人的箱子里，我的入党审批就这么黄了。

但不久，指导员的问题终于败露。他精神过度紧张，得了癔症性偏瘫住进医院。连干部为他取换洗衣服时，无意中从他的箱子里发现了我那份“丢失”多时的档案。真相大白，他不得不如实交代了问题及对我要挟、报复。

连长代表党支部表扬了我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精神，也肯定了我锻炼自己、经受了组织的考验。他通知我，下周，支部大会将再次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他和副连长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

兵团发展党员的程序与部队相仿。首先由党支部确定出“重点培养对象”，然后指定党员与其进行一对一的联系，在工作中重点加以培养，并对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发公函进行调查核实，对个别家庭情况不清楚者，甚至派专人去外调。待条件成熟，由党小组提名、党支部认可后，提交全体党员大会讨论、表决，半数以上党员通过以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上级党组织对于党支部报上来的名单，绝大多数都会批准；有时也会发生驳回的事情，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的身上，其原因不外乎有些人还需要更长期的“考验”，或者对一些家庭背景不太清楚的人，还要进行“内查外调”。不少人有填写过两三次入党志愿书的经历。

文革中盛行“火线入党”，在兵团也不例外。所谓“火线”，泛指大的考验机会，例如：一次较大的政治运动，水利大会战，“生产开门红”，野营拉练等等。每次“火线”后，都要集中发展一批党员，以造声势。

可以肯定地说，在兵团入党的人，绝大多数是苦干出来的，有

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对有些人来说，入党没碰到什么人为的阻力。但大多数争取入党的人，都曾碰上“端正入党动机”和“接受党组织的长期考验”两把大尺子。所谓端正入党动机，就是要不存任何私心杂念，批判“入党做官”思想的流毒，在自己身上找不能加入党组织的原因，不向组织提出非分的要求。至于接受组织的考验，则更是多方面的，不但要吃苦耐劳，还要事事小心，不能犯错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团糖厂的一位天津知青，任排长期间，曾三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第一次由于伯父的问题没搞清楚而失效；第二次因私自在生产时间带领全排去看新电影，被视为没有经受住党的考验，入党问题“搁浅”；第三次则因招工离开了兵团，虽然已经填了表，党委却没有批准，原因是扎根边疆思想不牢，没有经受住考验。黑龙江兵团五十一团的女知青孟丽茹，虽然有虔诚的追求，还是被关在了党组织的大门之外，她回忆道：

父亲曾是伪满警官，叔叔又当过国民党党员、日本翻译，可当时我要求入共产党的心情却是那么迫切、那么虔诚，这是为什么呢？

我是第一批报名下的乡。一个多月以后，开始组建兵团。一些青年因家庭问题没有批准成为兵团战士，我不但被批准为兵团战士，而且还当上了畜牧排排长和团支部副书记，激动得我连夜写了入党申请书：“……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长眠在狼牙山下的勇士，那延安烈士陵园中的一排排墓碑，我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每天下工回来，我都要学习毛选或看报纸，在第二天早上“天天读”的时候，向畜牧排猪舍、牛舍、马厩、鸡舍的同志们宣传。那时，同志们是多么支持我的工作啊，每天干完份内的活，又毫无报酬地加班运石头，自立更生垒猪舍。垒

完猪舍也不歇一会儿又去种猪饲料……大家争先恐后地干，可我为别人考虑的却很少很少，后来，学毛选也成了我寻章摘句教育别人的材料。一天晌午在地头吃饭，我见机车排的一位老职工少交了一半的饭钱，我竟当着全连人的面狠狠地教训了他，弄得他十分难堪。他家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我本应该替他交上，过后再找他谈谈就是了，可我当时还以为这是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呢。

深秋的一天下午，放牛回来，副指导员叫住我：“你下乡怎么不告诉你父亲一声呢？他到处打听……”我已经三年没见到父亲了，可我是下了决心不告诉他的，我要和他划清界线，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啊。

没过几天，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当着别人的面，我没敢拆开信。午休的时候，我一个人躲在马厩的火炕上偷偷地看，父亲的信中寄来了一份盖着公章的证明：“经组织调查，旧社会无民愤无血债”。父亲解放前本是个教员，被调去受训三个月就去当警官，没过半年长春就解放了。我将证明保存起来没敢交，怕指导员再问这是哪弄来的材料……

晚上，我打开毛选：“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我决心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于是，父亲的信我一直没回，每天只是拼命地干。终于，我被评为五好战士，又被选为团的师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可是一批批的党员却没有我。我坚决表示要准备接受20年的考验。

20年后的今天，我仍未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但我并不难过，因为今后还有时间争取。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孝敬父亲了。当我和他分别4年后再去见他时，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女知识青年，确实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但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她叫李碧秀……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她去云南时，朴实敦厚的父母一再叮嘱她：一定要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小李到了农场后，一直非常认真地磨炼自己，从不叫苦叫累。她很快就写了入团申请书，恳切地让团组织考验她。一晃两年过去了，在她准备回成都探亲前夕，入团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临走时，指导员对她说：希望你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回到成都后，和家人朋友团聚，小李好不快活。妈妈每天好菜好饭款待，倾尽家中所有，恨不得让馋了两年的女儿尝遍所有美味。一晃假期快满了。那时，几乎每个知青都要寻找种种理由超假，实在舍不得离开父母，离开温暖的家。可是天真的小李却对爸爸妈妈说，我不能超假，我刚刚入团，要经受得住组织对我的考验。

买回火车票这一天，妈妈觉得女儿脸色有些不大对头，她说不要紧，只是有些感冒。可妈妈摸摸她的额头，感到发烫，于是劝她把票退了，等病好了再走。小李执意不肯，一定要按时回去，还说轻伤不下火线。家里人见拗不过她，只好送她上路。

从成都到勐定，一天一夜的火车，整整四天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小李的病越来越重，一路发着低烧。五天五夜后，车到了勐定坝，还未到站，小李就已支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同伴怀里。

同伴们把小李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由

于拖得太久，医生想尽办法也没有挽留住小李的生命。天真烂漫的小李就这样怀着一个虔诚的心愿走了。她向连队党支部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但这答卷却是用生命换取的。

在文革期间，党内根本没有多少民主，在党员的组织发展中同样存在较严重的长官意志。在领导的授意下，一些不够党员标准，但和领导关系好的人被吸收到党内，在兵团后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难怪在兵团战士中，流传着“既要会干，又要会拍”的说法，有些人甚至通过请客送礼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入党的目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知青邓波对一个连队的实权人物吴队长的评价很有代表性：“有些知青‘心甘情愿’地送他20斤菜油，入党问题便可顺利解决；送他10斤腊肉入团也好办；送他一架半导体，可换个‘靶眼儿’工作；送件的确良，犯错误可免于处分……”

到了兵团后期，个人才能和文化修养逐渐受到重视，虽然仍然讲究家庭出身，但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已不再被视为不好的出身，出身于这些家庭的人可以被发展入党，但绝大多数出身于“黑五类”的人，依然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

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干部管理权限不同。兵团和正师职以上的干部，由中央军委任免；副师和正团职干部由所属军区党委任免；副团职干部由兵团党委任免；正、副营级干部和正连级干部，由师党委任免；副连级和排级干部，由团党委任免。

每个兵团都提拔了一批“知青干部”，即任命知识青年担任副连级以上的干部。他们是国家的正式干部，按级别享受干部工资及其他有关待遇。各兵团的中后期，连队的副职干部大多由知青担任，有的知青被提拔成正连级或营级干部，其中个别优秀者，甚至担任了团或师的领导。选拔知青干部，在当时被视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得到了各建设兵团的重视。

用知青干部来管理知识青年，有时还可以起到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起不到的作用，化解一些矛盾，这也是大量培养和使用知青干部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在选拔干部时会经常被提到。这些条件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具体运用，主要掌握以下几点：第一必须是党员。第二是家庭出身好。提干对家庭出身的要求，比入党要严格，不仅要审查“三代”，而且还要审查直系亲属和非直系亲属，家庭出身稍有问题，提干的可能性就几乎没有了。第三是本人表现好，工作能力强。此外，还要考虑群众关系及被提拔者与领导的关系。

正是用这样的条件，各生产建设兵团在组建后马上就发现人才、树立典型，提拔了一批知识青年干部。我们在北疆和南疆都能看到几乎相同的情况。

干部有干部的难处，最需要的群众的理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的天津女知青王鲁庆，是兵团提拔的知识青年干部，曾担任过团副政委的职务，她指出：

我是1968年来到兵团的……自从到了兵团我就总想自找苦吃，想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想做最艰苦的工作。在连队，我曾因战备紧张主动要求过调到边陲的武装连队，我曾带领全团唯一的女子伐木连到过兴安岭。一种理想化的东西成为我精神的支柱。

我工作认真，无论干什么我都想努力干好。这种认真在兵团的创业期间容易成为楷模，那时的知青都有献身边疆的热情。在兵团困难时期和发展时期认真也能被理解，那时的兵团战士还有很浓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但在后来，当我担任团副政委并分管“知青病退”工作时，“认真”被人非议，甚至遭到一些老同学老朋友的怨恨……为此我也曾十分苦恼，

总在想：我理解他们，可他们为什么不能替我想想，理解理解我呢？我也是知青呀。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知青干部任亚平，对当干部也有很深的体会：

在团部转了一大圈，参谋干事都干了干，兵团即将撤消前，我又回到了连队，先当连长（工业团也叫车间主任），后兼指导员（也是党支部书记）。团结好一班人，带领全连搞好生产不是件容易事。动员会、誓师会、大会战，是当时兵团企业管理和指挥生产的主要形式，常常是一天跟两班，革命加拼命，身体累一点，但熟悉了生产，联系了群众，取得了发言权。兵团后期，人心思走，开会学习，开展思想工作，难度很大。但上面的文件、会议，安排很多，都是要求人员、时间、内容三落实。怎么办？我想起了学知识讲历史。一部中外史，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统一融为一体，经济学、唯物论、辩证法都融集于一身。一有时间，我就翻资料，剪报纸、记卡片、抄笔记，然后归类分题讲给大家听。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大家坐得住，听得进。我呢，积累了知识，锻炼了口才，以后当政治课教师，做团的工作，讲点什么就不大发愁了。

当时，发展党、团员和提拔知青干部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单位政治工作好坏的标准，所以不少单位对组织发展抱有极大的热情。知识青年入党、入团、提干多的团场，常被树为典型，并介绍经验。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有3400多名知识青年，1968—1972年，有1272人人团，132人人党，126人提升为排以上干部，48人被推荐上大学。团党委因此受到表彰，他们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培育新人的经验，被登载在1972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毋庸置疑，生产建设兵团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并且选拔了大批的知识青年干部。我们从当时的各种报告和后来的论著中，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数字。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按照1975年年初的统计，在10万知识青年中，一共发展党员6524人，团员40439人，有1262人被提拔为干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39万知识青年，至1973年，已有1.3万余人入党，11.8万余人入团，1.2万人担任了基层领导和各级机关的工作。截至1975年兵团体制改变时，提干的知青有5000余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接收了16000名四川知识青年，至1972年，已有13人入党，1658人入团。其中有一位成都原三十九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离开学校时还是“群众”，到兵团后5个月入团，11个月入党，可谓快矣。根据1973年的统计，云南兵团从知识青年中提拔营职干部1人，连职干部529人，排职干部1567人。1974年云南兵团撤消后，原兵团党委做出的4年工作总结，列举了发展党、团员的数字，共计发展党员9060名，其中半数以上是知青；发展团员22488人，绝大多数是知青。广州兵团的11万知青中，有2739人入党，35400万人入团，66人担任师、团党委委员，11人担任团职干部，1329人担任连职干部。需要说明的是，各生产建设兵团撤消之后，在知识青年中发展党、团员的工作依然势头不减，以上列举的数字，只表明了兵团时期党、团组织发展的情况，不能作为所有兵团知青的政治情况来看待。

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教育，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应该承认，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中，虽然很多事情是黑白颠倒的，但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总比完全散乱无章要好；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毕竟从知识青年中培育出了一批党员、干部，并使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有了加入共青团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新的一代人不仅发现了

“适者生存”的奥秘，还知道了独立思考的价值，真正地成熟起来了。过多的政治说教虽使他们厌烦，但需要的时候，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大道理，足可以使经验丰富的老政治教员大吃一惊。如果说有人说经过兵团的政治教育之后，头脑里还是一片空白，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至少它把政治经验传授给了所有的人，虽然这是不自觉的。而这种经过扭曲、变形的政治经验，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其正负作用是难以估计的。

第九章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政治运动紧锣密鼓——严酷打击“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抓“台湾特务”——知识青年中的“裴多菲俱乐部”——“上书人”不被理解——与“反潮流”小學生的较量

一 “大批判”开路

按照中央的规定，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政治运动，自己内部也不搞运动。生产建设兵团在不介入地方的运动上与正规军队一样，但在兵团内部则要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城市知识青年，所以也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运动方式，不能完全照搬地方单位的一套方法。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政治气候下，主持政治工作的人往往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生产建设兵团在这方面有着同样的政治运动模式。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人进行大清理，并做出处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大批判”的厉害，因为它不仅要触及被批判者的灵魂，还极可能受皮肉之苦；更要命的是一旦被大会小会批判，马上“入了另册”，跌进十八层地狱，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受到极大的摧残。

生产建设兵团既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加入兵团的人大多经过“政审”，本无多少“阶级敌人”可批判、斗争，但为了表明阶级斗争的纲抓得紧，必须有极强的政治嗅觉，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批判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合，目的是要从革命队伍中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去。批判、挖肃的对象，首先当然是对准被兵团接收的原农场、工厂人员，因为他们不像现役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知识青年那样成分单纯，而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尤其是有些人本身就有劳改释放的背景。兵团组建之后，一般是先对原来的国营农牧场的工作做出政治评判，实际上就是批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原东北农垦总局等单位的评价是这样的：

生产建设兵团是在国营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过去，很多农场都推行了一条见物不见人、突出生产、突出技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设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原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各农垦局、分局以及所属农场，长期以来，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领导权，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直到现在，有的人还在那里大搞“物质刺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形成了一个雄厚的社会基础。这个机构无恶不作，如不砸碎，所谓兵团组建就是一句空话。

在这样的评估下，原有的农场干部、技术人员大多数被“下放”或被送进各式各样的学习班，甚至受到批判。1968年12月，

黑龙江兵团党委根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全省开展反右倾运动的决定和潘复生（省革委会主任、兵团政委）的指示，提出“要把反右倾贯彻到斗、批、改的全过程，深入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当时各师刚组建不久，各团正在筹建，都不得不紧跟这一部署，召开反右倾大会，举办反右倾学习班，揪“漏网走资派”。各级干部集中食宿、学习、劳动，人人过关，个个受审查，有的干部刚刚“解放”又被打倒，大部分干部靠边站，仅四师就在反右倾运动中揪斗干部756人。各师还以突击提干来解决干部奇缺的矛盾，有的单位竟把非党群众提拔为政治指导员，并由此形成了干部的大换班，各团新的组织机构在反右倾的高潮中诞生。1969年2月，黑龙江兵团党委又向各师部署“清理阶级队伍”，要求各团召开7—10天的大会，全面发动，于是对干部、职工又来了一次政治大清洗，四师被揪斗人数达1995人。到1971年夏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已成立三年，原东北农垦总局和省农垦厅所属的近3万名干部，尚有7000余人在各种情况下继续受到批判。

其他兵团的情况也是如此。被兵团接管的单位，一批新的“牛鬼蛇神”很快被抓了出来，成为大批判的活靶子。罪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除了现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外，还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流氓，等等。这些人往往交给知识青年看管。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义愤”，知识青年常有一些过激的举动，使得当事人在多年后还会带着深深的内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二团知青石予民回忆道：

挟着“文革”雄风，来到“广阔天地”，第一个冬天，就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看管“牛鬼蛇神”。

连队从近300名职工中，揪出了“一小撮”，那是5个“阶级敌人”。有“漏网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

“现行反革命”。这样艰巨特殊的任务交给了我，是组织上对我的信赖，也是考验，内心中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

这5个“牛鬼蛇神”分别在农工班接受监督劳动……长期的批判斗争，他们都已经老老实实，群众的铁拳不是好惹的……

天天和“牛鬼”打交道，我动过一次手。是那个最小的“牛鬼”跟我拌了一句嘴，我挥拳照他脸上打去。但到底是一介书生，没打到脸上，砸到了他的前胸，他身子只一晃。他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再说话，脸上丝毫找不到一点不服气和发怒的模样。

望着他，真不知道他神经麻木，还是没了感觉？我想不出来，只觉得我自己难受，而且窝囊。

黑龙江兵团三十三团的知识青年，吃完“忆苦饭”后，要查考“牛鬼”在吃什么，于是“牛鬼”就被押来斗争，一位天津知青后来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

主持会议的革委会主任命令道：“向毛主席请罪！”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牛鬼们”训练有素，齐刷刷排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异口同声地背得烂熟。

“向新来的天津革命青年报自己的狗名！”主任话一出口，“牛鬼们”熟练而机械地逐个报出自己的姓名、“头衔”。

我喝问道：“我们来你们抱嘛态度？”

“欢迎，欢迎。”“牛鬼们”纷纷点头。不想招来一顿拳掌。“革命青年，阶级敌人欢迎，你们不配！”

“我们来你们抱嘛态度？”我又喝问。

“不欢迎。”“牛鬼们”被打懵了头，不知该怎么办，只好

改嘴道。他们这一答招来更密更重的拳掌。

“难怪我们在这吃忆苦饭，你们反倒吃好的！”我话茬紧跟。

“押出去！”主任令人打开一扇窗户，窗口搭着一个木槽，木槽内用水浇注了一条冰道。造反派两个架一个，把“牛鬼”悠起来甩上窗台，“牛鬼们”顺着冰槽滑下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当最后把一个瘦小的教师扔出去之后，教师的耳朵被摔聋了。不久，这名知识青年接到家信，得知爷爷、父亲、母亲等都在挨整并挨了打，感到了无地自容的羞愧，从内心底发出忏悔，并且忏悔至今。

在职工队伍中乱抓“阶级敌人”，往往引出啼笑皆非的结果。黑龙江兵团三十六团的一个连队实在抓不出“牛鬼”，就把斗争矛头对准专管生产的队长，谁让他是当权派呢？但是在开批判会时，发现有4名知识青年入夜未回，人们又不得不随着队长出去寻找。内蒙古兵团三师二十一团的一位留场驾驶员，一次由于拖拉机油箱油面太低发动不起来，往油箱里尿了一泡尿才发动起来，但忘了将尿放出，此后兵团战士开车又发动不起来，于是有人揭发驾驶员曾往油箱里尿尿。连长一声令下，驾驶员就被关了起来，罪名是反革命破坏，自然成了批判会上的活靶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阶级斗争的矛头也不时对准知识青年。出身不好或父母受到冲击的知青，有的不但被剥夺了政治上进步的权利，还会受到批判。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一个知青，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并准备被发展入党，但在外调时发现他的父亲刚被打成“反革命”，于是此人马上从卫生队调离，下放到连队。他的一首诗被连里人发现，因其中有“平地风雷起，发配来轧草。含泪望明月，何时平怒潮”字样，很快成为批判的

对象。连队指导员定的调子是：这首诗反映了黑帮子女的三不满情绪，“党对他父亲进行审查，他对党不满；团党委让他下放连队，他对团党委不满；连党支部让他轧草，他对连里不满。他的这首诗是反党思想的大暴露，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为”。“混入兵团的阶级敌人”、“反动”、“复辟”等罪名很自然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逼得此人差点走了绝路。类似的事例，几乎在各兵团都发生过。

·生产建设兵团搞政治运动，很快就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运动一来，各兵团一般都是先由兵团党委确定运动的规模和时间安排，发出指示，各级领导迅速贯彻执行，组织所属人员按规定学习文件、进行动员（有时还要办专门的学习班），然后是对照思想，深入学习、检查，最好能抓出个把坏典型进行批判。假若本单位找不出坏典型来，大批判还是要搞，至少可以批判报上点名的“大人物”。运动很快又要与本单位的生产与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要通过运动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学”与“批”是受教育，“干”则是具体的行动与表现。运动时间够长了，领导就会做总结，归纳出运动的经验来，于是圆满收场。在运动中，最多的就是写学习心得和批判稿，后来又加上了“小评论”一类的东西。“挽下文章一大抄”，除了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抄报纸；如果需要的话，不妨再引上几句毛主席诗词：痛斥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用“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颂扬革命的大好形势，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表示克服困难的决心，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此外，也还可以找几段古诗，点缀其中，增加文采，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

二 “一打三反”和“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迅速铺开。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各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不失时机地抓出了一批“现行反革命”之外，还突出打击经济犯罪和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并衍成了持久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运动中确实处理了一批贪污、盗窃案件，但也存在颇多过火行为，尤其是将兵团职工的自留地、自留畜统统割掉，个人种瓜、种菜以及家庭正常副业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发行为，不少人因此受到批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先后派出377个宣传队，共计2400人，进驻“老、大、难”单位，重点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宣传队进点后，以大批判开路，发动群众大揭发、大检举，对管钱管物和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只要群众有反映就办班审查，共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1013人，结案处理784人，其中定性戴帽10人，定性不戴帽19人，判刑4人，受党内处分21人，行政处分138人，运动中480人被揪斗。尤其是三十七团在审查所谓“705案件”中，大搞逼供信，私设公堂，动用了20多种刑罚，导致2人死亡，3人重伤，36人受株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曾批判过这样一位职工：

一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蓬头垢面的男人被押进来了。他面色焦黄，瘦骨嶙峋，刀条子似的脸上皱纹交错，像是干透的核桃皮。

这个男人竟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我有点茫然。尽管对资本主义不甚了了，但印象中的资产阶级该是肥头肥脑，大腹便便。殊不知这个人干巴得刨了皮就剩骨头了。

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大会气氛热烈，安排好的发言，依程序进行。一个个喝声不断，唾沫四溅，声讨的目标

是这“人干儿”，内容是他下河摸鱼、上山挖药、搞自留地个人发家。“妄想资本主义复辟，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用心何其歹毒”，断喝如雷，可“人干儿”充耳不闻，木然垂首。

要说，这人够顽固的。连里多次派人查其行踪，“罪行”累累，并且多次面对面斗争，但“人干儿”我行我素，白天劳动，晚上挨批，半夜下河。这次，我随营教导员下连，就是针对这个顽固不化分子，来组织斗争，彻底清算他的罪行和流毒的。

可我就是琢磨不透，这人怎么就中了魔似地非一条道跑到黑呢？

人，人真是让人难琢磨。这批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大会才只过了一个月，就开起了追悼会，批判的对象也成了追悼的主角。

我四处打听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

“人干儿”赶着重载的马车爬上一个高岗，沿着陡峭的沙石路奔驰而下，不料一群孩子嘻笑着出现在半坡上。“人干儿”急了，没命地吼叫：“快躲开！”可仍有两个吓傻了的孩子愣在那里。收不住蹄的马拖着一车沙石仍在下冲，眼看马车就要从孩子身上碾过。刹那间，这个只顾自己发家的“人干儿”纵身而起，在马头前抱起两个孩子用力甩到路旁，而同时，飞动的车轮下溅出了不多的鲜血……

根本没有再抢救的必要。人们纷纷涌来，瘦巴巴的“人干儿”更干了，皱巴巴的脸像一张黄纸，血已经不再流了，“人干儿”睁着双眼，一脸苦相，无限愁思。

人们赶来了，知青、连队的老老少少，那些口若悬河、断喝如雷、挥舞手臂的革命者、勇士都来了。冷漠、不解、叹息、抽泣、嚎啕，但更多的是同情、是崇敬……

追悼会很平淡，没有悼词，也谈不上仪式。人们只是默

默默地、默默地望着“人干儿”干巴的躯体，又默默地为他堆起了一个不大的坟。

会后，在一间晴天“披头散发”、雨天“低首垂泪”的窝棚前，我推开了一扇摇摇晃晃的破门，映入眼帘的是斑驳的锅台和与之相连的一盘土炕。

土炕上，炕席东一片西一片，一个目光呆滞、蓬头垢面的女人和七八个大眼瞪小眼的孩子，横躺竖卧地挤在一起，使人想到干草中的一窝耗子。孩子们的裤子是新做的，上衣却千疮百孔，露着瘦嶙嶙的皮骨。那十几只脚黑得和鞋帮一个色。

见到不速之客，女人挣扎坐了起来，提起衣襟抹着止不住的泪水，有气无力地嗟喟：“连里送来的30尺孝布，我染了给他们做成裤子，没光腚的了，我谢谢了。”

她转脸指了指一个用玉米叶包着脚的孩子说：“早巴望死鬼打只野鸭子，给孩子换双鞋穿。我病在炕上四五年了，一家十口，靠他三十几元钱怎么过？好人？坏人？俺娘们儿念他的好。如今他人也没了，他活得好孬、死得好惨啊……”

“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甚至使连队、团场的副业生产也受到冲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三营的新六连，原来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连长和指导员带领战士们建起了砖窑，一窑砖可净赚800元，连队生活条件很快得以改善，知青们也变得有教养、文明；但是好景不长，有人传出了新六连是“复辟倒退，资本主义尾巴”的风凉话。指导员被叫到团部，通知砖窑停烧，回来后还要写检查，题目是“我们是怎样走上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

在政治运动中过于敏感，是当时领导的通病，有时就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知青王延东回忆道：

1970年秋天，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了，连队进驻了工作组。不久，狠割“资本主义尾巴”取得了辉煌战果，把住在我们连队附近的一个割荒草卖钱的姑娘逼得撞了火车，身首异处。

之后，工作组乘胜“向后屯追击”……

身负重任，挺进后屯的工作组中，有一个整天黑着脸的参谋，可惜迄今不知他的大名，一个是太话空话连篇的知青。工作组进后屯以后，把我们几个在猪舍、鸡号干活的男女知青吸收为“依靠力量”，每天晚上冒着寒风带着我们巡逻。那个知青，还经常辅导猪舍的一个女知青摸、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

转眼入冬，工作组进驻后屯也一个半月了，可什么也没有整出来，都有些蔫了。巡逻也免了。工作组正准备撤，谁想就在这当口，我却撞到“枪口”上。我们鸡号，当初不知是谁的瞎道道，从哈尔滨整回来几百只北京鸭，养着下鸭蛋。这北京鸭，本来就下不了几个蛋，一入冬，一只只都有七八斤重，可劲儿吃料，就是不下蛋。这可咋整？鸡号班长老侯领着我一起到连部请示，连领导商量了一下，指示我们母鸭还是养，把二三十只公鸭卖了，每只两元钱……

没想到祸从天降。我到连部会计那儿交钱的时候，已经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团部。团里有的领导为此大发脾气，立即指示：“矛盾转化了，这顿鸭子把我们3个月的运动成果吃掉了，一定要查出黑手。”

这下苦了我和老侯。鸡号摆开了战场。工作组那位参谋黑煞星似地盘腿坐在炕上，几个组员如夜叉似地瞪着眼在一旁助威。我生平第一次被带上来“过堂”。参谋盯着我，足足看了五分钟才发话：“小王，你把卖鸭的经过好好谈一

谈。”……天黑了，结论是什么，工作组没有开口就走了。我心里很坦然，我没有错。

可这事把老侯气炸了，明天要轮到他“过堂”了。“我操他姥姥，不干活瞎整人。”这个退伍的老兵，第二天一早就上了团部。50年代，老侯给团部烧过炉子，团部的老领导都熟得很。他直接找了政委。

老侯从团部回来后，一切都平静了，工作组也走了。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讲卖鸭子的事。

1971年4月12日，黑龙江兵团六十八团的武装连不慎失火，烧掉了帐篷和弹药库，六师师部派人来调查火情，用阶级斗争的尺子衡量，认定是阶级敌人破坏，并联想到了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搞得人心惶惶，结论还是自然失火。当时被审查的知青沉痛地说：“大火面前我没有退却，可审查却使我胆战心惊……大火的威胁、死亡的考验与那阶级敌人的破坏不协调地交叉起来，给我织成了一场难忘的梦。”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于是与“一打三反”同步进行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小组的决定》，使抓“五·一六”的运动更加“深化”；再加上“深挖特务间谍”，合成为声势浩大的“两个深挖”运动。

所谓“五·一六”，是1967年7、8月曾出现过一个以攻击周恩来和“揪军内一小撮”为能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很快被确定为反革命组织，其成员大多遭逮捕。两年多后旧话重提，主要是为了挖出“反党”、“反军”的秘密组织，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活动。在为时数年的运动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打击和迫害。生产建设兵团在抓“五·一六”分子方面也很卖劲，打击对象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

中参加过红卫兵活动的老高中学生。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某连的干部就曾不断动员一位北京知青揭发同连几个老高中知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说他们是“五·一六”分子，“反党集团成员”；这位知青拒绝揭发，竟有人威胁要把他也划入“五·一六”外围组织。为了抓出一个知识青年中的“五·一六”分子，一搞就是小半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团八连的干部，将一位知青冠以“五·一六”分子的罪名，关在马棚里隔离审查达几个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与几名知青一起跑到内蒙古草原，被安排在牧场插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管牧场后，他成了兵团战士。1970年初，他被所在团逮捕，关进团里临时设置的监狱，成为“一打三反”运动的牺牲品。两个月后，整理出了他的六条罪状：（一）污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二）污蔑林副主席、污蔑解放军。（三）污蔑江青同志。（四）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翻案叫屈。（五）偷听敌台，并且散播。（六）写反动书信、黄色日记，散布资产阶级淫乱思想。材料上报到兵团，很快引起重视。兵团政治部特别派人前来进行调查、审讯。后来，兵团党委决定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回原单位监督改造。他对此决定不服，经多次申诉，1974年底，兵团政治部改定为“严重政治错误，撤消群众监督”。打倒“四人帮”后，他终于在1980年获得彻底平反。这段曲折的经历，后来由他写成了一部小说《血色黄昏》。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也从1971年7月开始展开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如一师五团先后举办了团、营两级学习班，培训骨干1000多人，依靠骨干力量，大搞“划线站队”。截至1973年6月，云南兵团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共揭发有各种问题的5611人，查证落实4714人，定案3780人。

三 形形色色的政治案件

按照当时的通行标准，偷听敌台，书写反动标语，行凶杀人、进行阶级报复，破坏生产，叛国投敌，破坏武器，政治诈骗，蜕化变质，参加流氓集团，等等，都算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由于一切事情都可以“上纲上线”，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识，所以不少应属于一般性错误和刑事犯罪的人也成了政治问题，被扫入了“现行反革命”的范围。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只要对人民有罪，第一条罪就是反革命，几乎不存在其他的评判标准。

由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有的人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坚决的革命态度，经常盯着别人，希望找出阶级斗争新动向。黑龙江兵团六团的一位知识青年，对连队的几个支委和排长有这样的看法：“就看这位吧，在连里，专门尾盯男女知青的幽会，一次他私拆了连里一名女知青的情书还不罢休，居然拿到全连大会上用酸溜溜的声音宣读，说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还有那位，一天到晚在知青中嗅阶级斗争新动向……早时‘老道’被前任副指导员泄私愤，隔离审查了22个月，什么问题也查不出来，谁向他道过歉？”这样的现象，在当年并不少见。

过于紧张的气氛给人们以无形的压力，造成了人们的神经过敏和怕出错的心理。但是，越怕越出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的一所学校，曾发生过一次微型政治事件。当教师的一个女兵团战士正在讲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时，保卫干事进来听课，紧张的教师无意间把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战胜资产阶级司令部说反了，虽然马上纠正，但仍被抓住不放，不得当众检查。同在一个学校的兵团战士都安慰她，并联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想当年我们红卫兵小将指点江山，叱咤风云，俨然能搬动历史的车轮，而今落得个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前几年怕我们也这么整过人，如

今轮到我们挨整了，可悲可叹！”

还有一些抓“特务”的举动，简直就是闹剧。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二连的孙宝柱生动地描述了一次抓“台湾特务”的场景：

晚饭后，一声哨响，晚点名又开始了。指导员拿着本子走了进来。破旧的房子里，有一张破旧的桌子，是给连干部主持会议用的。今天不知是谁在桌子的裂缝里插了一把演《红色娘子军》作道具用的大刀。看见这把刀，指导员脸上立即晴转多云：“这是谁干的？”屋里鸦雀无声，没人答话。“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台湾派来的？”指导员提高了嗓音。“哈……”安静的会议室里，响起一片笑声。指导员的火气更大了，连连逼问，非要揪妄图刺杀革命干部的特务不可。“指导员，是我插的。”战士赵金祥只好坦白承认。“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指导员厉声问道。“不是，我是毛主席派来接受您的再教育的。”“那我是台湾派来的？”“不是，您是毛主席派来教育我们的。”指导员的火气愈发大了：“那……我们总有一个是台湾派来的，这是阶级斗争。”赵又答道：“我是想说明您和我都不是台湾派来的。”会议室里已笑声一片了。这时连长进来了，急忙把赵叫了出去，顺手把那把大刀拔出来拿走了。会场安静下来，晚点名正式开始……

还有的人因偶发事故而受到批判。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一名知青，骑车进城不慎撞伤了一个小女孩，即被扣上了“破坏军民关系”的帽子，受了半年多的批判，又被罚去与几个有“帽子”或有前科的人一起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也有人因喜欢聚堆而受到批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的一个连队，甚至抓出了一个由知识青年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当时被定为黑

头头的杨汝林回忆道：

知青里，我年龄最大，又安了家，那家也就等于知青的家……天地良心，我们从未有过过分的言词，更没有不轨的行为。但是，对“左”的一套确实不满，难免有几句牢骚。于是便总怀疑你在搞什么，捕风捉影。何为“裴多菲俱乐部”？想他指导员肯定不知道，可偏偏要把我拉扯进去。“大搞吃吃喝喝”还不是“裴多菲俱乐部”？可吃了什么呢？苞米碴子，玉米面，家里连根鸡毛也找不到，“资本主义尾巴”不用你割，我压根就不长。指导员说我阶级阵线不清，同情出身不好又犯有严重错误的知青，可不是老说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吗？出身不好，就该有罪？我也豁出去了，让我做检查交待，我就是不干。

从早晨2点到晚上8点，在地里苦学大寨19个小时，人们都已精疲力尽。白天风传晚上要批斗我，知青们也为我担心。我倒不觉什么，吃过饭就懒得再动。谁知，一阵钟声响音未落，连队治保会的几个人突然破门而入，不容分说，过来就拧胳膊。开始，我还挣扎，后来就让他们去吧，总是寡不敌众。连拖带拽我被押进了食堂。赶上停电，屋里只有两支蜡烛，不死不活地摇晃。黑暗中我看到墙上歪七扭八地写着“打倒裴多菲俱乐部黑头头”。前排的人还强打着精神，后排的人躲在阴影里打瞌睡。

“你必须低头认罪做检查。”

“不做，我没错！”我丝毫不软。

“让他低头，低头！”不知谁在喊，有人过来给我套上一块用铁丝拴着的大牌子，我的名字倒写着，画着三个大红叉。我被揪着头发低下了头。

在指导员的授意下，连队的“积极分子”轮着发言，历

数我的“滔天大罪”。我只感到周身的血在往上涌，一次又一次挣扎着抬头大喊：“出身不好的知青没有罪，他们也是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搞黑俱乐部！”拳头雨点似地落在我头上、身上。我喊：“压而不服，你们这是法西斯行为！”血从脸上、嘴里流下来，一滴滴落在土地上，我看着它们渗了进去。

会场乱起来，可能有人看见血害怕了。我的反抗使批斗难以进行，指导员气急败坏地命令：“押下去，禁闭隔离。”

我被押进了一个仓库，几个人24小时轮番看守。但我就是不写检查，我抗着。营教导员也来了，所谓做思想工作，无非是让我承认“罪行”。可我真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又何罪有之？我开始了绝食反抗。

连续5天的折腾，我不服，谁也没有办法，只好放我回家。

后来知道，在禁闭我期间，连里派人对我进行了内查外调，没查出名堂，也只有不了了之。

外逃、持枪行凶等行为，更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外逃，无疑要受到谴责，但是有些却是由于领导处理一般性问题时激化矛盾的结果。1972年春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三团的一名杭州知识青年，因叛国被关押起来，他有这样一段自述：

我为什么过江，你们都清楚了，上次我都交待过了，主要是谈恋爱引起的。我跟我们连的一个上海女孩子谈恋爱，我们俩挺好的，可咱们这个地方，谈恋爱是非法的。后来连里整我们，整得非常厉害。主要是那种屈辱感让人没法忍受，我就过江了。按道理这点事值不得，过江的时候情绪也非常复杂，那边我根本没有熟人，为什么要过江？过去以后会怎么

样？好像都没有细想过，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呕气。跟谁呕气？跟连里边头头呕气，也跟自个儿呕气。我心里说，本来是挺好的一个小伙子，你们把我逼成了叛国犯，将来我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时，你们良心上会很不安，到那会儿你们再后悔，再说什么也都晚了！想得就这么简单。你们保卫部门的人都清楚，俄国人对越境的人分成三个档次，有三种不同处理方法：他们认为真的对他们有用的人，就用直升机直接送往内地去了；对于一般的，可用可不用的人，送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俄国人在那儿办了一些短训班，交待点任务，再给撒回来，如果重新被咱们抓住，也无所谓，他们不指着这些人；第三类是对俄国人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人，人一过江，他们的边防站马上就升旗，要求会晤，把人送回来。我就属于第三类。我下乡那年才17岁，69届。

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党委1970年5月的上报材料，仅三师十四团遮相农场自1969年以来就有100余人越境参加了缅甸人民军，有13人返回国内。擅自出境投身“世界革命”的人，命运并不好。二师七团一名成都知青，跑到缅甸参加了缅共部队，后来又悄悄跑了回来，被九团视为“投敌叛国者”扣押。九团的知青记下了他的经历：

我们跑去了5个人，在密林中瞎窜了两三天才找到缅共部队。跑去的目的是想混顿饱饭吃，没料到才去了几个月，其中两个知青就被打死了，于是只好偷偷和另外两个知青跑了回来。一路上不敢走大路，只好荒山野岭乱钻，遇上单家独户的少数民族，就将随身携带的战利品和衣服拿去换一点粮食吃。被抓住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疲惫不堪了。缅共部队中知青不少，有的当了官，也有的被打死，主要都是

在边疆插队的北京、昆明等地的男女知青，他们的处境比我们还凄惨。有的女知青人生地不熟，跑过去后，不是被强奸，就是被卖往仰光当吧女、妓女……我们跑往缅甸，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回来后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真要是安上一个投敌叛国罪，我们的父母就惨了……”

还有捕风捉影制造的外逃事件。1970年5月28日，黑龙江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打渔排的女生织网班，在黑龙江中苏争议岛附近翻船，转业军人刘长发和知识青年许淑香、刘毓芳、孙艳、章秀颖、贾延云淹死，只有天津知青杨挚颖脱险。事发第二天，苏方在北京的谈判桌上以中方蓄意制造边境事端提出强烈抗议，沉船事件的性质迅速升格，被认定为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当事者被怀疑为苏修特务。半个月后，刘长发的尸体漂出江面，方才结束了刘长发携织网班投苏、将杨挚颖留作内线的“天方夜谭”，但还是没饶过死者，刘长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草草埋葬。杨挚颖后来感慨地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眼见的事实在无休止的怀疑和盘问中显得多么苍白无力，我也领教了那些我曾敬重不已的人曾是如何坦坦然地说瞎话。但我并不想过于责难他们，那是有历史的原因。”

四 “林彪事件”的影响

1971年9月13日，当时的副统帅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10月，各兵团知识青年中的“消息灵通人士”把这一信息广为散播，所以在传达中央文件之前大多数人已经知道林彪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七团的时宏斌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九团的祝祁回忆的场景，有很多细节是完全一样的，并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

那是197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收到了家里的来信，厚厚的。迫不及待地拆开，原来是一张剪下来的报纸夹在中间。报纸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请注意看，少了谁……照片上明明白白地少了“副统帅”，我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展开信看下去，一行字令我如五雷轰顶，顿时手脚冰凉：林彪叛逃，已成死党，成员还有……这是真的吗？这可能吗？我连连自问，头皮一阵阵发麻。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亲密战友啊！我的眼睛死死盯在那几行字上，再也难以移动。能不相信吗？谁敢开这种玩笑！

天一黑，我遵照信中嘱咐，烧掉了来信，找到好友元西、秋客……我把收到信和信中的内容简要告诉了他俩后，他们也吓傻了……送走两位好友，我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第三个人，我们的挚友，连队的文书。不料，隔墙有耳，几个女生“窃听”了这个消息，顿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知青们精心选择最可靠的人并互相嘱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的同时，这消息迅速传遍了全连，以至几天内传遍了全团……

后来才知道，我收到信时，内地已传达到行政17级以上党员干部，基本上公开了。而此时七团一营十一连的宣传队还在营部驻地与当地傣族老乡表演“林彪紧跟毛主席”的舞蹈；我们连队附近一个山寨在放电影前，全体寨民还在村干部带领下，举臂三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呢。

这年“十一”过后，我看着迟到的《人民日报》，头版上只有伟大领袖的照片，却不见“亲密战友”的身影。只在瞬息之间，心里似乎有点异样的感觉。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团里认识的一个齐齐哈尔市的知

青回团部路过我这里……他突然低声对我说：“有件大事，你可不要对别人讲，说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那表情显得严肃而又神秘。不待他再往下说，我就问他是不是国家大事，只在这这一刻，一种灵感使我联想到一星期前看的那张报纸。

“林副统帅坐飞机摔死了”，他语气低沉却很坚定。

我心里大吃一惊，尽管在朦胧间已意识到会出什么事，可这事太大了。我似信非信，一时语塞，呆呆地出神。

举旗举得最高，当然的接班人，多少年来，几乎没落过天天要喊“永远健康”，这怎么可能呢？可谁又敢拿这事儿开玩笑，而且报纸上也确实没了林彪……

想想国庆节那天，连里还开庆祝会，会上人们都不无虔诚地高声敬祝“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真是荒唐。

想着，想着，真他妈解恨！一时间有些忘形。“悠着点，可不能传给别人，这事非同小可。”这老兄还有些害怕。

“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一定不告诉别人。”我嘴上信誓旦旦，心里高兴得半宿没睡。

第二天，老兄去了，我只觉得这天的空气都新鲜，我找来最好的同学，把这大好新闻告诉他，并叮嘱千万不能外传。他同样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向毛主席保证，不外传。”他和我一样又惊又喜。

“向毛主席保证”，是当时的时髦话，可要用它来保证林彪摔死的事情不外传，难。后来，这消息果然越传越广，越传越快，不等正式传达，大伙儿全知道了。

正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林彪事件给生产建设兵团的震动是相当大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们，在最初的震惊之后，更多的是留在心里的疑团。在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兵团主要针对林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说

法展开批判，同时进行扎根边疆的教育；但“再教育”没个头，知识青年普遍为前途担忧，所以怎么批也批不起来；多少人扪心自问，难道过去的一切“紧跟”、“高举”都错了吗？狂热的信仰难道一文不值吗？一系列难以解答的问题，启动了人们的自我思索，兵团战士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政治运动，看待上山下乡，直至看待生产建设兵团本身……不再虔诚、盲从的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五 勇敢的“上书人”

青年人敢于思考，不愿意盲从，本来应该得到鼓励。但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想别人所不敢想的人绝大多数要遭难。生产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例：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知识青年，原来是学校中的优秀生，曾熟读伟人巨著和古今中外名著。赴滇支边，壮志未泯，室内挂满巨幅中外地图，劳动之余，潜心研究伟人战争著作。忽一日心血来潮，奋笔疾书，给当时在位的副统帅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请战书，要求恩准拨给他一个师的兵力予以指挥，数月之内攻占仰光，解放全缅甸，解救缅甸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企盼回音之时，所在师团收到上面的批复：此人狂妄，望严加教育、查处。结果是长达数月的关押反省和无休止的检查，监督劳动改造。

内蒙古兵团六师战勤连的保定知青陈建邦，撰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各阶级分析》、《共产主义新城草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乌托邦》、《论兵团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等文章，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80年才平反释放。

黑龙江兵团五十六团的一个齐齐哈尔知青，在1975年春季上书毛主席，结果被公安部列为特大反革命首犯，遭到逮捕，他在牢房中用军挎包的背带自杀，在墙上留下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万

岁”等大字。五师宣传科的知青张军生，参加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并写下了对这名知青的印象：

他平时任劳任怨，又沉默寡言。他主动从连里抢来了看管瓜地的工作。在生命本色的田野中，他研读了马恩列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日记里记载着他探索的痕迹。他平静得像一个姑娘，而内心又被海潮般的思绪折磨得彻夜难眠。他为自己被打倒的父亲不平，也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下台不解，向着茫茫夜空他大喊冤枉；他为全国生产停滞，内乱不止，人民苦不堪言痛心疾首，也为被林彪这个红得发紫的人物所欺骗感到愤怒。

……他怀疑理论出了问题，他提出阶级斗争早已结束，所谓的“阶级斗争”是人为制造，应该停止。

“狂”得令人不解，令人瞠目。他上书伟大领袖，要求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展开辩论。他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张是对的，特别是在按劳分配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上是对的，不那样社会主义就发展不了。而伟大领袖和斯大林都在这两个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更是错误。他甚至提出，人民要纠正这些错误，应成立个“帮助纠正左倾错误委员会”等等。洋洋数千言，直抒胸臆。

他抱着一线美好的愿望，等着盼着复信的到来。他也想到了会身败名裂，想到了杀身之祸……

并不是所有上书人都遭到了厄运。1972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林建国曾在北京上书周恩来总理，谈了兵团在接待外宾时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做法，受到国务院和外交部的重视，他又进一步指出了建设兵团的落后生产经营方式问题。此事在第二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还被提起，当事者成了

黑龙江兵团的新闻人物，自然没有挨整。还有一些干部主动出来保护被打为“反革命”的人。黑龙江兵团十三团的教师孟凡瑞，先被定为“恶毒攻击林副统帅”，后又因批评“白卷英雄”张铁生而被一个“反潮流”的人视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团党委经过认真调查，确定孟凡瑞并非“反革命”，此人只蹲了40余天牛棚就被放了出来，并调到中学任教师。对于写诬告信的人，团领导还多次进行批评。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作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六 “王亚卓事件”

使生产建设兵团在政治上出了大名的，是发生在1974年的“王亚卓事件”。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给该报的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说：“这个12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又另加编者按语进行赞扬。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宣传，把这个小学生捧为“反潮流典型”，在全国掀起了批“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反右倾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起了本地“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这股浪潮使教育领域更加混乱，反“师道尊严”的大棒到处飞舞，广大教师人人自危，连生产建设兵团办的半正规学校也不得安宁。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中心学校的校园里一片狼藉，大字报糊满门窗，个别学生打架闹事、破坏公物、欺负教师、扰乱教学，甚至把粪便抹在教师的椅子上。在这种情

况下，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报导员邢卓认为报纸上发表黄帅的日记摘抄在全国的影响太坏，应该有人站出来辨明是非。他们于1974年1月14日联名给黄帅写了一封信，信由邢卓执笔，署名“王亚卓”。信中写道：

看了你登在报纸上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结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实在不敢恭维，你在信及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未免迫人太甚。

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而学生就能把教师当敌人吗？我不是说你给教师提意见，就是把教师当敌人了，而是你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绝不是个别用词不当损害了教师的尊严，而是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很欠诚意。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

现在许多学校里，学生动辄就贴大字报，谓之“反潮流”，其实这才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教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

继你之后，广州又出来个辛若愚，说出的话更没道理。对教师的一点缺点错误，也要捅到报纸上去，这合适吗……

1月底，“王亚卓”收到黄帅的回信，信中表示“王亚卓”的信对她很有教益，正在认真考虑，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很好地学习。

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

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在“王亚卓”的信上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

“公开信”的发表，不仅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造成很大压力，二师和十九团党委做了检查，而且给“王亚卓”三人带来了一场悲剧，当事人之一邢卓有如下回忆：

2月11日上午7时，中央电台新闻节目头条播送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该文与一月前她写给“王亚卓”的亲笔信的语气大有变化，说“王亚卓”给她的信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是“别有用心，要把教育革命引向邪路”……

我从团广播员口中得知“公开信”发表的消息，还以为广播员开玩笑，在第二遍播送时，仔细听毕，大为惊讶。

随即，兵团司令部来电指示十九团查处此事。王、恩正分别在北京、天津家中，有电报令他们火速归队。兵团、师成立的工作组迅速开到团里，在内蒙古的我被多次召去审问。

三天后，王、恩归队。我们三人被工作组分别监管，互相不能晤面，责令交待问题。给黄帅的信是由我起草的，写完后寄发，未留底稿，工作组查问信的内容，三人分别凭记忆追述，多有出入，日久不能落实。工作组对三人外还有什么人参与、指使，颇感兴趣，反复查问，未得满意结果。

之后，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间或以踢打“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我们三人分别反复作检查，深挖“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的思想原因。此间全国有大量写给“王亚卓”的信。其中很多是对我们的“反动”、“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批

评、教育的，也有不少对我们表示同情支持，这些信未让三人过目。

4月中旬，组织作出处理决定：给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恩亚立团内警告处分，给我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分别送一、三、四连接受监督改造。改造期间，我们饱受欺凌磨难，看尽各种脸色，也始终受到正直真诚的人们的关照。

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王亚卓事件”发生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多数人对“王亚卓”是抱着支持或同情的态度，并在暗中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帮助或鼓励。在“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直接插手“王亚卓事件”的政治背景下，内蒙古兵团党委对“王亚卓”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对待，给予了在当时看来是较轻的处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王亚卓”的作用，这一点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各生产建设兵团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人，有的人被关进监狱，其他人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连接受“再教育”的资格也被取消，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时不让他们参加，甚至连讲用会都不能参加，并经常受到打骂和其他人身污辱。有人同情他们的遭遇，也只能在暗中给与一点帮助。对于这些冤案，除了最后一风吹的“平反”外，不会有人出来公开道歉。挨整的人，往往从人们的同情和理解中找到希望，真正认识到“人”的价值。那些整人的人呢，就没有一点内疚和不安吗？

第十章 扭曲的生活

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朴素的外表藏不住爱美之心
——破破烂烂的兵团战士之“家”——个个黄脸对黄脸
——挖空心思为了“吃”——“个人问题”一二三——
“生病乃人生一大幸事”

一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生产、战备、政治学习，不断的大会战、动员会、大批判，使得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节奏过于紧张。这种紧张并不是作息时间的规定所造成的，如果看一下当时作息时间的安排，会发现规定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留给个人的活动及睡眠时间不少于10个小时。但是实际上，各单位经常加班搞会战，还要留出时间来搞运动、开展谈心活动、学毛著、进行军训，连里出点什么事还要临时开会，分析、批判、谈认识，半夜又不时来个紧急集合之类，于是作息时间的规定和真正的时间安排相差甚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采石厂的一名兵团战士回忆道：“每天5点半，那划破夜空的起床号使我们不得不开温暖的被窝，像弹簧一样蹦起来。穿衣、列队、出操；洗漱过后，是列队、点名、开饭。一个小时的‘天天读’是早上最松弛的时间。然后是艰苦、繁重的

八小时采石劳动。晚饭之后，是军训、学习、班务会、晚点名。就在这有限的时间内，每周还要安排种一次菜、挖一次地道……我们好像被送进一架高速运转的生产线，早上被跌跌撞撞地送进去，晚上连滚带爬地爬出来。对我们这些昨天还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学生来说，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猛了。我们的连长，是一个有着20年军龄的38岁的军人……可以说，正是他推动着这条生产线的运转。他对战士，简直是有点冷酷。起床号过后，他会毫不迟缓地掀掉你的被子。当你在队列里接连走错，他会毫不客气地让你单独操练。他对内务的要求，不仅是毛巾成线，脸盆成行，他还不允许房间里有任何杂物，替换下的衬衣、鞋袜也一律入箱。”

农忙时期，各农业团场更是经常打破作息时间安排，挑灯夜战成为家常便饭。如黑龙江兵团四师在1971年为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展开大会战，全师总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锁头把门，烟囱站岗”，“早晨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餐饭”；同年为了抗灾夺丰收，又组织了连轴转的大会战，有人形容道：“部队情绪像火一样烤人，革命干劲像小老虎一样喜人，抗灾斗争场面像课堂一样教育人。”满足于轰轰烈烈，却很少有人考虑实际效果。有的连队干部对下属的时间从不放过，尽量安排得满满的，让人除了想着生产和政治进步外，没精力去想别的。有的领导，在生产中实行的是“四个一点”政策：早上点，晚下点，多干点，少歇点。舍不得让大家休息。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节奏，给知识青年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多少年后人们还有谈虎色变的感觉，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写道：我们农场的传统精神是“干”。一年365天，干字贯穿。五一节因为叫劳动节，所以这一天绝对不会休息，统统得“干社会主义”。6、7月谷物熟了，早晨麻麻亮就要下田，一直干到天黑，挑了灯再干。平常日子，吃了晚饭还要参加一个钟头的劳动，美其名曰：“干义务劳动”。

为突出集体主义，保证整齐划一，各兵团都有不少形式主义

的做法，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指出：“那年头形式主义的东西特别多，又没人敢不遵。知青每次到团部开会，都要打着背包，排好队。有时半夜就得起身，把五六斤重的被褥，被里朝外打成三横两竖式，然后背上，来回步行几十里路，到后来简直像个磨盘压在肩上，年幼体弱的女知青更是受够了累。”

大多数兵团培训了号兵，用号声调动人们的行动。与军号并用的还有哨子，哨声的长短、次数，都有明确的含义。

高度紧张的节奏，当时被赞誉为“生龙活虎的兵团生活”。在这样的集体生活中，人们只能机械地服从和尽量加快自己的频率。班组之间的竞赛、连队间的评比，使得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不能因为个人的生活拖拉影响集体的荣誉，由此造就了兵团人强烈的群体意识。对内班组、连队是小群体，对外整个兵团就是一个大群体，无论走到哪里，一说是兵团的，马上相互亲三分，遇到困难立刻可以伸手帮一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备的弦不再绷得很紧，形式主义的一套不再吃香，再加上知识青年的思想越来越不稳定，紧张的节奏已经难以为继，领导不得不做些合理的调整。首先是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等被取消了，随后是去掉了早上的出操，真是“阿弥陀佛”！最后干脆连出工、上班也不整队前往，各人自由行动，按时到即可。为了扭亏为盈，生产占用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切为高产让路。大多数兵团在后期都成为高强度劳动的集合体：生产时紧张万分，“出大力，流大汗”；回宿舍后懒懒散散，乱七八糟。兵团的列车，就这样在生产建设的名义下，费力地拖着一支支疲倦的知青劳动大军向前跑。

二 “兵团绿”

外表往往给人以最初也是最生动的印象。兵团人的外表颇为

鲜明：身穿“国防绿”，佩带着鲜红的领章、帽徽的是现役军人；穿着真正的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的大多是复员转业军人；蓝的、黑的干部服、工作服及各种家乡服装，穿在地方干部、职工身上；由兵团自造服装打扮出来的、间或穿出不同颜色的学生装的，是知识青年。

各兵团的地理环境不同，服装的配给各有特色，尽管有土黄、屎黄等差别，但一身黄似乎是兵团战士的统一标志。知识青年们自称兵团服装为“兵团绿”，穿上它感觉就与别人不一样。“兵团绿”的最大特点是肥大和质量差。无论是棉衣、棉裤、大衣，还是单装、衬衣，虽然有大、中、小号，但都比实际号码要宽大得多，大概是考虑缩水问题及给知青们留下身体发育的充分余地，无怪有人戏称兵团服装为“国防加强特别绿”。兵团服不结实，但经脏，可以长期不洗，甚至是越脏越破越光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对兵团服做了这样的描写：

当年多么令人羡慕的“兵团绿”，现在我却实在无法恭维了：里面是乱棉花套，肥大，没穿多久，衣襟处便臃肿起来，碎棉花坠在下面，棉衣像个盛东西的口袋。

刚进入冬天，许多人还舍不得穿那身值得纪念的“兵团绿”军装，更别提去穿它干活了……好景不长，值得骄傲的“兵团绿”开始毫无阻挡地破烂下去，用针线已无法克服，有人开始用颜色相像的布来补，后来是布就行，还有简便法，找卫生员要来胶布、止痛膏，一贴保平安。更有省事的，补都不用，把破布就势撕下去，远远望去，像反穿皮袄毛朝外一样，其理论根据是：“你补得再好也能看出来，我这一色白，挂掉一缕也看不出来。”

当然，领导对这些不会视而不见的，那些衣服干净而不破者往往是挨批的对象，“怕脏、怕累”，按当时常用的毛主席

席语录讲：农民的手是黑的，身上有牛屎，也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大家在这种教导下，不光比干活用力，还比脏，不怕脏，越脏越好，越光荣。”

在宽大衣服的包裹下，兵团战士的外形几乎都是直统统的，特别是北方地区，到了冬天，把大衣、棉衣、棉帽全武装起来之后，更是男女不辨。兵团的男士们，大多数有几件破衣服裹体就行了，夏天是汗迹斑斑的背心、小褂，甚至光膀子，冬天则是一件缺扣破口的棉袄，腰上捆一根草绳子。尽管棉袄又肥又破，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它的用处，并对它有了感情。在北大荒，棉袄被堂而皇之地称为一大“宝”：

凡下乡的知青，谁的行李里能少了棉袄。

棉袄里新外新，少不得那里含着母亲对儿子的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穿着它割豆、脱谷、扛袋入库、采石盖房、挖渠修路、进甸打草、上山伐木……棉袄不久便“开花”了。

棉袄旧了，但用途却意外地多了起来。冬天，修水利、刨冻肥少不了它。北大荒的冬季滴水成冰，可人们很少穿皮袄干活；穿新棉袄干脏活，难免有所顾忌。唯独穿着旧棉袄，不干活儿有点冷，真抡大镐正合适；既不嫌乎脏衣服，又不至于光捂汗不出活。

春秋两季，北大荒的早晚还见冰茬，赶上时序失调，清明节后、国庆节前，会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下地当然离不开棉袄。

初夏，北大荒温差大，加上当时正在讲学大寨，出工早，收工晚，常常是“早上两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上工时还得把旧棉袄披上，工间休息，往地上一铺，躺在上

面正好抵挡潮气。下雨了，把它顶在头上，又成了雨衣。一件旧棉袄，挡风遮雨，铺垫休息，一年四季不得清闲，我深悟出为何北大荒尊它为“宝”。

旧棉袄和我的“友情”加深，最终与我结成了“患难之交”……我对这件旧棉袄越发珍爱了，在灯下不知缝补过多少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破了补，补了破，再破再补。后来，我由农工改做康拜因手，成了“抹油的”。柴油、机油、润滑油敞开蹭，打满补丁，浸着泥水、雨水、汗水的棉袄又加上了油垢。我们常常自嘲，“远看像当军官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地球修理站’的。”

对棉袄的感情再深，也不能初夏穿着它游行。1970年5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集合全团人马参加包头市的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大会，单装没发齐，但又要展示建设兵团的整齐划一，团部灵机一动，决定全体战士着棉装开赴包头市。黄乎乎一片，气势不小，可是热坏了兵团战士们。更让人生气的是包头市民像看怪物一样夹道围观兵团的队伍，好逗趣的小青年不断起哄，“土八路，没衣服，破棉袄，抖威风”，“捂蛆呢”……说什么的都有。现役军人们还在队边不断高喊：“注意军容风纪”。好不容易走出包头市区，人们再也顾不上军容风纪了，一个个敞胸露怀……

谁都知道，光靠兵团发放的衣服和劳保用品是不行的，所以自己都准备了服装，但是有的服装不符合兵团的风气，只能长期压箱底。在强求一致的气氛中，服式、色彩稍有不同就会被抨击为“奇装异服”，甚至被扣上“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遭到批判。尤其是年轻的女战士们，正值爱打扮的年龄，却谁也不敢穿戴得与众不同，免遭非议。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几位女知青在林中留影，其中有两个知青戴了墨镜和白色太阳帽。一天团长来连队检查工作，发现了这些照片，下令全部没收烧毁，理由

是“充满资产阶级情调”。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北京女知青，收到了母亲省吃俭用买来的一条艳绿的拉毛围巾，这条绿围巾曾给她带来欢乐、温暖，但也带来了麻烦：

在邮局取包裹，我把围巾戴在头上，赢来多少羡慕的目光，那位好心的女营业员还特地把镜子拿来：艳绿的拉毛围巾，红扑扑的脸颊。但我没有忘，那红色的年代，只有资产阶级才爱美，女孩子家也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我偷偷环视四周，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才放下心来，将围巾重新包好，顶着狂风暴雪向连队赶去。

在北大荒，这条围巾曾在箱子里躺了整整六年，只有在我上夜班时，才偷偷地拿出戴在头上。就是这样，也被人发现了，结果被连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作风，狠狠批评不说，围巾自是再不能戴了。

毕竟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正如黑龙江兵团一位知青所说：“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青年人受压抑的爱美之心逐渐显露出来。姑娘们的黄棉袄领口翻出了艳丽的内衣，小伙子们的狗皮帽子也慢慢被羊剪绒替代”。1973年，一位从天津探亲回来的知青带来一套西服，十几个知青不但轮流过了西服瘾，还特别借来照相机挨个留影。后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说法终于被抛到了一边，人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穿出新衣服、新皮鞋，围上拉毛围巾，试试领导的宽容程度，一旦发现领导没有过激反应，各种式样的服装很快一涌而出。不但女青年们越来越打扮得漂亮，男士们也讲究起来。当然，所谓的打扮、讲究，在今天看来，水平是极低的，因为毕竟处于“革命化”的年代，毕竟还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等着人们去干，再说兵团人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使人们享用奢侈品，吃还是被摆在头一位的问题。那些被人们视为过时的兵团鞋帽、衣

服，派上的最后用场往往是与驻地附近的老乡换了肉、白面、油等，吃进了兵团战士的肚子，这就叫“物尽其用”。

三 “蓝天作帐地作床”

原有的农、军垦场被兵团接管后，由于无法容纳源源不断的新成员，都要进行扩建。新建的团场，更要大兴土木搞营建。各生产建设兵团组建的第一、二年，造房是主要工作之一，同时也是基本建投资最大的年份。调到兵团工作的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为解决突增人口的吃、住问题，在物资准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物资股的工作情况，在各兵团都可看到：

根据兵团计划，4到6月要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接“知青”3000名，加上原来的人员就接近7000人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7000人的过冬储备工作，任务非常艰巨。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过冬用煤。物资股总共有7名同志，我们进行了分工。由一人管理内部帐目，一人负责调粮，一人负责现役军人和兵团战士的服装，一人负责仓库管理，有两人管连队供应兼采购，我管全盘。按计划，煤炭要储备4000吨才能保证过冬。这么多煤到哪里去买？怎么往回运？这都是难题。靠当地供应，该县驻有一个师，七八个团，根本保证不了。必须要到县城去建物资转运站。经多方交涉，租赁了外贸一个靠近铁路线的大院，约有三四千平米，内有旧房20间。这就建立了根据地，上百吨货物拉进拉出非常方便，难题算是解决了一半。第二步是解决煤源问题。我们回内地联系，可以买到煤，可车皮无法解决，因为这叫“倒流”。最后决定到宁夏自治区碰碰。宁夏一是靠近车站有煤矿；二是自治区领

导是部队老首长。果然我们要多少煤给多少煤，但自己要出汽车从矿上往外运，铁路运输也要靠自己解决。团里拿出6台车10个司机两个月就完成了2000吨。然后留下2台车4个人继续倒。再说车皮，我们向呼和分局报送了用车计划，但跑了几趟，没有批，后来通过粮食厅一个关系进行活动，结果8月份批了10个车皮，没到月底就全部发来了。

第二个大难题是冬储蔬菜，按当地习惯以土豆为主，但量大季节性强。从县粮食局批指标到集宁拉运，经过努力调回土豆30万斤。师部又从内地给调入大白菜20万斤。为了让兵团战士吃上肉，从锡林郭勒盟调入羊肉20吨，从哈腾公社调入羊800只，这样兵团的生活基本有了保证。

当时因是第一年，工作量非常大，我们几个人具体工作十几项，全团所有物资的采购、拉运、出库、销售，兵团战士服装的清领发放，军供、调运粮食、生产粮入库、加工、销售，人吃、马喂、籽种都得管。仅粮食一项一年要从县城调回150万至200万斤。接转粮食关系，粮食预决算等等。总之全团一切消费和建筑材料都要通过我们来完成。

“营建”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往往给刚到兵团就参加超强度劳动的知识青年来个下马威。在内蒙古，早就有“脱大坯，挑大渠，割大地”的所谓“三大累”，而营建工作首先就是从“脱大坯”开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的回忆中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到兵团后第一个大战役就是脱坯盖房。那时候，年轻人争强好胜。不用连队号召，各排、各班和人与人之间自发展开竞赛。每天天刚亮，人们就赶紧起床，到离连队三四里路外的水泡子边，拉运土坯。大家你追我赶，一路小跑。那种工作热情，那种革命干劲，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激动不

已……最累的活是脱大坯。每天每人定额是150块。但谁还把定额当个标准呢？都想尽力多干一些，刷新自己的脱坯记录。连续几天的重体力劳动，我的胳膊肿胀起来，疼痛难忍。尽管班长和战友们都叫我休息，但我还是咬牙硬挺过来。脱坯得两个人默契地配合。一天下来，体力和精力都快消耗殆尽。这时我正蹲着脱坯，另一位战友端着满满一叉泥来到跟前，一吋疏忽，叉到我胳膊上，顿时鲜血直流。那时在兵团流行着一句誓言：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我马上用手绢把伤口包扎一下，继续干起来。

原临河农场场部，干部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加起来，只有三四百人。二十一团组建后，一批批的现役军人、知识青年和复员老兵从祖国各地汇集到这里，人口很快增加好几倍，使得住房十分紧张。基建连的任务也因此十分繁重。当时房舍的结构，都是“穿靴戴帽”。外墙从石头地基到窗框下，垒十几层砖，是谓“穿靴”，房檐又用几层砖，是谓“戴帽”。外墙其余部分以及隔墙、山墙，都用土坯砌。盖房所用的瓦工、抹灰工、木工等，是河北来的民工。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一部分当壮工或小工，一部分去脱土坯。脱坯场在团部南面的一块荒地，它西靠一条灌水渠，土质很粘，是脱坯的好原料。我们班也被分配脱土坯。

头一天，我们做坯场的准备工作。先是挖了一个大坑，疏通了渠道，从灌渠里引来了水。然后每人挖一个齐腰深的小坑和从坑底通到地面的斜道。接着又从几里外的沙丘上拉了几车细沙。第二天下午，开始和泥。推土有的用小平车，有的用独轮车，也有的用筐挑。独轮车看似简单，实际上也有技巧，开始时掌握不住平衡，推时左摇右晃，一不小心就会车倒土撒，还得重装重推。和泥时，没有水鞋，我们就用双

脚踩，和好，要再倒翻几遍。临走时在泥堆上挖一个小坑，倒上些水，以防晾干。

第三天，我们正式开始脱坯。早上6点多钟大家就起床到了坯场。站在挖好的坑里，双手从泥堆上挖一团泥，在铺好的细沙地面上，滚动几个个儿，然后扣到坯斗里。三个坯斗都扣满后，双手端起，沿斜道跑上地面，再扣在清理好的平地上。动作快的，要跑四百多趟，扣一千二百多块坯；动作慢的，也要跑上二三百趟，扣八九百块坯。下午我们又是和泥，并增加了翻坯、码坯等事情。就这样，我一连干了半个月时间……

烧砖也不容易，除了花力气外，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兵团战士初来乍到，凭着一股热情，虽然会有几次失败，烧出些似砖非砖的“二混子”，但终究不难成功，能烧出合格的砖。兵团的砖厂，除了满足自己基建的需要外，有时还可向附近的公社、城镇提供砖瓦。

在新房子没有建好之前，大量涌来的人只能挤在原来农场的旧房子、车库甚至牲口棚里；新建点的人居住条件更糟，大多是住在用油毡、茅草、木料（或竹子）搭成的简易屋檐内，或者干脆住帐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的一个连队，按“领导意图”办事，最终也没建成合适的住房：

初建连队，有帐篷两顶，大锅一口，支在公路边。

遵照兵团“当年盖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的指示，这些本应在学校读书的半大孩子开始了自己的艰苦拼搏。房子是草皮垒的，炕面是用树条铺上再糊泥。不知是连长糊涂，还是指导员不懂，这树条炕面刚一烘干，就燃起了烟火。

入冬，我们搬进了裸露着草皮的泥屋，在这四面“洞

天”的屋里，虔诚地听着连长、指导员构造连队发展的“蓝图”。可当极富战略眼光的师长视察时，一眼就发现了问题。连队安在公路边不正是把我光荣的兵团战士暴露在敌人炮火的直接威胁下吗？一句话，连队西迁20里，于是又重新开始了“当年盖房，当年开荒，当年打粮”。

为符合战备要求，依山挖成了半窑洞式地窖子。遗憾的是到了夏天，地上总是泛起尺把深的水。没法住，只好在草甸上第二次支起了帐篷。

是年秋天，十三连和十二连合并，改编为三团四十四连。气候已经变冷，早晨开始结冰。全连180多号人还房无一间。4个排的战士分为6组，每组受命在半个月时间内弄出一栋住人的房子。战士们冒着寒风，踏着薄冰，在刺骨的寒风冰茬中和泥、拧拉合瓣、脱大坯……

入冬，6栋拉合瓣房拔地而起。虽然来不及糊泥，虽然顶棚没有油毡，虽然围着炉子坐，火烤胸前暖和背后寒，但总算搬出了帐篷，有了新房。

……生活上仍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没电也没水……后来，黑龙江省地质勘探队帮我们钻了400米，竟不出一滴水。但这是师长为我们选好的营地，我们只能坚持在那里……

1973年夏，四十四连终于离开了战备地势甚好的那6栋泥房，以“水利连”的名义开始流动生产，继续一次次毫无用处的水利工程。熬到了当年冬天，零下40度的北国，帐篷里一切含有水分的东西全部结冰……

1974年春天，团里终于想到了我们的存在。而最终迎来的结果却只有解散，四十四连终于从三团的编制上划掉了。

“创业”不但艰苦，还有人人为之献出了生命。1970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六十一团二十二连副连长、北京知青张志生率

领战士开辟新点，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后因病情恶化，经多次劝说护送回北京治疗，但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生命弥留之际，张志生留下遗言：“我建设边疆的任务没有完成，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撒在北大荒，我要在那里站岗。”父母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北京，一半送到农场，安葬在“二抚”、“胜七”公路交岔口的西侧，六十一团党委特别发出了《向模范共青团员张志生同志学习》的号召。

如果不注意的话，人们会忽视生产建设兵团里存在着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从营地的外观就能分出等级来。兵团和师一级的司令部就不用说了，一般都有高大的楼房、宽敞的办公室和接待室、整齐的住房、大型的礼堂等，就是团部、营部、场部，也非同小可，同样不乏办公、开会、居住的宽大场所，一个“部”就是一大群颇有气概的建筑的集合体；兵团舍得花力气搞营建，无怪附近的老乡总是说：“兵团有钱呀！”但是连队呢？好一点的建上一片砖房，个别的还建个小礼堂；更多的则是造几排简易的砖瓦房，与土坯房、泥土房等参差不齐地立在一起；最差的连队，干脆就是帐篷、地窝子。营以上的干部，不但有专门的办公室，各人的住房至少是两大间或更多，大部分是专门设计并由兵团战士们建造出来的。连队的干部就无此殊荣了，连部往往同时兼有单身干部宿舍的职能，尤其是房子紧张的连队，连长和指导员甚至长期同住一室。连队干部家属来了，专门安排住房，条件则因地而异。复员转业军人开始大多与知识青年同吃同住，不久或条件改善，或家属来队，逐渐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参加兵团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有过睡大通铺的经历，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挤在一个窝棚、简易房、车棚或是原来的牲口圈里，渡过多人多房少的难关。稍微正常一点之后，四五个人挤在一条炕上的情况依然比较普遍，很长时间人们的褥子都要叠着放，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北方大多睡在炕上，但普遍不烧炕，睡的是凉炕，不

少女青年因此落下了病根。牧业团场的蒙古包，居住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到了冬季，包里结冰的现象司空见惯。南方潮湿，各兵团的战士住房条件同样很差，特别是处在边境地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由于每个知识青年都有几百元的“安家费”，而兵团这个“家”的条件确实难以让人满意，所以私下的怨言是在所不免的，不时有人指责兵团把知青的安家费给当官的盖了办公室和住房，但表面上还是要“一切听从党安排”，实际上就是对不同等级待遇的承认，谁让你是接受再教育的呢，自然应该低人一等甚至儿等。在团、场部乃至师部、兵团司令部工作的兵团战士，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一些，难免被基层连队的战士们视为“知青贵族”。

农牧业团场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洗澡，一般的连队很难提供像样的澡堂。夏天可以到河流湖泊中去洗涮，冬季就只能用小脸盆放些热水“擦澡”了。人们经常用“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擦”来解嘲。卫生条件恶劣，虱子、臭虫很容易找到孳生的场所。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大多染上过一身虱子，在作报告的时候，可以称虱子是“革命的小虫”，表示自己的不怕脏、不怕苦，与老乡打成一片。但身上长虱子毕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虱患”曾风卷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黑龙江兵团的《兵团战士报》还特别刊出过介绍灭虱方法的文章，教训人们要多洗热水澡，招来的当然是兵团战士的痛骂和讽刺。

四 关于“吃”的故事

吃和穿相比，吃绝对比穿重要得多。生产建设兵团以生产粮食为主，吃饱肚子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但由于劳动强度大，油水太少，又要按定量吃粮，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饿肚子的事经常出现。

1970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五团曾发生过“馒头事件”，一位兵团战士写下了事情的经过：

我们团是新建团，自己没有粮食，吃的都是从外地调拨来的地瓜干面和当地产的杂交高粱面。战士们已经3个多月没见白面了，又没有蔬菜和其他副食，粮本上那每月供应的3两油还经常买不到。有一段时间，甚至连盐都运不进来，我们只能白嘴儿啃窝头。那黑得发亮、甜中带着苦味的地瓜面窝窝头，偶尔吃一次还凑合，每天都吃真是难以下咽，但是连这样的窝窝头都吃不饱。

一天，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简直令我们振奋的好消息，说五原火车站有卖馒头的……出于在艰苦条件下自觉磨练自己的真诚，我认为去街上买馒头是一种害怕艰苦、不刻苦改造世界观的表现。我的看法得到了排长的赞同，我们俩在伙房前竖起一块木牌：“想想红军二万五，今日窝头不算苦。”

筑路任务越来越重，为了抢时间、抢任务，由原来大家一块混着干改为分段包干，每人每天要干两方土。一天下来，男生走路开始打晃，不少女战士累得边走边哭。

看着我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连长心里非常焦急。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把各排排长召去，宣布今后每个星期天每班可以派两个人去火车站买一次馒头（后来他为这事在团党委会上做了检讨）。其实，饭馆卖的馒头数量很有限，每次往返30多里路买回的馒头分到每人手里不过三四个。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如获至宝，每天垫补一点儿，不舍得一下子吃光。

一天晚饭后，班里小陈忽然把我叫到屋外，满脸怒气地告诉我，她放在挂包里的馒头少了一个，非让我给查清楚不行……我开始了背对背的调查，终于查清那个宝贵的馒头，是

班里的天津知青小 W 拿的……批判会之后，排长和我连续不断地“政策攻心”，小 W 终于痛哭流涕地承认了馒头是她偷吃的……第二天一早，小 W 留在宿舍写检查，我照例带着全班出工去了……忽然，通讯员气喘嘘嘘地跑来，他一把抓住连长，大声喊道：“小 W 跳井啦！”……当我赶回营地，小 W 已经被先到的人救上来……经过一番抢救，小 W 被送回宿舍，连续三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昏睡的状态，偶尔醒来就是一阵痛哭，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妈妈呀！我对不起你呀！就是一个馒头！妈妈！我要馒头……”

当事者常痛苦地回忆起这件事，并不无感慨地说：“为了一个馒头，险些葬送了一个青年的宝贵生命；为了一个馒头，竟毁了一个青年的金色年华。这怨谁呢？怨小陈？怨我？还是怨排长？”

吃高粱面、红薯面窝头还不是处境最差的，最恶劣的情形就是断粮。1969年8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五连断粮，既不能向贫困已极的百姓征粮，又不能向正在孕穗的小麦下口，焦急的连长为了连队一百多号子人的生存，不得不与团部的人争吵，终于从团部求来了粮食，但得罪了领导，不久这位连长就被调离了工作。1970年秋季，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二团三连断粮一周时间，天天吃西葫芦和土豆。连队仓库里存着几万斤粮食，因被团里规定为战备粮，连领导绝对听话，守着不让吃。几个饿急眼的兵团战士从场上拿回了几斤麦粒，晚上煮着吃，不想被连长发现，麦粒没吃成，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还有除夕夜断粮的，人们只能空着肚子干嚎。

粮食歉收的团场、连队，羞于吃“返销粮”，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勒紧下属的裤带。1969年粮食歉收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在1970年发出了“不吃亏心粮”的号召，给兵团战士吃的是“全面粉”，就是不去麸子的黑面粉，并且规定了严格的定量，女

的每天1斤，男的1斤2两。有的团场，粮食早已供应不上了，团首长还在向上级领导做保证：坚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绝不要外援！绝不吃补助！于是各连队半年多来，一日三餐清水煮黄豆，偶尔一顿包子，皮是豆腐渣掺麸子，馅是豆饼。知青们天天吃“忆苦饭”，天天得忍着。以土豆和黄豆作为主要食品，被人们戏称为“二豆”，食者难免“三头有气”：头顶生气，胃冒酸气，下放臭屁。

内蒙古兵团的歉收团场，和黑龙江兵团情况大致相同。如三师二十三团四连，第一年几乎没有收上粮食来，硬着头皮吃国家调拨的定量口粮，大家都吃不饱。“尤其是到了冬天，活儿少了，只吃两顿饭。遵照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每顿拳头大的两个红薯面窝头，一碗菜汤。而且没有任何盼头，上午这顿没吃饱，好不容易挨到晚饭，照样吃不饱，又要忍着去等第二天上午那顿饭。”

主食吃不饱，副食也很差，没有蔬菜，只能想法做汤，用来充数。在北大荒就有了很多关于“汤”的顺口溜：

汤，汤，汤，革命的汤，
兵团战士爱喝汤，
从北安到嫩江，
一直喝到建三江。

汤，汤，汤，革命的汤，
早晨喝汤迎朝阳，
中午喝汤暖洋洋，
晚上喝汤勤起床。

其他兵团的伙食同样不好。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食堂，几

乎每天都是黄豆、馒头、山芋干“老三样”，吃惯了大米蔬菜的江南知青当然不习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多数连队，每人粮食月定量只有35斤，副食供应很差，食堂的菜总是清水煮萝卜、煮白菜、煮海椒，或者是冬瓜、南瓜、木瓜，同样的水煮。还有更绝的时候，没有菜了，干脆开水中丢把盐，全透明，被人们称之为“玻璃汤”。无怪有人编了这样的顺口溜：

天天早上汤泡饭，
苦菜丝瓜伴午晚，
每月吃肉一两次，
个个黄脸对黄脸。

牧业团场和工业单位的伙食情况稍好一些，但对兵团战士来说，也还是以吃粗粮为主。牧区缺菜，玉米面、高粱米以及膻味较浓的牛羊肉，往往使来自江南的知识青年感到不习惯。在工厂里的兵团战士们，完全是吃国家的定量粮，也有饿肚子的时候。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1969年底和1970年上半年吃粮大大超过定额，不能多买粮了，转向农业团求助，农业团给予的支援也只能是土豆和红薯面，于是与农业团一样，各连都有一段时期以土豆和红薯面窝头为主食。

按照国家的规定，吃供应粮的人每个月有20--30%的细粮，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到自己的份额。兵团初期，是绝对标准的“大锅饭”，全连在一起吃饭，炊事班专司做饭之职。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粮食的宏观控制，也能够调整出足够的细粮来照顾病号、伤员和接待来访的客人。人们并未觉得这样做不应该。在一个集体中生活，有病的人理应受到照顾；客人来了，“客饭”是应当像样一点，总要讲点面子吧。

“得温饱而后知荣辱”。在饥饿的侵袭下，人们难免做出一些

不太光彩的事情：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溜进炊事班，拿几个馒头或几块肉的事，几乎到处都有。在菜窖上打打主意，搞几棵白菜，弄点土豆、胡萝卜，司空见惯，当然让领导发现的话，也是“吃不了兜着走”。累得挺不过去了，装装病号，不但可以休息，还能享用美味的“病号饭”，而各兵团的病号饭，几乎都是大米粥、面条之类。更有胆大的，干脆干起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但兵团驻地周围的鸡狗们受到冲击，甚至还有长途奔袭，不惜跑几十里路去猎取战果，一饱口腹：

那次吃狗属于绝密行动，一旦泄密就会以“破坏军民关系”论处，因为我们的编制全称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四连一排二班”，属于“军”方。

把老乡巴图家的狗套走、勒死，然后剥皮、开膛，都是邓铁锁在野外操作的，但要煮肉必须回到班里，别处不安全。等到晚上才敢把肉切了，放在烧炕的灶火上煮，还派人在外面放哨，监视连部的动静，以防连队的干部闯进来。9点半吹过熄灯号，宿舍不能再有亮光，我们就拿被子堵在窗户上，望风的人紧紧盯住连部，直到灯灭了肉才端上来。我们住的土房里是对面两铺大炕，中间过道很窄，一盆肉放在马扎上，香气扑鼻，热气腾腾，大家喜不自禁，但是不敢大声说话。有谁夸铁锁胆大，铁锁憨憨地笑笑，甩出一句天津话：“你逗嘛逗？快吃！”第一块肉放进嘴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吃，有种期待落空的感觉。煮肉时没放任何佐料，当晚连一小撮盐也没来得及找到。尽管如此，十几个人如狼似虎地把这条狗吃了。没有洗手的水，不敢到井里去打，只用柴草刮刮、擦擦，便钻进被窝。带着一些满足，我们度过了塞北这个寒冷的鬼祟的夜晚。

面对性格凶残、永难发福的箭猪，数月不见肉味的知青中也有人打起了它的主意。某连就发生过知青深夜窜进猪圈，从活猪身上将屁股割去一大块的惊人事件……有的知青不敢在大猪身上动刀，但是敢在小猪身上动手。他们将小猪赶往粪池淹死，然后乘夜将其捞回，悄悄煮食。结果，几乎全部中毒。我们连队的知青魄力小些，不敢冒生命之危险去求饱腹之兴奋，但也有创举，或是将一细线拴着鱼钩，钩上饰有钓饵，将钩抛于邻近老战士的鸡舍旁，待寻食的馋鸡将钓饵啄入嘴里时，躲在隐蔽处窥视的知青会猛一拉钓线，将鱼钩牢牢挂住鸡嘴，然后再一步步将欲吐不能、欲叫无声的馋鸡拉近身旁，将其脖子拧断，暗藏于屋顶或床下，留待晚上食用。还有的知青在寝室内挖一小坑，内注清水，水里撒些米饭，并插上电线，待老战士敞放的鸡来啄水里的米饭时，要么电死，要么电昏，成为知青们的美味佳肴，知青中有人戏称为“守株待鸡”。

鱼塘是挖成了——因缺少运土工具，还摔坏大家若干脸盆，鱼苗也放进了塘里。正当大家在做“鱼满塘”的美梦时，有天却突然发现塘水像泥汤似的混浊，塘里别说是寸把长的鱼秧，连只鱼虫也荡然无存。后来几经周折，终于查明前一天夜半时分，有几个男生用蚊帐把所有的鱼秧都捞捕起来，连夜熬了汤。尽管为此开了几场批判会，但鱼塘却就此一直空空荡荡，成了青蛙们的“歌剧院”。

越是条件艰苦，人们的食欲越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吃”是一个热门话题。除了这样的精神会餐之外，知识青年经常盼望的是四件事：一是真正的会餐，二是到附近的城镇去“下馆子”，三是有朋友探亲返队，四是家里寄来包裹。

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元旦、春节等，都是兵团法定的会餐时间，虽然当时有“过革命化的春节”、“以开门红迎接新年”的做法，节日照常上班，坚守岗位，但好好吃一顿还是免不了的。为了让大家吃得满意，炊事班的人有时要忙好几天。此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连里也让大家动手包饺子，改善生活。在苦了一阵子之后，包饺子也和过节一样热闹，所以兵团人对饺子的回忆，总是那么亲切。

除了连队安排的会餐之外，知识青年有时还有机会到连队的“老兵”、老工人家去聚餐，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了强行“吃大户”的地步。正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四团的邹国义所说：“‘不要脸，加勇敢’。这句话在我们连非常流行，鼓舞了很多的知青。连上的老工人被知青吃顺了，吃得一塌糊涂，血淋淋的；尽管他们不情愿，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他们不行，‘怕’字害了他们。凡老工人的红白喜事，没有哪家敢不请知青的。早先他们不懂事，知青不请自到，吃了又抢又拿，要是醉了，更是五花八门。后来他们懂事了，既然请不请都是一个样，请了多少落个人情。”

在休息日外出，到附近的城镇去找个饭馆一头栽进去，吃它个昏天黑地，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享受。但是，这种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兵团的驻地，一般都远离城镇，通常往返要走几十里路。如果有顺路的汽车，可省去跋涉之苦；没有汽车就只能靠两条腿了。为了吃一顿好一点的饭，不惜步行几个小时的，大有人在。实际上回到连队后，吃进去的东西已经消耗殆尽，又是饥肠辘辘，那也值得，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云南兵团的一位知青“借曲家”还编出了这样一首歌：

兵团战士
发了工资就赶劲撒

就赶团部
皮鞋沙沙响
“拿波”闪闪光
全为了离店的碗豆糖……

赶街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十几个男知青逛到饭馆门前，碰上一笼刚蒸好的馒头从里面端出来；一个知青停下了，两个停下了，十几个全停了下来；终于，第一只手下了五爪，跟着十几只手都伸了下去，一笼馒头被抢了多半。饭馆的工作人员呆了，甚至没有一个人追上来要钱。

远离城镇的连队，连这样的口福也没有，只能利用探亲的时候补充了。当时国内客车上流行盒饭，火车上的乘客常目瞪口呆地看着兵团的女战士一个人一下子解决好几盒饭，叹息着说：“饿坏了！”

回家探亲，不只是个人的大事，也是朋友们的大事。一块来的同学，都希望你回家后也到他家看看，如有可能的话，再带点东西回来。带回兵团的东西，以食品为主。孩子出门在外，父母无不牵挂，好容易有人回来，能带东西去，还不是要什么给什么。当然，要的无非是食品和精神食粮——书。另外，也要给同班、同排的同志，同宿舍的战友们准备些好吃的，同甘共苦嘛。这样，迎接探亲的人返队，就成了知识青年的另一种节日。回来的人往往是大包小包，接站的队伍浩浩荡荡，有时甚至出动马车去接站。一到连队，马上打开提包，该吃的吃，该抽的抽。顺便可以说一句，兵团的男知青，绝大多数都抽烟，每月的津贴费、工资，相当一部分冒了烟，这也算是一种刺激方式吧。

没有人回家探亲，知识青年也有高招，让家里寄包裹。很有一阵子寄包裹成风，得出动车去拉；错把起子当白糖寄来的事就发生过数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群男知青，曾将歌曲《团结

就是力量》的歌词改成这样：

稀饭是铁，干饭是钢，
稀饭不如干饭香……
向着红烧肉、回锅肉，
向着肥肉、向着瘦肉、向着盐煎肉，
还有鸡蛋的汤！

消息传到成都，知青家长坐不住了，一时腊肉、香肠、罐头之类食品从成昆铁路、滇缅公路上源源而来。领导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有的地方宣布一律不许寄食品，发现了没收；有的领导宣称这是给生产建设兵团抹黑，不但没收邮件，还办展览，开现场批判会，指责收件人忘了本。一位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在家信中写道：“妈妈，您来信说要给我寄点吃的东西，请您千万别寄。有的人家里给邮来点心、罐头等，通讯员从团部取来包裹，连干部就给扣下来。昨天晚上，连里开了个现场批判会，展览了一桌子邮件，说这些人忘了本，要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大众吃不饱，穿不暖，我们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批判也好，展览也罢，该寄还是寄，可怜天下父母心。时间长了，领导也懒得管了。后来兵团的生活不断改善，寄包裹的就越来越少了。

有人说：“兵团是‘共产风’刮得最盛的地方，烟、酒、糖、茶等好吃的，最是‘共产’对象，故乡来的美食大家共享已成惯例。”这是放之各兵团而皆准的真理，表现的不仅是人们之间的友情，更有豁达的心胸。有苦同当、有乐同享的道德准则，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为群体意识加上了又一个注脚。

在兵团不是没有潇洒的“吃”。会餐时“管够”，曾有一名女士创下一顿吃1斤7两米饭的纪录，另一位男兵团战士更创造了

一顿吃5斤米饭的奇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野兽、飞禽、鱼类，也可以变成美味佳肴。当然，最潇洒的，还是喝酒；最令人百感交集的，是离别兵团的辞行酒。兵团初期，限制喝酒，一般在会餐时才正式供酒。但有的人需要刺激，有的人要借酒浇愁，饮酒之风逐渐蔓延。一开始下酒菜相当简单，后来居然能够摆开像模像样的宴席。“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建设兵团的这桌大宴席，最终还是散了，兵团人分向四方。在告别宴上，当然既有痛苦的回忆，也有深深的眷恋。

五 萌动的青春

一大群年轻人集合在一起，有男有女，最难控制的是人们相互间的感情。用行政手段把男女分开，简便易行，于是各兵团几乎无一例外地分建男、女班，男、女排，甚至像前面所说的建个“和尚团”，但终不能起到男女之间完全隔绝的作用。每一个连队，几乎都是男女一起劳动，同在一口大锅里吃饭。要把青年人管住，不让男女之间发展出恋情，真不是一件易事。

一开始，领导总会郑重其事地宣布：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兵团内部不许谈恋爱。一道男女之间的大墙，就这样矗立起来，并且设置了层层禁网。男女问题不能想，想想都是罪过。

强制的禁令毕竟不可能封锁住青春期的冲动。正如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六团武装连战士的天津知青潘剑秋所指出的：“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大多数知青曾有程度不同的性压抑，但性压抑与性犯罪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可性压抑导致知青出现这样那样的事也不是没有。”经常出现的“丑闻”是这样的：

经过女班宿舍窗下，听到一阵嬉笑声，他本能地转头望

去，只见女班有人裸露着上身，在擦洗。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他的心狂跳不止，他毕竟是二十刚出头的后生，青春年少，异性的强烈吸引，不禁使他多看了几眼。这时，刚好女班有人出门，正巧看到，于是一桩“流氓事件”发生了。

厄运接踵而来，领导的白眼，同志的冷嘲，以前常挂在队长嘴上的“吃苦耐劳”、“为革命苦练基本功”等等赞扬话，再也听不到了，一个曾屡次受到团嘉奖的标兵，一夜之间，竟变成“想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屯垦戍边的叛逆”、“流氓分子”。

熄灯号刚刚响过，女宿舍那边传来纷乱的嘈杂声。两个惊魂未定的女战士向人们作了如下诉说：她俩结伴小解，蓦然看到厕所墙角处有一个黑影，用手电光扫了一下，是个男人！她俩惊叫，那人飞快地跑了。

闻讯赶来的连长听完汇报，立即向四周派出了搜索的人，同时下令全连集合清点人数。天！应到的人中独独缺了一个Z……

当时是兵团初期，男女大防是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言行都被视作几乎与“反革命”同等的罪孽。人们对此类人除了痛恨，还另增了一层轻蔑。连队里没有政治罪人。Z“图谋不轨，伤风败俗”，当属头号罪人……

以这样的“罪过”被钉在耻辱柱上，戴上“小看”或者“二看”、“三看”帽子的人，后来大多带有精神压抑的症状，甚至就此改变了人生的旅途。

单调的生活，艰苦的劳动，需要精神上的调剂，尤其是缺不了异性的抚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领导摸得准着呢。缺少女性的连队，甚至会有人公开向领导提出要求。黑龙江兵团一团

的参谋长，在本团最艰苦的木耳连，就听到了来自知青的这样一条意见：“我们到这儿两年了，每天几十个汉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真没意思，干活儿也打不起精神。生活苦点没啥，谁让我们是改造对象呢。可两年了，好像缺了点什么……团里能调一班女生来，三五个也行，我们不让她们干重活，给大家做做饭。只要有女生，我们就是在这里干一辈子也认了。”领导理解战士们的心情，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很快为这些单一性别构成的连队调进了一批女知青。“和尚团”、“和尚连”对女知识青年的欢迎是空前热烈的：

当这批女青年到来之际，加工厂机器停转了，卫生队医生停诊了，商店早早停业了……尤其正赶上砖瓦场出窑，他们来不及洗涮，污头垢面地涌向道口，边跑边喊：“去晚了没有了！”欢声笑语响作一片。

女人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况是同我们同命相怜的女知青。自打女知青进了连队，连里出现了“两少两多”的新景象：带赌注打扑克喝酒撒疯的少了，不讲卫生的少了；讲究穿戴的多了，写情书的多了。从不洗澡的哥儿们精心地用香皂搓洗起那双臭脚；从不看书的，捧起书本从中摘寻情场中可用的词句；张嘴就吐脏字的，谈吐居然文雅起来；从不系裤子“风纪扣”的，出门前也注意检查起“风纪”。

男知青似乎总是主动者，女知青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并且对所谓“个人问题”有着深深的恐惧感。黑龙江兵团一位女知青写道：

“个人问题”，这个在北大荒知青中难以启齿的问题，怎

么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敢打赌，无论是外国的弗洛伊德还是当今中国数以“打”计的恋爱专家，谁都无法想象当年的兵团战士对爱情所抱有的那种嘲笑和敌视。我们上北大荒干什么来了！

屯垦戍边、反修防修，人人向往着悲壮的献身。如果是恋人，那么也就失去了献身的资格，而被知青们嗤之以鼻。偶尔有知青恋爱，偷偷见见面，一旦被发现，就会有大批知青哄着喊着：“抓猹头去啊……”跑到他们身后，大声地喊叫，直到冲散他们。

我没有加入过这样的队伍，但一听到“战况”，便感到过瘾，禁不住拍手称快……

现在轮到我了。那“消息”似乎激发出内心的骄傲。我毕竟是个女孩子啊！躁动在内心深处的青春，难以泯灭的虚荣。我感到了新奇，紧张而且激动。要知道这是一个新建连队，那么多的知青，我成了第一篇爱情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我甚至想自己是不是该认真地考虑这个从天而降的“个人问题”了。然而那甜甜的梦只温柔了我几秒钟，自责、恐惧和自尊变成了一把把利剑，刺穿了我的灵魂，罪孽感攫住了我……

我为最初那一闪念而羞愧，又咬牙切齿地想到了那些用别人的“个人问题”来消遣提神儿的庸俗无聊之辈。我恨他，恨他“满城风雨”地处理“个人问题”。

蓦地，我想起了什么，疾步向连部奔去，去向指导员交待“个人问题”……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上他头一次真诚而且也是大胆地叫我明白了一切。我拿起笔，写了一封回信，记得信中有如下的话：

我们都是共青团员，我们都还年轻，应该把美好的青春

献给事业……

出于“相信组织”的动机，把来自异方的求爱信交给领导，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但是领导的介入，反而会使矛盾激化。1970年冬季，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七团发生过这样一幕惨案：

有位小黄姑娘，长得白白净净，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很动人，加上性格活泼，爱笑爱闹，恰好连里哈尔滨知青小江看上了她。

小江在武装排，自恃出身好，根正苗红，胆大无边，利用打水的机会，塞给小黄表示爱慕的信。小黄那时才十六七岁，单纯得像个孩子。来兵团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的，谈情说爱，岂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何况正在积极争取入团呢。于是她便不假思索，把信交给了指导员。

指导员认为如此大事，岂可等闲视之！马上召开全连大会，当众宣读了这封信。小江一听气炸了，当场与指导员争吵起来。为了镇住局面，指导员立即命令两个知青手持冲锋枪把小江看押起来。小江傻眼了，心想武装看押，必是敌我矛盾，哪还有生路可言？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顿时萌发了杀人自戕的念头。那两个知青挖了一天土方，熬到半夜便支持不住睡着了。小江便偷了武器溜出来，准备先杀小黄出气。谁知走错了宿舍……小江见杀小黄已不可能，索性把一梭子弹向这间屋里扫去。屋里六人，两死两伤……小江随即冲到晒场，爬上豆秸大垛，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自杀了。火光冲天，尸体烧成了黑木炭一般。在他跑过的雪地上，偏偏留下了一本残破不全的《普希金诗集》。于是一时间议论纷纷，大意为这种大毒草害死了小江……

死去的固然可惜，活着的又何尝容易？“人生如逝水”，就

这样地流去了么……

六 苦 恋

感情的火花，一旦迸发出来，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遏制的。勇触禁网的男女青年，在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有，他们走的几乎都是艰难曲折的恋爱道路。

兵团组建初期，领导对于男女之间偷偷建立恋爱关系的知识青年，无不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并由此酿成过悲剧：

1969年，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满怀崇高理想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领导三令五申：兵团战士不许谈恋爱，男女不许单独说话。心理定势形成了，我们认为，男女之爱是肮脏的，只有同志的情谊才是可贵的。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将男女接触视为洪水野兽，但那些年龄长我们几岁的知青，却按捺不住青春的骚动，男女间开始偷偷交往。晓兰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晓兰同马车班长大黄相爱了。大黄是来自农村的复员战士，32岁。大黄准备回老家探亲，临行前向连队打了结婚申请报告。报告说，他与晓兰相爱，探亲回来即结婚，然后匆匆赶回河南，向老父报喜。

连首长们震怒了：居然敢提出结婚！准备开批判会，大黄不在，就拿晓兰开刀。杀一儆百，看谁以后再敢干这些无法无天的事。

晓兰逃跑了……她要去找大黄，要和大黄按农村习俗举行隆重的婚礼，然后双双返回连队。那时他们将是合法夫妻，谁还会再批判他们呢？

他们回来了……晓兰、大黄被分别关了禁闭……女生排开批判会，斗争晓兰……我们义愤填膺，“批倒晓兰！”呼声四起……接着是全连的斗争会。“把大流氓大破鞋晓兰押上来。”随着一名男知青愤怒的吼声，晓兰神情木然地走了上来……批斗会进入高潮，凡是平常有过接触的男女都被点了名，受到了严厉警告。

两个月后，处理意见终于下来了。晓兰交群众监督改造，大黄被遣送回河南老家……知青大返城，晓兰终于得以去河南和大黄团聚。

“什么恋爱？这叫乱爱！”

“恋爱？”这真让人心扉颤动。刚到兵团，我们所有知青的年龄都仅在17岁左右。“恋爱”——对我们这个性发蒙的年龄，还是一个羞于提及、似带贬意的词儿。连长这是在骂谁呢？

……

秦国建的好朋友捎话给琦云，说秦国建真的喜欢她，而且就是为了她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的。当时，琦云是向有关领导写了血书才得到了扎根边疆的资格，面临从此音讯两茫茫的危险，秦国建心一横，舍了参军入伍的光荣前途，转而报名支边了。

听罢此言，琦云心头翻了五味瓶。想不到竟然有人为了自己作出这样大的牺牲！可是，她并不想就此依傍并未爱过的秦国建，为了对秦国建，也为了对自己负责，她约请秦国建尽早一谈，哪知会有好事者密报了连长。

当晚，连长接到信息，立即率领几个民兵扑到田坝里，想来个“捉奸捉双”。结果呢，琦云快刀斩乱麻，早就三言两语，了结了秦国建的单相思。连长一行人扑了个空，在冷嗖嗖、空

荡荡的田坎上转了一圈，回来就气急败坏地紧急集合，大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本来就不成其为事实的一个幻影，反而无中生有地作了被批判的众矢之的……

秦国建的痴心是有目共睹的，可他俩志趣不投也是有目共睹的。此后，他们共同经历了调离兵团的艰难，在极平常的气氛中，例行公事地结了婚。琦云凭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因才华出众，当了高等学府的教师，有学术专著出版。而秦国建成为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人，业余牌手。两人始终没有情投意合，前不久协议离婚了。他俩都曾分别告诉我，总算了结了一个梦……

因为正当的“恋爱权”被剥夺而自杀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女战士写道：“一位曾在云南农垦总局青年科工作过的朋友告诉我，那时他们每年都要统计一种报表——知识青年死亡情况统计表。在‘非正常死亡’一栏里，排第一位的是自杀人数，而在自杀人数中排第一位的，则是因未婚同居和恋爱纠葛而自杀身亡的。”

禁网是被慢慢撬开的。对兵团战士中的高中和中专毕业生，谈恋爱的限制逐渐放松，并终于允许他们结婚，于是各连队先后出现了“第一对”知青夫妻。但是，对初中毕业生的限制并未因此而作废。彻底地放开，是在1974年之后，兵团面临解散的前景，领导不愿再过多地干涉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而且多数知青已经是大龄青年了。男女之间的大墙终于坍塌了。一时间，交朋友、谈恋爱成了时髦的风气，从北疆的兵团一直刮到南方的团场。所有的秘密在几天内就全部公布于众，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暗地里隐藏了如此多的恋情，似乎大多数女战士都早已有了恋人，有的男士乃哀叹“地球已被瓜分完毕”。兵团后期的这种大开放，造成了对前期限制政策的反冲和嘲讽，人们的行动终于自由了。

爱情是崇高的。正如一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所说：“兵团战士的爱情，纯得透明，不掺杂半点‘铜臭’，也没有物质与权力的交换。在这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兵团战士心中，‘爱情’是神圣崇高的字眼，在他们的‘爱情天平’上称的只有‘情爱’……”他自己对爱情的感受是这样的：“兵团战士的爱情像‘苦茶加糖’，鲁迅先生说‘苦茶加糖其苦味如故’，但其中的甜蜜，毕竟给苦涩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和欢乐，艰苦的兵团生活也使我们更加感到爱情的甜蜜”。他和他的恋人，就是经过了多年的爱情交往，终于在1977年建起了幸福的家庭。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知青也有同感，他认为：“想想上山下乡有九弊而存一利，那就是透明度高的恋爱观和爱情观。”他的感受是：“生活、爱情真是奇妙，无限的苦闷被津津有味的闲扯冲淡，在这闲扯中写下了历史的一页，引来了我终生享用不完的欢乐。”正是在这样的爱情驱使下，有多少兵团知青完成了恋爱、结婚的重大人生历程，谁也说不清。年轻人的初恋，即使最终没有完满的结果，依然会深深地刻在他们心中。一位内蒙古兵团的知青，至今仍忘不了他在兵团的恋人、被骨癌夺去了生命的珊妹。一个黑龙江兵团的知青，今日依然对着兵团恋人留给他的纪念物怀旧，还是孑然一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面。当人们开始公开选择恋爱对象的时候，正是知识青年们最苦闷、绝望的时候，知青看不到未来的出路，对枯燥的劳动、学习已经厌倦，只有男女间的情爱才能给人以刺激和消磨时间。未来的家庭生活，在多数人心目中只有一个恍惚的影子，先爱起来再说，走到哪步算哪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于是，就有了未婚同居、未婚先孕、未婚先育，也有了匆匆忙忙的结婚和离异，甚至也会产生一些悲剧。黑龙江兵团三十一团的寒歌和雁梅是一对恋人，在谈恋爱期间，雁梅怀孕了，他们一起返回了哈尔滨：

可哈尔滨迎接雁梅的，是父母的盛怒。邻里多年的两家人也反目成仇。她的父母到寒家大闹，坚决反对女儿与寒歌的婚事。

这能怪谁呢？能怪父母吗？知青成婚，就意味着永远的“扎根”，更何况，“未婚先孕”，过了线了，还能不受到惩罚？受惩罚的人还能回城吗？

然而这一切却动摇不了雁梅的心，她深爱着寒歌，也有这爱的结晶，她死心踏地地跟定了寒歌。

父母管不了女儿，就把雁梅赶出了家门。含着泪，这对有情人带着刚刚满月的孩子，回了连队。

……含辛茹苦的生活，无脸见人的压抑，丈夫的顶撞，种种辛酸、苦楚，一齐涌上雁梅的心头，她精神崩溃了，泯灭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趁寒歌不注意把一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寒歌失去了雁梅，接着又失去了自由，莫名其妙地被判处一年徒刑，说他迫害患难的妻子，致使妻子死亡。可怜的寒歌，在劳改期间，又摔断了锁骨。

1973年9月25日，上海市赴兵团检查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进行调查后指出：一师四团知识青年发生男女关系的有114起，怀孕26人，人工流产18人，生小孩20多个。一团1至6月到医院流产的162人，三团四营生小孩32个。别的兵团也有类似的现象，只不过不像云南兵团这样严重。为了离开兵团，有一些女知青不惜托人在地方单位找对象，工人、干部、解放军都行，就是不找农民和知识青年，无怪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把女知识青年称为“全国粮票”。而当“回城风”侵袭兵团的时候，又无情地拆散了许许多多的恋人、夫妻。1979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大返城期间，甚至发生了回城知识青年弃婴的事情。邓贤在长

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里，记述了其中几个悲惨的小故事。兵团知识青年的爱情和婚姻，用曲折和苦涩来形容，绝不过分。

七 病伤的困扰

生活节奏紧张，长期缺乏营养，繁重的劳动，混乱的管理，是导致疾病流行和工伤事故屡发的主要因素。经过生产建设兵团多年的磨练后，许多人带病或带伤，身体状况欠佳。1978年5月云南知青办的《情况反映》中关于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身体状况的报告，虽然是晚了些，仍足以作为代表：“上海知青慰问团在我省农场部分连队进行卫生健康调查。调查结果，知青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例如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现有上海知青64人，验血结果，贫血者达43人，约占70%。血色素男性平均9克，女性平均8克，最低只有5克。另外，知青几乎100%患有胃病、风湿关节炎、肝肿大和营养不良等多种疾病。”

情况确实如此。各兵团最普遍的内科疾病是消化系统病症：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胃穿孔，这是由营养不良、生活不规律等因素造成的。呼吸道疾病也是常见病症：气管炎、肺炎等，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过度的饮酒、吸烟是主要的病因，有些工业连队甚至出现了早期矽肺的患者。此外，还有肾炎、肝病等病症。至于一般的感冒发烧，在人们眼中不算什么病，抗一下就过去了，最多是歇几天。最普遍的妇科疾病是月经不调、痛经，潮湿、阴暗的住房和持续不断的水中作业，是导致妇女病的主因。最常见的外科疾病是骨伤、劳损和关节炎、骨质增生，超强度劳动和工伤事故，造成了这些不流血和流血的内伤与外伤，至于碰个口子，蹭破点皮，出点血，或者砸伤手指、脚趾，更是司空见惯。

我们不妨举出大批人患病的实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六团的一个连队，在严冬季节连轴转，加班脱粒，不久就病倒了

一大批人。“患病的知青蜷缩在被窝里，咳嗽声此起彼伏，受寒感冒的，扁桃腺发炎的，引起气管炎、肺炎的。有的冻伤了面部或脚趾，有的尘埃过敏，浑身泛起荨麻疹，还有的引起肠炎、腹痛腹泻”。指挥会战的连长，也是发烧带咳嗽。

与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相比，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医疗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每一个连队几乎都有卫生室，有医生（军医或所谓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团场有卫生队或医院，至于师和兵团级的医院，医疗设备和医生的配置，甚至优于中小城镇的医院。以黑龙江兵团为例，1969年兵团在哈尔滨王岗建立兵团医院，编制床位500张，工作人员570人，随即相继成立各师医院，一师医院1969年建成，床位400张；二师医院由汤原医院改名，床位400张；三师医院1973年建成，床位500张；四师医院由裴德医院改名，床位400张；五师医院由九三农垦局医院改名，床位400张；六师医院1970年建成，床位300张。各团卫生队均由原农场医院改名，各连队设卫生室。到1975年末，黑龙江兵团共计有团卫生队74个，各类卫生所2532个，病床7712张，医疗、卫生人员16437人。1972年，云南省将上海下放的两个医院交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分别设在一师和三师，使云南兵团的医院增至12所，卫生队149个，病床1600张，卫生员达4530人。广州兵团师以上医院有7所，全兵团专职医疗人员1.01万人，其中医生562人，医士2580人，护士6781人。

正因为各生产建设兵团有较好的医疗条件，急重病人才能大多得到迅速治疗，不致于丧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的一个知青，打蒲草时镰刀砍在脚上，流血不止。连里的军医不慌不忙地为他缝合了伤口。当时连队一无电话，二无卡车，距师部医院四五十里路，如果没有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医，很可能因失血太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内蒙古兵团某团的一个卫生员，面对一位女知青的开放性骨折，采取了紧急止血措施，并立刻组

织人把伤者送往团部卫生所。伤者后来又被转送到师部医院，继而回北京住院治疗，终于痊愈返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二团的卫生队，曾挽救了一个因救火而全身烧伤面积30%的女知青的生命。黑龙江兵团十九团，康拜因把一个人的腿卷断，在场的人马上做了止血处理，并用拖拉机送往团部医院，团里闻讯后又派汽车来接。因送得及时，又有兵团战士们献血，此人虽高位截肢，但保住了生命。

兵团驻地附近的老乡，也能从兵团的医疗系统中得到些好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六连的卫生员，在一个大风之夜使一名难产的蒙古牧民脱险，母子平安；二师十二团五连的卫生员，不但治好了附近农村的小孩腹泻，还治好了左肩脱臼的小姑娘。

兵团的卫生员，大多是经过短期培训后即背上了药箱，完全靠自己的摸索给人看病治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的卫生员朱丹写道：“到连队不久，我就被连队领导派作卫生员到团部卫生队集训3个月。3个月的培训跟我后来在医学院校接受的正规教育相比，真是原始极了。各连队来的卫生员围坐在乒乓桌旁，每人手捧一本书，由一位从医专毕业的医生，按顺序从头到尾把书念一遍，讲一讲，没有感性认识，也没有具体实践。就这样讲完一本再换一本，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依次念完讲完。3个月眨眼功夫，我就算是出师了。回到了连队，开始行使连队卫生员的职责。”

但是对于慢性病，医院的功能只能是给药、住院治疗和开病假条、营养证明，而且多半治不好，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因病死亡的例子并不鲜见。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8—1972年，病死知识青年达102人，另因医疗事故死亡知青3人。五十二团的一个上海女知青，因长期睡冷炕，大便出血，且不肯休息，最终死于直肠癌。三团的一个女知青，死于“出血热”（一种鼠疫），年仅18岁。五十五团一位知青胃出血，抬到医院急救，需要献血。

一个献了血的知青，后来又日夜看护病人，不久突然死于心肌梗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个19岁的北京知青，死于不治之症。1972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瘴气”肆虐，5个知识青年相继死于“脑型”疟疾。

艰苦的劳动和恶劣的条件，往往使人们喘不过气来，休息的欲望与日俱增：

女知青也略有喘息机会。我曾读到一页文件，它是从人道主义的或是卫生劳保角度规定的，大意是说，妇女经期可以给3天例假，不下水田，但应从事其他劳动。

开初，有人羞涩，不敢说自己来了那个，但是后来，在繁重的活路压力下，羞涩宛如一道薄薄的轻纱被撕破。越来越多的人申请例假，班长排长来叫上工，每每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我来例假。”

男知青好羡慕，心里也有了牢骚，就在连长面前说：“我也要请例假。”……

妈妈，炎热的夏天又来了，你知道吗？炎热的夏天来临意味着大战红五月红六月开始。每天强劳动在10小时以上，全身疼得恼火，人像要死了一样。妈妈，我多么想害一场病啊，好好生生睡几天。

有的人为了能休息几天而装点病，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人们还颇有些羡慕那些休病假的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团的陈翔军，有这样一段回忆：

伤筋动骨、生疮害病是人生的不幸。然而当年我们连队的知青们却不这样看。谁要是生了病，虽然仍去问候一番，以

示关心，但骨子里却认为他娃划得来，可以在家耍病假，免去其他种种痛苦。即使得了大病，只要不丢掉性命，也被看成是得失相当的事。相反，为自己伤口不发炎化脓，病快好了而愁眉苦脸、耿耿于怀的却大有人在……其中不少病号有诈。就我所知，我们连就有在胳膊窝下夹热毛巾量体温的，有在小便中放入红颜料冒充血尿的，有用高锰酸钾与维C配制药水涂改病情证明的，甚至还有人硬要把苍蝇、蚊子、臭虫往自己伤口上放，寄希望于灌脓生蛆的。大家如此劳神费力无非是想找个借口获得片刻的安歇。

然而最有魅力的还是要工伤。工伤是“功臣”，不扣工资，耍得心安理得。那时连上有个不成文规定，大家都背熟了：“小蜂子耍3天，大蜂子耍7天，铲掉脚指甲半个月”……

在生产建设兵团得了重病或残废的知识青年，会很快被兵团退回城市。这似乎是一种解脱，但实际上是另一种痛苦的开始。难怪有人这样说：“我们还以为为革命献出身体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应该受人尊敬。结果很严厉，既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那么如果有一天这本钱不给你脸了，你还能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革命’呢？”

第十一章 文化贫乏综合症

知识青年最爱读《参考消息》——报道员向诗人、作家挺进——“三员、二队、一室”——靠“样板戏”走红的宣传队——当年中国只有两位电影明星——“黄歌”与“黄书”——“吹”出来的“地下文学”——重温中学课本

一 兵团报纸

生产建设兵团是年轻人集中的地方，渴求知识、追求文化享受、希望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这些都不是非分的要求。但是在“突出政治”的高压气氛下，不仅人的个性被抹杀，正常的文化活动也经常被视作“资产阶级洪水猛兽”，并由此给一代青年带来了知识贫乏和同样扭曲的文化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是公开发布党中央声音的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在这几份报刊上发表的社论、最高指示等，马上就成为全国的重点学习文章。生产建设兵团当然也不例外，每个连队都订有这些报刊，但份数过少，人们看报需到连部或阅览室。有的地方重视看报读书活动，给每个班订一份《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

加上一份《红旗》杂志。后来也有少数兵团战士个人订阅报刊杂志。

和“两报一刊”相比，《参考消息》比较受人们的欢迎。但当时只允许党员订《参考消息》，于是有些知青借用党员的名义，成为《参考消息》的忠实读者。毫不夸张地说，《参考消息》是当时最受知识青年喜爱的报纸，每天的报纸都有很多人传阅，有时报纸来后，就被别人拿走，数天后才能回到主人手中。报纸也是生产建设兵团“共产”的对象之一。

主管各兵团的解放军大军区，一般都办有本军区的报纸，如北京军区的《战友报》等。这些报纸也下发到直属的生产建设兵团。此外，各兵团还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友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兰州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民军垦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政工通信》，等等。这些报刊，一般都定期发放给各班组。

生产建设兵团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自然不乏爱动笔杆子的人。兵团报纸的“报道员”，不少是基层的笔杆子；有些记者也是从基层连队抽调上去的。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兵团的每个连队都设有报道组，负责出黑板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报道组成员都是兼职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十连报道员刘建禄的回忆，很具有代表性：

兵团从上到下对宣传报道工作是相当重视的。兵团机关专门创办了《兵团战友报》，师政治部和团政治处都设有专职的新闻干事和报道组。连队一级有业余报道组。我刚参加兵团不久，荣幸地成为十连业余报道组的一名成员，组长由副指导员兼任。

业余报道组是名副其实的业余。报道组的成员白天参加

劳动，每隔半个月左右开一次会。开会大多数是利用晚上时间或休息日。布置任务后大家就分头去写。我们写连队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动态，写好人好事，写一些诗歌、散文等。写好后，经副指导员审改，然后寄往《兵团战友报》、《巴彦淖尔报》、《内蒙古日报》等，有的则送到团政治处。

要写成一篇稿子确实不容易。采访、打草稿、誊抄等，大都要靠业余时间进行……尤其感到困难的是参考材料缺乏。当时，每个班只有一份《兵团战友报》，连部才订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内蒙古日报》、《战友报》几种报纸。班里的同志见我老写，却不见登报，有的说：“大秀才，什么时候能在报上见到你的大作呀！”有的说：“咱们干活就行了，写那玩意有啥用！”倒是指导员常鼓励我们：稿子能见报最好，见不了报我们也是在练笔，团政治处办的《简报》不是常用我们的稿子吗？

1969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在连部翻阅《内蒙古日报》，突然惊喜地看到：10月1日的《内蒙古日报》四版上，刊登了我写的一首“军垦战士心向党”的诗歌。

有的报道员不满足于连队的黑板报，于是自己办起了连队小报。1970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一个连队的报道员，既不满足于连队的两块黑板报，又有感于一周一期的《兵团战士报》不能解渴，决定自办一份小报。小报定名为《红哨兵》，办报所用的油墨、纸张、钢板等都是报道员们用自己的钱买的。参加办报的人白天劳动，晚上写稿，还要挖空心思为报纸设计内容。小报刚办得有了点名气，上级机关就派来了工作组，先借检查“一打三反”名义盘问油墨、纸张的来源，随后干脆不加解释地将该报查封，后来人们才听说小报被查封是由于搞了“多中心论”，冒犯了《兵团战士报》。1971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一连，同

样办了一份连队油印小报《只把春来报》，也是由连队的报道组搞起来的。

连队的报道员工作出色，笔杆子过硬，有时就会被团场负责宣传的干部发现，上调到团场任专职报道员。“王亚卓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邢卓，原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九团一个连队的报道员，既有写作才能，又有刻苦精神，得到团里宣传干事的赏识，1970年被推荐参加了《内蒙古日报》开办的通讯员培训班，回连后陆续在《光明日报》、《内蒙古日报》、《兵团战友报》、《巴彦淖尔盟报》发表文章，不久即调到团部报道组工作。上面提到的刘建禄，后来也被调走当了团部报道员、新闻干事。

为了提高团场报道员的写作能力，各兵团还经常举办培训班、写作班甚至创作学习班。1971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佳木斯总部举办文艺创作学习班，集中了各师的创作骨干40余人，参加学习班的李云龙、梁晓声、肖复兴、陈可雄、陆星儿、郭小林等，后来在文学创作上都颇有作为。同年1月10—14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政治处主办的宣传报道学习班，吸收了各营的业余报道员39人，在学习先进报道单位沈阳军区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本单位的宣传报道工作进行了总结，建立健全了全团的通讯报道网，团部由政治部主任负责成立了5人组成的专业报道组，并要求各营迅速成立1—5人的业余报道组织。1972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思茅总部举办了小说创作学习班，鼓励工农兵杀上艺术舞台。1973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以兵团报社名义举办了一次创作学习班，集中了兵团的写作尖子，如《疯丫头》的作者马沛然，《黄河的女儿》的作者禾菱，女诗人雷霆，搜集了10万多字兵团轶事的赵大卫，等等。创作班准备把班内创作的作品编成一本集子，定名为《春苗》，但因作品都未涉及“阶级斗争”而夭折。同年11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同研究决定拍摄新闻纪录片《风华正茂》，反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团八营五

连指导员、上海知识青年沈瑾瑾的事迹。

当时能够公开拿出来作品，虽然受时代的限制，烙上了“左”的痕迹，但不失为兵团文化的一种反映。尤其是兵团战士创作的诗歌，更为其突出的代表。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因擅长政治抒情诗而被奉为黑龙江兵团诗坛的“第一小提琴”。他曾著有《誓言》、《万里长江横渡》等诗。1972年，郭小林应《兵团战士报》之邀，写下了长达100行的新年献诗《战士爱边疆》。1973年元旦，《兵团战士报》再次邀请他写新年献诗，于是又有了130行的《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在《战士爱边疆》中，郭小林对边疆作了如下描述：

边疆啊边疆，
每天都是你第一个迎接东升的太阳。
祖国的每一个工作日的第一声汽笛
首先在你这儿拉响！
边疆啊边疆，
你是祖国最年轻的新乡……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邢晓南，曾在《人民军垦报》上发表《戈壁的海洋》一诗，对西北边陲的讴歌，同样充满激情：

眼前是一片浩淼的“海洋”，在阳光下泛着万点金光。一排排波浪随风涌起，消逝在无边无际的远方……

几只红色的船——没有帆，也没有桨，徐徐地驶过海面，传来一阵阵马达的轰响。

三年前，这里还是茫茫的戈壁，哪里来的这一片汪洋？莫非是太阳耀眼，还是海市蜃楼的幻象？

啊，这不是水的海洋，这是万顷稔熟的麦浪。军垦战

士——这戈壁滩上的“渔民”，正驾驶着钢铁的“渔船”，在起伏的金波上乘风破浪！

《兵团战友报》1973年4月20日登载的连山的《请转告妈妈》，寄托了内蒙古兵团战士的情思：

金鼓银锣猛烈地响，军垦新歌尽情地唱。慰问团的同志就要走了，边疆的山水连着故乡。

战士挎枪致军礼，话没出口心要跳出腔。首长，请转告妈妈，我爱上了边疆。

我和亲人隔着千里远，阶级的温暖和故乡一样。边疆迎接我的是一片荒沙，我给边疆的是共产主义理想。

毛主席领导的兵团战士，铁锹大镐开发千里宝藏。首长，请转告妈妈，我爱上了边疆。

春到塞北红旗飘扬，万古沙漠换上新装。公路纵横渠道如网，绿洲各处麦浪金黄。

鸭鹅成群鲤鱼跳浪，牛羊遍地哈密瓜香。首长，请转告妈妈，我爱上了边疆。

两年前还是温室的嫩草，两年后红柳战胜了沙浪。党的雨露滋润我扎根，党的阳光沐浴我成长。

掏尽红心向亲人们汇报，屯垦戍边无尚荣光。首长，请让妈妈放心，我深深地爱上了边疆。

兵团战士们还创作了不少旧体诗词。下面摘录的是留在旧笔记本上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两首词：

江城子 采石兵

朝阳破晓战士迎，

钢筋骨胜青松。

风钻一吼千山能踏平，
酷暑严寒奈我何。
苦更战，
甜在心，
登山更攀高峰顶。
放眼量，

全球红，
青石奠基共产大厦营。
三山五岳听谁令？
天公叹。
采石兵！

沁园春 纸厂颂

万水泉畔，
马达轰鸣，
歌声震天。
望纸厂内外，
苇草如山，
流水潺潺，
纸浪飞翻。
阳光雨露，
颗颗红心，
兵团战士干劲添。
进厂房，
看白云红霞，
溢满车间。

不禁回忆当年，
学大庆工人，
齐奋战。
老首长领先，
战士参战，
自立更生，
排除万难。
挥汗如雨，
繁星夜伴，
纸机飞转笑声甜。
看如今，
举大庆红旗，
永往直前。

生产建设兵团通过正常途径培养的一批笔杆子，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兵团办报和宣传工作的需要，也为后来中国文学界和文艺界储备了一支新生力量。不少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诗人，就是从兵团时期开始的写作生涯。

二 “样板戏”与看电影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盛行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其他文艺节目。各生产建设兵团大多在师、团一级组织半脱产的宣传队，边劳动边排练节目，并到基层单位汇报演出。连队普遍建立“三员”（教歌员、板报员、夜校教员）、“二队”（文艺宣传队、球队）、一室（图书室），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连队的业余宣传队，经常自编自演一些紧跟形势的小节目，或把连里的好人好事搬上舞台。逢政治性的节日或重大活动，各宣传队还要进行文艺会演。

兵团的知识青年中不乏多才多艺的人，再加上少量专业文艺团体的下放人员也流落到兵团，所以团以上宣传队都颇具水平，经常能造成轰动效应。当时全国盛行“八个样板戏”，各宣传队都把演出样板戏作为主要任务，起码演出片断，高水平的则演出全剧。八个样板戏中最常演出的是《红灯记》、《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能唱几嗓子京剧的人就成为当时各单位争夺的宝贝。有的连队宣传队也能排练出大部头的样板戏全剧。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六连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三团一个连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都曾有过这样的壮举：

70年代初，全国都在普及革命样板戏，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娃娃兵也斗胆排起了京剧《红灯记》。清晨，当战友们睡梦正酣的时候，我们就早早起床到水渠边去吊嗓子、练功夫。盛夏的中午灼热难耐，我们顾不上午休，到远离营房的沙包里练锣鼓、练拉弦。夜晚，我们常常是忍着蚊虫叮咬排练到深夜……恰巧团部的放映队到连里放映彩色电影戏剧片《红灯记》。这天赐的良机我们哪里能够放过。队里派出我们几名

骨干，跟随放映组翻沙包、踏泥泞在各连队转了一圈儿，看了7遍电影，硬是把《红灯记》背了个滚瓜烂熟！我们的功夫没白下……几乎排完了整本戏。我们的戏多次参加团里文艺汇演，还应邀到兄弟连队演出，得到了官兵一致的好评。

虽说当时“八亿人口八个戏”，艺术圣殿被死死禁锢着，然而，在我们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业余生活中，唱唱跳跳调剂一下生活，大家还是兴味十足……百十个知青的连队，凑起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只几个月的功夫便排练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三台戏全本，另外还有《海港》、《奇袭白虎团》等剧目的折子戏。

其实就是这么几个人……李玉和、杨子荣二合一了；阿庆嫂和李铁梅凑对，后来又捎上了江水英；几个老太太倒好对付，沙奶奶、李奶奶由年轻点的方海珍全饶进去了。难得的是这些知青把人物没有搞混，表演得也不错，匪气十足的杨子荣，转眼间就是新四军的“伤病员”，再不就手提红灯四下看。

好在当时“样板戏”是天天播，反复播，几个台同时播，不要说尽心尽意地跟着学，即便听也听熟了、听会了，所以我们学唱并不难。作派难了点，只能天天看电影。

业余文艺团体演出，难免“走板”，闹出一些笑话来。内蒙古兵团某连队宣传队演出《红灯记》的“刑场斗争”时，把“带李玉和”的台词念成了“带李铁梅”，口误者发现错误后，灵机一动，又加上了“她爹李玉和”，一时全场大笑，此后即传为笑谈。

兵团战士敢想敢干，除了排演现代京剧外，还向芭蕾舞挑战。云南兵团二师，在1972年春节举行了下属3个团、4个独立营和师部宣传队的文艺会演，九团宣传队排练的芭蕾舞《红色娘子

军》全剧受到好评，后来又在附近驻军和地方单位进行了多场演出。当时的演出完全是土法上马，服装几乎全用麻布、纱布染色后缝制而成，上面的花纹，有的是涂银粉，有的则用纸贴。演员们抓紧一切时间进行排练，甚至走路时也在跳，并一身兼好几个角色，身上重重叠叠地穿五六件衣服，再根据需要一件件地脱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二团三连的宣传队，服装、道具更为简陋，也排出了《红色娘子军》全剧，演出了二三年而不衰。该兵团十七团宣传队的《红色娘子军》，更是闻名于兵团内外，从全团到全师，从包头到呼和浩特，不断为兵团战士和边疆军民进行巡回演出，但不幸出了事故，在为黄河南岸的二十团演出归来的途中，演洪长青B角的北京知青苏士龙和乐手、天津知青贾凤岗不幸被淹死。黑龙江兵团十九团宣传队排演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同样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1971年，他们作为兵团代表队参加了沈阳军区文艺汇演，并代表军区慰问野战部队和东北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工矿企业；1973年，参加了黑龙江省知识青年文艺会演，受到文艺界的好评，兵团战士称他们是北大荒一支“绚丽的芭蕾之花”。

团以上的宣传队，是知青文艺爱好者向往的地方。有的兵团允许宣传队员佩带领章帽徽，用来扩大影响，但衣服还是“兵团绿”，更引来人们的羡慕。但是宣传队一旦到正规部队去演出，这一套就不灵了。按照云南兵团一位女战士的说法：“人家热情的很，往往等你一拢就来个夹道欢迎，一队人马明摆摆地从这么多热烈的打量中滤过，嘴里喊着向兄弟部队学习，心里发虚。觉得自己像伪军一样。”尽管如此，各级宣传队还是尽职尽责地不断演出，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活跃气氛。根据云南兵团1973年的统计，兵团组建3年来就曾派出宣传队2379人次。有的宣传队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要让每个贫下中牧看到我们的演出。大场演出之后，还要化整为零，分头到零散住户家中去演出，节目不过

是几段样板戏清唱，几个对口词、快板。当时颇为流行的节目还有枪杆诗和“三句半”等。

编排节目，政治标准是首要的。有人在1970年录下了关于编排节目标准的一段话：“编节目：塑造英雄人物要贯穿一条红线，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共产党；一个主干：揭露阶级敌人，与无产阶级的敌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个主要方面：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当然是当时形势下的产物，也只有按这样的政治标准排练出来的节目，才可以上演。

看电影是当年兵团最高级别的文化生活，和过节吃肉、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一起被列为三大好事。可惜那时大部分电影被禁演，只剩下“样板戏”和可怜的几个电影翻来覆去地放，人们都能倒背如流，常常是银幕上演员说上句，观众在下面接下句。八大样板戏之外，允许放映的文革前拍摄的电影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俗称“三战”）、《英雄儿女》等，文革中拍摄的《火红的年代》、《第二个春天》、《春苗》、《红雨》乃至《创业》，有时也组织放映。能够拿出来演的苏联影片，也仅有《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几部。此外，还有一些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影片。知识青年幽默地为各国电影的特征作了说辞：中国电影打打闹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苏联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锣鼓小号……人们比较喜欢看的是《英雄儿女》和苏联影片，偶尔演场好电影，人们早早地就去等着，可是也有扫兴的时候：

偶然，为了配合形势，放映一部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人们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影片中较精彩而且优美的片断，便是芭蕾舞《天鹅湖》中白天鹅与王子的双人舞。

当影片演到双人舞的特写镜头时，突然，画面变虚，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用手揉眼睛。当观众们莫名其妙的狐疑还未

驱散，画面却又变实了。原来，这是我们的孙组长，一位复员老兵，一个严肃有余的人，以十分娴熟的技巧，迅速而准确地使影片画面“虚实得当”，避免“资产阶级”镜头污染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视线。

当时看电影也要和政治结合起来，看了《卖花姑娘》要“忆苦思甜”；看《英雄儿女》前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语录；更不用说看了样板戏电影后要组织学习讨论了。为了体现战斗作风，各连队看电影时要集合队伍，排队前往，战勤连有时还要打上背包、背上枪，为的是预防战争突然发生。电影太单调了，“加片”就变成“正片”，从新闻纪录片中可略知国家大事，以弥补消息闭塞；看中央首长出国访问，可以领略到异国的风情。有人戏称，当时中国的电影明星只有两位，一位是周恩来总理，一位是西哈努克亲王，因为他们经常出现在新闻纪录片中。有时为了看场电影，人们不惜往返几十里路，由此可见当时文化生活的匮乏。几位黑龙江兵团的战士在看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加拿大等四国的纪录片后，感受到了极大的反差：

银幕上，那从未见过的立交桥，高速公路，摩天大楼的灯海，密如蚁群的车队……朝我们滚滚而来。尽管只是作为背景一闪而过，尽管早看过“四访”的哥儿们详述备尽，我们的心灵还是被强烈地震憾了！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看到和想到，那些常被挂在嘴头的“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一个小时飞快地过去了。我们带着一身暖气儿与人味儿，踏上归途。雪已经停了，月亮从薄云后朦朦胧胧地洒下些光来，雪原的荒寂苍凉一展无余。路旁，枯草抖索；远方，零零落落地散着三几个残破的砖窑……眼前的寥落，与刚才的

画面形成了极鲜明的反差。大伙儿心头，忽然涌出股无名的委屈与失落。

三 歌喉引来的麻烦

文化大革命中，最走红的歌曲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下定决心”、“沁园春·雪”一类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歌曲。文革前的大多数抒情歌曲和几乎所有的外国歌曲，一律被斥之为“黄歌”，不许吟唱。但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颇重”的一部分知识青年，总会情不自禁地哼出几句来，并引来一身麻烦。一首《敖包相会》，使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女战士不但五好战士没评上，还被扣上了“爱唱小资味很浓的歌”的帽子，并受到如下的盘问：“革命歌曲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为什么不能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一团的歌唱者，更为此遭到毒打，并以“唱黄色歌曲，麻痹人们神经，毒害贫下中农”的罪状告到团部。类似的例子简直是太多了。甚至连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也被视作地地道道的黄歌，敢公开唱者也会受到批评。有些领导不愿深究这种事情，对唱“黄歌”的处理轻描淡写。内蒙古兵团某连知青朱山，在五四青年节聚餐后用提琴拉了几十首中外名曲，最后以“送君送到大路旁”结尾，被听众之一用左手写匿名信告到团政治处。虽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时期，本连连长还是用轻松的方式缓解了矛盾：

连长果然一开口就上纲上线……调门不减，却弦外有音：“听说有个黑干子弟，唱什么送君之类的黑歌，公然为彭德怀招魂！”

连长这句话果然有震慑力。百多双眼睛“刷”地转向朱山，却见朱山双手抱肩，那抬头眯眼看游云款款飘荡之状，好

个超脱入定。

队列里开始骚动，空气陡然松弛。张连长原精明过人，本意不过虚晃一枪，草草收场，见此情景，先操着京腔，调子降下温来：“啊，唱什么‘喀秋莎’，喀秋莎不就是火箭炮吗？怎么一眨眼变成女人了？想老婆也没有这么想的，乱弹琴！”……“还要唱什么‘莫斯科郊外的、郊外的晚不响’。大晚不响干嘛去，黑不隆咚的，别掉沟里。那地方背，还不及咱这里的景。还有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什么、什么‘天仙配’！”连长最后这“天仙配”三字，竟是用拖长了调的花腔唱出来的。全连人自是乐得前仰后合。那聚众闹事的“首犯”朱山，更是荣辱不惊，皮毛未伤……张连长有这本事，不惜充当“刘姥姥”的角色，把一个火药味极浓的批判会搅得烟消云散。

为了抵御各种“黄歌”对青年一代的“侵蚀”，真正体现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当时曾有过大量的“革命歌曲”创作，并且由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编辑出版了《战地新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其中包括了《大刀进行曲》、《抗日战歌》等部分历史歌曲。后来，又结集出版了《战地新歌》续集和第三集。为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词曲家们亦专门创作了一批歌曲，被选登在《战地新歌》中的就有《青春献给伟大的党》、《革命青年进行曲》、《革命知识青年之歌》、《让青春放光芒》、《山乡盼着你们来》、《誓作公社新一代》、《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党是春雨我是苗》，等等。这类歌曲的早期代表作，是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仅6天（1968年12月28日）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歌词是这样的：

伟大领袖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决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革命斗争中百炼成钢。勇敢战斗，不怕困难，我们心中有个红太阳。努力学习，刻苦锻炼，颗颗红心忠于毛主席，我们的青春灿烂辉煌。

农村天地无限宽广，到处照耀灿烂阳光。我们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劳动中茁壮成长。勇敢战斗，不怕困难……

在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也创作了一批革命歌曲，尤有代表性的是《兵团战歌》、《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我站在工地上放声唱，歌唱兵团战旗红，万里边疆尽春光……”和“蓝天作帐地作床，黄沙伴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战歌，广阔天地摆战场……”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流传的《兵团之歌》、《兵团战歌》的歌词。内蒙古兵团一师三团二连还自编了这样的连歌：“我们生活在乌兰布和，我们劳动在乌兰布和，披荆斩棘气豪胆壮，我们是战斗的队伍，毛泽东思想指引方向，彻底埋葬旧世界，把全人类解放。”由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业余创作组创作的《兵团战士胸有朝阳》（收入《战地新歌》第3集），歌词是这样的：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胸有朝阳。屯垦戍边，披荆斩棘，战斗在边疆。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茁壮成长，祖国大地，山山水水，充满了阳光。三大革命炼红心，迎风冒雪志如钢。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誓把北疆变粮仓。热爱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红心向太阳。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胸有朝阳。屯垦戍边，耕耘大地，紧握钢枪。广阔的天地战旗飞舞稻菽千重浪，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日夜练兵忙。备战备荒广积粮，千里边防坚如钢。为

了当好革命事业接班人，誓把青春献给党。热爱边疆，扎根边疆……

引颈高唱革命歌曲，自可表现出知识青年的豪情壮志，但是低沉的时候，也难免唱出一支支思乡曲：“你知道吗，北风呼啸又是一个冬，得过且过，对酒当歌，也有沉醉意。自己的青春，谁不怜惜，苦难又谁来替！……”文革中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流行的《南京之歌》、《重庆之歌》、《告别北京》等歌曲，在各生产建设兵团中颇有市场。《南京之歌》的作者是南京插队知识青年任毅，歌曲创作于1969年夏季，作者因此歌被逮捕判刑，1979年才平反出狱。我们不妨引出其中最爱被人唱的两段歌词：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黑龙江兵团二十三团的一个连队，在春播的劳累后有人唱起了《南京之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一早，在食堂里，大伙议论纷纷，似那歌声还在响，人们意犹未尽。“昨晚的歌谁唱的？女生宿舍里哭成一片！”……

就在这天早上，连长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上：“这还了得，这是散布什么思想感情？这不是明摆着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春耕嘛！一定要查清楚！要开会批判！”……

连长见到我，也没二话，先是组织上信任、考验云云，继而严厉指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什么“南京”的歌！要我代表全班对唱歌者进行批判，并给一天时间写稿子，后天批判大会上做重点发言。

我不明白这歌哪儿得罪了领导，但是连首长的话就是党的话、组织的话，谁敢不服。

尽管有被批判的危险，知识青年们依然在秘密地传抄这些歌曲。很多知青都有秘不示人的小本子，抄录着各式各样的“黄歌”，其中有大量的中外情歌（外国情歌多抄自《外国名歌二百首》）。《忆难忘（蓝色的街灯）》、《苦的咖啡》、《苏珊娜》等歌曲，曾风靡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则流传着自编的《这就是美丽的西双版纳》、《姑娘八唱》、《勐腊知青歌》等。

传唱思乡曲和情歌，毕竟不是什么大罪过，紧过一阵之后，领导也不太注意这些事了，知青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大，在公开场合也敢亮开嗓子唱一通。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团工业连的知识青年，甚至用上了无线电技术“现场实播”知青歌曲大联唱：

十四团工业连北京知青金小平，在电子方面也是能手，他自己装半导体、电唱机，还装了一个发射机，知青们曾做过一个试验，在1000米距离之内，7个管的红灯牌收音机可以收到清晰的声音……

一天，工业连的女知青在宿舍里打开半导体，忽然从半导体收音机中，传来奇特的声音：“这里是北京知青广播电台。”接着便从半导体中传出参差不齐的歌声。先是《北京——地拉那》，再听就不对了，《小板凳摆一排》、《哇哈哈》、《插队的人归来》、《南京之歌》……声音越听越熟悉，一个女知青跑到男生宿舍，见他们正仰着脖子唱呢……后来，闹得更

大了，知青把天线搭在电线杆上，作为发射天线。一次北京知青张国新唱：“集体农庄有一位老妈妈，她的名字就叫呜嘞哇啦……”结果被边防军收听到了，派人来查问。知青们匆忙将线收了，再也不敢胡乱发射。

四 偷读“禁书”与“地下文学”创作

被知识青年带往生产建设兵团的书籍，绝不只是“雄文四卷”，还有一大批青年们喜爱阅读的名著。文化大革命“破四旧”，除了毛主席著作外，其他的书似乎都不用读了，读了就是“犯禁”，所以读书要格外小心。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七团北京知青王大闻一语道出了当时的秘密：“连队对思想政治工作抓得挺严，要是有本什么书都藏着掖着，相互保密。一本《青春之歌》都给翻烂了，全连几乎通读一遍，只是不能让连长、指导员知道……知青探家回来，先问有没有好烟，再就问带没带书。”什么书被禁，从来就没有严格的界定，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原来都在禁看之列，后来毛主席提倡干部读这几本书，又一轰而读之。不少抓政治教育的人，文化素质极低，认定除了毛主席的著作和各种学习文件外，其他书籍都是“封、资、修”的“黄书”，严禁属下人涉足，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令人心碎的事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知识青年陈大强带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出席过兵团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双代会”的团部协理员发现，斥为“黄色小说”，勒令烧掉。后因此协理员犯了作风错误，无暇再去管别人的事，书才保存下来。二师十一团知青谭宗远的一批名著，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的《沸羹集》、巴金的《大寨行》等，都在连队指导员的严厉下，由谭宗远本人送进铁炉中焚烧。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三团北京知青毕小元的妈妈给她寄来了《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和

《艳阳天》，竟遭到这样的批判：“要么社会主义搞不成呢？有人看外国小说和黄色小说。”在黑龙江兵团，有下面的事发生：

零点过后，北大荒的夜静极了，大地被黑暗包围起来。为了避免让其他人发现，我把医务室的门反锁上，躺在被窝里，借助手电光偷偷地看起来。

书是精装的，暗绿色的封皮，作者叫巴金，名字像个外国人，书名是《春天里的秋天》。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探险般地读下去。简直像是在探索，我想找到书中的“黄”。“黄”在我的心田里始终还是一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书不很厚，天不亮就读完了，却什么也没发现。然而却使我燥动着一种莫名的激动。这种感觉和我以前读某些世界名著时的感觉相似。

书中的人物和她们的的心灵以及她们间所发生的故事有一种崇高的美，这种美和作者笔下柔和的美融为一体，为我展示了一个高尚的世界。然而，慢慢地我又糊涂起来，我真不明白，这本书除了书皮的颜色和黄色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以外，怎么能说是“黄书”呢？

不久，工作组在我连的工作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抓出了一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主人。宣布他被逮捕的时候，传播黄色书籍是其罪行之一，判了他15年徒刑。

年轻人需要精神食粮，而这食粮绝非政治学习能够全部解决的。正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陈英惠所说：“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就像一片久旱干裂的土地，渴望着甘露浇灌。没有书看，就四处搜寻。只要打听到谁手中有一本书或手抄本，哪怕持书人远在几十里之外，也要想方设法不辞辛苦地去找来，如饥似渴地传阅。一本书传到最后已面目全非，残缺不全，而大家

还是照样看得如痴如醉。”看书的人除了自我欣赏外，有时还情不自禁地把书中的情节讲给战友们听，于是讲故事成了一种特殊的享受。下面是黑龙江兵团两位当年的主讲人的回忆：

有年回家探亲，见到两个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得来如获珍宝，读来更是过目不忘。回到连队，话题就来了，自打心眼里也没把这当回事，给几个知青讲起了故事。不料一传十，十传百，知青都来找我讲，甚至别的连队的知青也赶来听。

一遍，两遍，三遍……越讲越熟，越讲越风趣、有味……越讲影响越大，到处有人来请，就像开“讲用会”……

一日，偶然去团部，有朋友告诉我，我可出了名了，他那有我的大名。这位朋友在团部搞宣传，开始我还以为要表扬我，因为我开荒活干得猛，犁打得直。可一见那排黑体字，就有点傻，说我利用讲故事宣传封资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先是以谈心为名，实为大批判开道。团里的宣传股、保卫股也纷纷下到连队，调查始末，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手抄本，还有人以为手抄本是封资修的名字。

……我开始一遍一遍写检查，一天天受批判。检查中尽我想得起来的一切挖苦、讽刺的词汇乃至一串串的帽子，一堆堆地扣，但始终通不过……想不到最后的决定是监督劳动，本来嘛，不干活，坐着写检查，谁能允许有这种好事。

监督劳动开始还有那么点意思，日子长了也就淡了。再说，我这人又好聊，一聊又停不住口，《水上春秋》，《女篮五号》，《神秘的旅伴》……还有50年代放映的苏联电影、印度电影，一摆唬起来，谁知，监督者也下“水”了。

那是在大兴安岭伐木的日子。我住的帐篷里有13个女生，到了晚上，为了打破帐篷里想念家乡亲人的沉闷，我开始给大家讲鬼故事。大家蜷在铺上，点着一支小蜡烛，西伯利亚的风扑打着窗纸，外面是黑沉沉的原始森林。这气氛本来就有几分恐怖，我讲：“半夜公共厕所的墙壁上伸出一只红色、一只蓝色的手，一个骷髅头围着水井转，正三圈，反三圈……”，还有“坟地里慢慢升起一件白大衣，中间突然伸出一条血红的舌头”等等。讲到最吓人的地方，我“呼”地吹灭蜡烛，怪叫一声：“哇，来了……”把大家唬得个半死，帐篷里一片哭叫声……

由于伐木工作太枯燥了，于是，男生们和我商量，我应该干的活全部由他们负责干，作为回报，我给大家讲故事。

这个要求对我的诱惑力太大了，乐得清闲，不就是跟他们吹吹吗。

自一讲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把听来的野故事，看过的书，全部抖了出来，《绿色尸体》、《蓝色的响尾蛇》、《大盗鲁滨逊》、《基度山恩仇记》、《梅花党案》、《三侠五义》……每天早上一上卡车，听众就开始点“菜”，“朱老板，今天来段破案的……”，“今天来段谈恋爱的……”

经过不断操练，我不再甘心只添油加醋地做情节渲染，于是便开始了我最初的创作生涯。我编进一些大段的情节塞进原来的故事。后来看看既没人发觉，又不会有人来查处，胆子越来越大了，于是乎，我自己编了故事。

由“吹牛”发展到自编故事，已经是地道的口头文学创作，按照现在的说法，应属于地下文学创作一类。为吸引听众而编出来的故事，破案、武侠的情节居多，不怕离奇，远至古今中外的才子佳人，近到中国的原子弹和核潜艇之类，都可以编到故事中大

讲特讲。流传于各兵团中最有名的故事，应该属《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和《南京长江大桥》。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人加以演绎，于是越来越神，还有人把三个故事合为一个，故事的时间从解放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物上至当时的知名人士，下至普通百姓，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军警宪特，我方高级将领、侦察人员；情节更是曲折离奇，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方侦察员个个是“武林高手”，敌方潜伏特务也是老奸巨滑，最后以我方大胜利告结束。故事中不乏许多颇为荒诞的情节，明眼人一眼就可以识破，但仍然是讲者口若玄黄，讲得眉飞色舞，听者聚精会神，听得津津有味。

有的人不满足于口头创作，动笔录下流动的思路，于是又有了一批真正的知青地下文学作品。在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有一些人在秘密地写作，少数作品变成手抄本在知识青年中流传，多数则因生活命运的改变而夭折。秘密创作的作品，有小说、诗歌，也有散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曾创作长诗《生活三部曲》，从城市、列车上、北大荒三个角度，展现了知识青年内心世界的变化。在黑龙江兵团十四团，还形成了一个知识青年文学小圈子，不但写出了长篇小说《江畔朝阳》，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一团的知识青年，还曾组织编写了一部诗集《战士的诗》，全集58页，收诗27首，于1975年1月油印了一二百本。

五 侃大山、起外号、打扑克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需要精神调剂。在电影、书籍缺乏的情况下，兵团的知识青年很快发明了其他消遣时光的方式，其中不乏一些在今天看来是荒唐的游戏。

哪里有知识青年，哪里就有“侃大山”的团伙。上到天文地

理、风土人情、国外国内大事、知识青年命运、文艺作品评论等严肃题材，下到连队趣闻、小道消息、桃色新闻乃至各种家长里短的话题，都是侃的内容。有时某人主侃，听众肃然；有时各抒己见，场面热烈。话题可以随时转移，刚才还摆出一副国事参谋的架势大谈美国总统访华的意义，现在已在随随便便地议论连队女士的高矮胖瘦，同样的津津有味，同样地投入。不要小看这种闲聊的作用，它是兵团战士之间思想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抛开一些无聊的话题，听到的是知青对形势的分析议论，表现出新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其中自然不乏知识和信息的交流。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人，不管后来是干什么的，往往能把国事、家事、天下事讲得头头是道，令人惊异，就是积蓄了多年侃大山的经验。

侃山之时，人们又常常为了一件什么事而打赌，赌注多是香烟、糖果、点心一类的“进口货”，打赌的人指天发誓，保证若输了一定兑现誓约，围观的人不断加温，等着看好戏。多数的打赌，最终以哈哈一笑了结，但若碰上认真的，可就要真破财了。

相互之间起外号，也可以视为文化活动的一种，反映出年轻人的调皮、诙谐和人们的好恶。兵团战士不怕自嘲，如称农村公社社员为“地老大”、兵团战士是“地老二”或干脆自称为“7083装甲兵”（七零八散庄稼兵）。各兵团的外号无奇不有，有尊称、戏称和蔑称。学识渊博者被尊为“学者”、“博士”；爱高谈哲学的一位姓白的知青，授予雅号“白格尔”；内蒙古兵团某团有位副参谋长姓皮，大家叫他“皮肤参谋长”，某连副指导员姓窦，被称为“豆腐指导员”。至于按性格、长相、打扮起外号，那就更多了：不爱说话的人叫“闷壶”，一位性格像女孩子的男知青叫“囡囡”，面无表情的人被赐与“阴天”；个子高瘦的人叫“大洋马”或“某某杆郎”，矮胖的人就是“半袋面”、“小板凳”；脖子有点歪的人被称为“六点过五分”；脸上有黑斑的是“风景这边独好”；脸上长“青春美丽痘”较多的人，男士叫“疙瘩洛索夫”，女士为“疙瘩

洛娃”；还有什么“白脸”、“黑子”、“小洋人”、“大皮鞋干事”、“瘦腿裤”……；对女生，还多按其漂亮程度冠以一号、二号、三号……。有些人的外号颇有典故，因家人错把碱面当白糖寄来，此人从此得到“碱面”的外号；还有人说话总爱带着“吧”、“哈”一类的口头语，即被命名为“吧哈”；某人偷看女厕所，人送外号“小看”，不久，连里又有了“二看”、“三看”；一位营级干部因屡犯作风错误，兵团战士见他时总爱打招呼说：“老刘忙啊！”（老流氓啊）。下面一则外号的典故里带着几分政治色彩：

十连的司务长的外号最长，叫“加拿大的疙瘩汤，照得我两眼闪金光”，长达15个字，人们为了省略，经常叫他“疙瘩汤”或“闪金光”，提起他的外号还真有一段“典故”。那时讲究人人都背“老三篇”，有人问他“张思德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随口就说“加拿大”，人们引为笑料。当时知青不会做饭，于是经常下疙瘩汤吃，别人一问他“司务长什么饭”，他必答“疙瘩汤”，于是人们就把“疙瘩汤”联系上了。连队举行赛诗会，他朗诵自己编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毛泽东思想亮堂堂，照得我两眼闪金光”。一下子构成了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能把你照得眼冒金光，是你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于是赛诗会变成了批斗会，最后结果是司务长被撤了职，他的外号又延了8个字，成为我团最长的外号。

有些外号流传甚广，并得到本人的认可，于是从连长、指导员到下面的战士都直呼其外号，久而久之，甚至真名被人忘记。多年之后兵团战友重逢，首先想起来的仍是大名鼎鼎的外号。

下棋和打扑克，在兵团初建时常被视为不健康的游戏而遭到禁止。云南兵团二师七团五营四连的知识青年，曾为保护一副围棋与连队领导发生过冲突，但总算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一天劳累下来，百无聊赖，于是对围棋感兴趣的人逐渐多起来。虽然仅仅知道棋子要摆在交叉线上，四个子围住一个就可以吃掉对方，什么布局、中盘、收官的概念统统没有，大家仍然兴趣盎然地杀得难解难分、废寝忘食……

有一天，四班的两人对局，厮杀激烈万分，旁观者大呼小叫，热血沸腾。突然，连长走了进来，棋迷们不禁一愣，宿舍里顿时一片沉寂。连长看着这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抓起一颗棋子在阳光下瞧了瞧，皱着眉头问道：“这是什么名堂？”有人小心翼翼地回答：“围棋。”连长把脸一沉，说：“围棋？没听说过！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收了！”说完，将棋子棋盘一古脑端起就走。临到门口，扔下一句话：“棋扔进厕所，你们还要写检讨！”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儿，棋迷们清醒过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一没收，可就断了大家打发光阴的路子啊！众人议论纷纷，最后公推两个代表去见连长。

两人麻起胆子走进连部。甲说：“连长，围棋自古就有，不是资产阶级发明的。”连长说：“不可能，我见过象棋，可从没听说过中国人有什么围棋，肯定是外国的洋玩意儿，资本家吃喝玩乐的名堂。”乙急中生智，说道：“连长，就算围棋是外国发明的，扑克不也是外国发明的吗？上面还印了外国人。扑克都准打，围棋你也还我们吧！”连长有些恼怒了：“说不准下就不准下，还要强词夺理！这棋我一定要扔了，黑黑白白的，这么多子儿，把人的思想都搞复杂了！”甲大惊失色，赶紧说：“连长，你千万不能扔，党中央毛主席都会下围棋，毛主席著作里还用围棋来比喻战略战术呢！”连长听了，半晌没说话。最后挥了挥手，说：“你们先回去，我和指导员研究一下再说。”……

终于有一天，通讯员满面笑容地端来了围棋，说连长和指导员决定把棋还给大家，只是不准在学习和开会的时候下棋。棋迷们欢呼起来，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宿舍里又响起围棋清脆的落子声和激烈的争论……

打扑克的禁网也是一点点拉开的。一开始是绝对不许玩扑克，领导见到就没收。不久领导对于休息期间偶然玩玩，不再深究，但玩的形式都很正经，一般是“升级”、“争上游”之类。后来完全放任自流，不少领导也愿意在闲暇时分甩上两把，兵团战士更能抓紧时间，甚至工间休的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也要凑人打起来；休息日则能连轴转，一打十几个小时的事绝非罕见。打牌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起来，既有高水平的桥牌、百分，也有“三先”、“二十四点”、“拱猪”等，并伴以各种轻微体罚，如喝凉水、钻桌子、贴纸条、拱肥皂等等。牌桌上无大小，领导输了，照样受罚。兵团后期，变相赌博乃至真正的赌博也有所发展。先是输烟，俗称“甩棒子”，但结果往往是牌桌周围烟雾缭绕，满地烟头，拿出来玩的烟大多被吸掉，人们对输赢不太在乎；后是赌钱，俗称“玩页子”，赌注一般较小，输家赢家大都来去不多，但气氛要紧张得多，并且多半要秘密进行。亦有不少的地方盛行打麻将，俗称“搬砖”、“垒墙”等，很有一些人的业余时间全部搭在里头。

知识青年还有一大嗜好就是照相。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后的头几件大事，就包括照几张像片寄回家去。兵团驻地附近城镇的照相馆，给兵团知识青年照标准的“战天斗地”一至三寸像片很快成为主要业务之一，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有身穿“军服”的留影。照相馆的背景呆板，未能尽兴，兵团战士从家中带来的照相机大大发挥了作用，生活、生产、学习、备战等场面跃然像上。为了显示出“当兵”的威风，很多知青不满足于“兵团服”，特别向现役军人借军装、领章帽徽等，甚至跑到武装连队借武器照相。形形

色色的“战友留念”，使照相成为一项重要的交流活动，不但深化了朋友间的情谊，更为青春年华留下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印证。

六 学文化

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初中毕业生居多，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实际上大多数人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各级领导强调的是政治教育和组织管理，兼顾一点技术培训，不重视兵团战士文化素质的提高。学习数理化知识，往往被斥之为走白专道路或者不愿扎根边疆。生产实践需要科学知识，激发了一些青年自学的热情。大学恢复招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自学者的行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又时髦起来。除了重温或自学中学课程外，很多人还把注意力投向外语、美术、音乐等方面，力求学到一些专门知识，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在政治气氛依旧很浓的状况下，大量中学课本很快涌入兵团。入夜，战士宿舍中时而传出北京电台播放的英语自学节目，间或还有“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900句》的声音，再加上各种乐器的喧闹，构成了兵团夜生活的另一个侧面。不少连队的知识青年，还自发办起了夜校，发挥年轻人的拼搏精神，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许多老高中生出山当老师，教那些初中、甚至小学都未毕业的“知识青年”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团有一位女兵团战士，是全连人人都尊敬的大姐，人称“博士”。她由于“出身”的原因，当时得不到推荐上学的机会。1973年，上头有指示，上大学要实行推荐和考试相结合，连里几位小知青全乱了阵脚。其中一位求助于“博士”，她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认真辅导这位连开根号都不会的小妹妹，给她讲解从未学过的物理、化学，这位小知青在团里举行的文化考试中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后来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1973年的文化考试流产了，但当年得到

“博士”帮助的人，至今也没有忘记她的情谊。

在发挥知识青年作用上颇值得称道的，是把一批知识青年调到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学校中去充当老师，教育兵团职工的子弟。兵团各团场办的学校，条件一般较差，甚至缺乏教室和最起码的教学设施，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充当教师的知识青年颇有责任心，他们不但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很关心学生的生活，尽可能地改善学校的条件。每个学校不可能像正规学校那样配齐教员，这就要求老师成为多面手，既要教语文、算术，也能把美术、音乐、体育包下来，并且能够胜任各年级的教学工作。尤其是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不少团场设立了中学。以云南兵团为例，就抽调了1132名知青担任小学教师，228名知青担任中学教师。用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教中学，乃是极普遍的现象，并推动了教师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有不少团场办的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教学质量较高，为普及教育做出了贡献，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十二章 全国知青会议

兵团知青的“死亡档案”——《情况反映》揭出惊人事实——“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

一 水火无情

标榜为“思想上革命化，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工农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曾被视为理想的对知识青年集中进行“再教育”的组织形式。解放军序列的光环，遮盖了各兵团知青工作方面的种种问题。1973年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对这些阴暗面来了一次大曝光。

从1968年到1973年，各生产建设兵团相继发生死亡伤残的意外事故，不幸死亡的知识青年达千人之上。各级领导对事故的处理轻率，甚至隐瞒事故真相，更造成了知识青年的心理创伤。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抹去人们对死者的追忆。我们特别从知识青年的回忆录中辑出一些典型的事故片断，录下死者的姓名，使读者了解部分真相。

1970年4月18日，黑龙江虎林县荒火骤起，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九团出动1500人奋勇扑火，知青徐秀桂等26人牺牲。

1970年4月27日，驻军某部在兴凯湖龙王庙烧荒跑火，黑龙江兵团四师四十三团出动10个连、1330人扑火，知青孙连华等3人因过度疲劳、寒冷牺牲。

1970年6月28日，海南岛琼海县和万宁县山洪爆发，广州兵团二师二团（东太农场）职工陈道生和二师四团（东岭农场）女知青胡志红、谢红军为保护水电站大坝牺牲。

1970年10月20日的台风暴雨之夜，广州兵团六师二团（晨星农场）养猪场的一个新建宣传队被山洪吞没，幸存6人，指导员李灶和队长朱国干及20名女知青遇难。遇难的女知青中年纪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17岁，她们是廖以玲、梁愉辛、张惠、李小玲、李力、麻海晨、郭楚容、吴琼芳、李城珍、田燕文、姚丽卿、李佩萱、陈世兰、蔡起娟、李金红、李妙英、姚利娟、王笃卿、吴贡之等。

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兵团四师三十五团烧荒跑火，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团调集近500名兵团战士仓促上阵，80%的人没有携带打火工具，加之有的干部擅离岗位，致使部队失去指挥，伤亡百余人，烈火烧尽荒草自动熄灭。三十五团损失严重，副参谋长明海涛和14名知识青年牺牲。死亡的知青，小的仅有17岁，大的也不过22岁，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有人录下了他们的名字：栾英、薛克平、刘文、王秀琴、史丽露、马玉兰、耿淑媛、周秀兰、潘文渲、王晓勤、王立荣、郑秀荣、傅强、傅小芳。

1970年12月5日，黑龙江兵团三师跃进山钢铁厂用炸药爆破冻土，因炸药雷管混装引起爆炸，炸死兵团战士5人。

1970年12月9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五营接宣传队的卡车翻车，死4人，重伤4人，轻伤10余人。

1970年12月18日，黑龙江兵团十八团发生汽车翻车事故，死亡4人，重伤7人，轻伤12人。

1971年3月23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盈江农场）二营四连的知青宿舍发生火灾，10名刚到兵团仅7天的成都女知青被堵在屋里活活烧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漆黑的夜，万籁俱寂，疲惫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紧邻茅屋的一间小窝棚里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上海男知青赵国庆歪在竹床上，聚精会神地看《珍妮姑娘》。“文革”期间，许多中外名著被扣上“封、资、修”罪名，列为禁书。赵国庆知道偷看“禁书”被发现的后果，为避人耳目，他在深夜里阅读这本从一位北京女知青手里借来的小说。赵国庆完全被书中的情节吸引住了。他忘记了疲乏，忘记了劳累，也忘记了身边用小玻璃瓶做成的简易煤油灯。深夜12点左右，赵国庆不小心碰翻了油灯，只听得“轰”地一声，火苗倏地窜起，舐着了离地面只有一米多高的窝棚顶。火灾来得突然，赵国庆慌了神，扔了书抓起身边的外衣就去扑火，谁料干草着火，难以扑灭，顷刻间小窝棚里火苗乱窜，浓烟滚滚。赵国庆急忙叫醒同棚的上海男知青黄国平，夺路逃命。

当赵国庆还在小窝棚里枉然扑火时，大火已窜上了紧邻小窝棚的茅屋顶，在那一溜五间、用竹篾茅草搭成的茅屋里，居住着到边疆仅仅7天的60余名成都男女知青。

又急又怕的赵国庆目睹大火上房，完全慌了神，没想到大声叫醒睡梦中的人们，却自不量力地挥着竹竿去打火，这不可饶恕的错误导致了惨烈悲剧的发生。

……蒙难的10名女知青全住第二间寝室。

清理现场的情景真是惨不忍睹：10名受难者被烈火烧得形若枯炭，身体缩至不足一米，面目全非，四肢残缺，难以辨认。她们中有两人拖着一口箱子倒卧在距门不远处，其余8人紧紧拥挤在房间的一角，至死还拥抱在一起……

震惊全兵团的10名女知青罹难事件，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善后工作做了妥善安排：隆重的追悼会后，死者被掩埋在人们垦荒必经的小山坡上，坟墓面向东方，和连队所在的山坡遥遥相对，使人们永久缅怀。死者家属和受伤的知青受到亲切慰问。损失东西的知青得到了四面八方的物质支援。另外，对失职的四连干部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处分，肇事者赵国庆也被盈江县人民法院判处10年徒刑。

这10位女青年的名字是：周金秀、李晓妮、晏启芬、阮国清、范金凤、傅蓉碧、傅国秀、万禄秀、李观玉、施桂芬。

1972年5月5日上午约11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起火，火场附近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紧急出动，兵分两路前往救火，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历年来牧民们打火都是在火头后面和两边打，然而，我们的年轻战士又哪里懂得这些打火知识，他们按照连里的部署，在副指导员杜恒昌的带领下，勇敢地向后山迎上火去。当他们用了近10分钟的时间冲上山顶时，另一路人马也坐着拖拉机拐过山弯向沟底插过来企图接住火头。这时，从西北方向着上来的烈火已燃到对面的山顶，与步行冲上山顶的战士们隔沟相望，滚滚的浓烟卷着呼呼作响的烈火跳跃着向山下扑来。这边的战士们见状没顾得多想，便挥舞着手中的竹扫帚和其他打火工具，呼喊口号冲下山去……

原方案是两队人马合力扑打，可没等他们相互见面、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和祝愿，滚滚的浓烟和燃烧的烈火便把他们隔开了，紧接着把他们包围在火海之中。铁牛“55”拖拉机冲进浓烟没有几秒钟的工夫，车上的人们便不住地咳嗽起来。但是，拖车上的战士们无半点惧色，尤其是拖拉机手，浓

烟呛得咳嗽得直不起腰来，可他把整个上半身压在方向盘上，脚把油门踩到底向前冲去。然而冲出没有100米，拖拉机手便窒息在方向盘上。他原想把这些人拉出火海，但没能做到，拖拉机悲哀地突突了几下便熄了火。战士们见状纷纷跳下拖车挥舞着手中的扫帚向烈火冲去，但遗憾的是他们大多只冲出十几步，便先后窒息倒在地上。冲得快的、毅力强的也只是冲到火前扑打了几下，便也倒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之中，倒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草原上。

从山上冲下来的战士们刚刚到半山腰，卷着热浪的浓烟便包围了他们。有打火经验的人，打火时身上都带着火柴，万一遇到险情，可就地放火，等火能烧出一片空地来，便趴在燃烧过的地方，这样当大火着过来时，着过火的地方是不会重新燃起火来的。这些经验和教训，我们的年轻战士又哪里懂得，时间又怎么来得及？当他们被烈火和浓烟包围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拼，向前冲，只有迎风冲出火海。但可悲的是没等他们冲到火前，便大多倒在烈火烧来之前。上去的人只有六七个人幸免于难，但手部、面部多被灼伤……

前后只有十来分钟，就是加上从连队出发的时间，也只有近20分钟……69名年轻的战士倒在烈火中，走完了各自的人生旅途。

团政治处会议室里坐满了现役的连级干部，个个埋头抽烟，沉闷甚至是恐惧的情绪在空间流动。

团长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想起牧民妇女阿拉花因孩子玩火烧死了牧场的牛羊而被判了7年徒刑，觉得自己在劫难逃。69个生龙活虎的生命转眼变成了一具具焦尸，有些已无法辨认性别。各部门协助做的棺材要三天后才能运到，尸体开始变色、变臭……团长和政委们都悄悄地打好了行李，准

备坐牢。

政治处的干事们连夜写好关于着火、救火的工作汇报，上报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

“是否被烧？”“健康否？”“电告近况”的电报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落到宝日格斯台，知青们的情绪极不稳定，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6月12日，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一则题为《壮志凌云》的报道出现在《内蒙古日报》上。紧接着，《兵团战友报》也整版地报道了烈士们的英雄事迹。这场大火被肯定了。整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掀起了一个“学英雄”的热潮。

追悼会开过，接着的是“授枪大会”、“报告会”、“表决心大会”、“表彰会”，一个接一个。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又把她的女儿送到了宝日格斯台，为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屯垦戍边，埋葬帝修反。”强烈的“政治攻势”渗到宝日格斯台的各个角落，谁人敢否定这场大火？谁人敢说69个生命的牺牲不比泰山还重？对失火的原因、救火组织工作的失误、各级领导的组织责任、69条生命的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没有任何人敢提出质询。于是乎，一场震荡内蒙古一个多月的重大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当年7月10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批准授予死难的69名知识青年烈士称号，他们是：

杜恒昌、赵月秋、王继光、王孝忠、刘玉功、云金平、吴炳义、杨红原、王凤英、力丁、何丽华、吴淑琴、敖敦、张如成、舒宝立、徐克俭、查日斯、樊淑琴、陈敏英、张国通、马福洪、任凤彩、张振来、张富春、任玉玲、苏小存、吴富

贵、张金来、李玉香、王绍武、李春侠、王锦、畅孟吉、赵根柱、刘革、韩学良、聂建新、杨丽华、郭增喜、张钦弟、刘建国、陈勇、李富才、马志明、刘建平、燕亮、张金、宁田日、曹荣芝、王占祥、赖玉琴、赵玉琴、刘慧、王学尧、齐远平、毅强、金双全、青春、刘长海、龚占岐、唐亚志、胡国利、王洪远、李瑞琴、尹国茹、王爱民、张国顺、王孝、高志新

兵团政治部还决定给杜恒昌、胡国利、吴炳义、王占祥四人追记一等功，并号召兵团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向他们学习。

除了以上几件震动颇大的严重事件外，因车船事故等死亡的知识青年还有不少。如云南兵团东风农场放映电影《卖花姑娘》，各连知青纷纷赶来，一辆解放牌汽车因严重超载而翻车，当场死亡知识青年20多人；黑龙江兵团六十团派人出去找寻迷路的拖拉机手，误入沼泽地，死亡11人。一次死伤一至二人的事故更是不胜枚举。此外，还有因各种原因自杀的，下面是内蒙古兵团部分死亡人员的情况：

1970年1月5日，十一团三连战士焦××因对领导处理其打架事不满，自杀。

1970年3月28日，十六团一连战士安××因散布不满言论挨整，自杀。

1970年5月29日，二十四团一连战士鲁××因悲观失望自杀。

1970年6月18日，十九团一连家属侯××因有“反动言论”被揪斗后自杀。

1970年7月6日，十三团六连战士杨××因未评上“五

好战士”自杀。

1970年8月22日，四十二团二连职工石××因作风问题自杀。

1970年12月28日，十三团造纸厂战士赵××因“破坏生产”被看押，自杀。

1971年6月15日，三团七连女战士张××被辱后受到讽刺挖苦，自杀。

1971年7月13日，四十三团九连战士安××被关押毒打后伤重不治而死。

1971年8月14日，十九团四连战士马××被怀疑偷了5元钱，自杀。

1971年8月21日，二团一连战士王×因与班长吵架受屈，自杀。

1971年8月23日，十四团十二连战士党×因“破坏机器”被看押，自杀。

1971年9月16日，工程团二营六连战士李××因被怀疑有偷摸行为，自杀。

1971年10月3日，二团二连职工武××因贪污事发自杀。

1971年10月13日，兵团司令部战士刘×因散布不满言论被拘留，自杀。

1971年10月26日，三团六连战士董××被收入“反违法乱纪学习班”后自杀。

1971年11月16日，化肥厂六连战士林××因盗窃问题自杀。

1971年11月21日，五十三团三连战士魏××被怀疑偷钱，自杀。

1971年12月20日，二十四团一连战士王××死于步枪

走火。

1972年5月9日，五十五团一连军医贺××奸污女战士等丑行被揭露，自杀。

1972年6月10日，二十三团六连战士马××因与男友关系破裂自杀。

1972年6月23日，四十三团三连战士白××因向一女战士求爱被拒绝，自杀。

1972年7月17日，二十三团五连战士王××涉嫌偷收音机，自杀。二十一团工副连战士张××因谈恋爱未成自杀。

1972年10月11日，三十五团二连战士苏××与本班战士争吵后自杀。

1973年1月17日，八团十连战士崔××在本班丢失毛线后被逼供，自杀。

二 李庆霖告“御状”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主席，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关镇。家庭成份是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20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它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尽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青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住房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那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然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很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

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好走，我想，应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话。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毛泽东于1973年4月25日回复：“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此事被新闻媒介披露之后，引起了社会对知识青年问题的极大关注，并为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提供了契机。

三 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大规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1972年底已将715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和农场（农村插队562万人，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153万人）。从中央到地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安置办公室等专门机构，几年内的工作重点就是把中学毕业生成批地从城镇送往安置地点；中央和各地

制定的知青政策，也是侧重于安置。各地农村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牧场的基层干部，肩负起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等责任。各地党政机关都按照中央的指示，指派专人负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央和各省、市的调查组、慰问团等亦经常下到基层访问知识青年，从上到下似乎都很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从各地的调查情况看，几年之内，农村、农场等妥善地安置了大批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入团、入党的人数激增，还有一些知识青年被提拔为基层干部，知识青年无疑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改造，各方面的成绩颇为喜人。

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的调查组、慰问团已经发现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更有知识青年上书反映所面临的困难，但没有引起重视。轰轰烈烈运动的阴暗面，被人为拔高的宣传效果所遮掩了。更为严重的是摧残知识青年的事件在各地屡屡发生，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一定要对各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但下面具体执行起来却问题很多，很大一部分案件只是进行了一般性处理，甚至有些案件处理不了，坏人逍遥法外。对隶属于解放军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人们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涉及其内部的问题。即便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也主要是总结上山下乡工作的好经验。1973年2月22日至3月3日，北京市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都派知青先进人物参加了会议，如云南兵团派出的代表是李镇江、辛温、李爱国、林冬冬、郭洁、武贤平、奚怀兰、袁国莉、曹振东等人。

在李庆霖告状之后，中央决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由国务院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123人，来自中央19个部门，28个省、市、自治区，11个大军区

及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广州、云南 5 个生产建设兵团。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成立了以农林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公安部、商业部、卫生部、科教组、总政治部、团中央、妇联及北京、上海、河北、新疆、安徽、广东、云南等省、市、自治区 19 名负责人组成的会议领导小组，沙风、林乎加为正、副组长。

会议的第一阶段（5 天）是各地汇报 21 号文件的学习贯彻情况，汇报几年来知识青年工作的成就，检查存在的问题。

会议的第二阶段（10 天）是讨论和学习，统一思想认识。

会议的第三阶段（33 天）主要讨论国务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和 1973—1980 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

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已给会议定了调子，要找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这次会议绝不是一般的歌功颂德，而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否则这场涉及全国的运动很可能夭折。

各地反映上来的问题相当严重，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

有相当一部分下乡青年的吃饭、住房、疾病医疗等实际生活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全国有 30% 以上的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严重的达 60—70%。全国约有 30% 未给下乡知识青年盖房，有的省达 50—60%，使有些青年长期借住社员房子，有的住大队的办公室、饲养室、寺庙甚至放棺材的祠堂。有的知识青年反映：“搬了五次窝，只剩一口锅，没有房子住，叫我们咋生活？”

（二）任人唯亲“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

有些领导干部重工轻农，不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而是带头“走后门”，把子女留在城市或调离农村。如某省军区部门以上领导干部子女 144 人毕业，参军 130 人，当工人 10 人，没有一个下乡。走后门成风，都是抵制上山下乡。这样的做法影响很坏，群众意见很大，有人反映“领导干部子女下乡是镀金，群众子女下

乡是扎根”；江西省甚至接到一封信，信上画了一幅漫画，题为“后门比前门大”。

（三）对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甚至蓄意包庇纵容坏人。

会议期间，一份《情况反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震动。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两位记者向国务院报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存在严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现象。

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四师十八团，70%以上的人员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识青年。这个团的部分领导人，对有缺点、错误的知识青年不是坚持正面教育，而是采取捆绑吊打手段进行镇压。据1972年4月统计，十八团30个单位，有23个单位发生过捆绑吊打知识青年事件，被捆绑吊打的知青达99人，许多人被多次吊打。捆绑吊打的手段有29种之多，例如：背扁担、跪劈柴加踩杠子、捆上后用钢筋绞、吊在空中往墙上撞、夏天烤太阳、冬天浇冷水等等。被吊打的知青，绝大多数仅是有骂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劳动偷懒等缺点、错误，还有的人仅是看到干部吊打别人，说一句批评的话而被吊打的。

团里一些领导，有的亲自批准搞轮流批斗（实际就是捆绑吊打）；有的公然声称：“只要不打死就行”、“要捆就捆紧一点”；有的赤膊上阵，亲自拳打脚踢……该团九连批判一个知识青年，没有捆绑吊打，团副参谋长看了很不满意，指责他们说：“你们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要重搞！”在这些团领导的指使纵容下，基层干部和少数工人违法乱纪，任意迫害知识青年。该团基建连的一位知青，由于打群架，接连被捆12天，被吊打17次，用铁丝捆了5个晚上，有时被吊在空中往墙上撞，有时吊起来再用杠子往下压，受了七八种刑法，打得遍体鳞伤，不省人事，造成长期腰痛，大小便不正常，一度被逼得要自杀。六连一位知青被怀疑偷了军装，连长、指导员集合全连对他进行吊打，逼他交出军装，他交

不出来就打得更厉害。这位知青直向连长、指导员喊：“叔叔救救我，救救我！”连长、指导员不但不理，反而唆使一些人打得更厉害。有些连干部随身带着绳子，对谁稍不如意就说：“我代表党支部把你捆起来！”六连一些知青拉肚子，出勤较低，连指导员说：“你们不劳动，把你们拿到太阳下晒！”于是硬逼着六七个病号在摄氏40度的阳光下站着，并且要面对太阳，不得擅自走开。

对这些严重事件，四师党委也曾派人做了调查，但却不做严肃处理，以致其他单位也不断发生类似事件。十七团在团部附近修建黑洞洞的禁闭室，准备对有错误的知青实行禁闭；十六团某些干部动不动就捆人打人，残害知识青年。兵团战士陈舒平多年后回忆道：

林彪栽了的第二年春天，营部成立了持枪民兵排。一天，我们正在上军训课，听说一连知青又吵架了，为首的当然又是八寸。李副营长一怒之下，命令我们跑步去一连，将八寸捆来营部，扔进木工房旁边的那间堆木料的屋里，让他品味起生平第一次囚禁生活。

八寸姓刘，我们是同学，又一同支边。他个子极矮而墩实，且心眼机灵，人缘好，故同学们都称他“八寸”……

可这一次他真的栽了，像只飞蛾栽进新上任的李副营长的火中。于是先饿了两天，第三天晚上，文书室里设个公堂，司务长过节一般，慷慨地点起两盏充气煤油灯，一派雪亮。李副营长上座，持枪民兵两壁肃立，汽灯沙沙作响，大家屏息静气，酝酿着阶级斗争的严肃气氛。

“带坏分子进来！”随着一声断喝，八寸从黑暗中贴门蹭进来，他双手大拇指被一上一下反剪着捆在背上。晓得要挨打，便穿上了所有的衣服，唯脑壳无遮拦，只好拼命缩起……

“八寸，你今天必须老实交待，免得——”李副营长开场。

八寸自然知道免得什么：“我晓得，我一定全部交待！”声音有气无力，但不乏诚恳。只可惜人家摆就了阵势，本是要拿出颜色的。可怜的八寸，平时口若悬河，此刻……稍一支吾，枪托棍棒便雨点般砸下去。八寸倒剪着双手不便躲闪，“哎哟，哎哟！”地叫唤……

“我投降！我投降！”八寸突然大叫。

投降一词令审讯者满足，他大约想到了军队的传统。“好了，让他说！”朝众人一摆手。

“哎哟……”八寸呻吟，“刚过来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在腊哈地抢过一个老太婆的芭蕉……”八寸真正想老实，“开头我拿钱给她，她咕叨说要1角钱一斤的过称，我就……抢了一串——”

“才只一串？”上边怒极，“妄图避重就轻，压杠子！”

一块砖头砸碎了，撒在八寸面前。

“跪下去！”围观的司务长老易是个湖南籍老战士，人生一辈子，难得碰上可以如此抖威风的机会，作为再教育者，平时也实在缺乏能表现他贫下中农阶级性的机会。当下来劲，尖尖地扯着嗓门一声断喝，颇走调。要在平时，大家准会笑出来，如今阶级斗争火线上，谁也不敢放肆。绕梁余音中，司务长一步上前，长长的放根栗木锄把在八寸跪着的小腿肚上，又按住八寸的头往下捺。

“我一定老实，我一定坦白……”头在司务长手中倔犟地挣扎，哀求却近乎凄切了。

然而不容分说，几只有力的手吃饱了饭的手，将饿了三天的膝盖扑通接在砖渣上。有人开始站上锄把……

两个民兵站上去接着是四个，相互搀扶着，竟蹀跳起来。

“啊……哟……”每跳一下，我手里八寸的身躯便往上一挺，凄厉的惨叫声穿透油毛毡屋顶直上夜空，今夜山上的野

猪们一定被搅得心神不宁了。

八寸最后连嘶叫的力气也没了，干脆瘫在我的身上，张了嘴哈哈地喘气。直到谁都到锄把上尝过那滋味，并重又觉得乏味，悻悻地下来。

审讯结束，谁也没赢。我和另一个知青民兵将八寸扶回囚室，大约已是午夜……

几个晚上下来，审讯者累了，于是责令八寸白天强迫劳动，晚上写书面交待，一件件一桩桩，来龙去脉，定要文从字顺，“不能逻辑不正确”！

按规定，八寸一天只准吃4两，早晨没有，都分配在中午和晚上……

7月5日，叶剑英在新华社记者写的《情况反映》上批示：“事态严重，请电告昆明军区派人查报……”7月6日，国务院主要领导都作了批示。周恩来总理的批示是：“此等法西斯行为，非立即处理不可。……只要十八团被控事件属实，应请省委、军区立即派人主持，首先将这几个团部负责人停职交待，并开群众大会宣布此事。……省委、军区要负责保护这些受摧残的知识青年。”李先念批示：“内中有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军区难道说一点也不知道吗？”

在知青工作会议上曝光的还有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团团长、参谋长奸污女知识青年数十人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团四名团级干部奸污凌辱女青年近百人的事件等。据不完全统计，奸污女知青的案件黑龙江兵团发生365起，内蒙古兵团247起，云南兵团139起，广州兵团193起。

（四）领导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管理不

善甚至管理粗暴。

有些党委不重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把上山下乡运动视为权宜之计，在党委议事日程上知青工作挂不上号，只是推给业务部门去办，普遍存在不关心下乡知青学习和生活问题的现象。因管理不善还造成了严重的工伤事故。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伤事故死亡553人。1970年8月，3名上海知青到兵团第三天，在没有进行过任何安全生产常识教育的情况下，派他们排除哑炮，全部炸死。1970年4月，二十九团打荒火烧死21名知青。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造成126人死亡，伤756人。三十四团派人打草翻船，一次淹死9名知青。1972年5月，四十三团四连在一次草原失火中，烧死知青69人。广州兵团事故死亡知青210人。云南兵团事故死亡知青297人。新疆兵团1969年以来仅自杀就高达134起。

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尤其是生产建设兵团。如内蒙古兵团二十六团八连连长在大会上公开对知识青年说：这里过去是劳改农场，他们是大劳改，你们是二劳改。云南兵团二团有的连队规定：病假一天扣3角4分。开会不发言，记旷工一天。晚上不参加学习，罚款7元。偷一根甘蔗，罚20元。江苏兵团规定：大小便超过20分钟，扣半天工资。

（五）知识青年思想不稳定。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知识青年的情绪，很多下乡和到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跑回了城市，留下的知识青年亦缺乏扎根的决心，希望通过各种途径返城。还有逃往国外谋生的现象发生，如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的达2万余人；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

后来各生产建设兵团的统计数字更能说明问题，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的知识青年情况统计为：累计接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95128人，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

死亡 31 人，因公致残 53 人，病故 52 人，事故死亡 62 人，自杀 25 人，劳教 39 人，判刑 52 人，判死刑 1 人。

四 “成绩讲够，问题摆透”

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个议题，由与会者讨论并要求统一思想和认识。这三个议题是：（1）对毛主席的复信如何理解？要对照检查，对党内的思想状况做一个分析，看我们的距离在哪里？（2）毛主席说“全国此类事甚多”，我们是否承认？（3）为什么有些严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阻力在哪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倡导的，与会者没有对这场运动的主流和成绩提出质疑，依然认定这是一个长期事业，是关系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但比李庆霖揭示的要多得多，还严重得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在会议上是有分歧的。有的人强调要多讲大好形势，认为讲问题多了会否定大好形势，使干部有压力，影响干部情绪。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强调要讲够成绩，同时对问题的一面，即我们工作中的阴暗面，也要揭深揭透，并有深刻的认识和应有的估计；讲了问题就会否定大好形势的观点是片面的，认为家丑不可外扬的看法是错误的；有压力的不应该是干部的多数，而是那些搞歪门邪道的强奸犯、贪污犯和坏分子。

对残害知识青年的现象，与会者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于 7 月 8 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递交了检查报告，一致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非常重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决心遵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处理“此等法西斯行为”的问题。报告中说：“云南建设

兵团的问题较多，四师十八团的问题，其他师、团也存在……几年来，名曰省委、军区党委都管，实则都没有很好去管，有了问题互相‘踢皮球’，军队推地方，地方推军队……”“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已经抽调干部组成了调查小组，集中学习中央〔1973〕21号文件、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研究已掌握的材料，提高路线觉悟和政策思想水平，准备和中央来的同志一道去解决四师十八团的问题。同时，我们还拟再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分头到建设兵团的各师，同他们一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结合贯彻21号文件，深入路线教育，并严肃处理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

7月9日，周恩来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检查报告上批示：“这一报告要发给与会同志一阅。请他们回本省严格地检查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生产队以及国营农牧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按照这次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所规定的各项办法，予以彻底实施。”

当晚，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召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开会，强调要严肃处理摧残知识青年的恶性事件。

会议期间，李先念又特别指出：“对迫害下乡青年的，要引起重视，对坏人要严肃处理。黑龙江兵团那个团长和参谋长，和地主恶霸有什么区别？还有人包庇袒护这些蜕化变质分子。解放初期搞过反霸斗争，像这样的人还袒护，就是包庇恶霸，我就不相信那个团长和参谋长是搞社会主义的，家长为什么不放心女孩子下乡，坏人不打击，家长怎能放心，看来不整几个人不行。不大张旗鼓地整也不行。要把那些受过侮辱的女青年调出去，安置好。有些人，如云南兵团的张国亮，奸污女青年，有些女青年，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这和日本鬼子有什么不同？而上面有些领导，往往包庇纵容。”“要打击一小撮，不能宽，对很坏的不打击不能平民愤的，要杀头，当然也不能多杀，杀人权在省委，不能下放。”

“云南兵团一个连长对青年讲话，手里还提手铐了，还有的把两个谈恋爱的青年，绑起来丢到野外，这两个青年听到狗熊叫才拼命摆脱，有些领导同志不气愤，有些党委熟视无睹。对这样的新恶霸，要枪毙几个。”

会议最终取得了这样的共识：成绩讲够，问题摆透，正视矛盾，解决矛盾。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有关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问题的六条意见，体现的就是会议主体精神：

（一）各级党委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层层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满腔热情地、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

（二）切实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以必要的补助。今后安置经费要适当增加。

（三）大力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适当安排业余时间，积极组织他们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要组织一定力量，辅导他们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充分发挥青年人的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特长。积极培养和吸收具备条件的青年入团、入党、参加各级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对女青年的培养使用。青年有了缺点错误，要耐心说服教育，绝对不能采取简单粗暴态度。认真落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不要歧视他们。下乡青年档案填写混乱和错误的，要进行清理。

(四) 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1972〕19号、40号、44号文件中有有关制止和纠正“走后门”的各项规定，必须告诉广大群众知道，发动群众监督执行。领导干部“走后门”的，要主动检查，坚决纠正。今后要严格制度。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并且要给予纪律处分。

“走后门”的责任在家长，对于青年本身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上山下乡，不得歧视。

(五) 发动广大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于以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知识青年和强奸女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恶依法惩办。犯罪分子为掩盖罪行对受害人进行威胁、对检举人进行报复的，要从严惩处。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举行公判，坚决杀掉。杀人要严格控制，不可多杀。坦白认罪好的，可以从宽处理。要保护受害人的名誉和安全。要保护青年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严禁逼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警惕阶级敌人扰乱我们的阵线。

(六) 今后每年将有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落户，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作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随《报告》一同下发。前者包括“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经费问题”、“口粮问题”、“卫生医疗问题”及“其他问题”等内容。后者则为今后8年预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数额及安排去向。

全国知青会议还专门研究了华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从1968年底到1973年中，有约3000名华侨学生参加国营农牧场

和生产建设兵团。华侨学生最多的是云南和广州生产建设兵团。以云南兵团为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云南曾建有大批华侨农场，安置归国的华侨，这些农场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之后，都被划入兵团。云南兵团将当时的八个华侨农场改编为独立一、二、三、四团及三师十四团二营。

由于华侨知识青年有“海外关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往往感到组织不信任，政治上没前途，而实际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政治歧视”。云南兵团独立三团的女知青陆小静与华侨青年倪兴旺来往密切，受到团、营的点名批判，陆小静的朋友记下了这样的一段话：“陆小静又告诉我，有当官的告诉她，上面曾有一个机密文件，说对归侨不能重用。从国外回来的人很复杂，保不准有美蒋特务混在里边……那文件是林彪在的时候发的，林彪垮台了却还在沿用。归侨们知道了这件事，差点要把团部砸了。谁服这口气呀！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回来报效祖国的，没想到落得这个嫌疑。”

针对上山下乡华侨知识青年的实际问题，7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规定华侨学生“来去自由”，有正当理由要求出国的应予批准，愿意留在国内的应妥善安排工作；要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对华侨学生的培养使用以及申请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等，都应同其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一视同仁。《报告》还特别强调：“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对有严重疾病的，应给以治疗。他们探望国内的兄弟姐妹，在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可享受探亲假待遇；插队的可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补助路费。由北京市安置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华侨学生，不少人因气候不适应而患病。请北京市、黑龙江省共同派人进行调查了解，加以妥善解决。”

五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迫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案件的处理。中央领导关注的几个案件，都很快有了结果。

7月中下旬，中央工作组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22个单位进行了调查，接触了1100多人，收到了百余份反映材料。8月11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中央上报调查云南兵团十八团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证实其严重性远远超过新华分社反映的情况，并提出了改组十八团领导班子、严惩坏人的意见。10月27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向中央汇报的案情情况是这样的：“全兵团共发生捆绑吊打知识青年1034起，受害知识青年1894人，2人被打死。调戏猥亵奸污女知识青年的干部286人，其中团职7人，营职25人，连职202人，排职47人，受害女青年430人。已逮捕奸污犯18人（现役的14人），打死人的罪犯8人（现役4人），调戏猥亵女知识青年的干部已离职审查的有29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营长贾小山，前后强奸女青年20余人，捆绑吊打知识青年70余人；一师二团六营连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1973年11月28日，云南兵团在景洪召开宣判大会，判处贾小山、张国亮等4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刑的干部有26人（现役13人），组织处理77人（现役42人）。

黑龙江兵团也开了杀戒。1973年8月22日，沈阳军区在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召开公判大会，奸污女知青数十人的十六团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被判处死刑（1983年复查后撤消了原判决）。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处理了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 299 人，其中现役干部 209 人，上至兵团，下到连队干部，各级都有，团级以上干部就有 22 人。

在来势凶猛的“查处”、“打击”之风下，奸污女知识青年的现象确实有所扼制，但人们已经对生产建设兵团的组织模式产生了怀疑。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有人指出生产建设兵团任务不明确，组织管理混乱，中央领导指示要专门开会研究生产建设兵团问题。问题终于摆到桌面上来了，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的命运，在知青工作会议后来了一个大转折。

这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能够揭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制定了统一标准的知青政策，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应该说是达到了会议的预期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展了好几年，才终于有了这样一次机会，集中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人，用 40 余天的时间专门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具体问题。会议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提出了“成绩讲够，问题摆透”的辩证说法，既不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又能适当地采用一些调整方案，缓解矛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即便是这样一次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下乡工作会议，再加上一系列地区性知青工作会议，也绝不可能解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问题。而带根本性的问题，因必须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方向，在当时显然是无法解决的。

1973 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影响，只有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之后反观，才能看得更加清楚。这次知青工作会议，实际上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高峰转向低落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这种转变。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方式，从 1973 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1973 年以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或是分散安置在农村社队

(主要是边远贫困地区)，或是集中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或是返乡务农。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计划 1973—1980 年动员 1300 万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并对知识青年的去向作了这样的构想：“今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1) 插队，要适当集中，建立青年点，有条件的也可回老家落户；(2) 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在人民公社里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队；(3) 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单独建立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由带队干部和部分贫下中农参加的集体所有制农场；(4) 到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1973—1976 年，实际上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为 687 万人，其中到农村插队的为 486 万人，到集体场队的有 126 万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为 75 万人。农村插队虽然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模式，但是已不再强调过去那种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分散安置办法，而是希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相对集中，便于管理并有利于解决生活问题；同时，也不再强求向边疆贫困地区大量输送知识青年，因为有许多不好解决的实际困难，而是挖掘城镇郊区社队的潜力，尽可能在远近郊区安置下乡知识青年。集体场队是在知青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新事物，从 1974 年开始试验并推广，其性质明显地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农村插队。原来大量接收知识青年的各生产建设兵团，由于超量接收知识青年和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了巨额的经济亏损，在知青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并在 1973 年后陆续撤消兵团建制，改为国营农牧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继续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能力。只有一部分原来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国营农场，还能接收和安置一些下乡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前途问题，显然有了新的考虑。过去强调的是送下去扎根，基本不考虑城市回收下乡知识青年问题。知青工作会议之后，各级领导已经认识到必须有下有上，造成良性

循环，于是在安置新的中学毕业生时，大多已经考虑到城市的回收问题，有的城市（如北京市）已开始采用一届顶一届的办法，如1974年的毕业生下乡后，即安排1972年毕业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招工，知识青年下乡锻炼的时间为二至三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1973年后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时间远比在此之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时间短。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绝对人数，在1973—1976年中确有增加，但是周期缩短，回收速度加快，确实与以前的做法有了极大的不同。对1973年以前下乡的知识青年，也通过招工、招师、招生及病、困退等途径，启动并加速回收步伐。尽管从理论上讲还是要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方向，宣扬在农村扎根的思想，但是政策的转变，实际已使运动本身开始走向终点。

上山下乡运动阴暗面的暴露，打破了原来笼罩其上的美丽光环，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对这一运动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对犯罪分子进行打击，对领导不利的干部加以批评，对不安心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做说服教育工作，给予生活困难的知识青年救济，等等，解决的只是局部甚至表面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向是否对头，知识青年是接受“再教育”还是“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走后门”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问题引起了私下乃至半公开的议论，并终于导致了知识青年中的“怀疑派”与“扎根派”的公开辩论。

第十三章 敢问路在何方

“红道”、“黄道”与“黑道”——“捧表现、靠推荐”的戏剧性场面——“扎根”的都走了，就剩下“不扎根”的了——“病退”回城是另一种磨难的开始——为回城铤而走险——“苦菜花”们的挣扎和辩论

一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两招一征”

文化大革命中，按照国家计划，主要针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招工、招生和征兵工作，合称为“两招一征”。

招工由国家计委和劳动人事部门下达招工指标，各级政府部门主持实施。在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工厂、矿山、铁路、交通、电力、通讯等企事业单位的招工，成为城市回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重要途径。招工分为“内招”和“外招”两种做法。“内招”是各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下达的招工指标，将本系统职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回城市当工人，如铁路系统招回铁道部下属各单位职工的上山下乡子女，在本系统安排工作；邮电系统招回邮电部下属各单位职工的上山下乡子女，在本系统安排工作，等等。“内招”的指标，往往“戴帽”下达，有明确的目标。“外招”则是根据国家下达的招工指标，不分系统，指标不“戴

帽”，从原则上说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可以争取。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高等学校的正常招生工作，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为试验恢复招生工作打开了通途。《报告》所附的《招生（试点）具体意见》对学生条件和招生办法做了规定。学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要招收一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他们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就是人们后来所称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应该“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0月15日，国务院电告各地，1970年高校招生的原则，按中央批转的《报告》执行。当年高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41870人。1971年继续试点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42420人。由于是试点招生，各地虽有一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了大学，并未引起普遍的震动。

较大规模的招生工作从1972年开始，当年高校招生133553人。5月1日，中共中央特别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

“走后门”的不正之风，《通知》对招生办法做了具体规定。

征兵工作每年都有。在大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征兵的对象向知识青年倾斜，各地在分配征兵名额时往往要重点考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部队干部希望通过当兵的途径使已下乡的子女转回城市，所以在每年的征兵时都会有一些“戴帽”指标。

除了招工、招生、征兵之外，各地教育部门为解决中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特别定出名额，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了部分教师。

为了稳定知识青年队伍，农村社队、国营农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提出过很多响亮的口号，其中就有所谓的“三不去”：招工不去，读大学不去，当兵不去，一句话，扎根农村、边疆闹革命。但是，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认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是有一定时间限度的，回城乃是必然的结果，参军、上大学、当工人正是最好的回城机会，同时具有最名正言顺的理由。按照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说法，有所谓“红道”、“黄道”、“黑道”三种途径：“黄道”搞钱，通缅甸的团场可以参与边境走私贸易赚钱；“红道”凭汗水和机智，当兵、招工、读书跳出去；“黑道”则是生病或装病退回城市。红黑两道殊途同归，全国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是如此。

插队和回乡知识青年，由于是分散安置，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到招工、招生、征兵以及招师的名额。出身好、工作努力、能够得到贫下中农好评并得到公社、大队干部赞赏的知识青年，往往成为头几批招工、招生、招师或征兵的合适人选，出身不好的知青即便表现好也常被关在“两招一征”的门外。随着社会上“走后门”风气的日益盛行，“戴帽”指标越来越多，公社、大队甚至县旗干部利用招工、招生、招师和征兵的机会，把自己的子女送走，挤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名额，引起知青的强烈不满，既有一些知青因此精神受到刺激，意志消沉甚至患精神病；也有

一些知青铤而走险，对走后门的干部或知青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恶性伤人事件。尽管如此，经过几年的锻炼后，多数插队知青还是通过“两招一征”等途径变成了工人、大学生、解放军战士或教师。1973年以后的插队知识青年，多数在城市近郊安置，一般两至三年后即由所在城市招回，重新安排工作。一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由于下乡多年，得到了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的同情，终于有机会离开了农村。但是，一些闻名全国或各省、区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典型，为了保护“红旗”不倒，反而长年留在了农村。

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知识青年集中，又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性质，招工一般是“内招”，“戴帽”下指标，通常名额很少，所以在知青中引起的震动不大。但是每次征兵和招生都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竞争的激烈程度大大超过农村的“两招一征”，走后门的现象也严重得多。

二 征兵工作面面观

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但毕竟不是真正的部队，总给人以“上八路”和冒牌货的感觉。参加了兵团的知识青年，有不少人更加向往正规部队的生活和待遇。各军区每年都要在兵团征兵，于是每年都会在一部分知识青年中引起波澜。按照征兵规定，参军的知识青年不仅要根正苗红，还要有突出的表现，并需经过群众推荐、领导同意、征兵单位批准等手续。但是，有些“门路硬”的人，尤其是参加兵团的部队干部子女，早就疏通了关系，这些手续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的北京知青杨玉文，对当时的征兵工作做了详细的描述：

1969年8月30日，年仅16岁的我从北京市西城区鲁迅中学（原女八中）毕业，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被分派

到一师四团。当时对我们宣传说兵团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又传说今后不再在北京市征兵，所以我们这届毕业生大多被分配到各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初建生活是相当艰苦的，恶劣的气候，繁重的体力劳动，粗糙甚至是不管饱的伙食，很快使每个人心中“序列兵”与解放军一样待遇的幻想破灭了。1969年底，由于战备紧张，国家大量征兵，为少数兵团战士“偷偷摸摸”参军提供了机会。内蒙古兵团有多少人“偷偷”参军，我没有统计过，但数量不会太多，因为这种参军在当时是“非法”的，需要有相当的门路，只有父母正在部队担任现职干部或与部队有密切关系的干部子弟才能做到。以一师四团来说，我知道的有七连姓马的姐弟俩、十连姓蔡的一位女知青和八连姓陈的一位男知青。他们的参军经历都很戏剧化，首先要把部队联系好，再把自己在兵团值钱的东西送走，最后争取家中来电报请探亲假回去或干脆偷偷溜掉。正式参军的人在各地都要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的参军就不同了，不仅不能声张，还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保持警惕，不能与兵团的战友联系，以免地址落入兵团组织部门手中，把他们从部队要回去。当时内蒙古兵团曾正式下文件禁止此种参军方式，偷偷参军走的人都被说成是怕苦怕累，不仅被兵团除名，共青团员还要开除团籍。兵团有时还一直追查到部队，如八连姓陈的知青到部队后给兵团战友写了封信，暴露了在山西阳方口的部队驻地，兵团竟出动两名现役干部直接到山西查找。这样参军在组织上是不合法的，但动机可以理解，广大兵团战士对他们的印象不是很差，嘴上跟着领导批判，心里却想只要有这种机会谁也不会放过。

1971年初，内蒙古兵团首次正式按照国家兵役政策选拔兵团战士服兵役。属于解放军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征兵时

团级单位与地方公社一级单位平行，参加所在县市的征兵工作。这次四团有3名兵团战士应征入伍，赴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团服役。此后，内蒙古兵团又有1973、1974、1975年度3次征兵。在这4次征兵中，1973年度参军人数最多，一师共有69人（这69人不全是兵团战士，还包括由兵团代管的公社的农牧民子弟，兵团战士也不全是知识青年，还有一些加入兵团的职工子弟），四团6人。1972年底，我有幸被四团工副连推荐为1973年度征兵的候选人，当时四团每个连级单位推荐两人，全团共有36个人参加体检，并以四抽一的比例选送9人参加师里的体检和审查，再以三抽二的比例将选出的兵团战士输送到部队去。经过层层筛选，我终于实现了当兵的愿望。一师69名应征入伍的人中，39人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区独立师步兵二团，30人被分配到内蒙古军区坦克团。我到了独立二团，开始了真正的兵旅生涯。

“走后门”参军的人，心里并不轻松，黑龙江兵团十六团一位“曲线”参军的男知青写道：

那是在1973年，知青返城算不上“凤毛麟角”，却也是屈指可数。除有一部分当了工农兵学员走了，再就是那些有门有道的知青父母，为子女走个关系，或当兵，或曲线返城。我没想成了前者，可真当了后者。

当时我正像模像样地干着团政治处书记的行当，姐姐在连队当副指导员。看着身边的一些“有门路”知青上大学、参军，我心里怪痒痒的。忍不住把这情况写信透露给了当局长的父亲。但天地良心，虽说我也想上大学、当兵，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动心思要走这一步。

父母接到我的信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把我们姐弟

俩调回南方。他们通过老战友的关系，和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领导联系上了。第一步是把我们调到江苏省大丰县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尔后再看第二步。但是，当时我对父母的“决策”并不知晓，还蒙在鼓里。

1973年春节前后，我接到了父母来信，称一切均已安排妥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消息，对我很突然，给父母写信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真想离开北大荒。我马上和姐姐取得了联系，她也表示不回南方，要继续扎根边疆。看来我们的思想趋于一致，且当时的兵团还正红火着。我当即把情况和我们的决定向团领导做了汇报，团领导高度赞扬了我们的选择，并且在二师政治部的简报中，通报表扬了我们姐弟俩扎根边疆志不移的精神……

父母在上海了解了我们的态度后，急了，孩子们怎么了，这么大的事当儿戏。他们动真格的了，专门请江苏兵团派了一名现役军人股长，以到黑龙江采购木材为名，为我们疏通关系，办理手续。

难为这名军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奔波往来于佳木斯市、萝北县和十六团之间……

这么来回一折腾，我和姐姐的心逐渐软了，还是走吧。但实际上，兵团也好，师部也好，团领导也好，并不想放我们走。当时的情况是，走了一个，影响一片……

那军人返回了南方，我们耐心等待着。时机一个多月后就来了，团领导正式找我谈话：同意我们姐弟俩回江苏。

要告别北大荒了。除了离别恋情之外，心灵深处还有一番惭愧：当初“扎根边疆”的口号喊得当当响，而现在却违背了诺言，成了“逃兵”。但也无需过多自责，管他呢，走了

再说。

自然也无庸讳言，到江苏不过是找一块跳板而已，半年过后，我就当了兵，姐姐上了大学。

没有路子的知青，只有靠表现和跟领导搞好关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杨鲁勇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1974年，是我们支边的第四个年头。熬过了几年的艰苦岁月和思乡之苦后，知青们纷纷开始八仙过海，各找门路，伺机跳离农场。而病退、商调或顶替之类看来都与我无缘，我便把希望寄托在当年底的冬季征兵上。我暗自努力挣表现，争取得到更多的群众推荐。当然，我明白，搞好连队领导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这年初冬的一天，队长的老娘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队长历来是孝子，我估计他少不了要为老娘操办一台。于是，我心中暗自窃喜：真是天助我也，这不正是我帮队长出大力而巴结他的好机会吗？果然，队长在悲痛之后，郑重宣布：成立连队治丧委员会，并按当地风俗，死者遗体一定要在粮棚内停放三天——这样到了阴间也不会饿饭。这三天的白天，由队长家属守灵，每天晚上，由队长派人看守。凡夜晚守灵者，给存假一天，并于第二天在队长家免费进餐一顿，当然有酒有肉。其诱惑力真不小。然而，除我当即自告奋勇参加守夜外，响应者再无第二人，因为寒冬之夜守在死人身边，谁也不愿揽这霉人的差事。支书出面做好一阵思想工作，才另有几人勉强同意……

这天晚上刚黑，我和莫大海便来到粮棚……按队长规定，守灵者通宵不得打盹儿，不得擅自离开，不得下棋打牌，否则，后果自负……

下半夜，困意一阵阵袭来。白天，给往返不息的拖拉机装甘蔗，劳累了一整天，现在又熬了大半夜，我们早已呵欠连天，眼皮沉重得要命。但为了遵守队上规定，只得强睁双眼熬着。终于，莫大海蜷在草堆里打起了鼾，我一边抵抗着浓浓的睡意，一边告诫自己：为了前途，不能、不能、不能……

当我们被队长一脚从梦中踢醒时，天早已大亮，我后悔极了，队长却一句话也没说，黑着脸指挥大伙抬棺材去了。

尸体装进棺材，原本我是八人抬棺者之一，可临时却被取消了资格。完了，为队长效力的机会被剥夺，这意味着什么？我叹了口气，心里沉甸甸的……出殡了，我和莫大海只好傻乎乎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看热闹……送葬的队伍过一道小桥时，突然停下来。我和莫大海忙挤到前面看，只见走在最前面，手捧饭碗的队长埋头跪在桥中间，队长老婆、孩子等依次跪在其后，棺材在一片唱哭声中，竟缓缓地从这一行下跪者头上抬过去。据说，这是家人背死者阴魂过河。对这奇特愚昧的习俗，我们不禁哑然失笑。天哪！就在这一瞬间，队长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盯了我们一眼。我的心顿时沉入了无底深渊……

不久，冬季征兵开始，我以“吃苦耐劳”，“认真接受再教育”，“积极参加批林批孔”等闪光评语，被群众一致推荐。然而，我所担心的也终于应验：在连队领导最终鉴定时，一句“该同志对劳动人民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而抹掉了我心里的最后一线希望。我明白，这一切都归结于守灵失职和出殡队伍过桥时的一笑。我绝望了，半瓶甘蔗酒下肚后，我痛哭一场，反而冷静了许多。

参军并不等于回城，为了回城反而要多走一段弯路，这是知

青们经过另一段磨练后才明白的道理。杨玉文笔下的军人回城经历，颇耐人寻味：

是否参军后就一定可以复员回北京呢？现在许多同志回忆起来都说是必然的，其实并非如此。对复员战士的去向，主要执行的是中央军委1955年从哪里征集回哪里去的规定，从未变更过。从兵团参军的人，大多数认为当兵光荣，待遇好，比兵团有发展前途，对回城一般不抱奢望，希望在部队站住脚跟，所以都采取了努力工作争取提干的态势，并且很快成为部队的干部苗子。随着时间的流移，尤其是知青病、困退回城政策逐步放松，使我们的思想有了变化，宁回北京而不提干的观点占了上风。

空想回城是没有用的，必须了解回城的方式方法。在战友和家长的密切配合下，我们摸清了要返回北京，只有两条渠道。

第一条渠道是通过北京市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进入北京。北京市复转军人安置办是从1975年开始每年春季成立的临时性机构，由军队和地方的四个部门抽人组成，专门负责处理部队中的北京知青复员回城问题。这条渠道对我们来说是最正规也是最合适的，但回京条件相当苛刻：（1）父母有一人为红军时期干部；（2）本人是二等甲级残废；（3）父母身边无子女（12岁以下的弟妹不计算在内。）

第二条渠道是通过北京市各区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办理补名手续进入北京。1974年初，北京市与总参谋部达成协议，司意为1969—1971年之间征兵名额之外的北京市参军者补办手续，并按规定接收这批人复员回京。只要我们从学校、派出所开出证明并在区武装部找点关系，就可以伪装成另一种身分返回北京，但不足之处是兵团时期的几年工龄都

要丢掉了。

1977年春季，我们开始行动了。每个人都持有双份复员证，征集地分别写着北京和内蒙古，组织介绍信的开头都是空白的，以应付不同渠道的需要。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我所在团复员的北京知青10余人全部返回了北京。当年通过第一条渠道返回北京的各部队北京籍知青共计108人，我们团就占了8人。这8个人条件不一，唯有一位戚君的成功最值得赞赏。他在市安办系统绝无熟人，但巧妙地钻了政策的空子。他在兵团入党，到部队后未填过任何表格，而兵团的表格中只填了参加黑龙江兵团的姐姐和大弟弟，二弟因年龄尚小没有填入家庭情况栏中。于是档案中已清楚地表明父母身边无子女，而此时他的二弟早已超过了12岁。戚君硬是抓住这一点，在父亲单位和街道办事处密切配合下，瞒天过海，闯过了市安办这道“鬼门关”。

我们团的“战绩”，赢得了“友军”的羡慕和赞扬。当年同军区的另一个团，至少向北京市发出了40余份知青复员战士的档案，结果只有二三人被接收，其余的只好先就地复员，再搞“曲线救国”。

三 “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参军虽然是跳出了兵团，但毕竟还要到部队干上几年，不能马上返回城市。相比之下，上大学对知识青年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上大学不仅能够学到知识，拿上文凭，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毕业后大多数人还能分配在城市中工作。从1972年开始，每年的招生都要在各生产建设兵团引起一场大震动。

上大学可不是“寻常人”能够争取到的，一般是两个极端：真正吃大苦、耐大劳、表现好者和有“后门”者。对于前者，群众

真心推荐，领导一致同意，学校复审也没话说；对于后者，虽然颇有民愤，却无可奈何。黑龙江兵团的殷京生在题为《不再上当》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1972年夏秋之交，高校招生的消息正强烈撞击着每一个知青的心灵。天遭阴雨，无法出工，连里便组织学习。学的内容是一位优秀知青的事迹……

材料由我读，不一会儿，鼻子先酸了。太感人了，爸爸是省革委会常委，副省级老干部，母亲官也不小。可楞是放着兵不当，城不回，泥里水里一块滚，还发誓要扎根边疆60年。“怎么着，不就入了个党吗？凭人家这些关系，回了城还不一样入党？好样的！”我读得真动了情，顺嘴先发起自己的议论，谈起感觉来了。

不想角落里有人嘿嘿地冷笑。

“谁！谁笑？”这么严肃的课题，有人敢笑，我厉声责问。

“我笑这小子要走了，咱们这帮傻青还替人家涂脂抹粉呢。”丁来成满不在乎，不无讽刺地说。

“你听谁说的？别自己走不了，就糟践别人。”

“说你傻青你还不服，二十六连都嚷嚷动了，不占连队名额，‘带帽儿’下来的。”

“告诉你们，哥儿们这几天也走。”

李爱国突然说了一句。

“上哪儿？”又是一层波澜。我把学习的事已经忘了。

“后门兵，我爸托个老战友，事已经妥了。可我绝不吹什么扎根边疆！”李爱国轻轻地点着一支烟。

“你爸？你爸也走后门？”我脑袋轰地一下。说心里话，我是多么崇拜他爸！头年冬天，我们挖水利，一镐一个白印，手震出了血口子，李爱国写信回家诉苦，让他爸回信臭骂一顿。

说，你是我儿子就不能这么熊！当年打张家口，我们不也是数九寒天挖战壕……这样的老八路怎么可能走后门？……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辰清独立营的那位也要上学走了。她不也是讲用会上的人物吗？”丁来成又起哄似地抛出一颗“炸弹”。

“讲用归讲用，回城归回城。”没人再一本正经了，都有点玩世不恭。扯着淡，那份学习材料便你一条我一条地卷了烟。

任月喜突然叹了口气，总结似地说：“唉，扎根边疆的都走了，剩下的就是咱这些不扎根的啦。”

至于“候选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恩恩怨怨，由于事关前程，也是免不了的。内蒙古兵团一位知青在得知高校恢复招生后，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谈了想上大学的事。不知何故，这封信没有发出，而是在“方便”时用掉了。另一位知青想来是上厕所时闲得无事，盯着地上的废纸看，一眼发现此信，如获至宝。于是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连同此信交给指导员。思想汇报中除揭发他人不扎根边疆外，特意又大表了一阵决心。指导员高中毕业，是现役军人中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有一些共同语言。他对这件事动了恻隐之心，认为想上大学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他也对汇报人居然把这么脏的纸交上来，心里有点恨恨。指导员仅找当事人个别谈话了事。黑龙江兵团五十团的兵团战士马桂梅，也是由于“信”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大学在兵团招收工农兵学员，这消息对参军无望、返城无门的知青心理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上大学的资格形式上是“贫下中农”举手决定。在团直青年中，我得票第二，只比另一位男知青少一个“拳头”。这一个“拳头”就是高考分

数线上的关键一分，更是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又担心又激动。担心的是怕只给一个名额去不了；激动的是即使这次上不成，下一次不也就有希望了吗？当晚，就着昏黄的灯光，我把这决定命运的大事写信告诉妈妈：我有希望上大学了，只要女儿能上大学，也就有可能回到妈妈的身边……

信被同室的“好朋友”“捡去”拆看并交给了全团的最高首长。一夜之间“光荣的兵团战士”成了“一心想返城的逃兵”。上学的资格立时被剥夺，人们对我也疏远冷淡。一时间我感到未来渺茫，去死的心都有。

我们当然不必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更不必过多地指责这群前途暗淡的人所做的事。在一个颠倒的年代，无论是上学，还是参军，不可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也不可能制定出合理的选拔标准，这其中的谁是谁非，很难评说。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各地很快着手布置高校招生的文化考试工作。这一举动给在艰难环境中苦熬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希望，尤其是给没有“后门”上学的人带来了福音，不少人重新拿起数、理、化课本，准备在考场上搏一搏。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在夏季安排了招生文化考试。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的一封信，捧出了一个“白卷英雄”。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舆论很快一边倒，招生文化考查被视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靠优异成绩考上大学的愿望由此成为泡影，多少知青为之扼腕叹息，张铁生活该遭到千万人的

唾骂。

不经考试，只靠推荐，走后门现象根本无法杜绝。针对上学、参军中的严重走后门现象，无数控告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各级领导。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特别指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不要冲淡‘批林批孔’”，既然中央对“走后门”的问题不愿深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认可。从“前门”争取也罢，走“后门”也罢，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就像当今的评职称、分房子一样，人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有人哭、有人笑，堪称一场人生战场的真正厮杀。

从1973—1976年，高等学校共招生722871人，加上1970—1972年的217843人，工农兵学员共计940714人。我们不知道全国生产建设兵团共有多少知识青年有幸挤入这个行列（内蒙古兵团有7808人被选送为工农兵学员，广州兵团有3135名知青被选送为工农兵学员，云南兵团在体改前有264人被选送为工农兵学员），但是可以肯定，这些幸运儿每人都有一番“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

四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

在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为解决部分知识青年的实际困难，知青安置部门制定了“病退”和“困退”的政策和标准，并安排一些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返回了城市。“病退”是将患有严重疾病或受伤致残不能继续参加生产劳动的知识青年遣返回动员城市。“困退”则是考虑到一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庭的特殊困难，如独生子女或家中子女全部上山下乡父母老人无人照顾等，准许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家庭所在城市。

在生产建设兵团得了重病或残废的知识青年，会按照“病退”的暂行规定被退回城市。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规定中，已明确说明患慢性病或有残疾的知识青年，如不适应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可以返回城市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大、中城市陆续接收“病退”的知识青年是从1970年开始的，各地知青安置部门亦对允许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做了临时性规定，并且要求病退者必须持有相当一级医院的诊断证明。同时，对“困退”的标准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困退要经过反复调查，证明其家庭确有困难，并要有父母单位、街道居委会和区以上知青办的证明；有了这些证明，农村还要经过公社、县两级领导的批准，生产建设兵团则要经过师、团两级领导的批准。

尽管已有了“病退”和“困退”的做法，但就全国而言，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1973年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对应该照顾的几种人有了明确的说法：病残不能参加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归侨学生下乡的主要安排在华侨农场；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或按国家规定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职工子女顶替，或从本单位职工子女中招收。在会议后下

发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只有“已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身边无人的，在按照国家计划招工、招干时，应予照顾”的规定，对“病退”和“困退”一字未提。各地执行的还是各城市的知青办以“应照顾的几种人”为依据对“病退”和“困退”做出的一些相应规定，而这些规定大多强调的是病、困退的审批权限。

各安置地区也对病、困退的条件、手续程序等做出了相应规定。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知青工作会议后发出的《兵团贯彻执行中央和内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补充规定》中，对病、困退做了如下规定：“知识青年系独生子女或多子女父母身边无人的，本人或家长申请，经动员地区‘知青办’批准（需附准迁证明）者，由团以上单位办理退出兵团手续。确因病不能从事体力劳动，需退出兵团的知识青年，经本人或家长申请并附有关医疗机构诊断证明，团以上机关可协助与动员地区‘知青办’联系协商解决。”

对急于跳出农村或兵团、又无门路的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说，病退、困退是一条捷径，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如云南兵团二师九团的卫生员周良宗所说：“病退是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抛弃，也许还是一种对美好前程的主动选择。我们知道一种浅易的道理：乡村都不要的人了，城市还会给这种人什么甜果子呢？日后的事实证明病退的人将永远背负着一种重压——档案上写得分明：病退。”

刚开始，病退、困退的尺度掌握得很严格，各兵团对允许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有相当一级医院的诊断证明，医生也大多能秉公执笔；困退则要经过反复调查，证明其家庭确有困难。

在各兵团知青大返城之前，办通病、困退的只是少数人。病退的人中，除少数是来兵团之前就有慢性病，不可能在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外，大部分人是来兵团后由于劳动过重、生活条件过于艰苦而导致的疾病，再加上兵团管理混乱，事故颇多，使一部分人致残。云南兵团一上海知青因患“多发性癫痫症”，被批准退回上海，另一位上海女知青下肢瘫痪，也退了回去。内蒙古兵团一位女知青得阑尾炎在团部医院手术，谁想阴差阳错，医生竟把她的输卵管割断。兵团出了事故不好交待，只好将她病退回城。至于那些因工伤致残，或因政治原因导致精神失常的人，由于他们已丧失了劳动能力，还要花费高额的医疗费，各兵团往往会主动为他们联系病退，其中一些人的父母，从感情上考虑过多而没有顾及其他，也主动要求将他们退回去。他们回城后的处境大多非常悲惨，兵团已不再支付他们的医疗费和生活费，而他们又一时找不到工作，全靠家里负担。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五团的北京知青李毓，就是这样的情况：她和姐姐李颜一同到兵团，因母亲有病，姐姐请假回去照顾，超假未归。这事对李毓压力很大，再加上一些人的过激做法，导致李毓精神失常，不得已回到北京。李颜觉得没能照顾好妹妹，被沉重的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日复一日，得了甲亢，最后她也病退回了北京，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李颜沉痛地写道：“妹妹是带着精神分裂症由兵团回到北京的。整整20年了，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工作能力，没有经济来源，仅医药费用一项，一年数百元，家里就无法承受。沉重的压力，使妈妈鬓如霜染，我的心如乱麻……”

最初的病退和困退，大大启发了兵团战上的思路，为了回城，人家开始动起脑筋，一时间，真的，假的，半真半假的，困扰着兵团的各级领导。病退和困退，人们更愿意走后一条路，堂而皇之地回去，还能分个好工作。于是，昨天还有众多兄弟姐妹的人，今天成了独生子女；父母明明健康长寿，突然变成了卧床不起；不知从哪里蹦出了七老八十的爷爷、奶奶需要照顾……家里人也在远方紧密配合，用挂号信寄来不知用什么方法弄来的各级证明。即

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无“困”可退，就把注意力转到“病退”上。本来不知药为何物的棒小伙子，突然有了3个医院的诊断证明；躺下就着的小青年，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为了回城，无数知青的大脑开动起来，于是无数可怕的疾病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喝墨水制造胃穿孔；服麻黄素、升压灵成为高血压；喝1%高效麻醉剂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肠痉挛；还有制造肝炎、肾炎、心肌炎、血尿，甚至装疯、装哑吧……为了得到一纸病退证明，人们想尽了各种招数，不惜损害自己的健康。原黑龙江兵团知青，现在北京当出租汽车司机的唐某感慨地说：“为了病退，当年瞎吃了那么多药，总算回来了，可总觉得身子不如从前。真后悔啊，当初要是知道能恢复高考，咱们这些没门路的人也能凭本事考大学，用办病退的劲儿来复习功课多好，唉，走错了半步路！”是啊，一些人由于顶着“病退”的名，回城后又开始了待业的经历，即使找到工作，也大多在“大集体”的单位。

因治病和病退还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件。1974年5月3日凌晨，上海支边青年胡志虎在沪杭线许村车站卧轨自杀。胡志虎是上海市松江县行桥公社69届毕业生，1971年10月赴云南思茅地区，分配到五·七农场一营五连（属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独五团）。1974年1月，经农场批准，胡志虎回沪探亲及治疗癫痫病。胡志虎先后向农场团部、连部发出七封信，请求将工资粮票寄来，但没有回音，他在绝望中留下遗书，卧轨自杀。上海市革委会的有关部门对此事件极为关注，特别电告各县，要求关心回城探亲和治病的下乡知识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反映》中披露了这一事件。同年10月28日，浙江支边青年郭和平自杀身亡。郭和平是浙江省黄岩县海门镇知识青年，1966年9月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分配在农三师四十一团三连。郭和平1967年2月患肝炎，久治不愈，要求返回浙江。四十一团未与浙江省有关

地、县的上山下乡部门联系即于1974年4月将郭和平的户粮关系迁出。郭和平回到黄岩后，要求落实户粮关系，县知青办按规定答复需经两地有关部门事先协商同意后方可办理户粮迁移手续，由于他的手续不符，情况不明，需待调查研究后再作决定。由于时间拖延太久，郭和平感到前途无望，乃自缢身亡。浙江省知青办为此特别向省内地、县知青办发出通报，并抄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新疆等省（区）和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通报指出：“郭和平自杀事件的发生，说明我们的政治责任心不够强，工作做的不够细致。郭回黄岩前，四十一团事先未经联系协商就把他的户粮关系迁出，是不符规定手续的，给工作造成了被动。郭回黄岩后，有关部门虽做过一些工作，但没有积极主动地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单位联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拖延了很长时间，也是发生事件的原因之一。据我们了解，近几年来边疆一些省的个别单位和地区，未经联系协商就把户粮关系迁出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致使这些知识青年的口粮和生活发生困难，政治思想无人管，不但影响了这些青年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因而造成政策混乱，工作被动，甚至发生自杀事件的严重后果。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要求各级知青办都应引起高度重视，需要认真采取措施，解决这类问题。对于那些未经两方协商，已把户粮关系迁来浙江的，有关地、县要从政治上热情关怀他们，积极查明情况，与边疆有关单位协商处理。如够‘特照’条件的，应补办回城手续；不符合‘特照’条件的，应主动和对方联系，对知识青年做好思想工作，动员他们返回原安置地区抓革命、促生产。有病需要继续治疗休养的，也应将户粮关系退回原安置地区落实好。请边疆有关省、地、县知青办和生产建设兵团，今后处理这类问题一定要严格手续，再不要事先未经两地协商同意，就把他们的户粮关系迁出。”

五 地震大逃亡

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前后，生产建设兵团的前途出现了危机，兵团系统内知识青年人心不稳已是各级领导面临的重大问题，1974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成批逃亡，更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事情发生在1974年8月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的知识青年，从外台广播中收听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中国的滇西南将要发生强烈地震，震中可能在瑞丽。这个不祥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并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后果：

谁也没想到过这消息的真伪和可信程度，谁也没想到过要去依靠组织。他们早就不相信那“组织”了。于是，当四营的成都知青最先喊出“我们回成都去，不在这里等死”的口号时，立即得到各营知青的响应。短短数日内，知青们奔走相告，“跑地震”的信号已经变成“回成都去”的强烈刺激。回城，是那时知青的最大目标。谁说不是呢？他们总在被动中接受生活，而只有这一次，是为着自己解救自己的目的行事的……

为了上路，知青们收拾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几乎遗弃了可以遗弃的一切东西，那一刻，谁也没作再回来的打算。但是，还没发工资，没有钱。知青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连队的老职工，向他们兜售自己本来就不多的衣物和其他的一些物品：一条七八成新旧的长裤卖2元钱外搭一双袜子；一件外衣卖3元钱；一只值百把元钱的半导体收音机只卖30元钱再搭一条短裤……没有比这再便宜的了。那几日，许多连队的老职工也在为地震而惴惴不安，但他们仍安然地接受了

这种交换。他们太贫穷了，他们不像知青那样无牵无挂；他们更习惯于接受和等待。不少老职工是含着泪送走知青的。而知青，却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他们知道前途未卜，但什么都不顾了，也什么都顾不了了……

团部的电话从来都没有这样频繁过。几日来，团部不断接到各营的紧急报告：以成都知青为主的知青队伍仍在不断聚集，向……进发……连队已失去控制……

被惊动的县委、县公安局、当地驻军以及边防检查站、海关等也在询问知青跑地震的情况并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已有不少知青到达县城……

瑞丽县城居民已引起恐慌……

已有一些傣族边民在恐慌中迁往国外……

各种情况仍在不断汇集，最严重的是来自瑞丽江桥守桥部队的报告：已有一批知青到达江桥，形成对峙局面。知青手中都有刀，守桥官兵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政委王以哲稳稳地盘着腿缩在藤沙发里，一连几个钟头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明白，什么办法都已不是办法了……会议室里的辛辣烟雾令人喘不过气来，王以哲终于明白了，知青们的这次风潮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知青们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回城！而对于他，作为这个团的第一政委，他却带着职业军人的思维和眼光来管理和看待所谓的兵团战士的。他们始终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被他们领导的实际上是一群地地道道的农民和一群在文化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学生，而绝不是一群训练有素的、能够用军纪紧紧约束的士兵……他慢慢伸展开早就麻木了的双腿，趿上布鞋，站了起来，低声说：“团宣传队全部去江桥，尽力劝阻，尽量少放走一个人！”……紧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也没有最佳的解决办法，只留下了满地的烟蒂和久久缭绕在

室内的烟雾。

凌晨4时左右，第一批到达瑞丽江桥的知识青年在与守桥部队对峙了大半夜后，终于乘着黎明前的昏暗冲了过去。

没有接到命令，谁也不敢贸然对知青开枪，连江桥部队那两只凶狠的军犬也没敢放，拴住军犬的铁链在黑暗中被拖拉得“哗哗”乱响。

“8·28”冲江桥跑地震的知青大逃亡事件正式拉开了序幕。

天刚亮，团政治处副主任胡纯富就集合了宣传队的全体队员，宣布了团党委的临时决定，立即组成劝阻队开赴瑞丽江桥，与守桥官兵一同进行劝阻，尽量不放走一个知青……

守桥部队的丁排长和他的士兵们用毫不掩饰的甚至是有敌意的眼光接待了宣传队员们。而宣传队员们也故意用什么都无所谓的眼光打量着那些神情紧张的战士，并大声说：“我们也是知青。”宣传队员们发现，县公安局和海关的人也在其中。

对知青存有介蒂的丁排长耐着性子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后，忍不住破口大骂：“那些小知青，都带着长刀。要不是有命令老子的枪早就响了！谁也别想从这里跑过去！”……

“哪个敢开枪！”往日斯斯文文的姚娃儿突然像是漫不经心地冒了一句。

丁排长怔住了，一下住了口，脸上却露出愤愤的表情……

突然，一阵急促的喊声传来：“来了……”，一名被派出观察知青动向的士兵喘着粗气、神色紧张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来了来了……好多……好多人……”

“准备好，手挽手！”丁排长猛地发一声喊，大家纷纷扑向公路，手挽手地站成几排人墙，封住了北面靠山一面靠江的路面。他们身后，就是瑞丽江桥。

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人墙前方不到100米的公路拐弯处，传来一阵整齐而又急促的脚步“嚓嚓”声，紧接着，一个知青方队出现了：一圈强悍的男知青，全部双手高举着亮闪闪的景颇长刀，形成方阵的外圈；中间，是神色坚定而又凄然的女知青。几十张年轻的脸都布满着悲壮冷峻的铁青。

人们顿时被震住了，谁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谁也没想到知青会组成如此的方队。

双方的距离在“嚓嚓嚓”的急促脚步声里一秒钟一秒钟地缩短。犹如江面拍来的巨浪，还未正式接触就感到了那股迫人的气势，人墙开始下意识地缓缓后退，紧张的空气在双方不断缩短的距离的挤压下开始凝结……只有10多公尺了……知青方队猛然发出一声暴喊：“让开——”长刀开始挥舞了，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白亮亮的弧线，在那一霎那，劝阻者们挽着的手相互摔开着退到公路两旁，方队也乱了，呼号着向前猛冲。在紧张和杂乱中，丁排长首先清醒过来，他猛然大叫着“不能过去呀”扑了上去……

在瑞丽江桥桥头那一小段窄窄的路面上，上百人撕扯在一起，土路扬起一股股黄尘，人群中不时发出女知青绝望、惊恐的哭声和凄厉的尖叫；亮闪闪的景颇长刀在人群上空挥舞，发出“噼噼”的颤音；人们相互抓着扯着搂着抱着挣扎着厮打着……不时有人跌倒又挣扎着爬起来；不时有男知青冲出去又返回来，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同伴，他们要一起冲过去，仿佛冲过去就是生，冲不过去就是死！撕扯的人群中，一个女知青刚被拖拽着冲出来，便无力地重重跌倒，她几次想撑住身子爬起来却总也爬不起来，她的头发散乱了，嘴角也渗出了一丝鲜血。混乱的人群中，有的女知青干脆坐倒在地上掩面大哭，嘶叫着：“我要回成都，我要回家呀……”一个男知青被数名军人围住，怎么也冲不出去，他大吼着“一起

死吧！”用景颇长刀在自己面前挥舞成一个大圆圈……混乱中，几个宣传队员似乎是有意无意地用身子挡在那些冲出来的知青的背后，让自己被追上来的军人抓住，拉回，然后才说“我是劝阻队的”……

仅仅持续了几分钟，劝阻者们终于顶不住了，几近疯狂的知青终于呼啸着冲了过去，没有冲过去的十几个知青却被死死地拖着抱着，再也挣不脱了。一个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的瘦高个子的知青，被3名军人死死地抱住，猛地，他放声大哭，不再挣扎了的身子一阵阵地抽动，霎时，江边的人都被这哭声惊住了，一切都仿佛静止了，只有那哭声在流淌的江水上飘荡。

江对岸，已跑过去的一群知青也被这哭声惊住了……猛地，又爆出一阵呐喊：“你们等着，我们过来救你们！”长刀又开始挥舞了，他们向江这边冲来。

放声大哭的男知青见状猛地放声大吼：“你们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不要管我们……快走吧快走……回去告诉我妈就说我死了——”他边吼边挣扎着身子向江水扑去……

——瑞丽江下游，在缅甸境内汇入伊洛瓦底江。

劝阻者们，无论是军人还是宣传队员，都被那哭吼深深地震憾了，人人都默然相对……

劝阻失败了，瑞丽境内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唯一的一道防线被知青突破了。当天，又出现了知青第二个方队、第三个……相继冲过去了，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遥遥千里的滇缅公路。

沿着滇缅公路艰难行进的逃亡知青有400余人，他们行动越来越过激，拦车，找吃的，找住处，冲突不断发生，甚至拦截了军车并抢了枪，一名知青在混战中向天开了枪。当地群众接到了

上级的指示，强行阻拦知青，于是很快行动起来，武装民兵纷纷出动，围捕逃亡知青，有些民兵开了枪。参与拦劫军车的22名男知识青年，在祥云附近被近千人包围，在短暂混战中全被打伤，送到一个简陋的小卫生院看押治疗，并在9月10日左右被送回瑞丽，所幸没有死人。9月中旬，逃亡的知青被陆续遣送回瑞丽。事情是这样平息的：

参加地震大逃亡的知青中有10多个人被兵团第三师师部警通排抓了，据说是传谣者和领头人。

神态凄惶默然的知青们悄悄地回到了各自的连队，谁也不愿再提这事了。

十一团团党委发布了两条命令：（一）对参加跑地震的知青不再追究；（二）凡买过知青东西的老职工必须立即全部退还给知青，并且不许向知青索要一分钱。老职工在接到这命令时，退还了知青的东西，并且同样地安然，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对强行脱离兵团的知识青年，可以用强硬手段来制止，但是人心思归，已经是难以回避的事实。

六 “兵团战士苦菜花”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这是当年在兵团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的确，由于存在三大差别，同样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却分为三六九等。进工厂当工人，接受工人老大哥的再教育，既可以留在城市，又能学到技术，当然是第一等的；去部队当兵虽然苦一点，但杀敌立功，保家卫国，也为当时人们所向往；尽管农

村插队的知青羡慕到兵团的人，但插队也有好处，农闲时可以跑回家去悠哉悠哉，只要狠下心来不要工分，回家呆上一年也没人管，再说招工、参军、上大学的机会也比兵团多得多。只苦了兵团战士，没有解放军光荣，不如工人有前途，一样的干农活，却又少了插队的那份自由。如梦如烟的痴迷逐渐消散，奉为神圣的东西失去了昔日的光环，留下来的人们带着受苦受难后的清醒去寻找未来，可是向前看，没有多少光明，不知前途在何处。没走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被抛弃、被欺骗感，许多人彻底失望了，他们过早地丧失了对生活的热爱，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指点江山”的雄心壮志变为“信仰危机”、“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极度的精神空虚弥漫在兵团的各团场。消极怠工、抗拒管理、对抗领导、打架斗殴、未婚同居等现象越来越多，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人干什么都不认真，甚至连谈恋爱也不认真，那么认真干什么？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混吧，很快就学会了烟和酒。也壮起胆子干过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朦朦胧胧中渐渐地懂了女人的奇妙。继而又接受了赌的刺激，或让各种卦相把年轻人的心带到那惶惑的境地中去。”是堕落？是倒退？但是造就这种“堕落”的原因何在呢？

针对知识青年不安心兵团的种种迹象，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强调正面教育，各兵团的报纸不断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进事迹，介绍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好形势，陈述扎根边疆、扎根兵团的意义。有的文章还登载在《人民日报》上，如1972年5月7日，《人民日报》就刊载了署名为沈建兵（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文章指出：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把青年造就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保证党和国家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

前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伟大战略任务。

……“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劳动惩罚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是一种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它反对知识青年通过生产劳动实践接受工农再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它反对知识青年理论联系实际，又红又专；它反对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一句话，它堵塞知识青年走向革命之路……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广大知识青年，正是由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阶级斗争当作一门主课，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提高，更坚定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

边疆广阔的天地是他们革命化的大熔炉，也是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课堂。他们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通过反复试验，在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联合收割机无发动机改装。他们培育出粮豆新品种，普遍试制和推广各种农药。他们在北方严寒地区成功地培育了珍贵的银耳。他们在无霜期仅有120天的条件下，开创了年养两季蚕的新纪录。他们和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反复学习、反复试验，解决了多年来不曾解决的防止马铃薯退化、鹿群野牧等许多科研难题。许多知识青年刚来边疆时，还认不出苗和草，现在已经成了农业生产的“小专家”……

广大知识青年和工农一起战天斗地，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为他们的世界观的改造，提供了条件。他们只有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真正认识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作用，懂得什么叫“平凡”，什么叫“伟大”，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欢乐”；才

能逐步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理想”、“前途”，立志“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锋”，“为革命干一辈子庄稼活”……

洋洋洒洒的大道理和措辞严厉的批判稿，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也不可能反映知识青年的真实心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女知青李加里的一段“冬夜遐思”，才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思想情绪：

那是1972年，一个寒冷的冬夜……

天地冻凝了，我的思想好像也被冻结了，头脑里一片空白。木木地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个声音在问：“你将一辈子这样干下去吗？”不觉心头一阵冷缩。

一些日子来，这声音老是出现，逼着我反复地去想。是啊，这寒冷，北大荒特有的带着潮湿、令人难以忍受的寒冷；这劳作，面向黑土背朝天、无休止的劳作；这生活，清苦而又平淡的生活……

我不敢想下去，感到了一种畏惧……

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也许，我不会永远在这里，有一天要离开北大荒，去创造另一种生活。可这毕竟是感觉，什么也没发生，一切依然如旧……

不管是参军、上学，还是病、困退，只要有人离开连队，都会在知识青年中引起思想波澜。黑龙江兵团的一位知青写道：

从食堂打饭回来，亚芬告诉我，又有3个知青“病返”了，一会儿“28车”送他们去火车站。

送走了3个人，大家谁也没说什么，我心里无由生起一股茫然凄凉之感。晚上，宿舍里的人都早早爬上床。我无法

入睡，想必他们也没睡着。各人都有心事。看来，谁都不愿意在这呆一辈子，不论先进的，还是后进的。想来想去，更觉得心烦意乱。同屋这几个人，老耗子、亚芬、老不死，或在连队当出纳，或是老师、班长、团支部书记，全是骨干。可事实上，还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想走？可话说回来，都已年近30岁，多少困惑、烦恼、痛苦包围着她们。工作、生活、爱情，返城无疑是她们的奢望。

知识青年们对命运的思考，渐渐变成了半公开的讨论，焦点似乎集中在是否“扎根”的问题上，并且有了所谓“扎根派”和“怀疑派”的分野，而实际探讨的问题已经跨出了知识青年乃至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成为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探询。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当然不是什么“扎根派”，报纸上的公开议论却是一面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对是正确的，形势一片大好，绝不能怀疑和干扰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

197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两封针锋相对的来信》，把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两位知识青年黄一丁、刘宁的私人信件公布于众，挑起了一场惑乱视听的“怀疑派”与“扎根派”的辩论。黄一丁的叙述使我们得以了解事情的原委：

1975年11月，我接到了困退回京的通知，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自己是连队的积极分子，下大田、“学大寨”的知青骨干，数年接受“扎根”教育的熏陶，大谈过不少教育他人的大道理，这么突然一走，良心受谴责不说，不是自食其言吗？会让人家怎么想？

但我到底回到了北京。或许这便是“小资产阶级软骨病”最鲜明的表现吧。

在北京，我看望了几位同学的家长。刘宁是我的邻居，又是同学，刘母见到我，自然联想到自己的儿子。她深感伤心，希望我写信给刘宁，劝他尽快想办法回来。当时能有回京鸿运的知青并不多，所以劝与不劝我知道不会有实际意义。但我还是给刘宁去了一封信。

是我回到北京有了时间归纳概括自己这几年在兵团的感受？还是从“局外人”的角度去妄评北大荒？再或是力劝刘宁晓以“深浅”？总之在信中多有画蛇添足的笔墨。诸如对“学大寨”和“扎根”问题，我表示尽管支持理解，但怀疑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号召力；对当时黑龙江知青学习的榜样，“有些地方很钦佩，可有些地方并不想仿效”；感叹到政治，我说：“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着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实际上并不明白”，“政治这个东西，往往流于简单化，形式化，往往是落后于千变万化的社会存在的”等等。这些内容多是一些矛盾心理的真实表露。我虔诚并身体力行了“农业学大寨”和“扎根”运动，同时又饱看到“文革”中的种种怪现象，把这解释不清又想解释的问题诉之笔端，便成就了我后来“出名”的大作。大作后来给我带来的麻烦和压力我当然想不到。

刘宁当时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四团团宣传队队员，被评为1975年的“先进青年”，并在话剧《挑战》（根据1974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唯一一名兵团知青代表、黑龙江兵团北京知青高崇辉的事迹编成）中饰演主角。半个月之后，刘宁给黄一丁回信了；信是复写过的，有十几页之多，对黄的内心表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并且表示：

我是断然不回去的，不管家里怎么办，通知书来了也不

走。高崇辉同志当年面临的考验马上就要出现在我面前了，我要学习他……

我赠给同台演戏、家里也正在给她们办病退的同志的话是：

与王淑琴同志共勉 如果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那就让我们把自己同这个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的热血全部地洒在那块美丽的园地。行动吧。

与谭霞同志共勉 红霞终将撒满人间，那红霞是千万共产主义者的鲜血染成，其中也有——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三代捐献的一片。一定是。

刘宁把这封信的复本作为思想汇报，交给了党组织，并且很快逐级上报，由团、师直到兵团政治部，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黄一丁还蒙在鼓里，他又寄出了洋洋四五千言的复信，除了对刘的大道理表示不以为然外，在“扎根问题”上申诉道：

不管我能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逃跑”辩护，我都不能避开事情的核心：我竟是如此不可救药地舍不得已得到的或者将要得到的个人利益！当我看到（我在看《烈士诗抄》）革命烈士由于不肯出卖革命而被重新关在黑牢的时候，我才感到我的灵魂是如何的卑微、丑陋。从今以后，我有什么颜面侈谈“理想”呢！……我希望一直看着你们举着时代的火炬勇往直前。正如我有一次给别人写信中说的那样：你们身处偏远落后的乡村，却是时代最英勇的尖兵。可是小心，假如有一天你把这火扔掉了，看我会怎样嘲笑你。

黄一丁的两封信都到了领导的手里，被分析出三大错误：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散布反动的“怀疑论”。

刘宁则在1976年3月入了党，并作为先进典型回到北京。兵团政治部把两个人的来往信件送往北京，被谢静宜看到，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和“回城风”的好材料，指令《北京日报》公开发表，并加上了编者按：黄、刘的通信反映出知青上山下乡、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刘宁的复信立场鲜明，气势磅礴，发扬了红卫兵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此事给黄一丁造成了极大压力，兵团政治部和组织部派专人来京，意在要他返回兵团；他还不得不经常到《北京日报》去“谈思想”。黄、刘也在北京面谈过几次，但已经不是朋友、同学之间的交流思想和讨论问题，而是所谓的“帮助”了。8月26日，《北京日报》又发表了刘宁的第二封回信，全然是气势汹汹的训斥：

你绝不是如你自己所说，不配有理想。你是有理想的，不过，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想，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这种理想源于你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人生观”，核心是个人主义。

你的身上已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作了“资产阶级应声虫”，正在“堕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向何处转化，取决于对错误的态度”。“修正主义正向你招手，资产阶级正为此拍手喝彩呀！黄一丁同志，该猛醒了，要警惕啊！”

这场事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前途命运的辩论，在政治高压气氛下，只能变成又一次一面倒的政治说教。论战最终以黄一丁在报纸上的公开检讨而告结束。事件似乎平息下来，但是在知青中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黄一丁收到了数以千计的来信，对他表示同情。知识青年要改变命运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起来。

入流“理论家”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他们暂时无法改变自

己的命运，但是绝不因此而放弃努力。不少人每天仔细地看报纸，从字里行间捕捉着信息；传达文件时，详细地做笔记，然后进行认真研究，再综合“小道消息”，做出判断。探亲回来的人更常常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各种可靠的和不可靠的消息。他们盼望国家政局的根本改变，因为这将意味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命运的变化。

另一类有识之士是埋头学习者：学数理化、学外语、学语文知识、学提琴、学手风琴……不惜工本地培养一技之长，他们希望由此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虽然在当时学这些知识、专长似乎并无大用，但他们觉得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国家不会永远像现在这样。

城市在招手，家人在招手，兵团的知青们在通向城市的大道上艰难地、但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他们中的一些人如愿以偿，但绝大多数人的面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呢。

第十四章 走出误区

总参谋部的调查带来不祥之音——全面整顿，生产建设兵团全部撤消——“欢送”现役军人——不再被“运动”所迷惑

一 改变体制势在必行

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最初被认定为加强战备、建设边疆和安置知识青年的长远计划，但是在短短几年内，兵团亏损巨大，已经成为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有人开始对兵团的组织形式表示怀疑，中央亦不能不采取行动，寻找新的出路。

1972年5、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务院农林部联合派出3个小组，调查了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安徽5个兵团的情况。7月21日，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在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调查的报告中，列举了五方面的问题。

1973年2月8日，总参谋部和农林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4
40

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生产建设兵团有不少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不少兵团办得不好，投资多，产量低，亏损大。1969—1971年，国家对兵团投资13.4亿元，弥补亏损7.8亿元。1971年，全国兵团的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200斤。内蒙古、山东、江苏等以农业为主的兵团，粮食还不能自给。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负担，影响了兵团的巩固和发展。

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兵团建设方向和领导管理体制问题。

组建兵团以来，一直有不少同志对兵团是以打仗、育人为主，还是以生产为主？是按企业办，还是按事业办？建设方向不明确，甚至提出“兵团向何处去”的问题。内蒙古兵团反映，“组建三年，花了‘三亿’学费，现在才知道兵团是搞农业生产的。”

有些兵团偏重于军事，轻生产。布局建点从战备要求考虑多，从生产条件考虑少；强调解放军建制，解放军领导，各级机关要以现役干部为主，兵团有现役干部3万多人，相当一个军的员额，计入军队实力，国防费开支；兵团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多是沿用军队的一套，不适应生产的特点；在武装力量建设上，注重值班部队，放松民兵工作，新疆兵团还组建了14000人的现役部队，解放军待遇，不算军队定额，经费由兵团自理，开支很大。不少现役干部不安心兵团工作。

有些兵团由于方针、任务不明确，几年来接收、安置知识青年过多、过猛，同生产需要不相适应。内蒙古兵团强调育人、战备为主，在原有2万人的基础上，两年安置知识青年近10万人，从东到西沿边防线设置了6个师，45个团，点多，线长，而实际耕地只有150万亩。1969—1971年，国家拨基本建设投资2.33亿元，弥补亏损7860万元，3年平均粮

食单产 80 斤，吃供应粮 2 亿多斤。有些知识青年至今还考虑“去向”问题，思想不够稳定。

内地组建的兵团，一般是规模不大，布点分散，可垦荒地不多，又无“边”可“戍”，性质、任务更不明确。浙江兵团只有 13 万亩耕地，6 万人，每年工农业总产值 5000 万元左右，组建了 1 个兵团部，3 个师，15 个团，头重脚轻，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农业亏损由 1969 年的 178 万元，增加到 1971 年的 1300 万元；工业利润由 1969 年的 1130 万元，下降到 1971 年的 903 万元。浙江人多地少，兵团与各个方面的矛盾较多，很难维持，兵团党委已报请省委撤消兵团建制。

兵团属大军区建制，党政、军事、干部等工作，广州、福建、山东等兵团归大军区管理，其他兵团都委托省军区管理；计划、生产、投资、物资等工作归省、区革委会管理。实践证明，军队、地方两家管理，没有主次，都管都不管，同时，党政工作与经济工作分管，难于形成统一领导。兰州兵团所属 6 个师，分设在陕、甘、宁、青四省、区，矛盾更多。

省军区认为，兵团也是军级单位，而且其领导干部老、级别高，对兵团行使领导确有实际困难。大军区主要抓军政工作，经济方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便跨越省对兵团实施具体领导。兵团的各级干部，有的穿军衣，有的穿便衣，军队管理地方干部和地方管理军队干部都不方便。

省、区革委会认为，兵团是军队系统，大军区的单位，不便领导。安徽省习惯上称省革委会、省军区、十二军和兵团是“四大单位”。黑龙江省革委会各业务部门认为，他们和兵团是“服务供应”关系。因此，兵团的生产业务归口领导至今不落实，兵团的生产建设计划，没有全面地纳入省、区的统一计划；经济关系上矛盾很大，土地、水源、山林、矿山

等纠纷很多，不利于国家与地方经济的统一规划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物资供应体制下放和改变以后，衔接得不好，物资、设备供应，有的比过去减少，甚至中断，对生产影响很大。兵团的政法、文教、卫生、民政、交通等政府工作和社会建设事业，一般是由兵团自办，负担很重，又很难办好。

兵团基本上是按军队组织形式编组的，与生产需要很不相适应。机构庞大，设兵团、师、团、营、连，层次多，非生产人员多，管理生产人员少，不利于企业管理。黑龙江兵团机关设有司、政、后三大部，计划、生产、作训、炮兵、侦察、军务、通信、战勤、装备、营房等 25 个处，干部 420 人，加上警通、司机、门诊等人员共 781 人，比原来的农垦总局和农垦厅编制多一倍。其中，直接管生产的只有 3 个处 59 人，仅占机关总人数的 8%；师和兵团机关行政事业费开支，1971 年为 1100 万元，另由国防费开支 460 万元尚未计算在内。新疆兵团非生产人员占职工总数的 20% 以上。很多兵团存在着“供给制”思想，不注意经济核算，非生产性开支和非生产性建设显著增多。特别是兵团垂直领导，层次过多，与农业生产的地区性不相适应，生产指挥不当，“一刀切”的现象比较多，广州兵团橡胶生产尤为严重。

目前，很多地区和兵团都感到兵团问题很突出，急待解决领导管理体制问题，有的要撤，有的要整顿。

边疆地区的黑龙江、新疆等兵团，生产发展潜力大，又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切实加强。不少兵团领导同志的意见，兵团的领导关系要“靠一头”，或归军队或归地方，或归大军区或归省军区，我们倾向兵团不再列为大军区建制，划归省、自治区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政治工作、生产工作、干部工作以及政府工作，都由省、自治区革委会管理，生产、财务、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全部纳入省、区计划，军事、民兵

工作归省军区管理。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帮助把兵团办好。

内地组建的兵团，一般没有边防任务，采取兵团的组织形式意义不大。湖北生产建设兵团，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已撤消，恢复农场，成立农垦局，由省、地委领导。建议类似情况的内地兵团，也可以考虑参照办理。

二 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全部被划掉

1973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采纳总参谋部和农林部的建议，把一些生产建设兵团从大军区的建制中划出来，归省、自治区直接领导，并逐步缩小兵团的规模，撤消了一些兵团的建制。

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已在1972年由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撤消，离组建时间仅一年。

1973年8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黑龙江省委领导。10月4日，沈阳军区向黑龙江省委移交了工作关系，但是在会上强调“改变兵团的领导体制，并不意味着兵团性质、任务和体制的改变”。

如前所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受到国务院领导的严肃批评，不得不作检查。1974年5月，黑龙江兵团党委向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递交了《关于1973年企业亏损的检查报告》，承认李先念副总理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并将兵团低产亏损的原因归为：（1）议政不够，不注意抓大事、抓路线；（2）没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3）农田基本建设没有搞好，农业生产条件改变不大；（4）党委自身革命化搞得不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也因此而有所改变，开始从用军事手段管理部队向抓企业的经营管理转化，岗位责任、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与维修、经济核算、劳动管理、安全生产等制度先后建立起来，职工自留地等问

题，也有所解决。

1973年10月18日，兰州兵团汇报了体制管理方面存在的五个问题：一是兵团横跨陕、甘、宁、青四省区，战线太长，管不好也管不了；二是军区和省区对兵团实行双重领导，许多问题互相依赖，解决不了，不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是军政、军民纠纷不好解决；四是政治经济脱节，不利于生产建设；五是脱产人员多，开支大，又不对口，不利于对生产的领导。兵团提出了撤消兵团机关、将所属各师交给所在省区党委统一领导的建议。10月21日，兰州军区党委批转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工作会议纪要》，决定撤消兵团机关，所属各农建师分别交给所在各省、自治区领导：农建一师、二师和林建师划归甘肃省，农建四师划归青海省，农建五师划归宁夏自治区，农建六师划归陕西省。

11月19日，广州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广东省委领导的请示》，希望尽快办理兵团向地方移交的手续。

12月6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递交了《关于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移交省委领导的请示》，请示报告指出：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1970年初，以我省农垦系统和华侨部门的20多个农场共9万余人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先后派去了2300多名现役干部，安置了10万名知识青年。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兵团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成绩。橡皮的定植面积1969年是40万亩，现在是68万亩；干胶片1969年产980吨，今年产6630吨，增长了6倍多。当然，这几年兵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但主要是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管的不够不紧。

根据当前发展形势的需要,为了把兵团的工作搞得更好,将兵团改由地方党委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兵团领导关系改变后,为了适应地方体制和经济管理工作的特点,我们意见,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省成立农垦总局,作为省委、省革委的一个部门;有关地、州,成立农垦局,作为地、州党委和革委的一个部门;团以下单位,改为农垦团或农垦团。总局到各团,都要建立政治工作部门,以加强对干部、工人和知识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团还要建立武装部,有的配现役干部,加强民兵工作。

对兵团的现役干部,原则上分批分期地撤回部队,少数确需留下的,按中央 [1972] 32 号文件的精神办理。

1974 年 1 月 23 日,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十师划归广州军区直接领导,恢复八一农场名称。

同年 2 月,原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四师改名为青海省农业建设师,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领导。

6 月 26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广东省委领导;同意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团改为农场,分别成立农垦总局和分局;在改变领导体制过程中,强调要对干部、群众作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抓好革命和生产。

7 月 1 日,宁夏农建五师建制撤消,所属团场与宁夏其他国营农场合归宁夏自治区农垦分局管理。

7 月中旬,云南省召开了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会议。8 月 30 日,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批转了《改变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会议纪要》。9 月 6 日,昆明军区正式发出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命令。10 月 13 日,云南省委发出成立省农垦总局的通知。10 月 29 日,云南兵团撤消工作结束。

8月13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接交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8月17日，广州军区党委和广东省委联合发出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广东省委领导的工作方案》。当月，海南区党委、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湛江地委和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分别在海口市、湛江市召开兵团工作会议，对交接工作进行具体安排。10月1日，广东省农垦总局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在兵团任职的现役军人干部从10月份起陆续撤离垦区，12月底基本撤离完毕。

12月，甘肃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撤消农建一、二师和林建师编制，农一师所属各团、厂由酒泉地区接管，农二师下属团、厂分别由张掖、武威地区接管，林建师下属各单位分别由庆阳、平凉地区接管。

中央军委、国务院还同意南京军区将其所属江苏、浙江、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所在省省委领导；撤消了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广西农建师。

经过两年的调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的12个兵团和3个独立师，变成了7个兵团和3个农建师，其中保留在大军区领导之下的有新疆兵团、内蒙古兵团和山东兵团；隶属省委领导的有黑龙江兵团、江苏兵团、安徽兵团、浙江兵团和西藏、青海、陕西的农建师。

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进行全面整顿的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亦在整顿之列。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管理体制的工作加速进行，并最终得以完成。

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改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求报告，撤消新疆兵团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国营农场。兵团和师的工矿、交通运输、建筑企业，以及商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分别划归自治区和地（州）有关部门领导，各团场归所在地

(州)领导。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随即发出了《关于改变兵团体制有关交接工作的具体方案》。5月，兵团各机关将所属单位的机构、人员、工资总额、财产、物资以及职工档案等一并造册，移交给自治区的有关部门。

6月5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安徽生产建设兵团被撤消。7月29日，安徽省成立了省农垦局筹建领导小组。

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原兵团所属农、牧业团改为国营农、牧场，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场管理局。兵团、师、团所属的35个工矿企业，交给所在地工业部门归口管理。交接工作在当年底全部完成。

7月16日至21日，农林部在北京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做好交接工作座谈会。农林部副部长肖鹏在讲话中指出：“1968年以来，全国先后组建了11个生产建设兵团和2个生产师，加上原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生产师共12个兵团和3个生产师。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兵团、生产师贯彻执行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进行了斗、批、改，开展了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在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发展生产、培养教育知识青年、建设和保卫边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工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团结，更好地促进生产的发展，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了11个兵团和2个生产师。在有关省、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执行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示，改变体制是顺利的，交接工作是做得好的。”肖鹏希望在交接工作中，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各级党委重视，是做好改变兵团体制工作的关键。（二）改变兵团体制，涉及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思想反映，因此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三）认真做好交接工作，

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抓交接，一手抓生产，做到生产不停顿，工作不间断，绝不能因为改变体制，而造成生产下降。（四）组建好农垦部门和农场的领导班子。（五）搞好农场的管理体制。（六）进一步加强党对国营农场的领导。

撤消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工作进入了扫尾阶段。

1975年9月，青海省农业建设师移交给海西州领导，改名为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农场总场。

10月30日，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联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对改变兵团体制提出了七条建议：（一）撤消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领导机构，与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地方国营农场管理局。兵团的各团改为农（牧）场。（二）加强党委对国营农（牧）场的一元化领导。（三）对兵团所办的企业事业，原则上团办的带归农（牧）场，师办的带归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兵团直属的由省国营农场总局管理，继续办好。需要调整的，留待以后经过调查，分别情况作适当的调整。（四）体制改变后，各农（牧）场要在党委领导下，进一步搞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场的群众运动。（五）要坚持贯彻屯垦戍边的方针，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六）做好兵团体制改变后的现役干部的安置工作。组建兵团以来，沈阳军区为加强兵团建设派来3000多名现役干部。兵团体制改变后，按沈阳军区党委意见：“对师以上干部，按军委17号文件，除省委认为确实需要留，本人又愿意留的外，由部队安排。团以下干部，经过做工作能就地转业者，能留多少留多少，确实不愿就地转业者，可以回军区所属单位，统筹安排处理。”对于愿意转业留地方工作的现役干部，我们热情欢迎，妥善安排，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七）加强农（牧）场系统的各级领导班子

建设。

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各师的领导机构，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合并，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1976年2月25日，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正式成立，同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宣布撤消。

山东兵团等也相继撤消，只有西藏生产建设师坚持到了1979年年初才撤消，改为西藏自治区农垦局。

三 “来时雄赳赳，走时灰溜溜”

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一轰而上和“一刀切”的做法。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组建和全部撤消，不过是这类事例中的一个而已。兵团的体制改变牵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18个省、自治区的领导机构，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有大军区，更关系着近千万人的命运。在兵团移交地方的过程中，交接工作并不难做，但也存在一系列具体问题。

在各兵团撤消前后，人员流动突然加速。兵团即将撤消的消息一旦传开，不少人马上开动脑筋，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工作，由条件差的团场调到条件较好的团场，由农、牧业团调到工业团或者兵团、师的直属厂，从连队调到机关等等。由于兵团、师领导机关的干部，甚至大多数团场的领导干部都即将离任，他们不再对企业的未来负责，所以对人事调动远不像过去那样关心，更有不少人利用这一机会拉关系、“走后门”，把自己在农村的子女、亲戚塞入兵团的厂矿、团场，占一个“全民”指标；或把自己在工作中培植起来的“亲信”安排在较好的工作岗位上。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在兵团撤消前曾发布过“人事冻结”的命令（完全停止人员调进、调出），但尽管有这样的命令，人员流动还是没有控

制住，有的生产连队甚至团场，由于条件艰苦，原来的人员都自找门路调走，到地方接管时已成为空架子。相反，一些厂矿却是人满为患。

原兵团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是现役军人），在离任前都要“突击”发展一批甚至几批党员，提拔、任命一些干部，以偿还自己欠下的“人情帐”。这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在一些单位蔚然成风。地方接管兵团后，往往对于原兵团基层干部的安排、使用颇费脑筋，因为按照惯例，干部是只能“上”不能“下”的；而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即便以后表现不好，也只好承认事实。

根据军委文件精神，兵团撤消后，现役军人除地方确实需要留，本人也愿意留的人外，大多数人可以回部队安排工作。现役军人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先回部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撤退速度可能是最快的，以一师五团为例，1974年9月16日改为黎明农场，当月中旬现役军人即全部返回了部队。一些现役军人在走时大捞一把，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被人讥为“来时背包肩扛，走时车载箱装”，留下了极坏的影响。一位兵团战士气愤地说道：“兵团解散时，有不少平时道貌岸然的现役军官，趁着‘大撤退’，不顾一切地捞东西，有的甚至把办公室的折叠桌、折叠椅、条毡都卷跑了。”虽然各生产建设兵团都曾明令禁止各种违反财经制度、化公为私的行为，但这股歪风并没有彻底刹住。满载行李的车辆陆续摇摇晃晃地离开原生产建设兵团各单位，车上除了大小家具、行李卷儿、锅盆碗筷外，甚至还有木料、水泥、砖头、煤块、粮食，真正的干净彻底！留在车后的，是兵团战士的嘲骂，但是谁还管那么多呢？

当然，也有不少现役干部自始至终保持了应有的本色。他们在兵团工作期间能够与职工、战士一起吃苦受累，离开兵团时依然是旧木箱和几卷简单的行李。对这样的现役军人，知识青年是由衷地佩服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的韩凤歧同志，就

是这样一位值得称道的好连长。韩连长一贯工作干在前，却从来不向党伸手要职位、要待遇。他的家庭生活较困难，却从来没有拿过公家的一分一毫，也拒绝享受任何特殊待遇。离开兵团时，他的全部家当还是那几个行李卷和旧木箱。

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复员转业军人，绝大多数已把家属带到兵团安家立业。他们急需解决的是妻子、子女的就业问题。有些人利用兵团解散的机会，给家属谋到了职工名额，地方接管后，亦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而未解决的人，又要求新的名额，形成新的矛盾。

兵团的体制改变，给本来已不稳定的知识青年带来了整体性的“人心思动”，并造成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地方干部希望人员稳定，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知青却急于回城，不能安心工作。如前所述，全国兵团包含了上百万知识青年，兵团撤消之后，这些知识青年问题，全部要由地方政府来解决，并成为整个农垦系统中最不安定的因素和最难解决的问题。

各兵团撤消之前，人心浮动，人员流失，生产大多陷入停顿状态。更严重的是各地纷纷出现“吃喝风”和“哄抢风”。许多连队、团场的粮食积蓄被吃光分光，生产工具被拿光，甚至不少公共建筑被拆毁。安徽生产建设兵团体改之际，就是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一位当年的目睹者说：“安徽兵团司令部设在合肥工学院内，教学大楼成了兵团司令部，教室打通了作家属宿舍。兵团解散的消息传来后，干部和家属都准备搬家，到处是一片混乱的景象。孩子们可高兴了，因为能够随便往家里拿东西了。我们先跑进图书馆，每人抱一大摞书往家走，管它什么书呢！后来干脆把书装到麻袋里，让大人帮忙拉回去。图书馆空了，就跑到办公室去拿文具，见什么拿什么。办公室里还有人上班呢，可谁也不干涉。我当时特别喜欢眼镜，不知是谁的眼镜顺手放在了办公桌上，被我拿了就走……”

由兵团组织的生产，本来已对生态环境、土壤等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再经历一次解散兵团的“浩劫”，不少团场已是满目疮痍。地方政府接收兵团各团场、连队之后，除了安定人心、整顿组织系统（包括合并连队、团场，重新任命干部甚至重建党、团组织等）外，往往不得不筹措资金，购置新的生产工具、调运粮食等，方能逐步恢复生产。

四 位卑未敢忘忧国

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相继解体时，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的前夜。尤其是到了多事的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去世，在北京天安门发生所谓“反革命事件”，越刮越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唐山地震……在原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的知识青年，没有置身世外，他们不但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还做出了应有的反应。

有一些原来的兵团战士直接卷入了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并把事实真相很快传回边疆的农场和工矿企业。在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抱着冷漠、怀疑和抵制的态度；对于追查“反革命谣言”和“手抄本”之类的举动，更是嗤之以鼻。黑龙江、内蒙古兵团知青在以下四段回忆中所说的情况，在各地都可以看到：

1976年4月8日，佳木斯上空弥漫着阴云，大风也刮得昏天黑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年初刚被撤消，此时兵团机关各部门还在最后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上班不久，全机关就集合列队去火车站广场参加合江地区暨佳木斯市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拥护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的群众大会。

趁带队的人不注意，我溜出了队伍，给队伍中的赵文华使了一个眼色，我们就一前一后地溜到电话站去找杨振

明了……

刚坐下，司令部的王路通拿着一封信也溜进来了。他进门就说“‘副主席’来信了。”“副主席”指的是林建，原在兵团机关农场工作，1975年因家庭困难返回了北京。这几天，我们几个一直盼望着他来信传一些北京的“小道”消息。每天报纸刊登的那些屁话，虽然都仔细地看过了，但我们一点也不相信。只是在揣摩着那些黑字谎言以外的东西。

信中详细地讲述了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宏伟悲壮的场面，还抄了许多悼念周总理、反对江青一伙的诗词。我们几个围在一起看着信，完全沉浸在信中所描写的悲痛愤怒的气氛之中……信中那浸透了深情的词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天安门广场悲怆的海洋中。……赵文华这时高声道：“清明时节狂飚落，飞沙走石惊心魄。天不能死地难埋，悲思难掩泪难遏。”

那是“四五”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团按上面的指示成立了清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我是办公室成员之一，负责搜集情况及收发函件的工作。县公安局布置了清查“谣言”的具体方法、步骤，要求发现任何蛛丝马迹都要查出个水落石出。兵团是全国几大城市青年的汇集之处，自然被列入了清查重点。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清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从上面一直下达到基层。

一天，我原来所在连队的指导员风风火火送来一份“反革命诗词”和一张草图，诗词写道：“天，云雾茫茫遮字间。可曾见，神州赤血染……”格调似也要“扬眉剑出鞘”。草图上漫无边际的荒草甸子一直伸向完达山脚下，一条泥泞的路变成了“大酱缸”，上面写着：“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接下来是一连串的问号。作者是“三木”。“三木”是我的朋友，

数月前调到其他农场去了。其父是“走资派”、“叛徒”，家庭有海外关系，加上反动诗词和涉嫌偷越国境的草图，足可以给她定罪了。

可是，“三木”已经调走了，诗稿怎么又在连队出现了呢？……经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连干部一丝不苟的极端负责精神，是他们发动群众，在女生宿舍从调走的知青未清理掉的旧书本中发现了这能构成“问题”的材料……

我和“三木”是同班同学，1969年一同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在北大荒一起流汗，一起摸爬滚打，坎坷的命运把我们的心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面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看到为此而被收审的人员，我焦急，我不安！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她躲过这场灾难。我一方面给“三木”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告诉她，由于她的疏忽，诗稿被连队交了上来，要做好思想准备。为保险起见，我特意搭车往返200多里到师部将信发了出去。另一方面，我对“上面”的应付办法是：该做的工作都做了，该发的函件都发了。把“上面”特意催办的“三木”问题千方百计地压了下来。整个“清谣”工作我们的战绩平平，但拖总不是个办法，能拖多久呢？我的心就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铅块。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清谣”工作再也没人提及了。

我被他们问得没词儿了。

不就这片麦子吗？不就这片麦子能高产吗？为什么？反正我怎么也把麦子高产和批判“右倾翻案风”联系不在一块儿……

介绍什么经验呢？天时、地利加苦干，怎么掰手指头也就这三条。

……说着说着，不知怎地，我的眼光突然与团首长的双目撞上了，怎么这么不配对，我蓦地产生了条件反射：是不是说得离了谱？

心里还没琢磨明白，那边政治处领导的一句插话倒提醒了我。

“你们的政治工作方面搞了什么活动？”

我怎么忘了说点政治工作呢！于是赶紧说，我们组织运肥时，进行了动员，号召大家多打粮食，支援世界革命。

“还有呢？”还有？还有就是任务落实到班排。

“还有？”没了，我想再也没了。

领导问我，“阶级斗争怎么抓的？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你们都怎么联系实际的？”他在拐弯抹角地让我说点什么。

我也悟出了这么点意思。当时在连队干部中流传着“顺着领导出经验，有了经验好升官”。领导要借着你的题发挥，同时也给了你升迁的“梯子”。然而，几年的“再教育”，我变得憨实了。

“我们没批什么，队里没有四类分子，找不到批判对象。”我装起糊涂。然后看着各位首长，张大嘴巴，满脸迷惑不解，没词儿了。

不过，这会儿，我真的也没词儿了。

1976年初，全国批邓时，翟新华副场长带队到四连蹲点。他命令全连严格出勤，每天积肥、运肥，实行定额管理。职工白天猛干一天，晚上学文件时早累得筋酥骨软，困得哈欠连天了。有人连续贴出批判翟新华只抓生产、破坏批邓的两批大字报，准备写到“九评”。翟副场长召集全连开会，请“革命”可以不吃饭的“左派”站出来辩论，如果不能不吃饭，那就得积肥运肥，那就得上工。于是“九评”流产，批翟变

成了积肥高潮。

粉碎“四人帮”，人们由衷地高兴，知识青年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所谓上山下乡运动应该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终结。原兵团系统的上百万知识青年，并没有因为体制改变而被安抚下来，他们仍然在争取回城的道路上奋进，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结局。

第十五章 知青大返城

“活到这份儿上，我觉得这辈子上不了大学怪他妈冤的”——北疆那么多知青都有“病”——是“青年职工”还是“知识青年”——孤注一掷——雪崩效应

一 高等学府的召唤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学习知识、掌握科学技术的价值重新被社会所认定，教育部门很快“拨乱反正”，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废除了由群众推荐选送工农兵学员的做法。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对招生对象和招生办法做出了具体规定：

（一）招生对象、条件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申请报名：

(1) 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

(2) 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学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

(3) 身体健康。

（二）招生办法

为了保证招收新生的质量，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 自愿报名。各级领导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优秀青年报名。符合招生条件者，均可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报名，按学校和学科类别填写二至三个报考志愿。由公社、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按招生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者，报县（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参加统一考试。

(2) 统一考试。考试的目的是了解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的考试分文理两类。文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史地。理科考试科目：政治、语文、数学、理化。报考外语专业的加试外语。由省、市、自治区命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

(3) 地市初选。地（市）招生委员会组织评卷，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并征求所在单位群众的意见。

由公社或厂矿、机关、学校的党组织负责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按照现行体检标准，由县（市）统一组织，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地（市）招生委员会根据政审、考试和体检的情况提出初选（全省的初选总数应为录取总数的二倍或稍多于二倍），并汇总全部材料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

（4）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在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领导下，组织招生院校对地（市）上报的初选名单及全部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参考本人志愿，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确定录取名单，报省、市、自治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后，由学校签发入学通知书。

根据专业的不同情况，对考试成绩的要求，可以有所侧重。

.....

考试招生的消息，给在逆境中挣扎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希望，对他们来说，这是10年来第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一批早就有志于跨进高等学府的人欢呼雀跃，并且马上进入临战状态。毋庸置疑，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全国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高考，招生计划指标只有20余万。任何一个考生，面临的不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上百万如饥似渴的奋进者。要想挤进学校的大门，必须拿出百倍的干劲。原黑龙江兵团一位考生猛闯“报名关”，很有点戏剧色彩，但当时确实有不少人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1977年，带给我的最佳信息是恢复高校的招生考试。对与“推荐上学”无缘的知青来讲，这可是“掌鞋不用锥子——真（针）好啊！”

……可是没过几天，团部传来一条具体规定，“老高三”可以放宽年龄，“老初三”连边也沾不上。难道又是“刚出笼的包子——热乎一阵”？

有许多人退出报考行列，我却不死心，几乎天天跑到招

生办打探消息。一天，招生办同志告诉我：“又有新规定，凡有特殊专长的，也可不受年龄限制。”这好比黑道上见到一盏灯，我心里亮起来了。

在宣传股，一位老干事为我“出点子”，他说：“你搞了六七年的新闻报道，在报刊上也发了不少稿子，也可算是有特殊专长嘛。”

好一个特殊专长。就在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把过去发表过的报道稿、新闻照片，全部翻腾出来，剪贴成册。我还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以有特长为由，参加高考。

……政委是分管宣传报道的，他仔细地把这本简报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最后点点头说：“这是有特长，可以考虑去考一考！”

一听到政委松口了，我也得寸进尺，将申请报告又递过去，请他批个意见，他看了一下，在上面签了意见。

有了“王牌”，我急步闯进招生办。这时别说交5角钱报名费，就是交5元也行呀！一张准考证上，终于填上了我的大名。多么难得的准考证呀，这时离考试日期已不足10天了。

……一张普通的准考证，一张来之不易的准考证。事隔四月之后，换来的是一张大学的学生证……

既要复习功课，还必须参加劳动，尤其是原来的初中毕业生，更要克服底子差的缺点，真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每个成功者，可能都有过与原云南兵团知青王民康类似的经历，他回忆道：“临近考期不足40天，我却没有一天旷工缺席，从正负数、主谓语开始，一丝不苟，一题题演算论证，一步步深入探求，即使出差路上偶遇灵感，也马上拾起路边的小石子，在泥土上划划写写。当我终于接到故乡寄来的人学录取通知书，那小小的纸片竟重如千钧，我紧捧的双手阵阵发抖。”

从考场下来，除了疲倦之外，就是惴惴不安地等待了，这是与命运的抗争，出路在此一举。即便是最勇敢的搏击者，在等待结果时也颇感到自己的懦弱。原黑龙江兵团的一群知青，在等待结果时发表了一席高论：

考完了最后一门功课，极度亢奋与极度疲倦交织，几个伙伴回宿舍就躺下了。谁也睡不着。谁都觉得自己考得不错，但又无法否认自己的某些低能。时至今日，一块下乡的同学，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是一点手段都没有的。所幸恢复了高考，这些人才算捡到了一条出路。

1963年下乡的北京知青老姚说，我出一道题，谁答得好谁就能考上大学。这题是：“你为什么要考大学？”我背书般地抢答道：“为四化而努力学习！”老姚说：“不及格！”杨博说：“活到这份儿上，我觉得这辈子上不了大学怪他妈冤的！”屋内一片掌声、喝彩声。

“政审”，依然是令人生畏的一关，除审查个人政治表现外，还要审查家庭及主要社会关系。过去，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就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而被关在高等学府门外。虽然在后来的高考招生中纠正了政审中的极左做法，但在1977年的高考中，这一政策仍使一些人名落孙山。原云南兵团知青中就有这样一个落榜者，下面是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的一段充满愤懑之情的陈述：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二次解放”。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时，高兴得跳了起来！在那准备高考的日子里，我俩每天收工后，点起油灯，一直复习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甚至搞通宵，白天仍然坚持劳动。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我们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高

考时，咱俩都以较好的成绩名列全场前几名，但最后，只有你接到入学录取通知书，而我的通知书杳无音信。后来到场政治部询问，才知道我是因为政审不过关。真是晴天霹雳，苦苦盼来的“第二次解放”，却并未解放我这类人！我绝望了，差一点去拜见阎王。

成功者确实是令人羡慕的。1977年，高等学校实际招生272971人，于1978年2—3月入学。1978年招生401521人，9—10月入学。在这两届大学生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当然有不少原来的兵团人。

1977、1978两年，中专招生共计813351人，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在中专招生时的一些“走后门”现象，人们已用新眼光来看待了。1978年成都、重庆两地在云南农场招收中专生，主要实行所谓“内招”，各系统纷纷招收本系统的子女，考试不过是走过场，成绩好坏一律照收，各农场转眼间就走了几百人，引起了其他知识青年的强烈不满，但终究是无可奈何。

坐上了高考“头班车”、“二班车”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留下来的知青，继续苦熬着。在个体的努力徒劳的情况下，他们重又凝聚起集体的力量，为共同的出路发起了一场强烈的攻势。上山下乡的神圣大旗，终于被冲倒了。

二 北京、天津敞开了大门

生产建设兵团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使得加入它的中学毕业生成为一种矛盾的载体：一方面，不管是供给制还是工资制，他们都是在全民所有制体系之内，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职工；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中被国家安置进来的，国

家制定的所有知青政策，都有他们的一份，他们又理所当然地属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范畴。特殊现象自然导出一种特殊心理。当有人想改变工资制，向工分制过渡时，知识青年们强调的是自己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性质，不希望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等同于公社社员。而面临脱离兵团、农场回城问题时，这些已经是国家正式职工的人又要强调自己的知识青年身分，坚定地宣布应该落实知识青年政策返城，并由此造成了与当时政策规定的矛盾和冲突。

各地政府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安排少量兵团知青回城，病退、困退和招工，以主要面向原生产建设兵团单位的态势展开，并且规模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了知青大返城的结局。

1974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为解决参加各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病退”问题，发出了鲁知办（74）第12号文件。文件对病退的标准做了明确规定：原来患有严重疾病或有明显残疾的知青，到兵团后旧病复发或病情加重不能参加劳动的，允许病退回城；到兵团后患病的知青，因病情严重确实不能参加劳动的，也允许申请病退。一般的慢性病，不作病退处理。此后，天津、北京等城市也相继发出了类似文件。病退的手续基本格式化，包括以下步骤：（1）本人持有权威医院病情诊断书，提出病退申请，填写《病退人员登记表》。（2）所在连队讨论通过，经所在团研究同意，上报师审查批准，并由师级医院检查确诊，附有确诊证明，寄原籍知青办核准。（3）原籍公安机关核发准迁证明，持证办关系退返原籍。

1975—1976年，各生产建设兵团相继撤消，知识青年人心思动，要求病退、困退的知识青年骤然增加。1975年3月13日，青岛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在发给各生产建设兵团的公函中指出：“最近以来，我市陆续接到各兵团所属单位寄来的病退材料。数量很大，经我们研究认为，大多数单位寄来的材料合乎上级规

定，但有的不够病退条件，材料也不符合上级规定，例如：（1）有些病情很轻，不够病退条件；（2）有些病退材料只有地方医院病历，没有附师以上医院检查确诊证明；（3）有的未经劳资部门批准，而由团直接来函要求病退；（4）还有的因不安心兵团工作，长期不归也来函要求退回；（5）有的未经联系协商就自行办理了病退手续，交本人带回户、粮关系，要我们给办理落户；（6）有的对已婚青年不如实反映情况而作为未婚青年处理，使工作造成被动；（7）有些单位寄来病退材料后即告诉青年本人返回，在青坐催。这样不但给工作带来被动，而且也造成大量青年回流。”青岛市知青办希望各兵团严格掌握知青病退标准，按规定程序办理病退手续，并宣布“今后凡病退的人员没有附师以上医院检查确诊证明，我市不再接受，今后地方医院证明一律不作为处理的依据”。

1975年7月5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发出的《关于兵团战士病、困退由师审批的通知》，也反映了知识青年病、困退管理的混乱状况：

知识青年病、困退工作，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这方面工作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落实。根据兵团指示，师决定，从1974年4月起，病、困退审批工作由团办理。各团都做了大量工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我们有业务关系地区的“知青办”，除北京部分区的“知青办”尚未表态外，其他各地如上海、浙江、天津、济南、呼包二市等“知青办”，来函来人，要求和师对口业务，让师签署意见，不同意直接和团发生业务关系。各团发往天津、济南等地区“知青办”的病退材料，大部分退回，有些长期积压，得不到解决，致使少数病情严重、确实需要病退的战士不能及时返城。天津市各区的“知青办”，因

退对团不对师，病退对师不对团，给双方工作造成一定矛盾和困难。同时，各团对中发〔1973〕30号文件，内蒙古自治区党发〔1973〕50号文件及兵团贯彻执行中央和自治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补充规定精神理解不一致，执行也不统一，使师、团对病、困退工作无法全面衡量、合理掌握和控制。1974年全师病退413名，困退414名。1975年上半年病退461名，困退359名。病、困退工作由团审批期间，二团掌握得较好。

鉴于上述情况，1975年6月30日，经师首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从1975年7月1日起，病、困退工作由师审批，各团由首长办公会议审后，业务部门上报师审查批准。

病、困退的审批工作由师办理后，各团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加强理论学习，做好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安定情绪，抓革命，促生产，减少上访人数。有问题通过组织反映，个人不要上访查询。个别遗留问题，组织要采取积极态度，查清原因，按照规定权限尽快处理好。

尽管各兵团都发出了类似的通知，但并没有挡住申请病、困退的知识青年的脚步，大批病、困退函继续涌向各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青岛市知青办又于1975年9月21日发出《关于内蒙生建兵团病退问题处理意见的函》，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

青岛市1970年共组织动员去内蒙生建兵团参加建设的知识青年4320人，5年来共收到内蒙生建兵团二、三、四师寄来要求办理病退的材料1207份，约占去兵团总人数的27.9%。根据上级指示和经两地研究协商，先后共批准办理病退回青落户的595人，约占去兵团总人数的14%。目前除

已退回的材料外，在我市还有 213 份病退材料尚未处理完。

最近以来，由于内蒙生建兵团体制变动，各师和各兵团直属单位送我市的病退材料突增，仅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兵团寄来的病退材料 257 份，其中多数病情较轻，材料质量较差，确诊病情的科学依据不足。我们认为这不符合“个别收回”的原则，如不正确处理，势必造成混乱，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为进一步做好兵团战士的安置巩固工作，稳定情绪，经研究从 9 月 25 日起我市暂停止接收内蒙生建兵团的病退材料（包括已退回的材料）。对现有在我市的病退材料，我们将按照“病退”的规定，抓紧研究，争取早日处理完毕；一时处理不完的，待交接后再与新接收单位另行研究协商处理。

有的城市还是为部分知识青年回城提供了条件。1975 年 6 月 5 日，浙江省绍兴地区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给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发来了一批需要“特殊照顾”返城的知识青年名单。这些符合返城条件的知青或者是独生子女，或者是家中多子女但父母现无人照顾，也就是其他城市所说的“困退”。绍兴知青办特别声明：“如名册中有的青年已推荐支工、升学、服兵役、脱产或已在建设兵团和农村结婚的，不同意迁回城镇。”按照当地的政策，“凡经批准‘特照’回城镇的青年，在目前国家没有招工指标的情况下，主要是为了照顾家庭。今后他们的劳动就业问题，在国家有招工计划时（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由劳动部门根据招工条件逐步吸收。在他们没有正式就业前，由城镇街道组织他们参加劳动和学习”。6 月 16 日，内蒙古兵团生建部向一、二师和化纤厂、工程团转发了这些知青的名单，同意经过审查后给他们办理困退手续。

1976 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接收病、困退知识青年的限制略

有松动。1976年1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关于解决天津知识青年特困、病退问题的通知》，同意抽调2500名特困、病退天津知青回城，并指定抽调原兵团战士1000名回津。《通知》要求尽量不要抽调知识青年中的骨干，抽调工作不采用群众推荐方式；原兵团工厂中的知青，原则上不在抽调之列，特殊情况需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北京市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同意优先接受内蒙古地区的病、困退知识青年。

但是其他地区却先后关上了原兵团知青回城的大门。如青岛市知青办即于1976年12月向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发出通知，宣布自当年12月25日起，停止通过省、市知青口办理原兵团知青病、困退和转迁手续。上海、浙江、四川等省、市的知青办也相继发出了类似通知。

截止1976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累计总数已达1400万人。到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是城镇招工、招师的主要对象，大多数人已由政府重新安排了工作，或者退回城市成为待业青年。原生产建设兵团系统集中的上百万知识青年，移交给农垦系统后，调整了工资，确定了生活待遇，在某些领导眼中，他们的知青身分同时被抹消，已经无所谓重新就业问题，重要的是教育他们安心本职工作，立足于垦场。农垦系统不愿意失去这样一支生力军，各大中城市亦不希望如此集中的知青队伍如山崩一样倒下来，涌回城市，冲击已经极度紧张的就业市场。在这样的前提下，从中央到地方，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固化这批人的问题。在各种有关文件中，这批知识青年的国家职工身分一再被强调，但是为了照顾一些人的实际困难，各城市继续执行病、困退政策，允许少数兵团职工按知识青年待遇回城重新安排工作。

有后面的这一条已经足够了。1977、1978两年，原内蒙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抓住政策松动的大好时机，掀起了病、困退的返城大潮；北京、天津等地的知青办，也相应地把

门越开越大，做了极好的配合，谁不希望沦落远方的子女早日回到母亲身边呢？当年曾分管“知青病退”的黑龙江兵团六团副政委、知青女干部王鲁庆，写下了当时的感受：

初时，办理“病退”条件很严，需要一整套手续的证明。兵团对“病退”的疾病种类和程度也有严格的规定。后来，“病退”的条件越来越宽，返城知青也由个别变作成批。再后来，我记忆中是北京先敞开了大门，紧跟着波及到津、沪、杭、哈等市，形成了知青返城的大潮。

扎根还是返城，困扰着知青，几乎伴随了兵团兴衰的全过程。团、营、连都开展了扎根边疆的教育，也出现过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当然，随着返城浪潮的涌来，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

我接手负责“病退”工作后，便认真执行有关规定。我也为确有重病的知青联系过诊断、治疗，甚至往返师、团之间为他们办理手续；对条件不具备的知青我诚心地给予解释和劝说；对伪造病情的知青我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我那时只把“病退”理解为病退，看作是正常工作的一部分。

……直到很晚很晚我才明白，知青返城和知青下乡一样也是一种潮流。而我服从这一潮流并不十分情愿。坦率地说，那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

为了得到一纸病退证明，人们付出了代价，“真真假假”的事情太多了，原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指出：

那么多知青都“病”了，也搞不清哪来的那么多诊断证明。要说真有病的，前前后后办完病退手续，那病非加重一倍不可。起大早，赶长途车，赶火车，吃不上，喝不上，比

割一天麦子还累。更何况不是一次、两次就能把手续办妥的。从连部到营部，再到团部、师部，卫生队、医院、军务股，哪个环节不通都不行，而那么多环节怎么可能都是绿灯？

为了弄一张诊断书，有胡乱吃药制造病情的。一片麻黄素，能把血压升到160，低压至少100，心跳也明显加快。这基本够病退标准，再加上用脚趾头死命地抠住地皮，那血压就会更高……

医生能把握着你的“命运”，于是，罐头、色酒、白酒，卫生队里的医生没少拿。有那心眼儿歪的，更借机从知青身上捞一把，一个知青花几十块钱买一张回家的通行证，那不是太便宜了吗？！

过了医生关，还有机关手握病退困退大权的一些人。要说连、营、团、师四道关卡，要属营、团两关最难通行，二者又以后者为甚。没有真“本事”你就别梦想了。这一关“糖衣炮弹”要加份量不说，加了份量还“打”不到人。任你“手续齐备，病情严重”，但那“放”与“不放”的政策有个“分寸”，说你够“尺”，你就过去了，说你差“一寸”，你几个月的功夫就算白搭了，一切就得从头来。

为病退，有多少知青动了多少心思，没法统计，后背贴块牙膏皮照透视，两肋插着刀子去查心肺，明摆着告诉大夫瞧着办。要是找到一张胸椎、腰椎的片子，那便成了宝，看那片片子，骨头节快赶上竹节了，没有70岁的高寿照不出来那效果。如再有两张诊断配着，退回家去就十拿九稳。再看那刚才连腰都直不起来的知青，一会儿就能飞跑着扒上回连队的汽车。有这“镜头”，再想那几节“竹子”，鬼相信他的腰会有什么毛病……

返城潮席卷而来，势不可挡，“宁愿回城去扫马路，掏厕所，

也绝不回头”，已成为知青中的名言。知青干部也动摇了，并最终随之而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五团知青邓付加写道：

1978年，知青返城的大潮席卷而来，形势不容逆转。作为连队副指导员的我，对一哄而起的回城风虽不十分明戏，但也悟出，可能是中央里有人向我们招手了。

初时，还观望，可越来越多的知青“曲线”与“直线”的回京无疑给了我很大的冲击。给父母写信，对那一时刻的“壮举”，我说：“整个北大荒知青战线发生了崩溃性的变化，返城风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时不成文的规定说：凡办理病退的知青必需持有师团两级医院的诊断证明。那时我已在兵团成家立业，这汹涌而来的冲击波搅得我和妻子日夜不安，父母亲人来信也一再叮嘱：良机莫错，为了孩子和将来，争取早日返城。

我何曾不想，可四口之家，举家迁返谈何容易。这诊断证明又何易搞到。到兵团11个年头，春秋磨茧，冬夏洒汗，可我竟劳而无疾。还是妻子的活份，使我也只好如此这般了……

团卫生队有同学，我们冒雪赶了七八里路寻找到她的门下，直言挑明了来意，“知青对知青，心通情也通”，她与我们同命相怜，爽快地开出了写有“腰肌劳损”四个大字的诊断证明。冬日里捧着这方寸诊断，就像是捧着暖融融的太阳。第一关顺利通过了。

第二天，我们“连续作战”，来到有权威的师部医院……

在那个年月里，尽管有悖医德，尽管是违心的，但作为当时的军医心里都是坦然的。他们以慈悲心肠换取了无数家庭的欢乐，他们也是父母，也有妻子儿女，他们也是人。

就是凭着这张张冠李戴的诊断书，我被送上了返京的

归途。

原内蒙古、黑龙江兵团北京、天津知青的大返城，很快波及到原兰州兵团下属各师。1978年4月10日，甘肃省农垦局、甘肃省公安局和甘肃省知青办联合转发了天津市知青办、天津市公安局关于简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病、困退手续的商洽公函，公函提出：“拟今后办理我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均以我市知青办发出的天津市下乡知识青年困退通知书或天津市下乡知识青年病返通知书为返津落户凭证。此办法如无不妥，望通知所属有关单位，给予办理我市知青返津的户口粮油关系。”甘肃省农垦局等同意天津市的做法，为天津知青回城大开绿灯。北京市也发出过类似通知，北京知青也加入了回城的行列，甘肃垦区与黑龙江、内蒙古垦区一样刮起了知识青年回城风。甘肃垦区的兰州知青，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了城市。原兰州兵团一、二师和林建师的各地知青，有80—90%返回了城市，留下来的大多是与当地青年结婚的知青。

北京、天津知青能回城，其他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应该留在农场继续修理地球吗？回答是否定的。知青们不断地向农场领导及原籍城市有关单位施加压力，一个个城市的闸门相继开启。内蒙古兵团的青岛知青，就有过这样的壮举：

1978年各地知青大部分都已返城，只剩下青岛知青了。有一部分就办转插，或曰“曲线回城”，即先办到离城市较近的农村，然后再办理顶替或等待招工回城。这样办风险很大。……

1978年底，在场党委书记赵秀峰、场长刘省三帮助下，十四团各连出代表带病退报告于11月26日到师部驻地——临河，要求返城。各团青岛知青闻讯纷纷拥到师部。那形势真

有点像《今夜有暴风雪》电视剧中的味道。巴盟农管局宋焕武书记接待知青。对青岛知青的做法表示批评，同时对知青的处境表示同情和理解。经农管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对青岛知青返城大开绿灯。

1978年12月，青岛知青借放探亲假之机，集体返青到市知青办、市信访科、市委等处反映情况，要求市政府解决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团队撤消后的遗留问题。

青岛市委迫于形势，于12月11日召开紧急常委会，下达10号文件，同意接收内蒙、宁夏、青海支边青年返城，并于同日通知知青：（1）打电话通知内蒙来人携带材料办理病退。（2）成立以知青办王主任、区委张书记为首的领导班子专门解决内蒙知青返城问题。

就这样，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十四团最后一批知青于1979年4月份离开了战天斗地8年之久的边疆，回到了青岛。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结束了。

至1978年底，北方国营农牧场中大多数北方城市的知识青年已经离去，只剩下上海、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焦急地等待着来自本城市的消息。

三 上书、卧轨、大请愿

中央对农垦系统如此巨大的人员流失，当然不能坐视不管。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面临几百万知青要求回城的严峻形势，本应重新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知识青年的实际问题，但是在两个“凡是”的影响之下，会议还是对上山下乡运动做了充分的肯定。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以中发[1978]74

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人们常说的知青政策“四十条”）。《纪要》明确宣布：（1）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3）城乡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4）积极地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5）认真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6）要切实加强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与原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知识青年有关的是这样两段话：

在国营农场的下乡知识青年，是发展农垦事业的一支骨干力量。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办好农场，不断改善知识青年的生活条件；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使青年们看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做出贡献。

对于在国营农场和林区下乡知识青年的许多实际问题，国家农垦总局和林业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在《试行规定》中，有专门的“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问题”一节，无情地封住了知识青年回城的道路：

（十五）对在国营农场的下乡知识青年，按照1978年2月《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已经提拔为连职以上脱产干部的下乡知识青年，经过考察符合条件的，按照规定的吸收干部权限，给予定职定级。

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

工作处理。农场劳动力有多余的，同工矿企业一样，其他单位需要，有增人指标的，可以调工。不再办理转点插队。

(十六)切实解决在农场的下乡知识青年的婚姻和安家问题。同场外青年结婚的，允许对方到农场落户，符合条件的可以吸收为职工。农场的已婚下乡知识青年，距父母住地单程超过500公里的，共享受3次公费探亲假。其他生活、劳保福利待遇，与农场职工相同。

对原黑龙江、内蒙古、兰州等兵团的绝大多数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知识青年来说，这样的规定已经是马后炮了。原广州兵团的知青也在1978年的返城大潮中大多返回了城镇。但对上海、浙江、四川、云南知识青年集中的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各农场来讲，由于南方城市大多对知青病困退封得较死，这样的规定无疑为各城市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挡箭牌。云南农场的知青对北方知青的大返城已有所闻，回城的愿望更加迫切。他们希望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能拿出一个公正的方案，使在边疆地区多年的大批知识青年顺利地回到城市。但是事与愿违，来自中央的声音是要他们继续留下来。制定政策的人似乎忘记了，当年这些知识青年是怎么从城市来到边疆的。

1978年6月，原云南兵团三师十团一营二连团支部书记曾某自杀身亡。死者系独子，父亲已退休，当时病重住院，曾两次写信召唤儿子回家。死者曾三次要求病退，最后一次申请被拒绝的时间是死前一个月，他在死前一周的团代会上还作了《二连团支部抓纲治国学大寨大见成效》的发言。曾某留给父亲一封遗书：“我没有欠任何人的钱。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孝。”

1978年10月18日，云南农垦总局西双版纳分局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写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贴在景洪街头，签名者近千人。公开信发出后没有回音，签

名知青受到领导的批评。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青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的一片橡胶林中秘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37个营（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丁惠民被推举为领导，知识青年们准备有组织地开展争取回城的活动。

1978年11月13日，云南橄榄坝农场（原云南兵团一师四团）的上海女知青瞿林仙在场部医院生产时，由于明显的医疗事故，导致母子双亡，引起知青的抗议活动，并发展成为抬尸游行。经过领导的反复说服，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变。

11月16日，丁惠民等人又发出了第二封公开信，橄榄坝农场知青贴出“向四人帮讨还青春还我幸福”等八条大标语表示支持。公开信仍未得到回音。12月7日，丁惠民等拟出《请愿书》（第三封公开联名信），并成立了“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筹备总组当日即派代表前往西双版纳州委谈判，争取北上请愿合法成行。州委领导采取拖延态度，筹备总组决定用罢工来表示他们要求回城的决心。12月10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识青年开始罢工。12月16日、18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分两批从景洪出发。12月下旬，第一批请愿团在昆明登车北上受阻，知青以卧轨表示抗议，由昆明发往北京的列车中断运行72小时。12月27日，以丁惠民为首的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几十名代表抵达北京。

云南知青的不寻常举动，使中央领导同志颇为震惊。由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赵凡局长率领的中央调查团，迅速赶往云南；在北京的知青代表，亦被告知准备中央领导人接见。

1979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接见了云南知青代表，他们批评了知青的做法，鼓励他们立足边疆，建设新乐园。王震说：

我们两个老头子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

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正常秩序……对现状我也很不满意，有内忧外患嘛！我们国家还很穷，邓小平同志经常讲，想办法把人民的生活改善得快一点。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你们闹，影响不好。你们闹事，不对嘛！你们要转过来，作自我批评，行不行？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要作自我批评……如果你们能够这样做，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

我们准备组织慰问团，组织家属代表到垦区农场去慰问，看看你们。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局局长，已经到你们那里去了。

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30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30多岁了才结婚。

你们那里，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这时候也能有茄子、辣椒吃。我在北大荒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春节。那个地方，我看很好，气候也很好，澜沧江有很大的水利资源，可以发电，还有铜矿、铁矿等等。真正搞起来，不是个落后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老实讲，内地人口这么多，我看建设好边疆，是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有些问题要改。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由农林部、国家农垦总局负责。你们回去以后，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现在要好好搞建设，全国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今后半个世纪是你们的，希望你们守纪律，奋发图强。

事态在继续发展。1月5日，中央调查组在瑞丽农场向知青代表传达中央〔1978〕74号文件，一句内涵异常丰富、耐人寻味的称呼“青年职工同志们”又激怒了知青，他们尖锐地提出了以下问题：“支边青年”是不是知青？是响应上山下乡号召来的还是招工分配来的？为什么京、沪等地尤其是云南省71届知青全部在城市安置，却要到四川把我们弄来农场？当初号召我们“屯垦戍边”到生产建设兵团，现在林彪死了，兵团撤了，错误路线为什么还不纠正？“四十条”未照顾农场知青的利益，请求领导修改……当晚，知青代表起草了一份给党中央、国务院和邓小平同志的公开信。同日，孟定农场300名知青进驻场部。1月6日，进驻场部的知青人数增至1500人，有200人宣布绝食。国务院指示赵凡来场解决问题。赵凡率中央调查团赶到孟定农场时，被这样的场面惊呆了：

进场部的宽阔大道上，1000多名男女知青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用嘶哑的、呜咽的声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赵局长跌跌撞撞地跳下北京吉普，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赵局长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

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名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哭在一起。

两代人都哭了。历经十年浩劫之后，两代人的心贴在一起。……

赵局长直起腰，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哽咽着，但却是那么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知青们听得真真切切。顿时，他们的哭声、叫喊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的知青干脆躺倒在地，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知青们真想把赵局长抬起来。

而此时的赵局长和他的同志们，却还没有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们比知青理智得多，知道事情的艰难。

1月8日，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向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发出了如下通知：

上海、天津、浙江、陕西等省、市知青办反映，跨省下乡到黑龙江、陕西、内蒙等省、区的知识青年，已经在当地通过招工、招生进了厂矿企业、学校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最近突击办理退职、退学，将户粮关系转入当地生产队，重新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要求病退、困退回动员城市。……

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对于已经提拔为脱产干部和成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包括原生产建设兵团划分给地方的工交、基建、财贸企业）职工的，已不属于下乡知识青年范围，也不应采取退职的办法再通过知青部门搞病、困退。他们如有特殊困难需要调动的，应当按人事、劳动部门关于干部、职工调动的有关规定办理。对于为了搞病、困退而退了职的，有关部门要允许他们复职。

1月中旬，中央调查团在西双版纳进行广泛调查，发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知青们过着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长时间缺油、缺菜、缺肉，营养极差；女青年中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有的连队连普通卫生纸也买不到，不少女知青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劳动；知青非正常死亡不断增加，一次事故死几人、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因种种原因自杀的案件剧增，自杀死亡数已

占非正常死亡数字的首位；生活在西双版纳的 55000 名未婚知青都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晚婚年龄，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青年只占五分之一；未婚同居现象大量出现，一些连队甚至占到知青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央调查团面临巨大的两难选择：要么解决知青的困难，要么同意知青回城。前者，似乎谁也没有良策；后者，则不是他们的权力可以办得到的。

丁惠民等人返回云南后，于 1 月 23 日致电王震副总理：

国务院王震副总理：

1 月 4 日，您接见我们知识青年代表，深刻地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的关怀。您的谈话进一步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

说实话，当时我们对您讲的话不十分理解，认为有些地方批评得过重了。所以，回去后大家心里闷闷不乐。晚上，当您传达了华主席、邓副主席的指示后，我们的思想情绪才稳定下来。我们全体代表连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一致认为虽然知青问题是重要的，但在全国这盘大棋上它还只是小局。小局要服从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不论我们知青问题如何解决，既然中央有了明确的指示，那么我们在行动上必须听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指挥和安排。对我们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要求，相信党中央一定会给予妥善解决。因此，大家一致决定，马上返回农场，尽快把党中央以及您的谈话精神带回去，迅速贯彻落实。

回到云南后，我们全体代表分别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讲话和国家农垦总局的有关文件，并自动解散了当初我们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组做了些工作。目前，除个别单位外，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但是，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没有复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放心。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的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和干扰了安定团结局面。您和程子华同志批评了我们，是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是为了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免做出对国家、对人民更不利的事来。现在，我们在事实面前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上次您对我们的批评，不是重了，而是轻了。我们一定把这一教训，作为鞭策自己今后努力工作的动力。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我们全体青年向党中央保证，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百倍地发奋努力。

云南省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上海知识青年、共青团员 丁惠民 胡建国 刘光国

1979年元月23日

一次中央首长的接见，不可能马上使激动的知识青年们平静下来。惊人事件又爆发了：景洪农场部分知青恢复罢工，声称不达回城目的绝不罢休；勐腊农场部分知青因要求回城得不到答复，砍断了近百株已经开割两三年的橡胶树；勐撒农场知青举行罢工、绝食……

1月下旬，在中央的指示下，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的领导

人和知青办负责人在昆明紧急会议上果断作出决定，由原动员地区尽快分期分批接受云南农场知青回城。

云南知青闹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月，原宁夏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到宁夏农垦局请愿，要求回城。天津知青杜鸿儒有如下的回忆：

1978年底的一天，我在大武口医院偶遇一位好心的女医生，她给我和我的婆姨开了患病证明，我风尘仆仆赶回连队，却听到病退停办的消息。各个连队的知青不约而同地朝场部奔去。

场部设在紧邻西大滩车站的一片光滩上，那儿有当年独立一师老军工们垒起的土坯房，也矗立着我们亲手盖起的红砖厂房。房屋周围长着一丛丛黄色的芨芨草，我一直很喜欢它那顽强的生存格调。

场部的领导不知哪去了，怎么找也不见踪影。临近太阳傍西时，崔场长被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叫了回来，他一露面，就陷入知青们的重重包围。同他直接对话的是几位当文书、教师的知青，在伙伴们的簇拥下，他们说起话来从容不迫，有板有眼。

崔场长在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时不大受重用，在“文革”中又屡遭磨难，他对知青的态度并不蛮横。他告诉大家，停办病退是上面的意思。知青代表说，既然不是场部的意思，那就把我们的证明之类的文字材料报到农垦局去，局里的事由知青去办。崔场长考虑再三，仍拿不定主意，知青们提议开个党委会为宜，知青们做这样的提议，是因为场党委委员中有一位女知青，此人是知青的绝对的代言人。

党委会形成了较一致的意见。崔场长表示同意把知青们的文字材料报至农垦局。宣布这消息时，他的神色凝重，看

得出，是出于无奈。

我们亲眼看着场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把一份份函件装入文件袋，并且送专程送件的汽车开往银川。大家约好，第二天上午，在银川农垦局集合。

……43次客车把我们载到银川。我们在新城车站下车时，整个城市还沉睡在蒙蒙夜色中。

我们找不到局领导的影子，一位当知青的司机开车去到处找。据知情人讲，这两天局里一直忙着开会，局领导就在机关里。

局大会议室成了我们过夜的场所。知青们那意在鼓气的说笑声充满了烟雾缭绕的会议室，渐渐地，大家疲倦得懒得张口，裹着土黄色的军大衣仰靠着墙壁。

不知是谁轻声地哼起歌谣，节奏极慢，透着一股悲怆。我受不了这种悲怆的撞击，用宁夏方言唱起了另一支被我们知青“篡改”了的歌。那曾是一支“颂歌”，我们给改了几个词：“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知识青年望着您呀，心里升起红太阳。我们望着您，我们爱您，越望越爱越想俺的那个亲爹娘。”

大家的困意被哄笑声冲跑，我发现有的知青边笑边擦眼泪。

知青代表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几位我认识，他们是党员，而且早已不干体力劳动。我平素对他们有几分忌恨，现在，在返城面前，我们平等了，我佩服他们在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精力为我们这些同命人努力着。

当几颗残星消逝在天幕上时，我们已把机关里弄到的椅子搬出来，排列在农垦局大门口外，许多上班的市民驻步围观，人越来越多。

整整一上午，我们坐着不动，任凭西北高原一月的刺骨

寒风的侵袭。我们身上棉衣早被穿透，身体抖个不停。

中午，没有人去吃饭。当日头偏西时，我感到肠胃蠕动的频率加快。此时，风势渐大，漫天的尘土在我们头上飞旋。

一辆北京越野吉普在我们的队列前嘎然而止。刘局长钻出了车门。

我们被局工作人员引到大会议室。刘局长微笑着环视我们，尽管笑得不太自然，却也透出几分宽容：“你们都和我的孩子一样。”

“既然如此，请问您的孩子也在基层连队干力气活吗？”有的知青“出言不逊”。

“不要感情用事。”老人依然宽容地笑着。“我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我看大家是不是休息一下，方便方便，吃了饭再商量。”

知青们反对，几位知青代表迅速交换意见，继而把大多数知青劝说到会议室外。我被留在会议室内。

刘局长沉默无语地思索着，几位知青代表在一旁滔滔不绝地述说着，他像是充耳不闻。看得出，他对我们很不满。他们那拨人解放了宁夏后就驻扎下来屯垦戍边，直到熬白了头也不曾想向上级吐出半句要求照顾的话，他也许不明白，我们的这种生活条件强似他们当年的千百倍，怎么就踏不下心来呢？就在我揣摩刘局长的内心活动的当儿，他开口了：“我去自治区党委，和北京、天津直接通话，两下里都通通气。”

我们欢呼起来，争着和他握手。精明的知青代表没忘记派上两名知青随刘局长去打电话，并叮嘱把电话记录带回来。

我们在会议室里等待着回音，谁也想不到饥饿和困乏，许多人脸上泛出希望的光。

喜讯传来，津京两地同意接受安置我们这些离乡多年的游子。

1月28日是阴历大年初一，在各地下乡的上海、杭州等地知识青年，包括原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利用回城过节的机会，纷纷串联，发起了大规模城市请愿活动。一群群知识青年聚集在闹市区，发表演说，历数在农村、边疆地区的苦难生涯，呼吁家乡的父老乡亲理解和支持他们要求返城的举动；一时群情激奋，交通为之堵塞；还有一些知青到市委机关呈送请愿书。请愿活动愈演愈烈。2月5日，上海发生了请愿知识青年卧轨堵车事件，铁路交通中断12个小时。2月7日，上海市委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下乡知识青年做维护安定团结的模范，同心同德搞好四化建设。《解放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读者来信和评论员文章，指责请愿活动是无理取闹，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做出过分的行动，都是十分错误的。

中央也迅速做出了反映。2月10日的《人民日报》，用第一版的大半个版面，登载了王震和程子华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消息、王震副总理的讲话和丁惠民等人致王震副总理的电报，以及新华社发自昆明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称：

云南省农垦总局负责人今天在这里说：“我们拥护王震副总理接见云南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谈话，正在统筹解决有关问题。部分国营农场一度动荡的局面趋向稳定。”

这位负责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满腔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为边疆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加上我们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使许多青年建设边疆的热情受到了的挫伤。这是令人痛心的。粉碎“四人帮”后，又由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捂盖子，使云南省农垦系统的揭批查运动推迟

了一年之久，致使许多问题解决得很不及时。对此，我们农垦总局的领导是有责任的。

这位负责人说，王震副总理的讲话和丁惠民等同志给王震副总理的电报已被印发到各个农场。许多青年同志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不少人还作了自我批评。目前，农场混乱的局面已趋向稳定，农场干部增强了搞好工作的信心。

对于农场青年们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位负责人说：有许多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已经决定：凡是有条件解决的，立即着手解决；凡是一时不能全部解决的，将分期分批解决；对暂时难以解决的，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予以解决。关于在农场工作确有困难的青年的工作调动问题，农场青年中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问题，探亲费、医药费等处理不当的经济问题，知识青年的以工代干问题，农场职工家属和子女的落户问题，现在均已着手解决。最近我们已拨出500万元专款新建职工宿舍，另拨200万元专款修缮房屋。农场职工的劳保待遇，已按国家劳动部门的规定办法。我们深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农场全体职工一定会紧密团结，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遵守纪律，办好国营农场，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为配合宣传，各报刊纷纷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优秀事迹和部分知识青年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的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还特别在2月17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对一切不合理的要求，如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已经安排到工矿企业、国营农场林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要求一律返回原来城市，等等，必须进行教育，不能迁就；对一切合乎目前实际情况的措施，如1978年12月全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纪要和会议草拟的试行规定，必须继续执行。”

4月30日。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准许辞职回城青年回原单位复工的通知》重申：“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后已安排在工矿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知识青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支边青年，采取辞职的方式返回城市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应该制止。已辞职回城的，应返回原单位，并退还所发的辞职金。确有特殊困难需要调动的，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照中央〔1978〕74号文件的精神办理；下乡插队后已安排在工矿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工作的知识青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支边青年，可按照人事、劳动部门关于干部、工人调动的有关规定办理，事先要征得调入地区有关部门的同意。”

6月4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刹住“回城风”的说法：“要坚决刹住“回城风”，对于自行返城长期不归的，要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已经是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职工的，要求重新安排工作，是不对的，要教育他们安心工作；不符合政策规定，未经安置地区和动员地区联系同意，单方面办理手续，从国营农林牧渔场或其他企事业单位回城的，要动员他们返回原单位，原单位要欢迎他们回去，不得歧视，并报销返回的路费。”

回城风是刹不住的，不过是人为地制造障碍而已。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问题的解决，已经表明大势所趋。在云南省农垦总局负责人发表积极意义的讲话后不到三个月时间里，云南农垦的几万知青走得所剩无几。按照云南农垦总局的统计，当年全系统知识青年在刮回城风中，返城者达61515人，占知识青年总数的94%，占职工总数的1/3。勐捧农场有13个队全部走光，东风农场4000多亩投产林地无人开割。仅西双版纳分局，生产队干部

走了22%；机关干部走了38.2%；中小学教师走了71%；医护人员走了67.5%；驾驶员走了71%，割胶工走了78.6%。付给知识青年路费补助费2000余万元。

知识青年们欣喜若狂地迎来了“解放”，原云南兵团的知青回忆道：“1979年春天，作梦也没有想到知青可以返城，不用说，所有的连队都沸腾起来了！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抱着娃娃伤心地哭诉，有的忙着写血书，有的忙着处理家具凑路费回城，有的后悔不该在当地结婚，有的后悔不该找异地知青，有的怨两地分居想办法托交孩子……真是悲喜交织，不知谁对谁错。知青一窝蜂挤到场部办公室，开始还有秩序地排队办理，后来大家都觉得太慢，吵得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干脆用十几根橡皮筋接起来把公章拴在窗户上，谁想盖谁盖。然后，又像逃难一样找车返城。那些天街头尽是这些返城者。”

为了凑足路费，知青们纷纷变卖家当，衣物、家具全拿出来卖，价钱低得惊人。为了回城，一些恩爱夫妻离了婚，更有个别知青夫妇（包括未婚同居者），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的时间内，人们似乎疯了，只有一个念头：回城去，要快！下面这件似乎不可思议的事并非“天方夜谭”：

勐定农场有一个连队很偏僻，大约离场部40多公里。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场部开始发放迁移证。消息传到这个连队时，已经几天以后了。欣喜若狂的知青们连夜步行40多公里，走到场部去领迁移证。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热闹，几百个人满怀期待挤在一个窗口前。等到一个小个子知青挤到窗口前时，迁移证已发完了。小个子知青如五雷轰顶，跌跌撞撞回到了连里，蒙头就睡。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门后上吊死了。他太绝望了，以为没有领到迁移证，就是

永远回不了成都。其实，过了几天，场部又开始发放第二批迁移证了。

进入80年代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各种“左”的做法进行了认真清理，正视存在的问题，终于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了句号，并逐步解决各种遗留问题，不仅是原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的知识青年，全国所有因上山下乡而滞留在外的知识青年，都有了回城的合法权利。

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之后，各国营农牧场的凋零令人心寒。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二团的浙江知青李建才写道：

1977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更名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在农场总局农业处工作的我，眼瞅着返城的浪潮席卷而来，学校没有了老师，机耕队没有了驾驶员，许多担任连长、指导员，甚至团长、政委的知青也都悄悄隐去。被几十万知识青年的青春热血沸腾起来的北大荒，一下子蔫儿了……

弹指10年，于今孤身独饮酒一杯，心下倍觉伤感。多少铁心扎根的青年飞走了……北大荒啊北大荒，你为什么留不住他们呢？

1979年5月，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团知青张先德在办好回城手续之后，回到了连队，看到的是这样一片残败景象：“我走过一排排挂锁或洞开的房门，那些喧闹的“繁华”和如泣如诉的提琴和二胡之音都已荡然无存，残破的塑料窗布随风颤动，门前青苔已深，雨后檐沟里浮沉着“春城”、“金沙江”烟盒，将一派萧瑟暴露无遗。”

一切都结束了。知识青年大返城，为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补上了最后的一笔。

第十六章 青春祭

告别昨天——生命的价值——“中国知青”：超世纪的话题——宣讲过去，旨在使人们对今天的生活充满热爱，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

一 百感交集离别情

为争取回城，义无反顾，一旦踏上归途，又像打翻了五味瓶，乃是很多知识青年离开生产建设兵团时的心态。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知识青年姜昆和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团知识青年张先德的描述，就夹杂着这种复杂的情感：

天黑了，我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车厢里，脑子乱极了。紧紧张张的准备，没容我片刻的冷静。我要领结婚登记证，以向未婚妻明示不做“陈世美”；我要和所有的同学告别，并劝他们耐心等待和我一样的机会；我要和领导、同事在一起对付那火辣辣的65度“北大荒”，最后表现一下自己的“哥们儿义气”……

几天的忙乱，加上醉酒耽误工夫，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缕出一点细腻的思绪，去领略那块神奇的黑土地所给予我的

恩情。直到人上了车，行李上了架，我才突然意识也许我再也不会回到这块土地上来，我一下懵住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连想都没想呢？我在这里生活了8年呀！连做梦都是青一色的北大荒，难道它再也不能出现在自己眼前了吗？27岁的我木然地靠在座椅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呜——”列车动了！我一下子扑向了车窗。什么也没看见，窗户上全是冰碴，我吸足了气，用全身的热哈着冰冻的窗户……终于有了拳头大小的地方可以看见外面了——外面漆黑一团……我也沉浸在这漆黑一团之中了！

我想起了刚刚来到这块土地上的时候，满怀革命豪情，鼓着青春的风帆，刚一看到这黝黑的土地，就大声地对远方喊：“我来啦！不走了！”我想起了破衣拉撒地回到北京，曾骄傲地对妈妈讲：“妈妈，我们北大荒人从来不讲穿，大家都这样，一个扣子一个色！”我想起了在新建点自豪地对新战友介绍改天换地的经验，也想起了为了不让弟弟妹妹伤心而大肆吹嘘兵团战士使用的新武器……

当然，我们都为了离开这里而绞尽脑汁，但是，我们没有淡然处之这里的人生。北大荒也对得起我们，她不过是把我们的棱角狠狠地磨了一磨；她没有造就出好吃懒做的酒囊饭袋、圆滑的市侩小痞子，她凭借着天然的地理环境培养出了一大帮不畏寒冷与酷热的汉子，锤炼出一大批从不知什么叫难的女人和男人……

我望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的外面，我甚至在责备我的良心，就这么走了吗？你长成人丢下人家不管了？几滴泪水滚上了我的面颊。

8年时光的流逝和其间刻骨铭心的遭遇，以及“大光明”的终于盼到，令我悲喜莫辨，心生唏嘘，涌起不可抑止的沧

桑感叹……

可以走了却赖着不走，粘乎乎地有点凄然。……骤然意识到“三和尚庙”将不完整，不觉又都流露出不舍。远望团部小学的校舍，与路遇的人们随意攀谈。碰到过去的学生，他们仍叫张老师，除了几句劝勉的话，我能说什么呢？

清晨，宏伟叫醒我，房间里灯光还不分明。按下惊醒的老闵，相约成都见。门外薄雾轻裹，天蒙蒙亮。住那端头一间的队长杨朝国已悄然立在门边目送。隔着迷朦的雾障，我们用不止一种滋味的目光和表情代替语言，默默告别。宏伟驾上牛车送我去机务站，我要他行慢一点，我坐在车尾，回头用温柔而沉郁的目光一一抚摸那蜗居、那牛栏和空旷寂寞的滩地，那雨季泥泞旱季尘飞的机耕道，那蔗林和校舍。宏伟忽然回头一个苦笑，叹息说再也听不到你的笑声歌声和妙语了，我拍拍他的肩约他有机会一定来成都耍。才想朗笑，便觉泪水涌上眼眶，抬手抵额，几点溅于车板，几点从板缝滴落红土道……

车开上南京里山脉高处抛锚，那会儿雾退了，盆周峰岭显露出梦幻般的淡蓝色，灿烂阳光洒满陇川坝的碧野绿水，它的美丽一如8年前，而我们被流水被风雨所雕刻侵蚀，已变得多么不同了呵！同车知青们面对尽收眼底青春热土、一大段生命的遗留之乡，大多仍忍不住发出庆幸的欢呼和快意的咒骂，我却总不能解脱和狂喜。爱恨交织，涕泪悲欢，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百感交集呵……我明白，直到生命终点的一种思念，已经从此时此地开始。

二 心中的碑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身边的战

• 126 •

友猝然倒下死去时，人们才突然明白在和平时期也同样会死人，而更令人悲愤的是本不该有这么多人过早地离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知青冯雨楼在祭悼草原大火中死去的69名知识青年的文章中写道：

他们就这样走了，就这样仓促地走了，仓促得叫人如在梦中，不相信这是真的。而走的方式又太让人心碎了，心碎得叫人肝胆欲裂，悲痛万分。他们本可以不死，但他们真真切切地死了；他们本可以快乐地生活，但他们却走完了自己的不该走完的人生道路；他们本可以享受到人间的爱和温暖，但他们却把自己的爱过早地、无私地、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大地。他们本可以……

死者的遗物，更催人泪下。内蒙古兵团女知青申丽铭珍藏着一扎书信，那是在那场大火中牺牲的呼和浩特女知青力丁的来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在着火前夕寄出的，谁能想到这是最后一封信呢？信是这样写的：

申丽铭：你好！

来信已收到，放心。昨晚听说三十二团失火，火还不小，也不知火情到底如何？你是否受到什么损失？

看了你的信，基本上同意你的观点。以后对待这些问题也尽量端正态度。其实要说想家，你可能比我要想的厉害，因为你那里没有什么知己，而我却不一样。你别安慰我，你要能精神愉快地生活，我也算特高兴了。最近从家里来信和从呼市刚回来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很多，总的一个意思耐心等待，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形势一片大好……希望你放宽心耐心等待，没必要背包袱，给自己施加压力。呼市上大学的多

的不顶了……总之一大批人上了学，我们连也来了招生的，我们排长走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今天走。查日斯他姐姐北京钢院，还有猛多，叨不机密了。看来只要努力机会是有的，希望你好好努力，还是相信未来吧！“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当然上学是相当不容易，可干革命，总得干出个样来吧？看来你们那呼市的吃不开，是吗？我们这不一样，比如我们连，我大概最次，我们安身处都在包，而且基本都在机务排，入团的不少，连里对这些人评价也不错。现在杨红原在机务排，查日斯是班长，我还是老样子。至于什么立三等功，简直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哪有这回事，我这赖劲还立功呢，恶心死了。别信谣言，相信我吧！我反正是干好活，学好习就行了，尽量少管闲事。至于入团，我不想低三下四的求他们，能入就入，不行拉倒，反正就这样了。排长也走了，更没有了解我们的人了。走着瞧吧！别的因为一时心情不好也想不起来，以后再写吧。我相信总有见面的一天，那时好好谈谈。

祝：天天向上！

朋友 力丁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

力丁是蒙古族，牺牲时18岁，被迫认为共青团员。信中提到的杨红原和查日斯，也在那场大火中献出了生命。她们三个都是所谓的“黑帮子女”，尤其是力丁，是用了写血书的方式加入的兵团，到兵团仅一年多，就走完了人生的旅途……

有壮烈的牺牲，也有真正的英雄，但更多的是事故和疾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知青陈宝琪为一名死于“出血热”的上海女知识青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大家都为这位单纯的姑娘的死感到惋惜。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可能会上大学当博士，也可能进工厂当技术员；如果不来这北大荒，她可能不会染上这种该死的疾病；如果她干活不那么卖力，发病后及时就诊，或许不至将病情延误。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

历史安排了它的错误，却要让我们这一代青年承担，而我们却没有回天之力。

兵团人对死者的祭奠虽然简单，但是意义深刻，记忆永存：

一弯新月，拥着云衾，悬挂在天边。我啜上一口酒，呵，那酒真是五味俱全呵！良久，我打破沉寂，提议道：“来，哥儿们，让我们为开发煤矿献身的老班长和小敏，祭上一碗酒！”大刘、勺子、秀才、杨迷糊和吴明鬼，先是怔了怔，又很快会意地站起身来。众人端着酒碗，毕恭毕敬地朝河岸三鞠躬，虔诚而深情地把北大荒酒洒在脚前的荒草上……

清明时节，寒凝大地。我站在高高的白杨树下。

四野静悄悄的。

我在向永远埋在了这里的两位亡友告别。拔去坟上的枯草，培上几锹新土，擦净碑石，我摆上了两朵小小的白花。

明年，明年还会有谁再为他们添一把新土，再献上一朵小花，来慰藉不死的亡灵？我不知道。

“原谅我，朋友，这怕是最后的告别，但我不会忘记你们。”胸中波动的悲苦之情，不知不觉化作泪水，向外翻滚。

人们走了，我又悄悄地站立在坟前，没有寒冷，我周身

的血在沸腾，我深深地、深深地向可敬可爱的老班长鞠了一躬。

在批准我入党的会上，手捧着老班长画过“押”、签过字的入党志愿书，我心中耸立起一块洁白的碑，那碑文告诉我，人，要踏踏实实地活着。

死亡的价值何在？当时顾不上考虑。当生产建设兵团本身也成为历史之后，人们对死者的追忆更加沉重。正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知识青年聂晓薇所说：

在云南支边的8年中，不知有多少伙伴魂归他乡……他们不是那种气壮山河、绚丽如虹的死，谈起他们的死，总让人感到有些苦涩，有些遗憾。尽管他们的死单个地看来仿佛有些偶然，但是如果把他们合起来放在那个十年浩劫的社会背景下看，却分明昭示着某种必然。如果没有那种盲目的政治狂热，如果没有“读书无用论”所造成的愚昧无知，如果没有那些对人性的践踏和扭曲，如果没有那种对前途的迷茫所导致的精神崩溃，如果不是在那种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那么，这些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悲剧深深地印在了兵团知识青年的心中，尽管不少死者的坟墓和石碑早已荡然无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三团知青陈莎莎指出：

离开兵团已十几年了，也颇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唯有他们的死亡令我痛苦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压在心中，愿意忘却，却也不忍轻易忘却。总为这些为堵水渠、为救火、为救羊、为恩恩怨怨、为人世间琐琐碎碎而轻易或是

甘愿抛弃生命的男孩和女孩们感到无限惋惜和伤痛；但这些年轻、活泼的生命之火无谓而过早地熄灭，又岂是伤痛和惋惜所能形容、涵盖的？

常觉得，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都市红尘滚滚，人们好忙。除却死者的亲人，大约很少有人再忆起他们了。然而，在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里，一群兵团战友在聚会，一位中年人突然站了起来，说他是代表60多个在锡盟大火中丧生的战友们来参加聚会的，他们，祝所有的兵团战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还没看清说话人的容貌，眼泪便夺眶而出了。我以为，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早已告别了那个流泪的季节了。

三 “知青文学”与“兵团文学”

“知青文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凡描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经历的文学作品，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影视剧本等，都归入了知青文学的范畴。

知青文学作品的作者，大致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比下乡知识青年年长的作家、记者等，耳闻目睹知青的生活经历，有所感而发，写出了一篇篇以下乡知青为主角的作品。另一类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走上创作道路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托，为知青生活谱写出一系列作品。

知青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文化大革命前、文化革命中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个阶段。

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落户，参加生产劳动，始于1952年。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其后有大批支边青年参加了新疆兵团。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映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劳动场景的文学作品也应运而生。从严格意义上讲，当时既没有“知青文学”的

提法，在文学中也没有一个专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命运为创作题材的分类；所谓“知青文学”还处在萌芽状态期，在同一时期反映农村青年命运的文学作品大大多于描述下乡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

文化大革命前影响较大的以下乡知识青年为主角的文学作品，有《军队的女儿》、《朝阳沟》、《边疆晓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青年一代》、《军垦战歌》等。这些作品在积极肯定知识青年与工农兵相结合、在边疆和农村大有作为的大前提下，讴歌了知识青年上进、无私、忘我的奋斗精神，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树立了一批青年楷模。

我们绝不能低估上述作品对一代青少年的影响。青少年崇尚的是英雄主义的奉献、轰轰烈烈的事业和浪漫的生活情调，而这些都可以在上述作品中读到、看到；作品渲染的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和无畏创新的精神世界，很容易成为青少年追求的奋斗目标；对现实生活一定程度的美化，使农村和边疆具有了神话般的魔力，吸引了千百万青少年的注意力。在后来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确实有不少青少年是带着美丽的幻想离开城市的，而这幻想大多是读了文学作品后编织出来的。

从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千余万城镇知识青年送到了农村、国营农牧场和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知识青年很快体会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得不对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和摸索，并由此产生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

一类作品继承了文革前知青题材作品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特征，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方向正确，藐视困难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讴歌知识青年的生活劳动场景，强调不讲任何条件地扎根农村、边疆干一辈子革命，以塑造勇于献身的英雄和平凡的劳动者形象为己任。这类作品，往往能够公开发表，以起

到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鼓励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领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本书第十一章我们已列举了各生产建设兵团培养知青写作人才的一些实例。各地通过正常途径培养的知识青年笔杆子，创作了一些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满足了宣传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文学界和文艺界储备了一支新生力量。不少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诗人，就是当知青时开始的写作生涯。但就当时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来说，大多因理想和正面说教的成分过多，与残酷的现实生活完全脱节，已经全然失去了文革前同类作品的神秘号召力和感染力，甚至引起同辈人的厌恶。

文革期间发表的知青题材小说，代表作有《青春》、《理想之歌》、《分界线》、《广阔的路》等。《广阔的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集，主要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文学创作班的作品。《“扎根园”里苹果红了》以天津知青在山西省平陆县插队的生活为背景，用青年教师郝广杰和知青宋春元、张振忠、小曹等形象表明了农村大有作为的主题和坚持扎根边疆的方向。《广阔天地有志人》以张家口知青程有志培育良种的事迹说明两条路线斗争的错综复杂。《和金鸡纳一块成长》，述说了北京知青辛温在云南农场为建立金鸡纳基地忘我奋斗的故事，并对她主动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加以重点渲染。《小将的挑战》将当时的知青典型柴春泽的事迹文学化，在这篇作品后面还附上了柴春泽的日记书信摘抄。此外，还有《土窑洞里的赤脚医生》、《新教师和她的聋哑学生》、《在这张考卷面前》等作品。

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生活，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代表作是张抗抗等人的作品。张抗抗是来自杭州的女青年，1969年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这部小说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

的大框架下，描述了兵团知识青年的斗争生活场景。

诗歌的创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各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刊，都为发表知识青年的诗篇提供了专门的园地。理想的编织，激情的过分渲染，对边疆农村生活情调的美化，可以说是当时公开发表的知青诗歌的共同特征。

另一类作品是所谓的地下知识青年文学作品。在各地的下乡知识青年中，都有一些人在秘密地写作，少数作品变成手抄本在知识青年中流传，多数则因生活命运的改变而夭折。秘密创作的作品，有小说、诗歌，也有散文。这些作品，大多数是知青生活和命运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作品主要昭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光明面，秘密写作的知青题材作品则主要揭示这场大规模运动的阴暗面；前者展示的积极上进的革命精神，在后者中往往是虚假的伪装和谋取私利的手段；前者宏扬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在后者中不但看不到，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悲观、失望甚至颓废的气氛笼罩在知识青年之中；有的作品，干脆就是对残害知识青年现象的血泪控诉。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出现的大批文学作品，无论是公开发表的作品，还是秘密流传的作品，都因作者本身尚置身于运动之中，不能冷静、全面地观察这场运动，对知识青年的命运把握不住，或者过于肯定，或者过于否定，所以绝大多数昙花一现。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作品毕竟把知青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知青文学已有了雏形。

大批知识青年返城，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知青文学却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步入了成熟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亲身经历，使他们对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刻，亦为知青题材的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养分。

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发表的知青文学作品，有数百篇

之多，其中反映兵团知青生活经历的作品占了一半以上。知青文学发展的脉络，通过“兵团文学”亦可以揭示出来。

“兵团文学”的主要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感情化为主要特征的知青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的态度，再现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劳动场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捕捉青春的气息和浪漫、潇洒的情调；作品往往回避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对错是非评价，着重于知青的精神回归和对知青生活的感情依恋。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的转型，用淳朴的感情抒发取代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空洞渲染。

出生于北京的钟阿城，1968年赴山西、内蒙古插队，1969年又前往云南景洪农场，后转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阿城的小说《棋王》，把在农场当知青的王一生对象棋的执着热爱写得出神入化，浑然忘记了一切苦难，超脱了一切现实。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

王仕陆、田子镒、周良宗三人合著的《红土地白月亮——重返知青河》，被收进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爱的世界丛书》。他们写出了32篇描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知青恋爱经历的小故事，以浪漫的笔锋展示了青年一代的情爱世界。

人有情，动物亦有情。李海音的《杂毛狗牯》，梁晓声的《鹿心血》、《鸽哨》，以及北京晚报社的“人与动物”系列丛书中特别编辑的知青专辑《我和菊花青》（高立林主编，收录了111篇知识青年的作品），都是以下乡知识青年与各种动物之间的关系为主题的作品，主要展现的是在坎坷命运中挣扎的知识青年的精神寄托，从不同角度渲染了回归大自然的浪漫情调。

第二种类型是在“伤痕文学”盛行时发展起来的知青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知青个人乃至群体

所经历的磨难，换言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阴暗面的暴露，往往成为这类作品的主题。作品的主调或者压抑、低沉，或者悲愤、凄凉，使读者为之震动。这类作品可以说是文革期间知青地下文学作品的发展，但在运动结束后经过冷静的分析和思考后产生的作品，远比文革时期的秘密作品深刻，覆盖面也宽得多。

梁晓声创作的知青小说，大多属于这类作品。1968年从哈尔滨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梁晓声，创作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一系列知青题材作品，并于1993年结集出版了《梁晓声知青小说选》一书。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为了开发“鬼沼”，女副指导员、“摩尔人”和“妹妹”三个知青先后献出了生命。《为了收获》则展现了知青在收获季节突遭“出血热”（鼠疫）袭击时的各种心态，尤其是抨击了曹干事，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知青干部的拙劣表演。《今夜有暴风雪》是梁晓声最有影响的作品，这篇小说以黑龙江兵团知青群起要求返城的事件为线索，回溯知青们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塑造了曹铁强、裴晓芸、郑亚茹、刘迈克、小瓦匠等不同的知青形象，以及团长、政委等现役军人和地方干部形象。共同的命运，驱使知识青年采取了统一的行动，当人们终于接受了山崩一样的回城风的事实之后，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各级干部，对过去的一切做法几乎都有了新的认识。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更受到了一致好评，原因就在于它以人们能够接受的情节，铺陈出了一部悲壮的屯垦史诗。

《今夜有暴风雪》没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抱完全否定的态度，留下了一个积极的结尾。小说的结局是男主人公曹铁强等39名知青自愿留在北大荒，陪伴那些献身于北大荒的知青并去完成他们的未竟事业。同样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则是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完全的否定。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支由5名知识青年组成的小分队，为开发新的橡胶生产基地，在女副指

导员的率领下开进了热带雨林，结果除副指导员外，4名男知青全部死在了大森林中，而这种献身实际上毫无意义。尽管头脑清醒的男知青简和平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副指导员亦对行动的目的越来越怀疑，但他们不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到底。一个全然悲剧性的结局，更为动人心魄。

第三种类型是以纪实和反思为主要特征的知青题材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出现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至今方兴未艾。以回忆和纪实的手法，真实地再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幕幕场景，并加以今天的评判，既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信的材料，亦使一代知青对当年那场大规模的运动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集体的参与，使纪实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作者和读者，亦使文学的触角伸进了许多过去没有涉猎的领域。在整理、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创作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个人经历以及其后的巨大社会背景，首先成为这类作品的主题。“王亚卓”事件的受害者之一邢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雪纷纷》，作者不但叙述了事件发生的根源以及当事者受到的压力和因政治迫害产生的一系列悲剧，还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领导者的卑劣行径，并反衬以有正义感的知青们的同情。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马波，先在内蒙古草原插队，后来转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署名“老鬼”的作品《血色黄昏》，将他在内蒙古草原8年的经历一幕幕展现出来，清查“五·一六”中对知识青年的政治迫害，烧死了69名知识青年的草原大火，某些现役军人干部的无知和贪婪，生产建设兵团盲目开发草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形成了笼罩在知青头上的一道道阴影。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是试图真实地书写一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

出生于北京的女青年乔雪竹，1968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后转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她在《郝依拉宝

格达山的传说》中，描述了内蒙古兵团对一起殴斗死人事件的处理过程，揭示了产生悲剧的原因。虽然这是一篇小说，但同《血色黄昏》一样，有真实事件的依据。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亦谱成了纪实文学的宏大篇章。受云南知青大返城的震撼，原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知青郭小东写出了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一九七九知青大逃亡》；嗣后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成都知青邓贤，又以《中国知青梦》为题，不但再次揭示了云南兵团知青返城的内幕，并用纪实手法生动地再现了如下场景：人为拔高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知青艰苦的劳动换来的是生态破坏和经营亏损，鲜为人知事故、迫害知识青年的各种恶劣行径以及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后的查办行为、知青病困退和不正常的婚姻关系，知青大返城后的各种遗留问题，等等。在这个长篇纪实文学中，作者加进了自己的议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个体行为，而是集体行为，尤其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更是以大集体的面貌出现。要全面反映知青的生活经历，当然应该使用集体的力量。1990年，第一本由下乡知识青年集体编写的纪实性文学作品集《北大荒风云录》由工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193篇文章，使人们对黑龙江兵团知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了解。

受《北大荒风云录》的启示和影响，各地知青纷纷以同样方式共同追忆过去的经历，总结人生道路上的得失，一本本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先后结集出版。

在内蒙古插队和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编辑出版了《草原启示录》（收录作品181篇，草原知青书简52封）、《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收录作品135篇）、《戈壁岁月——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生活纪实》（收文65篇）等书，对内蒙古的知青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

四川支边知识青年在《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中，编录了86篇文章，记述了知识青年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经历。

“工农兵学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产物。曾是知青的一代人，没有回避这个话题。由老久、锋子主编的《难言“太学生”——“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收录了《非常规的校园生活模式》等19篇纪实性作品。

还有一些纪实文学作品集打破了地区界线，从全国范围收集有代表性的知青作品，意在全面反映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李广平编的《中国知青悲欢录》，收录了各地知青的53篇文章；余夫、汪卫华编的《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收录了陈小雅的《北京知青历程回眸》、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的幻灭》、蒋巍的《下乡知青人生切片》、张化的《“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透视》、吴名的《婚链：一个女知青的爱情困惑》、丁雨雨的《中国知青在外国》、荒野的《董加耕之路》、孙育鼎的《朱克家的沉浮》、申平的《柴春泽其人其事》、王冬梅的《四名女知青典型的今昔》、周缙的《跨世纪的“桥梁”——今日“老三届”实录》等11篇作品。这些作品中，同样有不少篇没有脱离兵团题材。有些自称是知青运动史的作品，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纪实文学的范围，如费声所著《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主要情节还是以文学的手法记下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生活场景和知青回城时的各种场面。

第四种类型可以称作后知青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或是将知青生活延伸到今天，叙述一个错误的运动给人们带来的沉浮和悲欢离合；或是跨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局限，以共和国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为大背景，描述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学生、红卫兵（或黑崽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各种类型的人物，一般构成了这类作品的四部曲。这种全景式的文学创作，因其关联到

了今天，使过去的知青生活与现在的大千世界融为一体，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和冲击力远比纯知青题材的作品强。

张抗抗的《红罍粟》和《塔》两篇小说，都是改革时期知青形象的延伸。前者的主人公纪小明，具有改革精神，但在万宝岭农场的所谓干部体制改革中屡遭挫折；而有红罍粟一样迷人外表的祝融，在“四人帮”横行时借制造人间悲剧飞黄腾达，后来又以阿谀奉承、打小报告等卑劣手段稳坐团委书记的宝座，作品意在提醒人们警惕这种“红罍粟”式的人物再兴风浪。后者描绘了几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经过多年波折后又在杭州六和塔下重聚，用人物交错和内心独白的手法表现了他们对当年荒原生活的眷恋和返城之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及其内心苦衷，其中尤以顾亦非和宋为良最为典型。顾亦非虽然穷极潦倒，但并不悲观绝望，在逆境中拼搏，若有人称他们为“垮掉的一代”，他希望有人出来摇头说“我看不见得吧！”宋为良原准备在北大荒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生活欺骗了他，他把自己比作返城潮水退走后留在沙滩上的小虾，并不认为去北大荒是上当受骗，他的人生信条是人总归都是要活下去的，活下去就要劳动、建设、创造。

陆星儿是来自上海的女青年，1968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小说《达紫香悄悄地开了》中，作者用一根婚姻的细线把回城当了作家的女知青潇潇和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场长李俊堂连在了一起，既有对旧日黑龙江兵团知青生活的回顾，也有对现实命运之思考 and 人生道路的选择。

1969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蒋巍，在北大荒当了9年记者，擅长于报告文学。他在《我问自己一千次》的报告文学中，展示了一个女人的奋斗经历：优秀女学生——黑帮子女——黑龙江兵团女知青——回城后又第二次下乡——女售货员——自学考试和奋发写作——成功的女记者。事业的成功并不等于生活幸福，一场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悲剧，就在她身上发生，并常常左右着

她的生活道路。这篇作品是作者特别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20 周年写的祭文。

肖复兴是北京 66 届高中毕业生，1968 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长篇报告文学《啊，老三届》中，作者追踪了一批从北大荒返回的知青的人生道路，并郑重宣布：大都市没有吞没你们！你们痛苦过，犹豫过，彷徨过，也奋争过。对于这一段和我们共和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将会刻骨铭心，渗进你们的血肉之中。你们可以毫无愧色而自豪地讲：“我们是曾经插过队的老三届！”

吴欢是北京知识青年，1969 年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雪，白色的，红色的……》的小说中，作者用今昔对比的手法勾画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即将出国的前知青发现过去的一切给他打下的烙印并不会因为命运的改变而变浅。

晓剑的《中国知青秘闻录》和《中国知青在海外》两部小说，不但把昨天和今天联系在一起，还把笔锋伸向国外。前者塑造了“类人猿”（杨之洋）的生活经历：开始于“造反”，随后在云南兵团当知青，逃到国外去谋生，终于变成了国际走私犯并被击毙在边界上。后者则分为现代、灵魂、欲望、拼搏、荒蛮、生存、文明、爱情、仇恨、神圣、社会、沉沦、乡恋、文化、罪恶、尊严、流浪、丑陋、死亡、命运二十篇启示录，分述了前知青在国外的不同经历。

1994 年是后知青文学创作硕果颇丰的一年。

为纪念中国知青运动 25 周年，郭小东出版了新著《青年流放者》。作者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把广州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现代生活与过去的经历有机地联系起来，织出了动人心魄的人生画卷。

梁晓声的新作《年轮》，横跨三个历史时期，从学生时代到红卫兵造反，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及至返城，一直延伸到改革

开放后在社会上的拼搏，勾画出了一代知青的成长足迹。

叶辛是在贵州省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曾以插队生活为背景写作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知青小说。1994年出版并改编成电视剧的长篇小说《孽债》，通过5个知青子女到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故事，在一系列矛盾的处理中，展示了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的家庭生活和不同的人生态度。

四 你我风雨同行

从各种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爱、恨、悲、叹的不同表述，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执笔者对自己的兵团经历刻骨铭心，这就是所谓的“兵团情结”。为表达对昔日生活的怀念，兵团人还自发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1990年底，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举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北京造成了轰动效应；1991年4—6月，原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在广州和成都分别举行的“历史为平凡作证——海南、广东兵团知青生活回顾展”和“青春无悔”大型图片回顾展，造成了同样的效应。

有人希望能为中国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塑造一座丰碑，她虽没有抵御外辱、解放苦难大众的人民英雄的壮烈，却足以展示一代人的悲壮历程。如晓剑在《中国知青秘闻录》中，陈说了主人公——一个曾活跃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领袖——的未了心愿：在云南为知识青年建一座100米高的纪念碑。知青作家梁晓声则在新出版的《梁晓声知青小说选》序言中表示：“如果我是雕塑家，我将为当年的我们——一代知青凿铸这样一尊雕像——一条腿屹立在大地上，另一条腿长跪不起。——一只手托着改天换地的豪情高举过头顶，另一只手擦着‘脱胎换骨’的虔诚扪于胸前。”

建碑的愿望已经部分实现了。1988年云南东风农场建场30周年前夕，耗资18万在场部塑了一座纪念碑。基座上三个形象，一看便知代表农场成员主要的组成部分——转业军人、湖南支边农民和知识青年。以后，可能还有更多的碑出现。

兵团人回首往事，经常是带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正如云南兵团的一位知青所说：“人，有时像个怪物一点不假。记得1979年知青大返城前，我们极像是看破了这里的红尘，积蓄在心头8年的忿闷莫不一古脑地渲泄出来——赌咒发誓捶胸顿足永不到此，能带走的东西全带走，带不走的便化作一堆堆垃圾抛向四周。仅剩下一句别言：盈江啊盈江，莫说二辈子，就是我们百年之后的坟头座向也要避开你！可回城数年以后，又纷纷抱怨在单位上挤不出重返盈江的时间。到底是盈江变了？还是我们在变？”当人们完全冷静下来之后，对过去的评判更为中肯、现实，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也不可能一致。我们在这里特别摘出了一些知识青年对生产建设兵团乃至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

这是一段与红土高原同生共存的历史，无论当今或今后的人们如何评价它，它的存在本身是难以忽略的。

……只是最近，听说成都知青想纪念赴兵团20周年这事后，云南农垦总局古希全局长给我们来信，他说：“云南农垦曾经接纳了10万知青，他们当中有不少杰出的人才，倘能留下他们的10%至20%，农垦事业的今天，不要说面貌非凡，至少也可以大为改观。”……我们创造过边疆也伤害过边疆，农垦接纳过我们也委屈过我们，如今它宽宏大度，反而使我们的追忆变得格外复杂。就这样，我们和云南才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云南农垦是我们的纪念碑，功过得失，全记录在它的土地上。我们呢，我们整整一个梯队的知识青年也是云南农垦

的纪念碑，走遍天涯海角，都带着它的标记。

——云南兵团二师七团曾小嘉

有人对兵团、对现役干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我则愿在此作一疾呼：那是颠倒黑白，造谣诽谤。绝大多数的兵团战士、绝大多数的现役干部是好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边疆的建设事业的。至于个别的逃兵、败类，那只是历史洪流的沉渣，不足为奇，不以为怪！

——内蒙古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刘欣

有人把上山下乡运动比做“席佛西斯”的石头，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又被巨人从山顶上推下来，他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却又是那么虔诚地相信，这种滚动是他们这一代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可是，当他们在滚动中遍体鳞伤的时候，狂热的头脑开始冷却，急剧地冷却，他们对这种毫无目的的滚动开始发生怀疑，这是本能的清醒。他们一边舔拭着自己的伤口，一边向席佛西斯，也向他们自己发问，是发至心灵深处的质问：“这种滚动的目的何在？”

——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三团金环

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否定极左路线，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唯其否定得彻底，我们才能真正从行动上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确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观念，我们才有可能发展生产力，才会有更多的“科技支农”，“科技扶贫”，“智力支边”，“希望工程”等等深得民心的壮举。

——云南兵团三师十团邓贤

当时，我一直真诚地认为：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考验人，越

能磨练人的意志，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退堂鼓。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己心甘情愿地，脚踏实地地在南疆干了整整8个年头！在那充满艰辛的2800多个日日夜夜，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一天也没有白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初，也许我们有些激进，但是绝不平庸！

有了过去那段日子垫底，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还有什么样的委屈不能忍受，还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呢？

——云南兵团三师十团尹俊屏

兵团存在于“文革”动乱那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有过狂热盲从，有过困惑迷惘。但是更多的是冷静思索和振作起来；兵团的劳动和生活是艰苦的，我们有过疲乏厌倦，有过牢骚怪话，但更多的是忘我劳动和艰苦创业；兵团是一个由多种人员身分组成的小社会，我们看到过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感受过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但更多看到的是凛然正气和美好事物，更多感受到的是集体温暖和人间真情。

我想，这大概就是曾在兵团工作、生活过的知识青年至今还怀念那段经历的原因。

——内蒙古兵团三师二十一团刘建禄

往事的回忆，使我更加痛恨那个动乱的年代，惋惜那些被扼杀的人材。我禁不住大声疾呼：“祖国啊，为了你的繁荣、昌盛，再不能让那些‘恶梦’重演了！”

——内蒙古兵团张保生

回顾过去，我从不逃避为自己所做错的一切忏悔，但不愿向那个谬误的时代低头，说一个“错”字。

——云南兵团二师七团王晓梅

对这10年，我始终不悔。当时的我毕竟是充实的。应该说，那是红红火火的10年、轰轰烈烈的10年。或者再过10年、20年、30年，我们可以自豪地对后代人说：当年在北大荒，我们曾忘我地战斗过……

——黑龙江兵团六团王鲁庆

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再有什么样的苦也已经不觉得。我们受了那么多的难，还有什么样的困难能挡住我们？老天爷既然给了我们特殊的命运，那么也必将造就特殊的一代。

——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三团唐惠国

青春无悔并非是要回避那段严峻的历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段历史使这一代人更加清醒、更加成熟。正是由于有这一杯苦酒垫底，才使得这一代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和事业上，更加奋力拼搏，有所建树，去夺回已逝去的宝贵年华。

——云南兵团二师九团林新春

两年前，云南耿马、澜沧地区遭受一场毁灭性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就是我们勐省农场。消息传来后，我们举行了回城10年来的第一次知青大聚会，大家用一点一滴的捐款为那里送去一片祝福，也得到了农场深情的回报：捐款和慰问信寄到农场后，农场干部职工争相传看，痛哭失声！是啊，那片大山曾挽留了我们的青春，于是也就挽留了我们的爱；虽然我们走出了那片大山，但那片大山却永远也不会走出我们的心境……

云南兵团二师九团张宪明

历史的客观性就在于它并不因为人们的良好愿望而会改变任何事实。

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为起点，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建师先后在18个省、自治区摆开阵势，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试验。发展农垦事业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两大有力的杠杆。国家为此付出了近80亿元的代价，最终却不得不将所有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撤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尽人意的结局？

满怀激情奔赴边疆的知识青年，在艰苦的劳动中懂得了献身的含义，在高压的政治空气下知道了运动的厉害，在单调的生活中萌发了对异性的追求，在绝望中寻求出路、企盼新知……山崩一样的知识青年大返城，使一切都结束了，留给人们的，岂止是遗憾？

错误决策导致重大失误，文化大革命中生产建设兵团的兴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难能可贵的是在荒谬的年代中已经发现草率地铺开大摊子建立兵团是错误的，并且果断地做了手术。即便如此，生产建设兵团还是给国家造成了几十亿元的经济损失，大大破坏了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使整个军、农垦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著作中，凡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生产建设兵团，无不抱否定态度，实际上已经表现了对错误事实评判的一致性。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里，因盲从而出现的种种在今天看来是完全失去理智的做法，不能说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生产建设兵团的兴衰，与大规模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同步，显然是该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兵团的各级领导，是运动的局部组织者，广大的知识青年和兵团职工则是运动的参与者。1973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

议，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决定生产建设兵团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上山下乡运动阴暗面的暴露，打破了原来笼罩其上的美丽光环，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对这一运动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强调维护知识青年的利益，上山下乡的一代知识青年，以此为契机，不但起而为保护自身利益呼吁，更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认真思考，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极左做法的厌恶，进而发展到对以“四人帮”为首的左倾路线的痛恨。对“白卷英雄”的斥骂，给“小学生”的回信，“四·五事件”，等等，呼声越来越高。“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将跨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绝不可能抛开一支经受过磨练的、自觉自醒的生力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阵地转移势不可挡，改革需要他们，他们欢迎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完结，正是迈开改革步伐的开端。

由于特殊组织形式的限制，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大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在这场大规模的运动中，知识青年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应该说是他们具有了对任何环境的适应性和挑战性。艰苦生活的磨难，政治风云的变幻，个人地位的上下，给知识青年以足够的经验、教训，使他们懂得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他们不仅能在逆境中调节自我，即便在社会最底层也可以找到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调；又能不时地分析、判断形势，及时地抓住一切机会，迅速改变自己的状况；更能在顺境中瞻前顾后，把握自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这不只是兵团知青所具备的特性，而是曾经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挣扎过的一代人共同具有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确实普遍地具有双重性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涵育了一代青年的如此性格，乃是始料不及的。这貌似“顺从”的一代人，现在已有了足够的社会基础，并又重新崛起，准备实现把握中华民族命运的抱负。对这一代人的研究，已经刻不容缓了！

附录一 生产建设兵团大事记

1966年

1月，宁夏农建十三师正式成立，隶属于宁夏军区。

2月，农垦部陈漫远副部长到西北检查工作，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4个农建师负责人研究西北农垦发展问题。中央决定筹建华北农垦兵团、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3月，沈阳军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农建第一师和第二师。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建设兵团改名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

5月，青海省农垦筹建处由西宁迁到格尔木，组建青海省农建十二师。

1967年

农垦部机关因“文化大革命”停止工作。

7月，华北农垦兵团整编，保留了6个农业团和3个工业团的建制。

秋，沈阳军区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酝酿研究，并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原则同意，开始重新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8年

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农垦部派驻军事代表小组。

2月24日—3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会议。

3月9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筹建情况的报告》上报中央。

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6月30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

12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同意黑龙江兵团开发抚远荒原。

12月22日,《人民日报》载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

12月23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办公会议决定取消月薪日计工资,一律实行月工资制。

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城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万余人。

1969年

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建立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建立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月26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决定撤消原东北农垦总局科研所。后又决定撤消八一农垦大学。

1月28日,国务院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2月25日—3月2日,在兰州召开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大会。

3月15日,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指示》。

3月24日，财政部军管会发出《复农垦部军代表关于解决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资金问题的函》。

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十一团奉命组织担架队等参战。

4月1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4月1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整机构，成立后勤部等机构。

4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会议批准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化纤厂。

4月18日，纺织工业部军管会业务组批文同意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化纤厂。

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召开成立大会。

5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决定组建第六师。

6月4日，国家计委、物资部军管会、财政部军管会、农垦部军代表发出《关于将农垦部原东北农垦总局编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有关投资、物资供应等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

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月28日，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

8月23日，农垦部军代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改变农垦部直属垦区和事业单位领导体制的报告》。

8月28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边疆各生产建设兵团加紧进行战备教育。

8月，兰州兵团司令部由兰州迁往甘肃省武威黄羊镇。

9月17日，建立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9月，设立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0月19日，边疆各生产建设兵团紧急传达以林彪名义发出的战备命令，进入临战状态。

10月，云南省组建5个水利工程团，先后接收知识青年近万人。

11月23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小组上报《组建方案》。

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划归新疆军区领导。

当年，设立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江西农建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城市知识青年18万人。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年产橡胶3100多吨。

1970年

1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下放农垦部直属的云南、福建、广东、广西垦区的通知》。

1月26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将5个水利工程团交给即将成立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领导。

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思茅召开成立大会。

5月7日，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

5月19日，国家计委、物资部军管会、财政部军管会、农垦部军代表发出《关于橡胶垦区下放后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

5月22日，国家计委、物资部军管会、财政部军管会、农垦部军代表发出《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放后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

5月28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发生翻船事故，死亡6人。

5月，成立农林部，下设农垦组（后改为农垦局）管理国营农

牧场工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决定建设跃进山钢铁厂。

6月23日，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报告》，开始试验招收工农兵学员，各生产建设兵团也推荐了一批知识青年上学。

6月，农林部、财政部派出联合调查组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研究扭转亏损问题。

8月1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七”化纤厂投产。

8月20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

8月25日—10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

10月17日，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晨星农场）的一个新建连队被山洪吞没，死亡22人。

10月18日，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大会在济南举行。

11月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团等在扑灭荒原大火中伤亡百余人。

12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当年，建立广西生产师。西藏军区生产部改名为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总产量超过15亿斤。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干胶4.3万吨。

1971年

1月10日，国务院燃化部批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建立林源炼油厂。

3月23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知青宿舍失火，烧死女知青10人，烧伤7人。

4月，财政部、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联合组成3个调查组，分赴辽宁盘锦垦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广州生产建设兵团，调查农业工人工资制度问题。

5月25日，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调查组提交《关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橡胶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

5月，农林部、财政部调查组提交《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实行供给制的调查》。

6月30日，农林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递交《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工人工资问题的调查报告》。

6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实行定收定支、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包干制度。

8月20日，农林部、国家计委劳动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组提交《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工人现行分配制度的调查报告》。

8月28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规定增配副连长、副指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副团长、副政委、副参谋长等职，安排了原农场干部5000多人。

9月26日，国家计委、农林部发出《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调整工资问题的通知》。

当年，建立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粮豆总产量50亿斤。广州生产建设兵团产干胶4.64万吨。

1972年

2月4日，财政部发出《复农林部同意解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亏损的函》。

2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云南和广东海南岛等地区积极

发展热带、亚热带植物》。

3月4日,《人民日报》载北京部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政治部文章《选送优秀青年上大学》。

3月,农林部、商业部、轻工业部根据国家计委的要求,联合召开了由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的甜菜生产座谈会,讨论建立糖料生产基地问题。

4月10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决定在三师十八团(友谊农场)七营进行工资改革试点。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5月5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四连在扑灭草原大火时烧死69名知识青年。

5—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国务院农林部联合派出3个小组,调查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安徽5个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

6月20日,农林部提交《关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橡胶生产情况的报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政工通讯》创刊。

7月21日,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提交《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的调查》。

8月,农林部制定《关于1972—1980年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开荒规划的初步设想》(草案)。

10月12日—11月10日,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全国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

12月6日,《人民日报》载文《思想上教育好,生活上关心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党委做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经验》。

12月20日,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

当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粮豆总产量46亿斤。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撤消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

1973年

2月8日，总参谋部、农林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报告》。

2月22日—3月3日，北京市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生产建设兵团派北京知识青年代表参加了会议。

2月23日，农林部提交《关于召开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座谈会的报告》。

3月3日，农林部、财政部发出《关于改变生产建设兵团师以上行政事业费管理问题的通知》。

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组织文化考试。各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纷纷准备参加考试。

4月13日，国务院批准恢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大学（原八一农垦大学）。

4月25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

5月8日，农林部提交《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试行工分制情况的报告》。

6月22日—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7月4日，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印发了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摧残知识青年的情况反映等。7月5日—9日，中央领导同志纷纷表态，要求各生产建设兵团严肃处理残害知识青年的坏人。

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一份发人深省的考卷》，捧出

白卷英雄张铁生，招生亦回到推荐程序，更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

8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划归黑龙江省委领导。

8月22日，沈阳军区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迫害知识青年的罪犯黄砚田、李跃东死刑。

8月28日—9月14日，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召开全国橡胶生产座谈会。

9月5日，财政部、农林部颁发《国营农牧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9月14日，广州生产建设兵团驻海南岛的7个师受到台风袭击，死亡128人，受伤829人。

9月26日，国家计委、农林部发出《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调整工资问题的通知》。

10月1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石油化工厂投产。

10月4日，沈阳军区向黑龙江省移交黑龙江兵团工作关系。

10月6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关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粮食生产和预计交售情况》上批示，批评黑龙江兵团抓农业不利。

10月，兰州军区召开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工作会议，兵团机关撤消，兵团所属各师分别交给所在各省、自治区领导。

11月19日，广州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关于将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移交广东省委领导的请示》。

11月24日，财政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的暂行办法》。

11月28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景洪召开宣判大会，判处迫害知识青年的罪犯贾小山、张国亮等4人死刑。

12月6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移交省委领导的请示》。

12月底—1974年初，云南橡胶垦区遭受特大寒潮袭击，损失幼林橡胶18万亩。

当年，全国生产建设兵团粮豆总产量41亿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产干胶6630吨。

1974年

1月3日，财政部发出《关于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牧场调整工资在财政预决算上处理办法的通知》。

1月12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公布《兵团农牧连队实行工分制试行办法》。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少数“走后门”参军、入学的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不久后返回兵团。

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王亚卓事件”。

2月，原兰州兵团农建四师更名为青海省农业建设师。

4月14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车祸死亡知青12人，伤45人。

6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广州、云南两生产建设兵团，建立两省农垦总局。

7月1日，建立宁夏农垦分局，撤消宁夏农建五师建制。

7月24日，财政部发出《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局关于对生产建设兵团贯彻工业交通农牧企业财务成本规定中存在问题的处理意见的函》。

8月28日—3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一团知识青年为逃避地震，集体北上返城，与驻军、民兵等发生冲突。

8月29日，财政部发出《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财贸办

公室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驻城镇单位初高中毕业生安置费问题的复函》。

9月6日，昆明军区发出撤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命令。

11月22日，农林部、财政部发出《复黑龙江革委会关于弥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亏损的函》。

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南京军区将所属江苏、浙江、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划归各所在省省委领导。甘肃农建一师、二师和林建师撤消。

当年，撤消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和广西生产师。

1975年

3月25日，农林部、财政部在银川召开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新疆自治区党委、军区党委关于改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

5月23日，根据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改变兵团体制有关交接工作的具体方案》的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机构将人员、财产、资金及职工档案等造册，移交给对口机构。

6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7月16日—21日，农林部召开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做好交接工作座谈会。

9月，青海省农业建设师改为海西州格木尔农场总场。

10月30日，黑龙江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

12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当年，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和陕西、江西

农建师先后被撤消。

1976年

2月25日，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成立，撤消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4月26日，《北京日报》发表《两封针锋相对的来信》，将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十四团黄一丁、刘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看法的私下讨论公诸于众。

1977年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恢复高考制度。

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

当年，北京、天津知青办同意放宽原内蒙古、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病退、困退的限制，掀起了这两个地区知青人回城的浪潮。

1978年

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农垦总局，对黑龙江、新疆、广东、云南四个垦区实行农垦总局和省、自治区双重领导，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兼总局局长。

10月31日—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发出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宣布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已是国家职工，不再办理病退、困退回城。

11月10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

11月，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为争取回城举行请愿、罢工，并派出“云南西双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北上。

12月11日，青岛市委下达文件，同意接收在内蒙古、宁夏、青海的支边青年返城。

12月下旬，云南西双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在昆明集体卧轨。

1979年

年初，撤消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师，成立西藏自治区农垦局。

1月4日，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云南知青汇报团代表。

1-2月，昆明知青工作会议，同意原云南兵团知识青年返城。云南掀起知青返城大潮，并影响到其他省份。

附录二 生产建设兵团团场建制表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总部，驻新疆乌鲁木齐市

221 团，吐鲁番县，原植棉场

222 团，阜康县，原天山 10 场

104 团，乌鲁木齐市，原天山 9 场

1 师，师部驻阿克苏

1 团，阿克苏沙井子，原胜利农场

2 团，阿克苏新井子，胜利 3 场

3 团，阿瓦提县，原胜利 2 场

4 团，乌什县，原胜利农场英阿瓦提分场

5 团，温宿县，原胜利 7 场

6 团，温宿县，原胜利 5 场

7 团，阿克苏马滩，原马滩农场

8 团，阿克苏新垦地，原胜利 17 场

9 团，阿克苏阿拉尔，原胜利 8 场

10 团，阿克苏阿拉尔，原胜利 9 场

11 团，阿克苏塔南，原胜利 21 场

12 团，阿克苏塔南，原共青团农场

13 团，阿克苏幸福城，原胜利 10 场

14 团，阿克苏沙里里克，原胜利 11 场

15 团，阿克苏，原胜利 12 场

16 团，阿克苏塔南，原野麻场

工程 1 团，阿克苏

工程 2 团，阿克苏

2 师，师部驻库尔勒

21 团，焉耆县，原开南农场

22 团，和静县，原博北农场

23 团，和硕县，原 2 师牧场

24 团，和硕县，原解放 5 场

25 团，博湖县，原 25 团

27 团，焉耆县，原种马场

223 团，和静县，原哈木湖提农场

28 团，库尔勒古西湖，原孔雀 1 场

29 团，库尔勒库尔楚，原 6 团

30 团，库尔勒库尔楚，原库尔楚农场

31 团，尉犁县，原共青团农场

32 团，尉犁县，原塔里木 4 场

33 团，尉犁县，原塔里木 6 场

34 团，尉犁县，原塔里木 3 场

35 团，尉犁县，原塔里木 2 场

建工 1 团，焉耆县

建工 4 团，库尔勒，原工 3 师 21 团，1972 年划归 2 师

3 师，师部驻喀什市

41 团，疏勒县，原草湖农场

42 团，岳普湖县，原前进 2 场

- 43 团，麦盖提县，原前进 3 场
- 44 团，巴楚县，原前进 4 场
- 45 团，麦盖提县，原前进 5 场
- 47 团，墨玉县，原昆仑农场
- 48 团，巴楚县，原前进 9 场
- 49 团，巴楚县，原图木休克总场 2、4 分场
- 50 团，巴楚县，原东方红下河分场
- 51 团，巴楚县，原英曼里分场
- 52 团，巴楚县，原齐干桥分场
- 53 团，巴楚县，原皮塔克分场
- 工牧场，叶城县，原前进牧场
- 建工 1 团，巴楚县，1971 年并入 50 团
- 建工 2 团，巴楚县，1969 年并入水利工程团
- 水利团，巴楚县
- 现役团，驻喀什市，1971 年成立

4 师，师部驻伊宁市

- 61 团，霍城县，原 13 团
- 62 团，霍城县，原东风农场
- 63 团，霍城县，原幸福农场
- 64 团，霍城县，原农 3 师 7 团
- 65 团，霍城县，原清水河农场
- 66 团，霍城县，原 50 农场
- 67 团，察布查尔县，原察布查尔 1 场
- 68 团，察布查尔县，原察布查尔 2 场
- 69 团，察布查尔县，原共青团农场
- 70 团，伊宁县，原谊群农场
- 71 团，新源县，原 12 团

72 团，新源县，原 10 团
73 团，巩留县，原 11 团
74 团，昭苏县，原红旗 2 场
75 团，昭苏县，原红旗农场
76 团，昭苏县，原红旗 3 场
77 团，昭苏县，原 1 牧场
工程团，原工 2 师 14 团，
1 牧场，特克斯县，原 4 牧场
2 牧场，尼勒克县，原 9 团

5 师，师部驻博乐县

81 团，博乐县，原工程支队
82 团，精河县，原艾比湖农场
83 团，精河县，原沙山子农场
84 团，温泉县，原 4 师 3 牧场
85 团，博乐县，原红旗 2 场
86 团，博乐县，原红旗 9 场
87 团，博乐县，原红旗 7 场
88 团，温泉县，原红星 8 场
89 团，博乐县，原红星 9 场
90 团，博乐县，原红星 10 场
91 团，精河县，原托托分场

6 师，师部驻昌吉县

101 团，米泉县，原猛进农场
102 团，米泉县，原八一农场
103 团，昌吉县，原 16 团
105 团，呼图壁县，原枣园农场

106 团，呼图壁县，原马桥农场
107 团，吉木萨尔县，原下兴湖农场
108 团，奇台县，原天山 3 场
109 团，奇台县，原天山 2 场
110 团，奇台县，原奇台农场
111 团，呼图壁县，原工 1 师牧场
芳草总场，呼图壁县，原芳草湖农场
新湖总场，玛纳斯县，原新湖农场
军户农场，昌吉县，原大年户农场
共青团农场，昌吉县，原共青团农场
六运湖场，阜康县，原柳荫湖农场
上墩子场，阜康县，原土墩子农场
红旗农场，吉木萨尔县，原四厂湖农场
奇台农场，奇台县，原奇台县农场
北塔山场，奇台县，原八一农场牧场

7 师，师部驻奎屯市

121 团，沙湾县，原 21 团
122 团，沙湾县，原 19 团
123 团，乌苏县，原 20 团
124 团，乌苏县，原高泉农场
125 团，乌苏县，原 25 团
126 团，乌苏县，原车排子 1 场
127 团，乌苏县，原车排子 2 场
128 团，乌苏县，原车排子 4 场
129 团，乌苏县，原五五农场
130 团，乌苏县，原共青团农场
131 团，奎屯市，原奎屯农场

- 132 团，沙湾县，原下野地 5 场
- 133 团，沙湾县，原下野地 4 场
- 134 团，沙湾县，原下野地 3 场
- 135 团，沙湾县，原沙门子农场
- 136 团，克拉玛依市，原小拐农场
- 137 团，克拉玛依市，原乌尔禾农场

8 师，驻师部石河子

- 141 团，沙湾县，原安集海 7 场
- 142 团，沙湾县，原 22 团
- 143 团，沙湾县，原 23 团 5 分场
- 144 团，沙湾县，原 23 团 3、6 分场
- 147 团，玛纳斯县，原 30 团
- 148 团，玛纳斯县，原莫索湾 2 场
- 149 团，玛纳斯县，原莫索湾 5 场
- 150 团，玛纳斯县，原莫索湾 6 场
- 151 团，沙湾县，原紫泥泉种羊场
- 152 团，石河子，原独立团

9 师，师部驻额敏县

- 161 团，裕民县，原 12 团
- 162 团，塔城县，原叶尔盖提农场
- 163 团，额敏县，原塔城农场
- 164 团，塔城县，原乌拉斯台农场
- 165 团，额敏县，原达因苏农场
- 166 团，额敏县，原锡伯提农场
- 167 团，额敏县，原麦海因农场
- 168 团，额敏县，原乌什水农场

- 169 团，额敏县，原红星农场
- 170 团，托里县，原托里种羊场
- 团结农场，额敏县，原示范农场
- 工建团，额敏县

10 师，师部驻阿勒泰

- 181 团，阿勒泰，原 28 团
- 182 团，福海县，原 29 团
- 183 团，福海县，原 33 团
- 184 团，哈巴河县，原 35 团
- 185 团，哈巴河县，原哈巴河农场
- 186 团，吉木乃县，原吉木乃农场
- 187 团，福海县，原北屯 2 场
- 188 团，福海县，原北屯 3 场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总部，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26 团，桦川县，原宝山农场，1970 年组建为兵团战备值班步兵团

63 团，汤原县，原汤原农场，1970 年组建为兵团炮团

1 师，师部驻北安县

1 团，爱辉县，原北方农场，后改名锦河农场

2 团，原为爱辉县新华农场，1970 年团部迁往北安县赵光地区，原属单位划归 1 团，7 团下属 7、8、9 营（原红星农场）划归 2 团

3 团，孙吴县，原红色边疆农场

- 4 团，原逊克县库尔滨农场，1973 年改为 1 师独立 1 营，驻北安县的 68 团改为 4 团
- 5 团，德都县，原五大连池农场
- 6 团，德都县，原二龙山农场
- 7 团，北安县，原赵光农场
- 64 团，孙吴县，1970 年由 1 师独立 4 营（辰清农场）改建，1972 年并入 3 团
- 68 团，北安县，1970 年由 7 团 4、5、6 营（原建设农场）组成，1972 年改为 1 师 4 团

2 师，师部驻萝北县

- 8 团，绥滨县，原 290 农场
- 9 团，绥滨县，原绥滨农场
- 10 团，萝北县，原江滨农场
- 11 团，萝北县，原军川农场
- 12 团，萝北县，原名山农场
- 13 团，萝北县，原延军农场
- 14 团，萝北县，原青年农场，后改名向阳农场
- 15 团，萝北县，原宝泉岭农场
- 16 团，鹤岗市，原伏尔基农场，后改名新华农场
- 17 团，原汤原县汤原农场，1970 年迁到萝北县蒲鸭河地区建普阳农场，原辖区域移交 63 团
- 独立 1 团，嘉荫县，原嘉荫农场
- 独立 2 团，铁力县，原铁力农场

3 师，师部驻集贤县

- 18 团，集贤县，原友谊农场
- 19 团，宝清县，原 597 农场

- 20 团，宝清县，原 852 农场
- 21 团，宝清县，原 853 农场
- 22 团，饶河县，原饶河农场
- 28 团，集贤县，原 291 农场
- 29 团，双鸭山市，原集贤农场
- 30 团，桦川县，原万宝农场，后改名江川农场
- 31 团，桦南县，原曙光农场
- 32 团，勃利县，原北兴农场
- 58 团，饶河县，建于 1969 年，后改为红旗岭农场

4 师，师部驻密山县

- 33 团，虎林县，原 854 农场
- 34 团，虎林县，原 858 农场
- 35 团，虎林县，原和平农场，后改名庆丰农场
- 36 团，虎林县，原 850 农场，1974 年撤消，所属单位划入 33、38、39 团
- 37 团，虎林县，原 856 农场
- 38 团，虎林县，原农垦部实验场，后改名 850 农场
- 39 团，虎林县，原云山农场
- 40 团，密山县，原 8511 农场
- 41 团，密山县，原 855 农场
- 42 团，密山县，原 857 农场
- 43 团，密山县，原兴凯湖农场
- 44 团，鸡东县，原 8510 农场

5 师，师部驻齐齐哈尔市

- 45 团，嫩江县，原鹤山农场
- 46 团，嫩江县，原跃进农场

- 47 团，嫩江县，原大西江农场
- 48 团，嫩江县，原铁锋农场，1974 年并入 5 师 49 团
- 49 团，嫩江县，原尖山农场
- 50 团，原嫩江县前锋农场，1970 年所属单位并入 49、51 团，
55 团 2、3、4 营编为 50 团（甘南县，丰收农场）
- 51 团，嫩江县，原荣军农场
- 52 团，嫩江县，原旭光农场，1974 年并入 5 师 45 团
- 53 团，嫩江县，原红五月农场
- 54 团，克山县，原克山农场
- 55 团，甘南县，原查哈阳农场
- 56 团，甘南县，原音河农场、阿伦河农场
- 67 团，甘南县，1970 年从 55 团分出，建金边农场
独立 3 团，安达县，原红色草原牧场

6 师，师部驻富锦县

- 23 团，饶河县，原 859 农场，1969 年由 3 师划归 6 师
- 24 团，饶河县，原胜利农场，1969 年由 3 师划归 6 师
- 25 团，富锦县，原七星农场，1969 年由 3 师划归 6 师
- 27 团，同江县，原勤得利农场，1969 年由 3 师划归 6 师
- 57 团，富锦县，建于 1969 年，后改名大兴农场
- 59 团，同江县，建于 1969 年，后改名青龙山农场
- 60 团，同江县，建于 1969 年，后改名前进农场
- 61 团，富锦县，建于 1968 年，后改名创业农场
- 62 团，饶河县，建于 1969 年，后改名红卫农场
- 68 团，抚远县，1973 年由 23 团反修营扩建，后改名前哨农
场

3.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总部，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化纤厂，呼和浩特市

工程团，呼和浩特市

发电厂，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

化肥厂，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

1 师，师部驻巴盟磴口县

1 团，磴口县朝阳镇，原乌兰布和农场

2 团，磴口县红卫镇，原巴彦套海农场

3 团，磴口县卫国镇，原哈腾套海农场

4 团，磴口县戍边镇，原太阳庙林场

5 团，磴口县建国镇，原包尔套勒盖农场

6 团，磴口县反修镇，新建点，包尔套勒盖西

7 团，磴口县红旗镇，原纳林套海农场

2 师，师部驻巴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

11 团，乌拉特前旗，原乌海劳改农场

12 团，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原乌海劳改农场

13 团，包头市西水泉，工业团，下属采石厂、阀门厂、拖修厂、风机厂、化工厂、无线电厂、浆粕厂、造纸厂、农药厂等

14 团，乌拉特前旗苏独仑，原苏独仑国营农场

15 团，五原县建丰，原建丰劳改农场

16 团，中后旗牧羊海，原东方红种羊场

17 团，乌拉特前旗中滩，原中滩劳改农场

- 18 团，包头市万水泉，原共青农场
- 19 团，乌拉特前旗坝头，原乌梁素海水产局
- 20 团，杭锦旗独贵特拉，原独贵特拉公社、杭锦淖公社
- 62 团，乌拉特前旗大余太，原苏独仑农场牧业队

3 师，师部驻巴盟临河县

- 21 团，临河县军垦镇，原临河劳改农场
- 22 团，临河县屯垦镇，原狼山劳改农场
- 23 团，杭锦旗巴拉亥，原巴拉亥林场
- 25 团，杭锦旗扎尔格郎图，原改改召林场等
- 26 团，临河县石兰计，原石兰计公社
糖厂，临河县

4 师，师部驻伊盟海渤湾市

- 8 团，乌达市，乌达市属农场、林场等，原属 1 师
- 24 团，海渤湾市，原属 3 师
- 34 团，磴口县碱柜，原接收朝格乌拉牧场，后随师部西迁
- 35 团，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碱矿
玻璃厂，海渤湾市

5 师，驻师部锡盟西乌珠穆沁旗

- 31 团，西乌旗阿巴哈纳尔旗，原锡林郭勒种畜场等，原属 4 师
- 32 团，西乌旗阿巴哈纳尔旗，原毛登牧场，原属 4 师
- 41 团，西乌旗高力罕，原高力罕牧场
- 42 团，西乌旗哈拉根台，原哈拉根台公社，后划归兵团直属
- 43 团，西乌旗宝日格斯台，原宝日格斯台牧场
- 44 团，西乌旗彦吉嘎庙，原罕乌拉公社

6 师，师部驻锡盟东乌珠穆沁旗东风

51 团，东乌旗红星镇，原哈拉盖图牧场

52 团，东乌旗红边镇，原乌拉盖牧场

53 团，东乌旗红疆镇，原贺斯格乌拉牧场

54 团，东乌旗红光镇，原满都宝力格牧场

55 团，东乌旗红建镇，原宝格达山林场等

57 团，东乌旗五七镇，原煤矿、发电厂等

4.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总部，驻甘肃省武威黄羊镇

1 师，师部驻玉门镇官庄

1 团，安西县西湖，原 11 师 7 团，西湖农场

2 团，安西县踏实滩，原 11 师 6 团，小宛农场

3 团，玉门市蘑菇滩，原 11 师 2 团，蘑菇滩农场

4 团，靖远县中堡坪，原 11 师 11 团，饮马农场

5 团，玉门市黄花滩，原 11 师 1 团，黄花农场

6 团，酒泉边湾，原 11 师 3 团，下河清农场

7 团，金塔县生地湾，原 11 师 9 团，生地湾农场

工程团，原 11 师工程团

2 师，师部驻河西堡

11 团，张掖老寺庙滩，原 11 师 4 团，老寺庙农场

12 团，山丹四坝滩，原 11 师 10 团，四坝农场

13 团，永昌黑土洼，原 11 师 8 团，八一农场

14 团，武威黄羊镇铧尖滩，原 11 师 5 团，黄羊河农场

15 团，甘谷县城，原 11 师 12 团，白石嘴、前坝等农场

16 团，景泰县一条山，从原 11 师 11 团分出，一条山农场

林建师，师部驻西峰镇

1 团，庆阳县巴家嘴

2 团，老合水县城

3 团，华亭县安口镇

4 团，宁县湘乐

4 师，师部驻青海省格尔木

26 团，原 12 师 1 团，格尔木劳改大队

27 团，原 12 师 2 团，海西州马海农场

28 团，原 12 师 3 团，格尔木劳改支队

29 团，原 12 师工程团

5.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总部，云南省思茅

独 1 团，文山州砚山县，原平远街、稼依等农场

独 2 团，玉溪地区元江县，原甘庄农场、红河农场

独 3 团，大理州宾川县，原太和农场、宾居农场

独 4 团，曲靖地区陆良县，原陆良农场

独 5 团，思茅地区江城县，原红星农场、省第四“五·七”干校

水 1 团，西双版纳州勐腊县，1974 年 8 月并入 1 师 6 团、20 团

水 2 团，西双版纳州勐腊县，1974 年 8 月移交 1 师 19 团

水 3 团，西双版纳州景洪县，1974 年 8 月并入 1 师 4 团

水 4 团，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水 5 团，西双版纳州勐海县

1 师

1 团，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原景洪农场

2 团，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原东风农场

3 团，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原勐养农场

4 团，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原橄榄坝农场

5 团，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原黎明农场

6 团，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原勐腊农场

19 团，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原勐醒农场

20 团，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原勐满农场

独立 1 营，思茅地区孟连县，原孟连农场

独立 2 营，原振东农场

独立 3 营，原红星农场

2 师

7 团，耿马县，原勐定农场

8 团，耿马县，原勐撒农场

9 团，沧源县，原勐省农场

独立 4 营，耿马县，原耿马农场

独立 5 营，双江县，原双江农场

独立 6 营，永德县，原永康农场

独立 7 营，永德县，原勐底农场

3 师

10 团，德宏州陇川县，原陇川农场

11 团，德宏州瑞丽县，原瑞丽农场

- 12 团，德宏州潞西县，原遮放农场
- 13 团，德宏州盈江县，原盈江农场
- 14 团，德宏州潞西县，原芒市、遮相农场
- 15 团，保山县，原潞江、新城农场

4 师

- 16 团，河口县，原河口农场、红河公社
- 17 团，弥勒县，原弥勒东风农场
- 18 团，金平县，原勐拉（金平）农场

6.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总部，驻海南岛海口市

1 师，师部驻海南岛琼山县道美

- 1 团，文昌县，原南阳农场
- 2 团，琼山县，原大坡农场
- 3 团，琼山县，原红明农场
- 4 团，琼海县，原东升农场
- 5 团，定安县，原中瑞农场
- 6 团，琼海县，原东红农场
- 7 团，文昌县，原文昌站农场
- 8 团，文昌县，原东路农场
- 9 团，琼山县，原三江农场
- 10 团，定安县，原南海农场
- 11 团，琼山县，原桂林洋农场
- 12 团，文昌县，原罗豆农场
- 13 团，定安县，1970 年新建，后改名金鸡岭农场

14 团，原彬村山华侨农场

2 师，师部驻海南岛万宁县兴隆

1 团，琼海县，原南俸站农场

2 团，琼海县，原东太农场

3 团，琼海县，原东平农场

4 团，万宁县，原东岭农场

5 团，万宁县，原东兴农场

6 团，万宁县，原东和农场

7 团，万宁县，原新中农场

8 团，万宁县，原兴隆华侨农场

9 团，万宁县，原南林农场

10 团，陵水县，原岭门农场

11 团，陵水县，原南平农场

12 团，琼海县，1970 年新建，后改名白石岭农场

3 师，师部驻海南岛保亭县通什

1 团，保亭县，原畅好农场

2 团，保亭县，原通什茶场

3 团，保亭县，原新星农场

4 团，保亭县，原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

5 团，保亭县，原金江农场

6 团，保亭县，原新政农场

7 团，保亭县，原南茂农场

8 团，崖县，原南田农场

9 团，保亭县，原三道农场

10 团，崖县，原红星农场，后改名南新农场

11 团，崖县，原南岛农场

- 12 团，崖县，原立才农场
- 13 团，崖县，原南滨农场
- 14 团，乐东县，原保国农场
- 15 团，乐东县，原保显农场
- 16 团，乐东县，原乐光农场
- 17 团，乐东县，原乐中农场
- 18 团，乐东县，1970 年新建，后改名抱伦农场
- 19 团，乐东县，1970 年新建，后改名福抱农场
- 20 团，乐东县，1970 年新建，后改名山荣农场

4 师，师部驻海南岛昌江县石碌

- 1 团，东方县，原广坝农场
- 2 团，东方县，原东方农场
- 3 团，东方县，原红泉农场
- 4 团，昌江县，原红田农场
- 5 团，昌江县，原叉河农场，后改名红林农场
- 6 团，白沙县，原金波农场
- 7 团，白沙县，原白沙农场
- 8 团，白沙县，原牙叉农场
- 9 团，白沙县，原卫星农场
- 10 团，白沙县，原龙江农场
- 11 团，白沙县，原珠碧江农场
- 12 团，白沙县，原芙蓉田农场
- 13 团，白沙县，大岭农场
- 14 团，儋县，原红岭农场
- 15 团，白沙县，1970 年新建，后改名为邦溪农场

5 师，师部驻海南岛临高县加来

- 1 团，儋县，原西培农场
- 2 团，儋县，原西华农场
- 3 团，儋县，原西庆农场
- 4 团，儋县，原西联农场
- 5 团，儋县，原西流农场
- 6 团，儋县，原新盈农场
- 7 团，临高县，原加来农场
- 8 团，临高县，原红华农场
- 9 团，澄迈县，原红光农场
- 10 团，澄迈县，原金安农场
- 11 团，澄迈县，原西达农场
- 12 团，澄迈县，原昆仑农场
- 13 团，澄迈县，原和岭农场
- 14 团，儋县，原兰洋农场
- 15 团，儋县，原龙山农场

6 师，师部驻海南岛琼中县牙挽

- 1 团，澄迈县，原红岗农场
- 2 团，屯昌县，原晨星农场
- 3 团，屯昌县，原黄岭农场
- 4 团，屯昌县，原中坤农场
- 5 团，琼中县，原新进农场
- 6 团，琼中县，原大丰农场
- 7 团，琼中县，原阳江农场
- 8 团，屯昌县，原南吕农场
- 9 团，屯昌县，原中建农场
- 10 团，琼中县，原乌石农场

- 11 团，琼中县，原南方农场
- 12 团，琼中县，原白马岭茶场
- 13 团，琼中县，原岭头茶场
- 14 团，琼中县，运加钗农场
- 15 团，琼中县，原长征农场
- 16 团，琼中县，原乘坡农场
- 17 团，屯昌县，1971 年新建，后改名广清农场
- 18 团，琼中县，1971 年新建，后改名太平农场
- 19 团，琼中县，原新伟农场，后改名红卫农场

7 师，师部驻雷州半岛海康县龙门

- 1 团，海康县，原奋勇华侨农场
- 2 团，海康县，原火炬农场
- 3 团，海康县，原红卫农场，1975 年与 7 师 6 团合并为金星农场
- 4 团，海康县，原南光农场
- 5 团，海康县，原幸福农场
- 6 团，海康县，原金星农场
- 7 团，海康县，原收获农场
- 8 团，海康县，原东方红农场
- 9 团，徐闻县，原五一农场
- 10 团，徐闻县，原勇士农场
- 11 团，徐闻县，原南华农场
- 12 团，徐闻县，原海鸥农场
- 13 团，徐闻县，原友好农场
- 14 团，徐闻县，原红星农场

8 师，师部驻湛江市霞山

- 1 团，化州县，原星火农场，1975 年与 8 师 2 团合并为新时代农场
- 2 团，化州县，原新时代农场
- 3 团，化州县，原新华农场
- 4 团，化州县，原化州研究所
- 5 团，化州县，原和平农场
- 6 团，化州县，原兰山农场
- 7 团，廉江县，原太平农场改称红湖农场
- 8 团，化州县，原桃园农场改称红阳农场
- 9 团，化州县，原官桥农场改称红峰农场
- 10 团，化州县，原建设农场
- 11 团，廉江县，原黎明农场
- 12 团，廉江县，原塘蓬农场
- 13 团，廉江县，原长山农场
- 14 团，廉江县，原东升农场
- 15 团，廉江县，原青平农场改称红江农场
- 16 团，廉江县，原晨光农场
- 17 团，遂溪县，原前进农场
- 18 团，遂溪县，原螺岗岭农场，1975 年与 8 师 17 团合并为前进农场
- 19 团，湛江市，原湖光农场

9 师，师部驻高州县县城

- 1 团，阳江县，原鸡山农场
- 2 团，信宜县，原红旗农场；北界农场在兵团组建时编为 9 师 1 团，1970 年 2 月撤消，并入 9 师 2 团
- 3 团，高州县，原大井农场

- 4 团，高州县，原胜利农场
- 5 团，高州县，原黎垌农场
- 6 团，高州县，原团结农场
- 7 团，高州县，原火星农场
- 8 团，电白县，原曙光农场
- 9 团，电白县，原水丰农场
- 10 团，阳春县，原乔连农场
- 11 团，阳春县，原卫星农场
- 12 团，阳春县，原三叶农场
- 13 团，阳春县，原阳春华侨农场
- 14 团，阳江县，原红旗五月农场
- 15 团，阳江县，原红十月农场
- 16 团，阳江县，原织簧农场
- 17 团，阳江县，原平岗农场

10 师，师部驻海南岛儋县雅星市

- 1 团，儋县，原总后勤部八一农场 1、2 分场
- 2 团，儋县，原八一农场 3、5 分场
- 3 团，儋县，原八一农场 4 分场、畜牧队

主要参考书目

1.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2.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
3.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稿》，1981年10月。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年10月—1984年9月）》，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5.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谭宗级、郑谦等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7. 农垦部政策研究室、农垦部国营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研究室合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8. 张林池主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9. 国务院知青办编：《知青工作文件选编》，1981年。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7辑《农业财务（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1.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
12. 农业部农垦局编：《为建设大寨式农场而奋斗》，农业出版社1977年版。
13. 农业出版社编：《农业学大寨》，第22辑，1978年。
14. 李可、赫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刘培植：《国营农场四十年》，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
16. 王瑞璞、孙启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3卷（1966—1976），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1988年。
18. 王年一：《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李澄、晓季、王立兵主编：《建国以来军史百桩大事》，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0. 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
21. 费声：《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
22. 《北大荒风云录》编辑委员会编：《北大荒风云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23. 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
24. 贺鹏、陈广斌编：《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25. 《青春无悔》编辑组编：《青春无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6. 《草原启示录》编委会编：《草原启示录》，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27. 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28. 托马斯·伯恩斯坦著，李枫等译：《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9.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30. 刘文杰：《激扬与蹉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1.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资料室1994年12月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论文选编》。

32. 《历史为平凡作证（海南、广东兵团知青生活回顾展选辑）》，岭南美术出版社 1993 年版。
33. 宫异娟、黄建军主编：《戈壁岁月——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生活纪实》。
34. 魂系黑土地编委会编：《魂系黑土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5. 郭小东：《青年流放者》，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 年版。
36. 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37. 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38. 《知青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39. 李广平编：《中国知青悲欢录》，花城出版社 1993 年版。
40. 余夫、汪卫华编：《悲枪青春：中国知青泪》，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41. 老久、锋子主编：《难言“太学生”——“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红旗出版社 1994 年版。
42. 闵云森主编：《咱们老三届》，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43. 《命运列车——知青返城沉浮录》，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44. 王江主编：《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年版。
45. 刘中陆主编：《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46. 贺绍俊、杨瑞平主编：《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47. 《当代中国的西藏》，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48. 《当代中国的新疆》，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49. 《当代中国的云南》，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50. 《当代中国的广东》，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51. 《当代中国的安徽》，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52. 《当代中国的宁夏》，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0 年版。
53. 《当代中国的北京》编辑部：《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1989）》，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
54. 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编：《云南省情（1949—1984）》，云南人

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5. 宁夏区情编写组：《宁夏区情》，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56.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安徽省情（1949—1985）》，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57. 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编：《浙江省情》，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8. 中共山东省委研究室主编：《山东省情》，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59. 《黑龙江历史编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60.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局、档案馆编：《内蒙古自治区大事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61.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62. 《内蒙古自治区概况》编写组编：《内蒙古自治区概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63.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局 1973 年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

6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65. 苏桦主编：《当代安徽大事记（1949—1985）》，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66.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67. 思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思茅县志》，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68. 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69. 成都军区西南戍边概览编写组：《西南戍边概览》，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70. 房艺杰编著：《论兵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7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物资志编纂领导小组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物资志》，1992 年版。

72. 张友德：《新疆农垦经济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7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师局院校概况》，1992 年版。

74. 黑龙江人民政府办公厅史志办公室编：《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施政纪

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75. 杨遇春主编：《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76. 《黑龙江省志》第 14 卷《国营农场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77. 黑龙江省牡丹江国营农场管理局农垦史编写办公室编：《牡丹江农垦史（1947—1985 年）》，1989 年版。

78. 黑龙江省延军农场场志办公室编：《延军农场志》，1991 年版。

79.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场志办公室编：《宝泉岭农场志》，1990 年版。

80. 黑龙江九三国营农场管理局局志办公室编：《九三农垦志（1949—1985）》，1986 年版。

81. 黑龙江名山农场史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名山农场史（1955—1985）》，1988 年版。

82.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83. 云南农垦志资料丛书编纂小组编：《云南农垦纪略》，1990 年版。

84. 云南省黎明农工商联合公司史志办公室编：《“黎明”三十年之一：大事记稿（1955—1987）》，1988 年版。

85.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农垦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86. 广东省国营中坤农场（广州兵团六师四团）场志编写组编：《国营中坤农场志》，1986 年版。

87. 广东省国营南吕农场（广州兵团六师八团）场志办公室编：《国营南吕农场志》，1988 年版。

88. 广东省国营中建农场场志编写办公室编：《国营中建农场志》，1987 年版。

89. 广东省国营晨星农场场志编写组编：《国营晨星农场志》，1987 年版。

90. 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甘肃省志》第 19 卷《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91.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第 12 卷《农业志、渔业志》，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92. 西藏农垦概况编写组编：《西藏农垦概况》，1986 年版。

93. 陈宪主编：《江西农垦经济的昨天今天明天》，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94. 海南省国营红明农场编：《红明农场志》，南海出版公司 1992 年版。